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红墙纪事(中)

 **eBOOK**
网络资料 非纸书

红墙纪事

第十二章 平静的中南海起波澜。怀仁堂两军对阵。毛泽东邻居神秘失踪

“打倒刘邓”口号的出笼

1966年12月18日下午1点30分，从清华大学西门驶出一辆黑色小轿车，风驰电掣闯过一串红灯，直奔中南海。

车上坐着的是显赫一时的蒯大富。此刻张春桥正在中南海等着接见他。

差几分钟就到两点，蒯大富乘坐的小汽车驶进中南海西门。张春桥二话没说，把他领进一间套房里，随手关上了房门。

这是一次秘密接见，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

按照张春桥的需要，蒯大富首先汇报了他去上海串连和清华运动的情况。张春桥除了偶尔插句问话，就眯着他那三角眼，不时的点点头。肚子里尽是鬼点子的张春桥，没等蒯大富把话说完，就把军大衣往后一甩，向前探着身子，一字一句地向蒯大富交待说：“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然相当猖獗，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蒯大富心领神会，他心里十分明白，张春桥所指的他们，无疑就是刘少奇、邓小平。搞臭他们，就是要用一切手段，进行诬蔑，进而打倒。所以，蒯大富听到这里频频点头说，“请首长放心，我，我保证照，照办！……”

这次秘密接见，从下午2点持续到下午4点。

张春桥之所以把这样机密而又重大的任务交给蒯大富，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蒯大富具备了他所信赖的反革命条件。

当时独揽清华大学一切权力的蒯大富，原是化工系学生。此人权欲熏心，“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就贴出了“一鸣惊人”的夺权大字报。公开声明：他眼里盯着权，心里想着权，手里要抓权，迟早要夺权。他对林彪“有权就有一切”的谬论颇有研究，从他自身的体会中很得意地总结出“36条夺权经”。他有一套善于钻营的本事，打砸抢抄抓，样样皆通；他张口革命，闭口造反，这一套深得江青、张春桥的赏识，因而康生、陈伯达给他贴上了“坚定左派”的标签。1966年9月24日，蒯大富在中央文革某些人的支持下，拉起了山头，篡夺了清华大学的领导权。紧接着，他又混上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司令的头衔，陈伯达公开表态说，一司、二司是保守派，只有三司才是真正的造反派，蒯大富起了中央文革“铁拳头”的重要作用。从此，“蒯司令”的大名满天飞。

这一切，就是张春桥利用蒯大富公开跳出来反对刘少奇、邓小平的原因。

下午4点，接受了张春桥交给他“特殊使命”的蒯大富，迅速离开中南海，驱车直奔清华园。紧接着，蒯大富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对刘少奇、邓小平的罪恶活动。

当晚，蒯大富结合自己的“深刻”理解，向“井冈山红卫兵”的头头们作了紧急传达，并作了具体部署；19日，按照张春桥的旨意，蒯大富打着大联合的旗号，将清华园其他两个群众组织吞并，并主持召开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誓师大会”，公开叫嚷：“彻底砸烂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司令部！”；20日，在清华园航空馆召集他的总部头头开会，蒯大富

全盘托出了 23 日把“打倒刘邓”的行动推向全北京市的计划。他的行动计划引起了会场一阵混乱，有人提出：“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政治局常委，从来没人敢把反对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反对刘少奇我坚决不同意！”“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打倒刘邓决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蒯大富急了，“腾”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一手撑腰，一手拍着胸脯说，“首长把如此重大的任务亲自交给我们，这是中央文革对我老蒯，也是对我们大家的极大信任！由首长直接指点我们，险风恶浪也敢闯，怕什么！我们应该玩命地紧跟……”有跺脚的，有甩东西的，大伙互不相让，争论不休。不容别人争辩的霸道司令蒯大富，还是强行通过了他的行动计划，所不同的是将行动日期由 23 日推迟到 25 日。这就是 1967 年 1 月 1 日清华井冈山小报鼓吹的“井冈山兵团 12 月 25 日大行动”。

12 月 25 日，寒风刺骨，天气昏暗，沙尘弥漫的天空，太阳像个苍白的斑点。由张春桥指使、蒯大富带头的耸人听闻的反革命大行动开始了，上午，蒯大富带领着 5000 余人摇旗呐喊着从清华大学来到天安门广场，然后，他们又分成五路，由广播车嘶喊着开道，分别到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处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大标语，进行反革命宣传，对刘少奇、邓小平竭尽诬陷、谩骂之能事。刹时间，把北京城搞得乌烟瘴气，“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的巨幅大标语，铺天盖地而来，贴上了天安门城墙，贴满了大街小巷。同时还宣布声明：

- （一）强烈要求王光美回清华作检查；
- （二）薄一波必须在 1966 年 12 月 29 日以前回清华交待反革命罪行；
- （三）王任重必须在 1966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回清华还账。

这个反革命行动持续了整整一天。

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就像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北京城，震惊了全国，震惊了全世界。广大人民对蒯大富的行动表现出极端的不满。他们气忿他说：“这些乌龟王八蛋是存心要把我们这个好端端的国家搞垮呵！是谁支持蒯大富这么干的？！”

蒯大富的罪恶行动受到首都人民的谴责！

序幕由蒯大富拉开了，进一步迫害刘少奇的行动就一个接着一个的开始了。

中南海并不平静

1967 年 1 月是严寒而又阴冷的。“全面夺权”的黑风很快扫遍全国。林彪、江青一伙对刘少奇的迫害，自然不会停留在“绘画绣花”的阶段。

1 月 6 日，在江青等人的疯狂怂恿下，清华大学的蒯大富之流以狡诈的手段，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却还夸耀什么“智擒王光美”。他们诈称刘少奇女儿刘平平在学校作检查后的归途中被车轧断了腿，马上需要截肢。听到这个消息，王光美一口气噎在胸间，双眼直瞪瞪地看着刘少奇。刘少奇说：“马上到医院去。”王光美着急他说：“总理不让我离开中南海呀！”“你不去我去！这么小的孩子为了我挨斗……”刘少奇、王光美赶到医院不见刘平平，却看见被扣作人质的刘源源和刘亭亭。周围的清华“造反派”一见刘

少奇进来，都愕然不知所措。这时，刘源源急切地对王光美说：“他们就是为了要抓你。”王光美一听，只身迎上去说：“不是王光美的都走！”自己一人留在了“造反派”中间。接着王光美严肃地对“造反派”说：“你们为什么用这种手段骗我出来？”“造反派”望着头顶的天花板，一字一句他说：“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们搞的，嗯！？……”

刘少奇和刘源源、刘亭亭及工作人员刚回到家里，只见刘平平气喘吁吁地先等在门口（她刚从学校赶回家）。刘少奇忙问：“平平，你的腿？……”刘平平扑到刘少奇的怀里说：“我的腿没事，他们把我扣在学校，为的是把妈妈骗出来抓走啊……”刘平平和刘亭亭抱着刘少奇放声大哭。

以往的日子，每当深夜，刘少奇、王光美总要出来散步，把紧张了一天的头脑松弛一下。这天深夜，刘少奇照例出来散步，他的三个孩子陪着他，年纪较小的刘亭亭又呜咽起来，哭得是那样的伤心。她这几天一直被“造反派”扣在学校里，当天早上，在全市中学生联合批斗会上做了检查，下午又被押去看刘平平挨批斗，刚被放回家，晚饭都没吃又赶到医院，眼看着妈妈被抓走。现在，妈妈在哪里呢？他们会打妈妈的呀！会拉妈妈去游街的呀！

刘少奇又何尝不难过呢。他爱怜地抚摸着刘亭亭的头。一边走一边还给孩子们讲夜空的星星……寒风呼啸，繁星闪烁，孩子们仿佛在荒野上漫游，无边无际的黑暗，要把他们吞没。但是，听到爸爸轻匀的脚步声，他们心里涌起了一股暖流。刘少奇步履缓慢地走着，依然是那么从容而又安详，只字不提白天发生的一切。刘亭亭默默捧起刘少奇那长满老人斑的手，紧贴在自己滚烫的小脸上，一颗炽热幼嫩的心脏与一颗同样炽热而又坚强的心脏靠在一起了，奔腾的小溪与浩浩江水汇在一起了。

在周恩来的干预下，王光美终于回来了，刘少奇见到她，只说了一句：“平平、亭亭哭了！”江青终于达到了她的目的——利用刘少奇一家父母儿女的亲密感情，来摧残折磨刘少奇、王光美的心！

光是摧残折磨刘少奇的心，他们自然是觉得不够的，江青一伙开始直接批斗刘少奇了。1967年1月上旬的一天，中南海的一些“造反派”冲进刘少奇的家，在院里、办公室里贴满了大标语。在批斗会上，当刘少奇的答辩使质问者理屈词穷时，一个“造反派”突然蹦出来，让刘少奇当场背出语录本某一页的某一条。刘少奇背不出，那些人大声嘲笑青。他的子女们真想上前去提醒爸爸，但中间隔着一层层的人。而刘少奇却镇定自若他说：“叫我背词句我背不出，你们可以问我毛主席的哪篇文章，写的内容是什么，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针对什么问题，在当时起到什么作用，在理论上有什么新创见，这些才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我是《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无论哪一篇文章的问题我都可以解答。”那个“造反派”被刘少奇说得哑口无言，便喊一阵口号，斗争会一哄而散。

1967年1月13日深夜，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让秘书乘一辆华沙牌小卧车接刘少奇去谈话。毛泽东亲切热情地接待了刘少奇，一见面就关切地问：“平平的腿好了吗？”刘少奇回答说：“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两位几十年共同合作的老战友见面了，可是这一次他们并没有谈工作。刘少奇说自己犯了错误，接着，郑重地向毛泽东提出自己经过反复考虑的要求，他说：“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

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毛泽东沉吟不语，只是不住地吸着烟。过了一会儿，他才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还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临别时，毛泽东亲自送刘少奇到门口，亲切他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刘少奇全家焦急、热切地等待着刘少奇从毛泽东那里回来。刘少奇回来后说：“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叮嘱我认真学习，保重身体。”王光美和孩子们听了，感到悬在心中的石头一下子落了下来，心中暗想，情况也许会好起来的。

但是，没有安稳两天，中南海的一些“造反派”，在江青、戚本禹的直接指使下，又一次冲进刘少奇家，还要冲刘少奇办公室。他们贴大字报，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叫他们站在一张独腿的桌子上。白发苍苍的刘少奇伫立在凛冽的寒风中，镇定地面对着嘈杂的喊叫声，坚定有力他说：“我从来没有反对毛泽东思想，只是有时候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只是在工作上有过意见分歧……”

1月16日的深夜12点以后，周恩来打电话给王光美说：“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这在当时是多么大的信任和同情呀！一句话激起王光美心中的千言万语，然而，几句言语又如何能表达呢？王光美只说了一句：“总理，你真好。”

第二天一早，也就是在毛泽东谈话以后第四天，中南海某电话局的一些“造反派”闯进办公室，要撤刘少奇的电话。刘少奇一听，霍地站了起来，迎上去阻拦，斩钉截铁他说：“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批示，你们不能撤，也无权撤！”这一伙人只好悻悻而去。第二天，他们又气势汹汹地闯进来，二话不说，把电话线扯断。从此，断绝了刘少奇和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政治局的一切联系。

刘少奇久久地站在那里，像座雕像似的一动也不动，而他的孩子们呢？一直追到门口，望着那伙人大摇大摆走去。他们头脑一阵轰响，心里痛苦极了。

刘少奇和外界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了。每天清早他的孩子们就骑自行车出门，排着长长的队买小报，从墙上揭下传单，挤在人群中抄大字报，侧耳听着人们的议论。回到家里把所见所闻告诉爸爸、妈妈。

在他们买回的这些小报里，充满了对刘少奇形形色色的诬蔑。其中有一张小报上无中生有他说刘少奇曾吹捧电影《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还造谣说刘少奇曾自诩为“红色买办”。对于这些令人恶心的谰言，刘少奇不屑作什么解释。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工人运动，站在反帝斗争前列。大革命期间，29岁的刘少奇——一个共产党员，直接领导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英勇斗争。这是几十年来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一次前所未有的胜利。这些小报的造谣诬蔑，岂能改变历史？不过刘少奇觉得这毕竟是一种不寻常的信号，不可等闲视之。刘少奇回到办公室，立刻提笔疾书，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驳斥了这种造谣诽谤，这天是1967年3月28日。

历史的颠倒，不仅使孩子们不可思议，就连刘少奇这样历尽人间沧桑的老革命也不能理解。而他凭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凭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坚定不移的信仰，准备接受严峻的考验。可是，刘少奇万万没有想到考验竟来得如此猝然。

4月1日，各报登载了戚本禹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刘少奇气愤已极，他把报纸狠狠一摔，对孩子们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刘少奇越说越愤怒：“我早在去年8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在中央委员会辩论，在人民群众中辩论嘛！我还要为这个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

刘少奇的话是那样理直气壮，正义凛然，强烈地震撼着孩子们的心。可是，刘少奇如今却处在毫无发言权的“被告席”上，哪里有人会理会他这一正义的要求呢？心里怀着鬼胎的阴谋家又哪里敢接受刘少奇这一严正的挑战呢？作为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刘少奇，不仅没有在党的会议上申辩的权利，也没有在人民群众中辩明是非的权利。

4月6日晚，中南海的一些“造反派”，高喊着口号冲进刘少奇的办公室，向他宣布勒令：必须自己作饭、打扫卫生、洗衣服，改变作息时间（过去刘少奇的习惯是夜里工作，上午睡觉），还就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中的所谓“八大罪状”提出质问，要刘少奇回答并写出交代，刘少奇按照提出的质问，用铁的事实逐条据理驳斥。当质问到所谓61人叛徒集团的问题时，刘少奇一下子发了火。这是刘少奇第一次发那么大的脾气。他激怒他说：“这个问题简直是岂有此理。61人出狱之事，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要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再让日寇把他们杀了。当时王明路线使白区党组织大部分受到破坏，这些同志是极宝贵的。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论嘛。”“我们许多干部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有白区工作经验，有城市工作经验。这些经验都是在长期斗争中，通过成功与失败，靠鲜血总结出来的，不能全部否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总结过。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又懂得建设新中国的干部是最宝贵的，怎能把他们统统打倒呢？”

4月7日，刘少奇交出一篇关于“八大罪状”的答辩，说明一部分事实真相。工作人员把原件上送，抄了一份大字报在中南海内贴出。几个小时后，那张答辩的大字报就被撕得粉碎。林彪、江青一伙，完全剥夺了刘少奇讲话答辩的一切权利。在斗争会上，每当刘少奇用事实进行答辩，他们就用小红书敲打刘少奇的脸和嘴，说什么“不准放毒”，不让刘少奇讲一句话。刘少奇连一个公民的发言权都被完全剥夺了。

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至，使刘少奇精神上受到了痛苦的折磨，加上突然改变作息时间，限制安眠药量，刘少奇已有几天没有睡觉，身体搞得很弱了。4月8日，通知王光美去清华大学作检查，这对刘少奇又是一个大打击。

这天晚饭后，王光美正和三个孩子谈外面的情况，刘少奇突然扶着墙走进来，面色铁青，大滴大滴的汗珠顺着面颊淌下来。王光美赶快搀扶刘少奇回卧室，孩子们去叫大夫。那天晚上，刘少奇几次晕厥。大夫给了几片药，转身走了。王光美和孩子们守候在刘少奇身旁，只见他躺在床上，双目紧闭，白发如雪。谁能想到，这位安详地躺着的老人，曾经肩负着八亿中国人民赋予的重任。在人民需要他的时候，他从不畏缩不前。如今，中国大地上血雨腥风，他却病倒了。望着刘少奇清瘦的面庞，一年以前他一次重病后和孩子们谈话的情景，又浮现在他们的前面：

那是 1966 年初，刘少奇害了一场重病，他刚刚脱离危险，就把孩子们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叫到跟前，感慨万分他说：“看来，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必须更抓紧时间多干些事。只要马克思再给我十年时间，我们是能够把中国建设得真正富强起来的。”接着，刘少奇给孩子们描述了他的设想：如何整顿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如何改革教育，实行全日制和半工半读两种教育制度；如何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如何缩小三大差别，等等。刘少奇当时还举例说，我们在山东、河北一带发现了大油田，建立工业基地，这可以使荒僻的小镇发展成新型的工业城市。有电、有油、有铁路和公路网，同时带动附近农村现代化。在招工时要注意招收女工，不要使农田中只剩下女社员干活。刘少奇不仅有宏伟的设想，而且有脚踏实地的措施。他讲着讲着，两眼透过明亮的窗户，望着窗外飞舞的白雪，仿佛看到了未来的蓝图正在眼前展现。“到了那时候，我们就为中国的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也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可以瞑目了。”

仅仅在一年前，刘少奇还是那么自信，心中充满了革命的豪情。如今，他身处逆境，不仅那些美好的愿望变得渺茫，而且还被无端地强加上种种恶名。

4 月 9 日中午吃饭的时候，刘平平说：“听说，清华大学‘造反派’要组织三十万人大会批斗妈妈……”

刘少奇一听，立即震怒了，他推开饭碗，大声激昂他说：“我有错误我承担，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要作检查，要挨斗，我去！我去见群众！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群众？”刘少奇胸中的激愤终于像火山似地爆发了。

王光美急切他说：“清华大学的运动是我直接参加了的，当然应该是我去向群众检查……”

“你是执行者，决策的不是你嘛。”刘少奇激动他说：“我绝没有反过党，没有反过毛主席。别人反对过毛主席，林彪反过，江青也反过，我一直是拥护主席的。在我主持中央工作的几十年里，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有，但没反过。工作错误有，但都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的。我没有搞过阴谋诡计。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得自己去改！”刘少奇说到这里，把手中的汤勺猛地往桌上一摔，手都微微颤抖了。“别人就是一贯正确的吗？要一分为二。为什么不许人家向中央文革提意见？有不同意见就把人抓起来！”

刘少奇继续说：“去年八月，我就不再过问中央工作。从那以后，错误仍在继续；将来，群众斗群众的情况还会更厉害，不改，后果更严重。责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这么多干部都被打倒了，将来的工作谁去搞？生产谁来抓？”

刘少奇停了一下，长出了一口气，似乎他的话已经说完了，激动的情绪也安静下来，恢复了以往的安详神态，亲切地望着子女们，缓慢他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王光美哭了。她泣不成声他说：“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呢？”

“会把骨灰给你们的。”刘少奇语气坚定地对子女们说，“你们是我的

儿子、女儿嘛！这一点无论什么人还是能做到的。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你们，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几个孩子眼泪早已流尽，瞪大眼睛，仔细静听，生怕漏掉一个字，默默记在心里。刘少奇说完，站了起来，坚定而又响亮他说：“共产主义事业万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共产党万岁！”说完，便回到他自己房间去了。

怀仁堂抗争

1967年2月16日下午，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室，一场激战开始了。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所谓“大闹怀仁堂”事件。会议室内，两方阵容分明。周恩来坐在会议桌中间，右边：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这是象征着“右派”，还有余秋里和谷牧。

坐在左边的有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江青有事缺席，王力来列席。他们坐在左面，象征着“左派”。

双方都是怒目而视，战云密布，一触即发，双方都在琢磨着，怎样击中对方的要害。

“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究竟有什么问题，你们揪住不放？”性格耿直，心无邪佞的谭震林，打响了头一炮，他用一双锋利的眼睛，狠狠地盯住张春桥，大声地质问：“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都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谭震林提出的大区、省领导来京问题，是因为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之后，毛泽东连续在三个不同场合，一再指示，要把各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周恩来排除多方阻拦，把一部分省委书记接到北京，可是仍有一部分在当地被无理扣押着。陈丕显就是一个。进会议室前，谭震林在门口碰到操纵上海“一月夺权”黑风的张春桥。谭震林问他：“陈丕显同志来了吗？”张春桥狡猾地答：“群众不答应呵！”此时，张春桥见谭震林又提出质问，为了激他走火，他故意说着风凉话：“这些事都要和群众商量啊，我们都得尊重群众意见嘛！”说罢，用一种挑战的目光，瞥了谭震林一眼。

“什么群众？”谭震林怒发冲冠，打断了张春桥的不负责任的诡辩，理直气壮地反问：“老是群众、群众，还要不要党的领导？”他一手指着对面中央文革的几个：“你们的目的是，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越说越气，猛地用力一拍桌子，大声道：“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不就是你们的打手么！他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一次，是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他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不做，二不休，豁出去了，什么都端出来吧！“照这样，你们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跟你们斗到底！”他把嗓门提高了八度，“我一生犯了三个错误，第一，我不应该活到今天；第二，不应该跟着毛泽东干革命；第三，不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

说罢，他拿起衣服和皮包就要向外走。

“不要走，要在这里跟他们斗嘛！”满腔怒火的陈毅喊了一声。

被气糊涂的谭震林，如梦方醒，走干什么？是退却，是临阵脱逃，要在这儿跟他们干，干到底。他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坐了下来。

陈毅接着发言。他针对林彪一伙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进行反革命两面派活动，斥责说：“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整老干部就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多少人！现在有人还背着包袱，连周总理都挨了整。”他用眼睛狠狠扫了一下坐在斜对面，假装镇静的康生，有所指他说：“除了整人，还能干什么？就是靠整人起家的嘛！”

顿时，康生的脸煞白，但他早已领教过陈毅了，如果真正一比一的短兵相接，未必是陈毅的对手，他又望望对面的几位元帅、副总理，个个怒目而视，不，他暗暗地打定了主意，这个时候上阵，他们非群起而攻之不可；他又望望自己这边的阵容，陈伯达哼哼叽叽的，三个顶不了一个。先把这口气咽下去，小不忍则乱大谋，但陈毅的话又正刺了他的疼处，他阴阳怪气地自我解嘲插了一句：“我就是整人的嘛！”

“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陈毅又望望康生，激动他说，“历史不是已经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要看，还要证明。”

“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财富。”叶剑英作了配合，“对犯错误的干部为什么要一棍子打死？要治病救人嘛！不能动不动就打倒！照这样下去，人身安全还怎么保障？还怎么做工作？”

“许多干部被揪出来斗，”身受其苦的余秋里，气得浑身发抖，愤怒地拍着桌子说，“这样残酷对待干部，照这样下去，下次再揪，我就不去，你们要怎样就怎样去吧！”

李先念接着说：“《红旗》第十三期社论，号召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全国就乱了。”“《红旗》第十三期社论你看了吗？”周恩来用严厉的目光望着康生问道。

惯于撒谎脸都不红的康生，摇摇头道：“我没看。”

“这样大的事情，”周恩来气愤他说，“为什么不给我们看一看呢？”

“对干部子女采取关监的办法，是不教而诛。”聂荣臻道，“毛主席在军委八条命令中特别加了一条，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如果父母不教育，责任就在父母。不能因为打倒老干部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现在这样迫害老干部，是搞‘落井下石’，没安好心！”

想到许多老干部被残酷斗争和凌辱，谭震林说：“我从来没哭过，现在哭了三次，哭都没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里流眼泪！”

“不要从个人感情出发嘛！”后来证明早已倒向林彪“四人帮”的公检法负责人谢富治答了腔，“要顾全大局嘛？”

“我哭不是为个人，是为整个党！”谭震林把谢富治顶了回去。

会议不欢而散。

钓鱼台 15 号楼内，江青惊讶地听着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的汇报。

党内上层人物对“文化大革命”错误做法的强烈不满和异议，不仅惹怒了江青，也吓坏了她。良久，她双眼盯着天花板，全身颤抖着。突然，她满脸杀气道：“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我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发起攻势，非把他们一网打尽不可。”但她又深感自己手下这帮人势单力薄，不是对手，她必须求援搬兵。

江青叫通了毛泽东的电话：“有紧急事，必须马上向主席汇报。”“那你就来吧！”毛泽东答应下来。

江青立刻驱车去中南海。

“什么事这样急？”毛泽东望望江青那种急不可耐的样子问道。

“他们大闹怀仁堂了。”江青十分激动，她把谭震林、陈毅、李先念等“大闹怀仁堂”说了一通，绘声绘色，添枝加叶，说着说着，她突然大哭起来：“他们这样明目张胆地胡闹，你总是姑息、迁就、退让。他们依仗着资格老，功劳大，地位高，不敢碰他们，他们背后又有周恩来的支持。这次他们是釜底抽薪，背水一战。他们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的矛头并不是对着我，而是对着你。这你还不明白吗？他们恨不能把我枪毙了，把你和林彪撵下台。现在到了关键时刻，不能再搞平衡了，他们得寸进尺。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

“那你们来汇报吧！”毛泽东紧皱着眉头道。

“我就给他们打电话。”江青破涕为笑。

汇报开始了。

毛泽东只是安详地听着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的汇报，并没有把事情看得那么重，以为只是几个老师思想不通，发发牢骚。他不以为然。

“李先念说：斯大林死后，出了个赫鲁晓夫，斯大林在世，他比谁唱的调子都高。”

听到这，毛泽东脸色变了，善于察颜观色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也知趣地不念记录了。他们心里暗喜，几句话就把毛泽东心里的火点燃了。

毛泽东站了起来，慢慢地踱着步。

他走到办公桌前，顺手拿起谭震林给他的一封信。信里骂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这哪里是对江青，分明是冲我来的。”他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

张春桥趁热打铁，又向陈毅刺了一枪，说陈毅如何对延安整风恨之入骨。

“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么？要想翻案，把王明请回来吗？”毛泽东发火了。

张春桥当晚在他的日记中洋洋得意地写道：

我们从主席那里获得了我们所想要的东西，主席的支持标志着这场斗争的转折点，我们已经稳操胜券。

2月18日晚，毛泽东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被称为“三老四帅”的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一进屋，毛泽东就没给好脸。几十年同毛泽东患难与共的老帅们，对毛泽东今天这样冷淡的态度，无不目瞪口呆，他们心里都明白，这一定是恶人先告状，江青抢先向毛泽东上“奏本”了。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早已心中有数周恩来，一看毛泽东一脸怒气的表情，就已经知道毛泽东要亲自出场。他早已思考过，今天的会议，将会比怀仁堂那次摊牌会议更加尖锐、激烈。“三老四帅”们的观点和自己完全一样，他们在怀仁堂的摊牌会议上的发言，自己是支持的。可是，现在让自己主持会议，来批判“三老四帅”，这不是把自己置于尴尬的地位吗？再说，“三老四帅”也是代自己受过呀！自己主持会议，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战友在那里挨批判，这是一种什么滋味，什么处境？自己是扮演了一名什么角色，这

比自己挨批判还痛苦。

他终于打定了主意，要尽一切力量，为战友们开脱、解围、帮腔，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全部中箭落马，果真把“三老四帅”都打倒了，那就不仅是几个人的不幸的问题，而是全国人民的不幸，全党的不幸。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暗中支持他们，不仅如此，就是在会议上，也要巧妙地为他们打接应。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较量，不能为了保存自己而牺牲战友，他们是为党、为人民，也是为了我而冲锋陷阵的呀！现在他们陷入重围了，自己能袖手旁观吗？

周恩来尽管心情沉重，但他还要装出一副不动声色的样子来主持会议。他扮演的这个角色太难了，既要保护战友，又要紧跟毛泽东，有时还要替自己的对手——中央文革帮几句腔。

打头炮的是毛泽东。如果是平时，毛泽东总是态度和蔼，甚至谈笑风生，这次却一反常态，一登场，便给“三老四帅”一个下马威。他是想用威慑的手段，镇住几个想阻止“文化大革命”的人，他面带怒容，语气严厉：“你们在怀仁堂会议上联合起来，搞突然袭击，向中央文革发难，向中央发难，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这无非是想搞宫廷政变，想让刘少奇重新上台。十一中全会你们都是举了手的。为什么没过几天，你们就反对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为什么阳奉阴违，出尔反尔呢？讨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你们也是赞成的，我没看见你们谁投过反对票，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真的发动起来之后，你们又反对它？”

几位老师和几位副总理，都惊愕地望着满脸怒容的毛泽东。

心无邪佞的谭震林，没有在毛泽东的盛怒面前胆怯、退却，他再也忍不住了，插话道：“我认为我在会议上的发言没有什么错，是符合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的。难道说文化大革命能不要党的领导吗？能不要稳定军队吗？能把老干部都打倒吗？”

陈毅也磊落坦白地从侧面配合谭震林，他说：“我就是对中央文革小组有意见，他们的许多搞法是错误的。天下让他们搞得这么乱，工人不做工，学生不上课，机关干部不上班，将来……”

“中央文革是执行十一中全会的精神。”毛泽东也大吃一惊，一向对自己的话百依百顺的副总理和老师们，怎么这样反常，针锋相对起来，这是向自己的权威挑战，他再也无法容忍了，粗暴地打断他们的话，气冲冲地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毛泽东用一种愤怒的目光，狠狠地扫了一下“三老四帅”，“你们想反对文化大革命，那办不到！”他抬头望望叶群，用着一种挑动的口吻道：“叶群同志，你回去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思想准备。”毛泽东越说火越大，他已失去常态，用着一种叫号式的语言，冲“三老四帅”道：“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去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说到这里，他怒气冲冲地向陈毅说，“让你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他又用一种应战的口气冲陈毅和谭震林道：“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那做不到，你谭震林也算是个老党员，为什么对待中央路线那么大的火气。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为什么那么反对文化大革命？”

横下一条心的谭震林，一看毛泽东这样说话，他一不做，二不休，豁出去了，气愤地顶撞道：“我不该早入党四十年，不应该跟着你干革命，也不应该活到六十五岁！”

多少年来都像众星捧月似的被捧着的毛泽东，他那“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听惯了的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今天，居然有人当面顶撞他，使他下不了台，他岂能忍受得了！

顿时，他恼羞成怒，声音沙哑地吼道：“那你可以退党嘛，就不革命嘛！不活六十五岁怎么办哪，你已经活了嘛！”

打架无好手，骂架无好口，双方你来我往的，步步升级，都不冷静，说话都出格了。

这场交锋完全出乎周恩来的意料，毛泽东发火，这在周恩来的意料中，可是谭震林如此斗胆冲撞，针锋相对地反唇相讥，太出乎他的意料了。一开始，会便开僵了，而且还在升级。尽管事先他分头向“三老四帅”打过招呼，要忍让，要认错，要检讨。这是保存实力唯一的良策。怀仁堂一场恶战，经过江青和张春桥的挑拨、煽动、火上加油，已经激怒了毛泽东。再同他面对面地唇枪舌战，这不是飞蛾投火自取灭亡吗？这种做法，正中江青等人的下怀。不能这样发展下去！

周恩来连忙打圆场，诚恳地说：“在怀仁堂会议上，几位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这主要责任在我。会后，他们也认识到这样做不对，找我也作了检查，他们也感到说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也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查。”

毛泽东心里很清楚，几位老师和几位副总理的后台就是你周恩来，表面上你是为我帮腔，实际上你这是替他们开脱、解围。但毛泽东一向是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他不能四面出击。打倒刘、邓、陶，已经天下大乱，再动周恩来，那更是不可收拾了。于是，他对周恩来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可他对“三老四帅”却毫不让步，他怒气冲冲地说：“他们根本不认错嘛！恩来同志，我提议这件事要认真地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说罢，他起身愤然退场！

毛泽东掷地有声的话，算是一锤定了音。他的“御驾”亲征，使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的江青等人，转危为安，扭转了败局，胜利是注定了。

这时，对垒双方的表情十分鲜明。坐在另一边的江青、康生、陈伯达、叶群等中央文革派，个个脸上露出趾高气扬的神情。而“三老四帅”们却感到毛泽东像一位陌生人似的。

会议室里，一片沉默。

会议主持人周恩来望望几位老师和几位副总理，语气平静地说：“根据主席的指示，像今天这样的会，还要继续开下去！”他问老师和副总理们：“谁有什么话，先说吧！”他有意地缓和一下紧张和不安的气氛。“有什么好说的。”不怕邪的谭震林恼怒地一挺脖子，“已经没有我们的发言权了。”

早已摩拳擦掌的江青，使出了全身的解数，她一身兼二任：既是反击战的总指挥，又是打头阵的先锋。

“你谭震林，那么疯狂地反对文化大革命，”江青充满杀机，气势汹汹地吼叫，“你是可耻的叛徒。你说我是武则天，武则天怎的？她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的女政治家，我就是要学她。”她一下意识到说走了嘴：“武则天使唐朝出现太平盛世的局面，这有什么不好！”她又脸冲着陈毅：“你

陈老总，仗着自己资格老，地位高，功劳大，疯狂地攻击文化大革命，老实告诉你，就是玉皇大帝下凡，想阻止文化大革命，”她激动地用力一挥拳头，威胁地说，“那是痴心妄想。文化大革命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顺者昌，逆者亡，谁想反对它，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要猛击你一掌，你再不悬崖勒马，顽固不化，那只能是死路一条。”

老奸巨猾的康生，在2月16日那头一个回合的较量时，他被强大的攻势吓住了，他怕把自己置于不利的地位，没有积极上阵。会后，他受到了江青的埋怨。在这次反击中，他要“戴罪立功”了。

“你们是疯狂反对文化大革命，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他撸着胳膊，挽着袖子，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式，大喊大叫，“毛主席发怒了，这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的义愤；你们反对文化大革命，进而又否定25年前的延安整风运动，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就是否定解放战争的胜利……现在要翻这个案，矛头指向谁，不十分清楚吗？你们诬蔑文化大革命，不要党的领导，心目中还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吗？”

康生已经决心在这场“反击战”中充当主将角色。此刻，他的胸中正燃烧着怒火，用劲地敲着桌子，用着刀子一样的语言：“徐向前呀！军队可不是你个人的，你有什么了不起！你要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想反毛主席吗？”忽然，他像发了神经病似的，大喊大叫：“那绝对做不到，我要和你奉陪到底！”

李富春憋不住火了，用愤怒的目光，狠狠地扫了康生一眼，冲着康生反击道：“那你就逮捕我们吧，你组织专案组来审查我们吧！”

“同志们，”陈伯达提高了嗓门，“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应该引起注意，就是他们反对《红旗》第十三期社论。因为社论提出了路线斗争，提出要打倒走资派，他们心虚害怕了。”

这时，一个不错过任何机会向江青邀功取宠的人，也上阵了，他就是手握生杀大权的谢富治。“怀仁堂的这场斗争不是孤立的。”他望望江青那张阴森苍白的脸，“在京西宾馆会议上，你们就跳出来，反对江青同志，阴谋夺军权。这次，你们又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行动。”他阴阳怪气、冷讽热嘲地说：“那次只是军队几个，这次你们阵容扩大了，又把几位副总理也联合上了。你们的用心很恶毒，是想搞垮中央文革，使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夭折。……”

“同志，”徐向前打断了谢富治的话，“军权就在我们手里握着呢！这还用夺吗？我们到底要夺谁的权呀？究竟是谁要夺权？”

“现在问题已经清楚了，”关锋帮腔说，“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总后台就在上头。”他扫了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一眼，含沙射影说道：“有摇羽毛扇出谋划策的，有在前台冲锋陷阵的，军委一伙，国务院一伙，这次，这两伙都上阵了，是联合行动。”

谢富治又跟上道：“这次怀仁堂事件，是军委和国务院的两股势力的总合流，在这两股势力中，还有挂帅人物。”

“我揭发。”一个尖声尖气的女高音，老师们不用扭头看，便听出是叶群的声音。她杀气腾腾地喊道：“我代表林彪同志揭发叶剑英，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时候，叶剑英同志很不满，说自有革命战争以来，没有一个真正的战士在他负伤临死的弥留之际，诅咒过自己所参加的这场战争的。你说过吗？”

“说过。”叶剑英不动声色地坦率地点点头道，“我现在也还是这样认为。”

“你这是影射。”叶群感到叶剑英的话是对她的蔑视，她恼怒地喊道，“你把话挑明白了，你究竟是影射谁？”

“我讲得很明白嘛！”叶剑英从容不迫地望望满脸怒气的叶群道，“什么叫影射呢？如果谁认为影射，那是多疑！”

一看叶群败在叶剑英手里，江青气急败坏地出来接应，一挥手，大声吼叫：“叶剑英在京西宾馆气焰那么嚣张，又是拍桌子，又是叫着号，你这是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有什么话，都要摆在桌子面上，不搞背后动作，这是我的脾气。”叶剑英毫不退让，反唇相讥，“发火，拍桌子，这都是事实，这是我的习惯，改不了啦！”

周恩来一看双方相持不下，一方猛攻，一方死守防线，寸步不让。这样下去，怎么向毛泽东交差，而不给毛泽东留个面子，不给个台阶下，老这么僵着，“三老四帅”的被围困局面，便无法结束。“三老四帅”们，是勇气有余，而策略不足。大丈夫要能伸能屈，哪怕使个权宜之计，检讨几句，把这一关过去，保住实力，便是胜利。

想到这，他望望叶剑英，严厉地说：“难道这只是脾气、习惯吗？你女儿已经向中央文革作了揭发，你同她说过，你在京西宾馆拍桌子就是对着中央文革小组，对着江青同志的。当时叶群、春桥同志也在场。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认错呢？难道对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你们就都无动于衷吗？”周恩来停了一下，望望“三老四帅”，又严肃地说：“什么错都不认，对你们有什么好处？错了又有什么要紧，检讨了就好嘛！……”

夜深了，西花厅的庭院里，树影绰绰，寒风凛冽。远处传来高音喇叭刺人神经的吼叫声：“坚决粉碎二月逆流！”“誓死捍卫中央文革小组！”“打倒二月逆流的黑手将谭震林！”

周恩来双臂交叉抱在胸前，仰望着黑沉沉、神秘的苍穹。他在思考会议上这场惊心动魄的较量。保存实力的唯一良策，就是急流勇退，因为毛泽东已经直接“参战”了，不认清这个已经变化的形势，还一个劲儿地向前冲，那就不仅是同江青等人交锋，而是同毛泽东短兵相接了，这也正中对手的下怀。不能走这步凶多吉少的险棋。搞得不好，会落个全军覆没的下场，再想反攻，就不可能了。真正的战略家，在关键的时刻，权宜之计，缓兵之计，只要能化险为夷，对战局有利，都应该用。

这时，秘书不知不觉地来到他身边：“总理，这是江青派人送来的急件——她的亲笔信。”

周恩来打开一看，信的大意是：总理：

散会后，文革小组全体同志又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重要讲话，大家对怀仁堂事件表示了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并强烈要求政治局立即免去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所担负的领导工作，勒令他们停职检查，接受批判。此意见康生同志已同意。此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敬礼。

江青

周恩来看罢，又慢慢地来回踱着步，沉思了一会儿，便回到办公室，抓

起电话机：“要西山……你是叶剑英同志吗？我是周恩来，我知道你们都在那里，在一块议论一下会议上的情况也好嘛！……我没有什么事，只是对你们有三点建议：第一，要心安气静，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和他们奉陪到底；第二，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阵地决不能放弃。放弃阵地，就是退却，逃兵；第三，该检查的就检查，要讲点策略和斗争艺术，你们都是身经百战的军事家，战略战术比我懂，不能匹夫之勇。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污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

叶剑英放下电话，又把周恩来的几点关照，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在座的几位战友。

几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回味着周恩来打来电话的含义。

“总理比我们想得深，看得远！”叶剑英意味深长地道，“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对于我们来说，最初，我们都被江青一伙气得乱了方寸，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和他们来个背水一战。结果毛主席亲自出马了，战局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对我们不利的局面。这样一来，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一个是豁出去了，决不半途收兵，对抗到底。”他摇摇头，“如果没有主席直接参战，江青、康生、陈伯达，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对手，可是，主席一参战就复杂了。从江青那边来看，他们是希望我们丧失理智，不计后果，直接和主席交锋，他们好借主席之手，让我们全军覆没，他们不费吹灰之力，便除掉一个强大的对手。我琢磨着，总理是看透这步险棋了，提醒我们不要中计，不要感情用事，要理智、冷静。”他沉思了一会儿，“那么另一种选择，就是撤退，总理的提醒，就是只限于对江青不满，对中央文革的不满，不是对主席的不满，退是为了进！”他顿了顿，又接着道，“总理还叮嘱我们，要想得远一些，要有战略眼光，不要凭一时的感情冲动。斗争要讲究策略、艺术。……”

“总理比我们的处境还难啊！”谭震林道，“中央文革这批乱臣贼子们，搞我们并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打我们，是打外围，打完外围，便要对我们下手了，他们的主攻方向是总理。他们不把国家栋梁一个一个地都打倒，不给他们腾出位置，他们是不会甘心的。他们的目的，就是改朝换代。”

徐向前苦笑着摇摇头：“这次事件后，我感到意外的是，怎么也没想到主席会这样。我们失去了理智，主席也感情用事了，直接参战，为江青撑腰。……”

“我们不要辜负总理的良苦用心。”叶剑英若有所思地说，“从长远的战略着眼，我们应该作检查，总理也好为我们说话，这样做，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打仗也还讲究使用迂回战术呢！政治舞台上的较量和军事舞台上的较量一样，有时要有猛张飞那样的勇往直前的精神，有时也要有诸葛亮那样的计谋，这叫智勇双全。”

“1947年的时候，”聂荣臻赞同地点点头，语气平静地说，“蒋介石调动几十万军队，向胶东根据地发起进攻，摆出和我军决战的架势。在这种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只能有两种选择，一个是硬碰硬地拼个高低，这是敌人求之不得的。另一种选择，就是大踏步地撤退，暂时挂‘免战牌’。当时不少干部和战士都想不通。我们陈老总就在大会上讲：今天的大撤退就是为了明天的大进攻，只要我们保存了有生力量，就不怕打碎坛坛罐罐。果然没出所

料，一年多之后，我们就开始反攻了，又一年后，骄横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队，全军覆没了。《南征北战》这部电影，不就是以陈老总这段经历为模特写的吗！”他望望几位老战友，微笑着风趣地说道：“看来，我们还得再打一场、两场‘南征北战’啊！”

“我理解总理的意思了！”快言快语的陈毅哈哈大笑道，“为了党和人民，也要检查，这并不是向中央文革检查，他们算老几，不就是阴差阳错，鬼使神差，走了红运，应运而生的几个暴发户嘛！一时一地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他们是最后的胜利。看谁笑在最后！”

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议论到周恩来。为了不把大权交给那些野心家、阴谋家，他忍辱负重，日夜操劳。我们几个人，也应该替他分忧解愁，多替他分担些工作，不能把千斤重担，都让他一个人来挑。

几天后，在中南海的紫光阁、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

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坐在一方，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和其他中央文革成员，坐在另一方，像两国交兵一样，阵线分明，相对而坐，双方的脸都绷得紧紧的，严肃得几乎令人窒息。

“现在开会。”坐在两排中间的周恩来，打量了一下与会者平静地道：“会议的内容，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是上次会议的继续，希望犯了错误的同志，要认真地进行检查。”说到这里，他望望“三老四帅”，又接着道：“谁也难免犯错误，尤其是在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一时理解不了，思想跟不上形势，也难免说些错话。”他提高了嗓门，“问题是要端正态度嘛！”

周恩来的话音刚落，“我先谈。”陈毅抢先道。他话语爽朗，举止磊落，不慌不忙地道：“上次会议上，江青、康生、伯达和其他中央文革同志，给我提了些意见。这几天，我也认真地考虑了一下这些批评，我是该检讨。毛主席不止一次说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陈毅当然不是圣贤，更免不了要有错误！……”

他望望中央文革成员们，道：“有的同志批评我的时候，说我反对毛主席，这顶帽子可不算小，不知提这个意见的同志有什么根据！这可是个原则问题，我认真地考虑了这个意见，我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当年我和朱老总上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干革命时，在座的好多同志可能还没参加革命呢！哎哎！”他急忙收住话头，“瞧！我又摆老资格了。我向诸位检讨。”他仰起头，沉思了一会儿，“我再接着检讨。康生同志说，怀仁堂这场斗争，不是偶然的，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有纲领的行动，我同意这个意见，坦白地说，我的计划是酝酿了很长时间的。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天天看到许多老干部被斗，被关起来，有的被折磨死，我就很不满，不，说不满的词儿，太轻了，是很气愤。我不相信像陈丕显、李井泉和其他各省领导人，都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他望望江青、康生和陈伯达等人绷得紧紧的脸色，又从容不迫地道：“也不相信在我们共产党内还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恕我直言，我认为这些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搞的，是林彪同志搞的。”

“你这是借着检讨的机会，继续放毒！”一个少壮派的中央文革成员，粗暴地打断了陈毅的检讨，“不准你转移视线，你应该严肃地对待自己的错误。”

“同志，要冷静嘛，有意见等我说完了，你再提嘛！”陈毅望望脸红脖子粗的文革少壮派，用着一种嘲笑、教训的口气道，“我有个意见，不管我讲的错对，希望不要打断我的话，让我把话说完了，谁掌握了什么秘密武器、重磅炮弹，再往外甩也不迟。我都洗耳恭听。”

说到这，他望望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总理，我这个建议可以吧？”

“可以！”周恩来果断地道，“不仅是陈毅同志，其他同志发言，都让把话讲完，再提意见！”

“那我继续说吧！”陈毅望望周恩来。

“好！你继续谈吧！”周恩来点点头。

“我曾经说过，”陈毅呷了一口茶，显得有点激动，“有些人表面上支持红卫兵，实际上是乘文化大革命之机，自己上台。我说这些话时，是有所指的，就是对着江青同志说的。我也说过马克思在世的时候，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佩服得五体投地。马克思一去世，伯恩斯坦就当叛徒，反对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活着的时候，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比亲生父亲还亲，什么肉麻吹捧的话都讲了，可斯大林一死，他就焚尸扬灰……。在我们中国，恐怕也有伯恩斯坦、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两面派。有人说我这是影射林彪同志的。我说这话的目的，就是认为文化大革命搞左了，搞过头了。特别是上海‘一月风暴’以后，全国到处夺权，一片混乱，批斗老干部，冲击军事机关，生产破坏得一塌糊涂，再这样发展下去，局面可怎么收拾！我是有意识跳出来放这一炮的。”

陈毅停顿了一会儿，望望板起一副阴森面孔的康生道：“康生同志揭发说，我在这场斗争里，是扮演一名联络员角色。我到李富春同志家去过多次，看来你的情报还不太准确呀！”他轻松地道，“给我定个联络员的角色太低了，我是个主要召集人呢！每次打桥牌，都是我作东，就连红卫兵都说我是黑帮头头嘛！我不仅到过富春同志家，剑英、徐帅和谭震林同志的家，我都常去，摆摆龙门阵，说些对揪斗老干部、冲击军事机关不满的话，话说的大多了，一下也不能全想起来，不过，有一点还是要郑重地申明一下，说我有野心，向党伸手要权，这可冤枉，我从来没有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更没有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

陈毅的检查，康生感到字字句句都是冲自己而来，哪里是什么检讨，这是借着检讨的机会发泄、反扑。但他知道这个对手，并不是一招就出水的软体动物，他没有同陈毅短兵相接，而是从总体上进行了批判。他用刀子似的眼睛狠狠地扫了“三老四帅”一眼，声色俱厉他说：“刘、邓、陶被打倒了，他们阴魂不散，还有代理人。‘二月逆流’，就是刘、邓、陶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的继承者。”他望望中央文革成员，“同志们看到了吧？‘二月逆流’的成员们，并不是外国派进来的敌人，而是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一起战斗的同志，他们不是一般的党员、干部，而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都是参与中央重要决策的领导人。……可是，他们却使出全身的解数，进行‘二月逆流’的错误活动，这是十分严重的，危险的。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

“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反党事件，是一次反革命政变的预演。”江青大发歇斯底里，拼命地拍着桌子，叫着号：“你们把那股子反党反毛主席反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劲头拿出来吧！你们敢挑战，我们就奉陪到底！”她忽地站了起来，一只手掐着腰，一只手指着，叫着号：“这

次跟你们没个完，非跟你斗到底不可！你们想搞资本主义复辟，疯狂地向革命群众反攻倒算，想把中国拉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的老路上去。但是，你们失败了。”她咬牙切齿地吼叫：“你们打着保护老干部的旗号，你们保护谁？是牛鬼蛇神，是大叛徒、大特务、大走资派、大坏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们臭味相投。”

会议在杀气腾腾、大喊大叫的气氛中收场。

按照江青的部署，在全国掀起了反击“二月逆流”的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

为民请命的谭震林，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被批斗，被打得死去活来，遍体鳞伤。

在一次体育场的十万人批斗大会上，江青挥舞着拳头，声嘶力竭地宣布：“谭震林是大叛徒！”江青这位复仇狂，她不把谭震林打倒，连睡觉都合不上眼睛。

几位副总理，几位军委副主席，敢于反抗江青的硬骨头们，他们逐个地被“炮轰”、“火烧”、“油炸”、“打倒”！江青还感到不解恨，不置他们于死地，她是不甘休的。用她的话说：“谁碰了我，我就不会让他舒服了！”

经过几个月较量，周恩来损兵折将了！江青得意忘形。可是周恩来并非败将，他借向毛泽东请求汇报工作的机会，有意把话题引到“三老四帅”身上。

熟悉红墙内环境的人，都知道这里有一个十分响亮也十分奇怪的名字——“游泳池”。它是一幢很普通的平房。1966年以后，毛泽东从紫云轩搬到了这里，度过了他最后的10年人生。

1967年4月初，毛泽东把周恩来请到了他的客厅兼书房。毛泽东担心地问周恩来：“现在北面的情况怎样？”

“最近的情况还不能掉以轻心。”周恩来道，“苏军在邻近我东北、内蒙边境地带，调兵遣将，陈兵几十万，他们的意图是明显的。从各种情况分析：一种可能是搞边境摩擦，小打小闹；第二种可能是炸毁我们的核设施；第三种可能是大动干戈，发动全面进攻。”

“苏修是亡我之心不死啊！”毛泽东沉思良久，忧心忡忡地道，“要把这种形势告诉全国人民，加紧备战，准备打仗。特别是军队，一定要有准备，要防范于未然，防止突然袭击。几位老师怎样？”

听到这句话，周恩来顿时心花怒放。从毛泽东问话的语气里，他听到了毛泽东对老师们的关心。其实；周恩来胸中早有成熟的方案，只是还没找到机会向毛泽东面陈，现在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他平静地向毛泽东道：“政治局和中央文革联席会议，已经开过几次了。四位老师和三位副总理，也都做了深刻的检讨。”说着，他从皮包里掏出一摞材料，递给毛泽东，趁势说，“他们都认识到在怀仁堂的发言是错误的，感到对不起主席，是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认识不清楚，对主席的战略部署跟得不紧，还有些居功骄傲，对自己的战友被打倒，想不通，不满……”

“好！”毛泽东平静地说，“他们能认错就好嘛！我并没有打倒他们的意思，只是想狠狠地批评他们一顿，让他们改变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不要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

正在江青得意的时候，1967年的“五一”节前夕，一件意外的事使江青目瞪口呆。一个耳目告诉他，周恩来领着这几位被打得半死不活的老师、副

总理去中南海毛泽东那里。她几乎鼻子都气歪了。

她怒从心头起：他在这个时候接见几个败将干什么？他这种举动，是一种妥协、调和，不，这是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肯定是周恩来搞的鬼。她埋怨毛泽东捉弄中央文革，批准批斗的是你，宣布无罪的又是你，“礼”都被你一个人送了，好人也都被你一个人当了，中央文革的工作今后还怎么做！她一肚子的火，都发到毛泽东的身上了。

周恩来心里明白，为了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毛泽东需要林彪的支持。可是林彪势力滚雪球似的增长，毛泽东对林彪又很不放心，能与林彪抗衡的江青和康生毕竟是一帮文人，在军队没有影响，他需要有第三种势力，而自己和“三老四帅”正是属于这第三种势力，现在他只能在利用矛盾中求得生存、发展了。毛泽东召见“三老四帅”，无疑是想给他们解解围，扶一下。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让“三老四帅”的精神振作起来，煞一下林彪和江青的威风。

在周恩来的率领下，“三老四帅”来到中南海。一走进毛泽东的客厅，毛泽东微笑着，站了起来，主动地和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一一握手。

坐定之后，“你们身体都好吗？”毛泽东满脸笑容，望望几位曾经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老战友，关切地问道。

“还好！”大家不约而同地点头答道。

“那些天，你们思想不通，过不了关，我心里也着急啊！”毛泽东用一种平静的口气道，“你们仅仅是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思想上想不通，这也不奇怪。想不通心里就憋着一股气，就犯了错误。承认错误，检讨了就好嘛！”

“三老四帅”们也纷纷地说：“我们对您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想不通，认识也跟不上形势，我们看到一些老干部被打倒，社会秩序又一片混乱。我们总觉得这是中央文革之过……”

“这些问题，不必再提了。”毛泽东摆了摆手，回避了问题，道，“梁山泊的好汉，不打不相识嘛！中央文革不想打倒你们，红卫兵不想打倒你们。你们犯了错误，我的心情也很沉重……”

副总理和老师们的顿时心花怒放，他们对毛泽东是信任、尊重、崇拜的，毛泽东亲自出面解围，可以解放了，一块石头落了地。

“2月16日那次会议之后，”周恩来打圆场地说，“他们的心情都很沉重，感到辜负了主席的期望，也想有机会向主席当面检讨”

“你们不要背包袱哟！”毛泽东哈哈大笑，轻松地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客厅里谈笑风生，一派欢乐的气氛。

善于捕捉战机、趁热打铁的周恩来，望着毛泽东说：“明天是‘五一’节联欢晚会，主席……”他看看“三老四帅”，“你看谁应该参加？”

“你开个名单吧！”毛泽东笑着，风趣地说，“没有你们陪着我上天安门，我不成了光杆司令啦？！”

早已做好准备的周恩来拿出一份名单，上面除了“三老四帅”，还有一些其他党政军干部。毛泽东粗略地看了一下，顺手拿起笔来，在名单上批了“同意”二字。

周恩来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这不仅仅是身陷重围的一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公开亮相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保护了一大批国家栋梁。留得青山

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保存了实力，未来就有希望了。他有一种挽回败局的兴奋心情，不时地微笑着。

又谈了一阵子，周恩来看看表，已经过午夜了。他对毛泽东说：“时间不早了，主席该休息了！”

“三老四帅”这次公开亮相，可气坏了江青，她更切齿的是恨周恩来。像她这样一个女人，怎能受得住这个。她要报复，她要报这一箭之仇。她与林彪共谋，策划了武汉“七二〇”事件，打倒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他们又在北京制造了“杨、余、傅事件”，逮捕了代总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

这些天，江青满以为自己已经羽翼丰满了，有实力了，她想除掉谁就可以除掉谁，没有谁再敢碰她江青一下了，她不仅能同老师傅们较量，同周恩来争胜败，而且她要同毛泽东分庭抗礼了。她做着打江山坐江山的美梦。

“三审王光美”

1967年4月10日，在清华大学果然举行了30万人批斗会。在江青、陈伯达的直接操纵下，一伙人拳打脚踢，强迫王光美穿旗袍，戴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王光美坚持原则，不屈淫威。“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井冈山》杂志社，1967年8月10日出了《井冈山》专刊，登了《三审王光美》，下面是1967年4月10日在批斗会前和批斗会后“审”王光美的记录：

第一次审问

地点：清华中央主楼

时间：晨6点半左右

问：刘少奇为什么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

王：我从来没有听少奇同志讲过这个片子是爱国主义的。少奇同志肯定没有讲过。我相信毛主席，毛主席总会调查清楚的。

（同学要她穿上去印尼的衣服出去斗，王光美不干。）

问：这衣服一定要你穿上！

王：就不穿！

问：穿也得穿，不穿也得穿！

王：反正我不穿。

问：告诉你，今天是斗你。不老实，小心点！

王：我们好好谈谈好不好？

问：谁跟你谈？告诉你，今天是斗争你。

王：反正你们不能侵犯我人身自由。

问：（哄堂大笑）你是三反分子老婆、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也不给，半点也不给。今天，是对你专政，没有你的自由。

王：这是绸子的，太冷了。

问：“冻死苍蝇未足奇。”

王：如果我真反毛主席，那冻死就活该。

问：你就是反对毛主席。

王：我现在不反，将来也不反。问：不行！都穿上。

王：你们没有这权利。

问：我们就有这个权利！今天是斗争你，我们要怎么斗就怎么斗，没有你的自由。你那套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臭理论还是收起来吧。我们是革命群众，你是反革命臭婆娘，你混淆不了阶级阵线！

（时间到。捉鬼队员给王穿妖衣）

王：你们武斗，你们违反毛主席指示。

（众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王：谁反对毛主席指示就……（被打断）

（众念：“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

王：你们用强制手段。

问：胡扯！是你侮辱我们。你穿上这套衣服去印尼与苏加诺吊膀子，丢尽了中国人民的脸，你侮辱了全中国人民。你还想倒打一耙。对你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清华园里的头号大扒手，对你就是要强制。

王：希望你们好好调查一下。

问：我问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谁干的？

王：真正的革命者是勇敢的，是勇于正视事实的。……反正“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肯定不是我，也不会是杨天放。谁是真革命的，谁干的谁自己承认。是谁说清华园是黑窝的，是谁说宁可怀疑 99 个也不放过一个黑帮……真正的革命者就要敢于站出来。谁干的谁自己承认。

问：你说，为什么打击基层干部，而何东昌倒在香山休养，刘冰、胡健在北京饭店，蒋南翔，同学提了多少回，你们就是不斗。王：问我不知道，北京饭店是在开会。蒋南翔情况我是反映了。中央有同志批示（我不能说）不让拉回来斗。

问：派工作组的目的是什么？

王：同意派工作组当时中央常委会决定。当然毛主席不在，刘少奇要负主要责任。但真正他派的，只有我了个人。

问：就你这一个人就打多少革命群众成反革命？害了多少人？

王：我们没定一个反革命。

问：你赖不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事实！

王：事实总是事实，应根据事实得出结论，这才是毛泽东思想。

问：不对。立场是主要的。你们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就是看革命群众的阴暗面，反对文化大革命。我们看的事实，收集的事实就是和你不同。

王：现在有人推卸责任……如果是真正的革命左派应敢于承认事实……怀疑一切是错误的，是谁提出的？

问：你们怀疑革命的一切，打击一切革命群众、干部。

王：反正“怀疑一切”不是我的思想，更不是刘少奇的思想，我们是反对“怀疑一切”的。

问：（气急、骂）大扒手，反动资产阶级分子，给中国人民丢脸，揭事实。（给苏加诺点烟）

王：我认为我没丢脸。那天是告别宴会，他坐在我旁边，我是女主人……应尊重印尼习惯。

问：你说，你把多少同学打成反革命，我们这里就有不少。

王：反正我们只批过，没有打成反革命。

问：谁让你反“假左派”的？

王：不是刘少奇。是工作组问我，是叶林、杨天放，他们说蒯写了一个夺权的批语，还有反映了与现在根本不同的片面情况，我就根据这些同意了。

问：刘少奇做了什么指示？

王：刘少奇对清华指示很少。

问：那你卖菜是谁让的？捞政治资本。

王：那是毛主席对刘少奇说：“王光美为什么过去四清时三同现在不三同啦？……”主席说：“可以参加劳动，……这样可以接受批评。”我听了很感动，就去劳动了。

问：那你老老实实劳动啊？为什么到三个饭厅去卖菜。

王：走三个饭厅，不是因为接触不广吗？

问：你回答：“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到底是谁推广的？

王：的确不是刘少奇。

问：蒯大富是谁定的反革命？

王：与刘少奇无关，也肯定没定反革命。

问：你交待。保蒋南翔是谁指示的？

王：蒋南翔性质未定的话是我讲的。但你们前后的话都不讲，只讲这句是断章取义。

问：同学们对蒋恨死了，你却说性质未定，不让斗，这不是保他是什么？你知道不知道？

王：我不知道。你们试试看，将来你们工作中不要犯错误。

问：你对批判《修养》怎么看？

王：这本书是唯心的，不谈阶级斗争，我同意报上发表的《红旗》评论员文章的几句话。至于反毛泽东思想，主观上我是不同意，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

问：对戚本禹同志批《清宫秘史》的文章怎么看？

王：这部片子是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的，戚本禹同志批得很深很对，这部片子刘少奇没有说是爱国主义的。我和他一起看的，当时只看了一半，以后天亮了看不清了，他什么也没说。这是肯定的，他没说过。我和他一起看的，我知道肯定没说过。

问：照你这么说戚本禹同志在造谣了？

王：是不是有另外人假借刘少奇的名义说过这些话。

问：你觉得这文章写的对不对？这是毛主席看过的！

王：是吗？是主席看过的吗？我觉得还是从革命利益出发，从事实出发，如实向毛主席汇报情况。

问：戚本禹同志文章针对的是谁你清楚吗？

王：那他提的的确是刘少奇。

问：你对戚本禹同志提出的问题怎么看？

王：有的是刘少奇的责任，有的不是刘少奇讲的。

问：那么《红旗》上在造谣？刘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王：相信毛主席，相信群众，过去就是相信不够才犯错误。我在刘少奇身边工作了十几年，我觉得有出入，反正有许多不是刘少奇的事。说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直接没感到这一点。

问：那叫叛徒集团自首是怎么说的？

王：这不是他指示的，是一个负责同志提建议他同意过的。

问：是谁？

王：我不说！

问：你包庇！快说。

王：（沉思一会）是柯庆施建议的，刘少奇同意了。

问：（气愤）不许你污蔑柯老！

王：反正我说话你们不相信，你们可以去调查好了。

问：王光美你说，你对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怎么看？

王：我主观上还认识不到这个水平。反正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主席许多事委托刘少奇、书记处处理，发生的事他要负责，但现在他靠边站了，不负责了，不当权了么。在反动路线时他是走过一段资本主义道路的。

问：就是反动路线这一点？

王：当然不止。凡是犯路线错误都是走资本主义一段道路。

问：就按你的这种说法，你说说看刘少奇走过哪些资本主义道路？

王：山西老区互助组的批示，是错的，是他批的。合作社发展太快，他求稳，说要慢一些。1962年他对困难的估计过分。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谬论出来他是不赞成的，单干也是不赞成的。他那时许多关键时刻还是坚持社会主义的。

问：刘少奇宣扬“红色资本家”，说剥削好，也是主观上走社会主义道路吗？

王：刘少奇是讲了很多的错话，你们是指1950年他在天津的讲话，当时我也在，我知道的，有许多话是很错误的。当时天津有一种过“左”的情绪，不少人要消灭剥削阶级，是毛主席派他去纠偏的，他一些话是纠偏讲的，现在大字报上的话与他讲的有出入。

问：这么说，讲“工人就得剥削”是对的？

王：有些是错的。有的这样讲是对的，有的这样讲不好。这不能脱离环境。比如一个资本家与他座谈说剥削是罪恶，那开一个厂就大罪，再开一个厂罪就更大了。刘少奇说只要对国富民强有好处，开厂剥削，这样的剥削是需要的，工人也需要这样的剥削。这是特定条件下讲的，现在有人砍头去尾地讲这句话。

问：那鼓吹和平民主新阶段，散布对蒋介石的迷信是谁呢？

王：那不只他一个。根据报纸上的报道，绝不是一个人责任，停战协定（决议）上写“和平、民主”很明显嘛。他现在把责任担起来，勇于承担责任。（众笑：这么他还是英雄了？）就是勇于承担责任么。

问：那你说，还有谁？

王：不用说了吧。

问：不行！迷信蒋介石的人要查出来。

王：我是中央工作人员，要保密。你们可以去查查报纸，有公开文章的！

问：那刘少奇贪污金皮带圈，金鞋拔子呢？

王：金皮带圈、金鞋拔子是有这么回事。他做白区工作，随时有被逮捕危险，是应该身上带些东西的。

问：“红色资本家”是谁提的？

王：不知道！反正不是刘少奇，他只说进步资本家。

问：你是否说过王光英这个大资本家好，还要拉他入党？

王：王光英不是大资本家，最多是中产阶级、民族资本家。他剥削是剥削，可是……你们可以调查一下，他是否可以起进步资本家的作用。他不愿当资本家，说资本家名声太臭，要求入党，党给他任务，让他做资本家的工作。

问：你现在对刘少奇到底怎么看？

王：说他一辈子反革命，不反资本主义，我没有充分材料。

（同学要她戴上项链）

问：你说！江青同志叫你出国不要戴项链，你为什么非要戴上？

王：江青同志是要我不要戴别针，没说戴项链的事，但问题是一样的。

问：（逼）那你说红旗调查员的文章怎么样？

王：红旗调查员文章……（不语，同学吵，最后，大声嘶叫）就是有很大的片面性！

问：好，记下来。

王：记就记，我说的，怕什么！“怀疑一切”肯定不是工作组搞的，更不是刘少奇搞的。清华，我们的问题肯定是右倾主义，是路线错误，我们是右倾不是形“左”实右。反正这“怀疑一切”肯定不是工作组搞的，我没有这个思想，刘少奇也没有这个思想。

问：那你说是谁？

王：反正有人。

问：无耻！蒙骗人家还夸耀。现在谁都看透你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本质了。

王：我不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真理就是真理，可能是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

问：你敢否定革命小将？

王：真正的爱护小将，应该是什么就说什么，不能歪曲事实来爱护革命小将……（被打断。众：你放毒！）如果你们摆事实讲道理，就让我把话讲完，毛主席说：坏话，好话，反对的话都要听，要让人把话讲完，你们要不摆事实不讲道理，那我不讲了，你们斗吧！

问：我们就是要斗你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清华园的大扒手。

王：我不是，我是共产党员。

问：你不要给我们的党脸上抹黑了。干的丑事还少啦！桃园四清你干了些什么！王：对四清材料你们了解了多少？你们都找什么人了解？你们下去五天，我待上一年了，比你们了解，你们要认真调查。

问：去你的。桃园经验臭透了。一会儿你听听。

王：桃园经验是好的，不是坏的。但有缺点有错误。

问：（大伙耻笑她）有功、有功。那么后十条看来也是好的，有缺点、有错误吧？

王：后十条是刘少奇改的，有些清规戒律，但精神是好的，是毛主席叫他修改的。

问：这么说后十条棒极了？

王：后十条有好的部分，但有形而上学，繁琐哲学，一些政策界限强调得过多，成清规戒律束缚了群众运动。

（群众气极，给她“打扮”后照相）

王：谢谢你们。你们不应该侮辱我。

问：刘少奇是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你认为怎么样？

王：（避而不答）他是要负主要责任的。6、7月是他干的，但以后就不能归他。

问：归谁？你说。

王：他路线错误有影响，不能全归他，他有责任。

问：那蒯大富反革命很久翻不过来，谁负责？

王：蒯大富反革命不是刘少奇定的，刘少奇没跟我说过蒯大富是反革命。

问：他在《修养》中大骂有人要全党尊重他……是谁？

王：那是什么时候出版的？他不是骂主席，那指的是洛甫。

问：那1962年再版时为什么不修改，反而把斯大林都删了？

王：那不知道。他是坚决反修的。他改的地方有档案在，你们有条件就去查。毛主席说要出刘选，他不积极，后成立编辑委员会，要他修改出书，他看过一遍，有的是编辑委员会改的，他没注意，你们可以去查嘛。我知道，他是不反斯大林的，“九评”、“两论”他都参加起草的。

问：戚本禹同志的文章你怎么看？

王：批这电影很对、该批。

问：不对，要害是揭开了“老革命”的画皮，暴露了假革命、反革命的本质。

王：“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问：胡说！你顽固到底死路一条。我们就是要把刘少奇拉下马！

王：拉下马我同意，别人领导比他领导对党更有利。问：王光美，你对戚本禹同志提的几个问题怎么看？（念戚本禹同志的文章最后的几个问题）

王：（1）没讲过。我不知道。（指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疯狂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猖狂反对毛主席三个问题）

（2）我等待毛主席讲话，等毛主席讲最后一句话。刘少奇并不是梦寐以求资本主义，他是想搞社会主义的，说猖狂复辟不是那样，愿意搞社会主义的。他特别谈了一些防修、反修、反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他经常想，但想不出办法，无办法没有水平，无魄力像毛主席这样搞文化大革命。他是考虑避免修正主义复辟的。我认为他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提倡全党全民大学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地位、重要性、毛主席对他的信任来看，应很早就提出的，但他1966年才提出，这是他最大的错误。

（3）他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更没有什么猖狂。他有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地方，有不少是世界观问题。（4）他没有大肆宣扬。他是想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当时白区损失极大，日本人又要进攻，因为一些人不知名，影响并不大，就让他们自首了。北京61个人，天津几十个人。至于自首书的措词，什么“坚决反共”，他不知道的。

（5）起草的文件，中央是看过的，当然他要检讨，但同一个文件他提出过积极练兵。当时这些是可能造成不好的影响。

（6）他反对资本主义改造？没有！在天津讲话是错误的，但改造资本家他是积极赞成的。合作社问题他是同意过一些同志的意见，主要是邓子恢干的。

（7）八大报告是有缺点，但是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八大决议好像也有错误……主席没看过？……这是很匆忙的，刘少奇决议好像看的也

很匆忙。不过文件出来很久了。毛主席、党中央未表态。

(8)这不是刘少奇说的。他只是对困难估计过分了。可能是会助长歪风滋长。

(9)刘选编委会叫他审查的，他对此不积极。

(10)他是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过分强调了扎根串连。有些话使人感到农村漆黑一团。

(11)对六七月之前我同意毛主席大字报观点。六七月后他也要负责任。是不是都要他负责，那我就不了解情况了。

(王光美准备“坐牢”，将毛巾、牙刷……什么都带来了。)

问：王光美，你怕不怕？

王：我怕什么。我不怕。

第二次审问

时间：4月10日下午1点

地点：清华主楼803

问：你对戚本禹同志文章怎么看？

王：戚本禹同志写得很好，旗帜鲜明。根据我知道的事实，刘少奇是假革命、反革命的结论我得不出。1950年我同刘少奇一起看这部电影时，他没有讲什么。主席要批判，他没批判，这是错了。反正我没有听他说过这片子是爱国主义的。戚本禹同志文章出来后，我很气愤，也很关心。毛主席说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么，我又问了刘少奇一次，与他回忆了很久，他也说没说过。我们相信毛主席，伟大的毛主席会弄清楚的。

问：照你这么说刘少奇还是老革命？文化革命也只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王：刘少奇在文化革命中犯错误不是偶然的，他自己也说不是偶然的，他的世界观没有根本改变，不可能不违反毛泽东思想，他是要负主要责任。他没有毛主席的胆量和魄力来发动领导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去，我的错误是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不够，相信群众不够。现在，我愿意交真心给你们。我对“假革命”、“反革命”的确没有认识到。

问：问你，你对今天斗争大会怎么看？

王：今天大会表现了群众的愤怒。我个人受一些委屈也没啥。毛主席教导我们也要经风雨见世面嘛。我希望你们给我听录音，我听到的太少了，我应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也应让刘少奇知道。

问：狡辩！我问你，桃园经验到底怎么样？

王：我认为桃园经验是成绩多缺点少。

问：喝！还成绩呢？你倒成了有功之臣了。

王：成绩不是王光美的，是毛主席的，是毛泽东思想的。

问：不许你污蔑毛主席。

王：我去桃园，许多人都不支持。刘少奇是主张我去的，那时就只有毛主席支持我去。

问：可是你呢，大整社员，大整同学，毛主席支持吗？

王：那，人的认识有个过程，这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然正确思想从哪里来？

问：再问你，刘少奇在天津讲的反动话你怎么看？

王：天津讲话，有好的，有不好的，有错误的。他是毛主席派去的，是针对一些人“左”倾情绪去纠正的，他说的话有些是很不好的。但“红色资本家”不是他讲的，我知道，我不说是谁。刘少奇只讲过进步资本家，资本家是有先进的，落后的。

问：谁说的“红色资本家”。

王：我是中央工作人员，要保密。

问：不行！你是专政对象，说！

王：还是不说得好，我知道你们要揪。

问：算了吧！谁不知刘少奇是老机会主义者。

王：是的。是有人批评他老右倾，立三路线时批评他右倾，王明路线也批评他右倾……（打断）

问：恶毒！你说现在是什么路线！不许赖！

王：我是说过去。

问：你对《论修养》怎么看？王：我同意红旗评论员的话。

问：戚本禹同志文章呢？

王：（避而不答）

问：赶快交待你和刘少奇攻击中央文革的罪行。

王：刘少奇没有罪行，叫我交待什么？

问：少耍赖！你对中央文革到底怎么看？

王：越是做工作多的，缺点错误是不可避免的。真正的革命者要自我批评，中央文革是经常检讨自己的工作的，我从讲话上看到过。大字报上边也有提意见的嘛！问：三反分子的臭老婆，我们早定你……（被打断）

王：中国的妇女中国的女共产党员是独立的，不能因为丈夫错了，老婆就一定错，老婆错了，丈夫就一定错。

问：你们俩本来就是臭味相投，你是什么共产党员？你是刘少奇拉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

王：我入党不是拉进来的，我有手续的。

问：你介绍人是谁？

王：反正不是徐冰，外面是谣言。

问：谁？

王：一个姓孙，一个姓赖。

问，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工作？

王：（不说）我的历史，我全部向组织汇报过了，你们可以通过组织调查，这些没必要说。

问：我们就要你说。谁看你档案。说！刘少奇对戚本禹同志文章怎么看？

王：文章发表后，他很仔细地看了两遍，我想他不会承认假革命，反革命。刘少奇说他从来没说过是爱国的。我们一起回忆过这件事，那回是谁推荐的，什么过程，我都忘了，反正是演到一半天就亮了，看不清，我们什么也没说。

问：你是不是说戚本禹同志、《红旗》在造谣？

王：戚本禹，我一直认为是好同志。是不是有人造谣，我不知道，反正刘少奇没说过。

第三次审问

时间：4月10日下午5点40分—10点零5分

地点：主楼803

问：刘少奇是反党头子，知道吗？

王：毛主席十一中全会上没有这么说。17年来成绩是毛主席的，刘少奇是第一线，有错误是他的。

问：你说《红旗》文章你同意，那刘少奇是否修正主义一套？

王：《论修养》是唯心等还可以，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等我还想不通……

问：《修养》和赫鲁晓夫是否一样？

王：有某些方面一样，也有合乎马列主义的。

问：哈！这不是修正主义吗！打着红旗反红旗，你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

1962年大量印发出版是谁定的？

王：可以查么，不是刘少奇亲自抓的。不知道。

问：戚本禹文章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王：从批《清宫秘史》和肃清刘少奇影响是好得很，但有些事实我有保留。是假革命反革命我未认识到。刘少奇从来没有讲过是爱国主义。

问：难道《红旗》文章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吗？王：我不知道毛主席亲自看过。

问：你相信不相信中央文革？

王：中央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总的说来相信的，每个成员是否都相信，那我有保留……

问：戚本禹文章的结论是中央文革的，你拥护中央文革吗？

王：那为什么不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表呢？

问：刘少奇看了戚本禹文章什么态度？

王：刘少奇，反正不是反革命。

……

恐怖的世界

1967年，春去夏来，骄阳似火。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巡视大江南北。

就在这个时候，林彪、江青一伙的毒手又伸过来了。他们欺骗和煽动单纯幼稚的红卫兵“围攻中南海，揪出刘少奇”。一时，中南海墙外，帐篷林立，车水马龙，围得水泄不通。看起来是多么矛盾：他们掌握着大权，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刘少奇置于死地，但他们却要欺世盗名，愚弄群众，以“群众运动”的名义来“吊民伐罪”，借刀杀人，使自己双手不沾一点血迹。事实很清楚，他们围困中南海，是要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撵走周恩来，揪出刘少奇。他们越走越远了。

刘少奇在中南海内，依旧像往常一样，坚持每天看大字报。刘平平、刘源源把他们去云南、湖南、湖北、陕西，山西、四川、青海、天津串连时看到的情况告诉刘少奇和王光美，当他们说到长沙、武汉、成都、天津等地开始大规模武斗时，刘少奇仔细倾听，陷入了沉思，但他很少说话。其实，仅仅从小报上登载的“首长讲话”里，刘少奇就知道全国已经沦为什么样的境地，党已经被破坏到什么程度，群众又被愚弄到什么地步。党被摧毁，国家

受难，群众遭殃，而这一切还看不见尽头。正当他忧心如焚、寝食难安的时候，建工学院一个群众组织突然要刘少奇写检查，刘少奇已是身心交瘁，怎么也写不下去，只好由王光美代写。送上去后，刘少奇又要了回来，加了一句“是党中央、毛主席委托我主持中央工作的。”就因为加了这几个字，几百个高音喇叭对准中南海日夜狂吼。

在这滔滔恶浪的袭击中，周恩来岿然不动，作为中流砥柱，独撑危局。他看穿了江青的阴谋，就亲自到中南海北门向群众做说服工作。而江青、陈伯达竟唱对台戏，来到中南海的大、小西门外进行挑动。当周恩来出现在西门说服群众时，江青一伙又跑到北门。结果围攻中南海的浪潮，此起彼伏，有增无减。周恩来坚定地说：“我就是呆在中南海不走。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你们要想冲进中南海，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造反派们冲不进中南海，就把不少省委第一书记和中央各部部长，轮番揪到中南海门口进行批斗。与“围攻”相配合，中南海院内又一次掀起“批刘”的恶浪，还出现了要揪朱德、陈云的大字报。刘少奇得知这一切，痛心地说：“糟糕，又要整倒一大批老干部了。”王光美说：“你已经不工作了，这个国家主席，辞了算了，你再正式提一提，我和孩子们养活你。”

刘少奇说：“没那么好受的，不会让我回乡种地，我下去了，他们还批什么？……”

王光美也叹了口气，说：“现在看来，这场文化大革命，好像是林彪和江青他们搞的一次反革命政变，专打从中央到地方主持工作的一、二把手……”

刘少奇听了未作回答。经过了一夜的思考，刘少奇带着十分沉重的心情，语气肯定地对王光美说：“你昨天谈的看法是对的。”

在刘少奇身边工作了18年的厨师郝苗突然被林彪、江青一伙诬陷为“特务”抓了起来，这对刘少奇身边工作人员造成很大的压力，他们更不敢再与刘少奇接近了。

刘少奇自己不得不作最坏的准备。唯一使刘少奇放心不下的一件家事，就是最小的女儿小小（潇潇）。小小当时只有6岁，天真无邪，简直可以说是刘少奇夫妇的“掌上明珠”。一年来的狂风恶浪，她那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的摧残。再有更大的风浪，她该怎么生活呢？这几天，刘少奇见到小小，就格外眷恋。刘少奇常叨念：“小小该上学了，该上学了。”王光美也觉察到刘少奇的心思，她何尝不为小小担忧呢。可是，现在能到哪儿去上学呢？一想到小小，王光美心里也是火烧火燎的啊。

一天，王光美内心的痛楚实在压抑不了，对刘少奇说：“如果咱们被捕了，能不能跟他们提提，让我把小小带到监狱里去？”

“这怎么可能？”刘少奇摇摇头。

“不是有许多先烈都把孩子带进国民党的监狱里去吗？”王光美还不死心。

“那是在监狱里边生的。”

“那究竟该怎么办呢？”王光美不知所措了。

“托给阿姨吧。”刘少奇思忖了一会，说，“要记住小小的特征，将来一定要把她找回来。”

每逢危难之际，刘少奇就从人民那里寻求救援，寻求帮助。人民从来就是他赖以生存的靠山。王光美尊重刘少奇的决定，她狠了狠心，拿了两张刘

少奇和自己的像片，去找阿姨和小小。小小已躺在床上要睡觉了，正愉快地嘻笑着。

王光美走到赵阿姨身边，把像片递给她，禁不住泪如泉涌，抽泣着对阿姨说：“老赵，小小就托付给您了，无论如何要把她带大……今后……你和小小在一起……要吃大苦……”王光美已泣不成声，再也说不下去了，扑到小小身上痛哭起来。小小却吓坏了，赶快挣脱出来，缩在床边的一个小角落里，眼睛里充满了疑惧，望着趴在床边向她伸出双手的妈妈。她还太小，她还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着的一切。

……

沉重的打击，比刘少奇预计的要来得快。

那是1967年7月18日清早，刘少奇的孩子去中南海职工食堂吃饭，在他们常坐的饭桌旁吊着一张大字报，上面说根据江青、戚本禹“指示”，今晚要开揪斗刘少奇的大会。回到家里，他们就告诉了刘少奇。刘少奇意识到生死搏斗已迫在眉睫了。中午，他从衣服的口袋里拿出两份文件让孩子们看，一是毛泽东肯定刘少奇检查的批语全文，一是毛泽东赞扬和推广“桃园经验”的批示全文。这是刘少奇第一次让子女看中央的文件，也是唯一的一次。过去，他连自己的办公桌都不让子女接近。如今到了最后关头，他认为不能给孩子心头留下阴影，刘少奇以期待的目光望着孩子们说：“你们都看了，这证明爸爸、妈妈从来没有骗过你们啊。”

当天晚上，几十万群众围在中南海的四周，上百个高音喇叭不停地喧闹。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的直接策划下，中南海的“造反派”把刘少奇和王光美分别揪到中南海的两个食堂进行批斗，同时抄了刘少奇的家。在斗争会上，不许刘少奇讲一句话，强按着他低头弯腰站了两个小时，刘少奇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难以忍受这种折磨。他掏出手绢想擦一下汗，被旁边的人狠狠一掌，把手绢打落，汗水滴在地上……

斗争会后，刘少奇被押回前院（他的办公室）隔离看管，加派了岗哨。王光美被押到后院。子女虽然还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也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不准他们去爸爸、妈妈被关押的地方，不准他们离开家。

刘少奇不知道王光美关在哪里，也不知道孩子们的去向。而从他孩子住的地方，有时却能看到刘少奇在屋里的活动，也能看到后院的王光美。可是既不能见面，也不能说话，他们心里像油煎似的难熬。一家人被分割在一所宅院里，父母儿女，咫尺天涯。

19日早晨，刘少奇到食堂用饭，看见刘平平和刘源源正在那里洗手巾，一时喜出望外。趁哨兵不注意急忙走过来，小声地问他们：“你妈妈在哪里？”

“关在后院。”他们说，

“哦，你们呢？”

刘源源低着头说：“他们不准我们跟你们见面、说话……”

这时，哨兵走过来，他们不敢再讲下去，刘少奇也只得转过身，恋恋不舍地走了。

从此以后，刘少奇天天站在他的后窗户前望着后院。尽管其间还有一道墙隔着，根本看不到后院的一切，可是刘少奇一站就是好半天。孩子们望着刘少奇的身影，似乎听到老人胸中的波涛翻滚。

1967年8月5日，伏天的北京，骄阳似火。有空调设备的钓鱼台8号楼里，却是另一个天地，里面十分凉爽。江青坐在康生的对面，她说：“今天

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一周年，怎么庆祝一下呀？”

“最好的庆祝，”康生吸了一口烟说，“是今天再炮打一次刘少奇，不然，他老在屋里呆着，太便宜他了！”

“不能让他舒舒服服的，”江青咬牙切齿充满杀机地说，“要斗他，要狠斗！”

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一伙策划下，一场批斗刘邓陶的大会，分别在中南海内各家院内举行，与天安门的百万人大会遥相呼应。“中央文革特派员”曹轶欧等，亲临现场指挥，安排了录音、照相、拍电影，说要在全国放映。

那天，刘少奇三个孩子，被特派员命令参加大会，每个人身后还故意安排几个战士看守。他们站在围斗的人群后面，满腔悲愤，眼看着刘少奇、王光美被几个彪形大汉架进会场。大汉们狂暴地按头扭手，强迫他们做出卑躬屈膝的样子，作“喷气式”，拳打脚踢，揪着刘少奇稀疏的白发，强迫他抬头拍照。

突然，哇的一声嚎哭打断了会场上的口号和谩骂，“谁敢在这时候哭呢？”人们的目光都转向了大门口，原来是6岁的小小，被如此残暴的景象吓得嚎陶大哭，拼命往大门后面爬去。顿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木呆了，全场鸦雀无声。刘源源转身就向外跑。几个战士抓住他，厉声喝道：“你要干什么？”刘源源使劲挣脱开身：“你们没听见小小在哭吗？”刘源源一把抱起小小，亲吻着她，吮吸着她的泪水……

会场的指挥者还觉得“火药味不浓”，命令他们的走卒们“要杀气腾腾”。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斗争会上，刘少奇不断遭到野蛮的谩骂和扭打。刘少奇的每次答辩，都被口号声打断，随之被人用小红书劈头打来，无法讲下去。会场上，突然喊起打倒十几个老干部的口号声，刘少奇却纹丝不动。那些人揪着他质问为什么不喊口号？刘少奇回答：“我负主要责任，要打倒，就打倒我一个人。”

接着，那些人把刘少奇、王光美押到会场一角，离刘少奇的子女只有几步远，硬把他俩按下去向两幅巨型漫画上的红卫兵鞠躬。刘少奇被打得鼻青脸肿，鞋被踩掉，光穿着袜子。就在这时，王光美突然挣脱，一把紧紧抓住刘少奇的手；刘少奇不顾拳打脚踢，也紧紧拉着王光美的手不放。他俩挣扎着挺着身子，手拉手互相对视。这是刘少奇跟王光美最后握手告别。

几个“造反派”狠狠地掰开了他们的手，王光美又奋力挣脱，扑过去抓住刘少奇的衣角，死死不放……然而，暴力终于把他们分开了。那些人把一幅画着绞索、红卫兵的笔尖和拳头的漫画套在刘少奇的头上。在这一片谩骂和围攻之中，谁能想到漫画的绞索套中竟是我们八亿人民合法选出的国家主席！

斗争会结束后，刘少奇被押回办公室，他疲惫已极，余怒未息，立即按铃把机要秘书叫来，刘少奇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义正词严地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刘少奇要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来维护国家的尊严，维护人民的神圣权力，为捍卫神圣的宪法作最后的斗争。尽管秘书当夜就写

了汇报，但刘少奇的抗议没有得到任何回答。8月7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信。他严正抗议给他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书面向毛泽东提出辞呈，并向毛泽东写明：“我已失去自由。”

经过这场非人的摧残，刘少奇的腰伸不直了，打伤的右腿一瘸一拐地拖着，只能双手扶着走廊的窗台一步一步蹭着移动。为了不使孩子们难过，一见到孩子们老远在望着他，他就放开双手，强伸起腰，那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

王光美仍关在后院，头破了，还被强迫劳动搬砖。一位站岗的哨兵看到王光美背一大筐砖很吃力，就大声“训斥”说：“你不会一次少背几块嘛！”语气是凶狠的，却包含着极大的同情，就因为这一句话，这个哨兵立即被调走，复员回乡了。

那是1967年9月13日上午10点，突然，通知刘少奇的子女立即收拾行李，回各自学校接受审查批判。他们要求能在假日回家，回答说：“不行，你们给刘少奇、王光美通过风，报过信，必须好好检查罪行！”他们要求最后看一眼爸爸、妈妈，也被无理拒绝了。怎么办？他们就暗中商量无论如何也要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这样就能再见到刘少奇一面了。他们一会儿说要找衣服，一会儿要找书，慢慢悠悠，来回磨蹭，尽量拖延时间。“造反派”可能发觉了他们的用意，就把东西扔进卡车，硬是不准他们见刘少奇最后一面。就这样，他们被赶出了中南海，赶出了家。同天下午小小和阿姨也被赶出中南海；晚上王光美被正式逮捕入狱。这，就是他们生离死别的一天。

毛泽东的邻居不见了

走出居仁堂，拐进两边红墙耸立的窄巷，穿过万字廊，便是刘少奇居住的院落。这里原是清朝光绪皇帝读书的地方。位于中南海甲区的刘少奇住房并不阔气。1952年以前住的是一幢旧式房子，共有三间，一间是办公室，一间是会客室，一间是卧室。因年久失修，都已十分破旧。后来，管理部门给刘少奇调了好一点的房子，使他成了毛泽东的近邻，但孩子们住的还是集体宿舍。至于他的办公室，仍然很简单，除了办公桌、书架、文件柜、一对沙发、一把藤椅，既没有地毯，更看不到什么可供欣赏之类的摆设。在不到2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光是西面的一堵墙就有四个大窗子，到了冬天，西北风一刮，窗帘像波浪一样飘动，室内温度很难升上去，刘少奇办公时还要穿棉鞋。一到夏天，太阳西照，又特别热，既无空调设备，也无电扇，他有时只穿一件背心办公还满身大汗。当时，工作人员住在楼下，比刘少奇办公室凉快得多。有一次，刘少奇到工作人员办公室交待事情，风趣地对他们说：“好地方让你们住上啦。”

刘少奇的卧室更简单，除了床和书架以外，只有两个凳子，四五个人进去就显得拥挤。有时夜间一两点钟，周恩来有急事和他商量，工作人员就直接引到卧室。有一次，跟着周恩来来了三四个同志，卧室里就没地方坐了，有的坐在床上，有的干脆就站着谈。工作人员要去搬几个凳子，周恩来说：“不用，不用，很快就谈完的。”可是谈着谈着，几十分钟就过去了。多年的工作，给工作人员一个深刻的印象：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脑子里装满国家大事，为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快点富强起来，有一种紧迫感和高度的责任心，只要能办公，什么时间、地点、条件、形式，他们从来都不讲

究的啊！

刘少奇全家人的吃用穿戴，同样是十分俭朴的，刘少奇在家里穿的都是普通布衣，有的由于年久，都洗褪了颜色，衬衣总是穿到无法再补了才肯换新的。吃饭更简单，尤其是夜间那顿饭，常常是把中午剩下的（有意多做一点）来个一锅烩。因为用饭时间都是在半夜 12 点以后，为了照顾厨师的休息，刘少奇就叫王光美做这顿饭。所以，工作人员开玩笑地称王光美是“烩饭厨师”。

1952 年以前，中南海里的生活设施还很简陋。刘少奇每天喝水，都是警卫员在煤球炉上烧的开水；洗澡用水也是一个很旧很小的锅炉烧的。刘少奇为了节省煤，一星期只洗一到两次。

就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刘少奇夜以继日地为我们的国家工作了十几年。

1967 年 9 月 13 日，就在子女们被迫离家，王光美也被关进了监狱的当天，刘少奇佝偻着身子，手扶着走廊窗台，拖着打伤的腿，一步一步地蹭着，想看到自己的孩子们；又蹭到曾被关押的后院墙根，想听到里面的动静。然而，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每次都是失望地蹭回来。周围的一切是那么寂静。一天夜里，家里连夜筑起一堵高墙，再也不许刘少奇出门到后院墙根了。接着，几个战士又奉命来搜查刘少奇的房间，并要他把皮带解下来。刘少奇厉声抗议，话音未落，就被按倒在地，强行把皮带抽去。刘少奇发火了，气得浑身打颤，半天爬不起来。

刘少奇完全像囚犯一样！不，比囚犯还不如。

之后，迟群跑来，代表“中央”给刘少奇的警卫战士训话：“你们×中队负责警卫的人里黑帮出得最多，刘少奇就在这儿。你们中毒最深，要肃清流毒。你们现在的任务已经根本变了，不是警卫，而是看管刘少奇。”他还恶狠狠地加了一句：“要好好地看管，不能留情，”原来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被骂为“地道的保皇兵”，下了他们的枪，没收了证件。“看守”刘少奇的战士，也加了双哨，层层监视，谁要是有一点“留情”，就要立即被批斗、关押或送回农村老家。

当王光美和孩子们都已被迫离家，只剩下自己孑然一身之后，刘少奇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再加上不给足够的安眠药，强迫改变生活习惯，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彻夜不眠。这种折磨使得刘少奇成天神志恍惚，常常陷入沉思而忘掉一切。他的手臂曾在革命战争年代受过伤，经过扭打，如今又发作了，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到饭厅吃饭，短短的 300 米距离，竟要“走”上 50 分钟，甚至两个小时。前后跟着的看守战士谁也不敢上去扶一把。最后根本不能走动了，只能由工作人员把饭打来吃。常常打一次饭，吃几顿。刘少奇满口只剩 7 颗残存的牙齿，嚼不动窝头、粗饭，又长期患有胃病，加上经常吃剩菜馊饭，常拉肚子，身体更虚弱了。手颤抖得不听使唤，饭送不到嘴里，弄得满脸满身都是。

这一切，使得刘少奇身体愈来愈坏，经常生病。病得厉害时，大夫护士也不敢好好看。每次看病前先开一阵批判斗争会，一边检查病情还得一边大骂：“中国的赫鲁晓夫。”有的用听诊器狠狠敲打，用注射器使劲乱捅。看病就跟上刑一样。有一次，刘少奇实在忍受不了，抗议道：“你们给我看病是假，我的病你们越看越重。”接着，他们又把刘少奇服用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药 D860 也停了。

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怎么经受得起这种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刘少奇的身体日益恶化，有时神志不清。可是，那些负责监视看守的人却说：“此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的可能。为严防意外，监护工作要相应采取一些措施。”

1968年仲夏的一个晚上，刘少奇发起高烧。大夫来敷衍了一下就走了。第二天转成肺炎，引起多种并发症，随时有死的危险。上面得知后，立即派医护人员来抢救。这以后，刘少奇虽然没有瘫痪，却再也无力起身活动，每天在严密的监视中躺在床上。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人给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起床大、小便。因为不活动，双腿的肌肉渐渐萎缩了。他的胳膊和腿由于常打针被扎烂了。护士记录上写着：“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

在室内刺眼的灯光下，刘少奇哪曾想到：他的妻子正被关押在阴暗、密闭的牢房里，直不起腰、毛发脱落、咳血，被林彪一伙判了死刑；他的长子刘允斌已惨死一年多了；长女刘爱琴被关在“牛棚”里，遭着毒打；次子刘允若在监狱里患着脊椎结核，被折磨得死去活来；19岁的刘平平被关进单人牢房；刚从监狱里出来的17岁的刘源源，正艰难地行走在雁北的漫天风沙中；年龄更小的刘亭亭独自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苦苦争斗；心爱的小小（刘潇潇）处处遭歧视，正忍受着痛苦和凌辱。

1968年11月24日，是刘少奇70岁的生日。刘少奇从来不让别人为他祝寿，他总是在这一天特别加倍工作，引以为最大的欣慰和欢乐。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年的生日——

据说这天早上，刘少奇听到八届十二中全会把他“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十二中全会开过整整24天了，单单在生日这一天让他听到。刘少奇气愤已极，浑身颤抖，立时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大口呕吐，血压陡然升高到260/130，体温升到40℃。但他一声不哼，只有那一双干涩的、快要绽裂的眼睛，喷射出怒火……

从此以后，刘少奇一句话不说了，连治病和生活用语也一句不说了，表示无言的抗议。周恩来动员了北京医院的两个护士来护理刘少奇，可是这两位熟练而细心的护士也无能为力啊。

突然一天，刘少奇叫起过去的卫士小贾的名字。看守把小贾找来，小贾问有什么事，刘少奇只朝他微微一笑，小贾又问了一遍，刘少奇仍不说话，闭上了眼睛，过了几天，刘少奇又同样叫来以前的卫士小于，也是微微一笑，闭上眼睛不说话。啊——这是刘少奇向他们作最后告别了。在他最后的日子，他身边没有妻子儿女，没有一个亲人，只有这两个在身边工作过几年的青年卫士。他们勤勤恳恳地工作，真诚地热爱刘少奇。刘少奇熟悉他们，喜欢他们，关心他们，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刘少奇常说：“不管是谁的孩子，在我这里，我就要把他们当作革命的后代来教育。”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了。如今，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刘少奇向他们告别，不，是在向中国人民和青年一代告别！他知道留给青年一代的是什么，是曲折而光明的前途；是备受伤害而仍不屈不挠的心灵；是优秀而崇高的品质；是鲜明而又深沉的爱和恨，他深信青年一代一定会奋勇斗争，夺回真理，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繁荣富强起来。

1969年10月17日，根据林彪“一号手令”，将刘少奇送往开封。刘少奇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通着吸痰器，身上扎着输液管。医生护士都认为：“随时都可能发生突然死亡”。当时中办的负责人来到刘少奇房门口瞧

了一眼，亲自叫人通知刘少奇转移。护士只好用棉签蘸上紫药水，在一张报纸上写了几个大字：“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刘少奇转过脸不看。护士又把这张纸拿到另一边，让刘少奇看，刘少奇又把脸扭了过去。刘少奇原卫士长老李上前对看他的耳朵，心情沉重地把纸上的字念了一遍，刘少奇闭着眼睛，一言不发。

晚上7点多钟，刘少奇赤着身子，被人用被子一裹放上担架，由专案组的人监护，让护士和原卫士长老李陪着，乘飞机飞往开封。林彪在河南的那个死党亲自把刘少奇关进一个特别监狱。这里围墙高大，电网密布，戒备森严。

这正是初寒的天气，刘少奇在担架上因为没有穿衣服，一着凉肺炎又复发了，高烧39℃，呕吐厉害。而林彪在河南的死党却声称：“一切均好，病情无异常变化。”到11月5日，刘少奇又一次高烧，抢救两天以后才降到37.2℃。当时在刘少奇身边的人都说，他特别配合治疗。刘少奇虽然不说话。但他的神志还清醒，他仍然想活下去，想亲眼看到林彪、江青一伙的下场。

就在刘少奇退烧的第二天，11月8日，专案组下令：凡北京陪同来的人，立即撤回北京，一个也不准留，连北京带来的药也不准留。临走之前，专案组的人特意到火化场看了看，但又说：“千万不要死在我们手里。”然后向当地负责人员训话说：“要激发对刘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证据。”

原卫士长老李一回到北京，就要向当时中办的负责人汇报情况。他得到的回答是：“不用了，先休息一天。”可是，深夜两点，电话铃催醒了老李：“他昨天已经死了，你必须再赶去。”老李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连忙取了一些衣物匆匆赶往机场。

13日凌晨，老李到开封，直奔刘少奇的身旁。刘少奇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盖着一个白床单，一尺多长的白发蓬乱着，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了，下颔一片淤血……

老李急切地询问了解，原来——

11月10日晚发高烧，试体温表，5个小时后才取出，体温39.7℃，“当时不能确诊是肺炎”，但却按肺炎治疗，不让送医院抢救。到11日深夜，嘴唇发紫，两瞳孔光反应消失，体温40.1℃。第二天6点40分，才发出病危通报；5分钟后。6点45分心脏停止跳动。两分钟后，值班医生、护士赶到现场。两个小时后，“抢救”人员才赶到……

老李偷偷抹去夺眶而出的泪水，给刘少奇剪去一尺长的白发，刮去长而稀疏的胡子，穿上衣服和鞋子。深夜12点，六七个人把刘少奇的遗体抬上一辆吉普车，小腿和脚伸露在车外，拉到了火化场。

火化场早已得到通知，说有一名“烈性传染病人”要半夜火化，只准留下两个工人。20多个军人把小小的火化场全部戒严。由中办专案组的人在火化单上填写——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并冒充死者的儿子刘源签了名……刘少奇曾说过：“我活着是个无产者，死的时候也要是个无产者。”可人们怎么也不曾想到，他竟“无产”到这个地步：他为革命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死时却成了“无业”；他把自己的一切都无私地献给了人民，死时却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没有哀乐，没有哭声；他为党披肝沥胆，死时却没有鲜花，没有党旗……他死时，只有那一尺长的白发属于自己，还有的就是那林彪、江青、康生和陈伯达一伙强加在他身上的奇耻大辱。

火化后，专案组宣布纪律，要用党籍和脑袋担保，谁也不准透露出去。

并举行酒宴，宣布：“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

林彪、江青一伙自以为干得神鬼不晓，人民毫无所闻；他们自以为“胜利”地清除了他们的篡党篡国的最大障碍。但是，党是公正的，人民是公正的。对于任何人来说，历史自有公论，而那些莫须有的罪名，终于公正地落到那些炮制者自己的身上。历史是无情的，民心是不可违背的，真理之光是永远不会泯灭的。为人民英勇献身的刘少奇，将永远受到人民的怀念和尊敬。

第十三章 离开钓鱼台，陶铸“乔迁”中南海。江青闻讯质问：“是不是文革小组名声太小，不如国务院响亮啊？”保刘、邓，殃及中国第四号人物。

来到北京

1966年5月底，中央通知陶铸去北京开会，回来后，陶铸心情显得相当沉重，第二天午饭时，沉默了很久，陶铸终于开口对夫人说：“曾志，中央要调我去北京工作。”

“干什么？”曾志问。

“中宣部长。”

曾志断然说：“你不合适，你胜任不了。”

陶铸点点头：“刚才我在常委会上讲了，紫阳同志也认为这个工作于我不太合适。”

“那你就向中央辞掉。”

陶铸沉重地为难道摇摇头：“辞是辞不掉的。除了中宣部长，还决定要我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他浓眉紧锁，缓缓地说：“这件事我已经考虑了很久，也想得很多，事已如此，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陶铸临危受命时，全国已面临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十分严峻的险恶形势。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已在全国公布，批吴晗的《海瑞罢官》，批“三家村”，批“十七年的文艺黑线专政”，甚嚣尘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铺天盖地而来，晴朗的中国上空，刹时已变得天昏地暗。林彪、“四人帮”正在利用这个集中代表“左”倾错误的纲领性文件，把它推向极端，搞乱全国。

1966年5月底，中央通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去北京开会，调陶铸去中央工作，担任中宣部长，还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

6月1日，陶铸就匆匆飞往北京，住到了当时“文革”小组所在地钓鱼台国宾馆，因为他还另兼一职——中央“文革”顾问。

陶铸的到来，使当时并不宁静的国宾馆又涌动起一股暗流——“文革”小组成员对他展开了一连串拉拢手法。

就在陶铸来京的当天晚上，钓鱼台幽静的林荫道上，出现了一高一矮两个人影。警卫人员一看那身形，便知道是住8号楼的康生和住15号楼的陈伯达。

自从中央文革将办公处设在钓鱼台后，这两个人的身影便经常出现，一闪一晃，像两个幽灵。此时，他们正结伴去看望他们的新邻居。一路上，自然少不了串同盟者式的“通气”。

“陶铸是黄埔五期的，可算是林彪的同学。南昌起义时跟萧克在一起，当连长。不过，真正受重用还是在东北，林彪很看重他，他算四野的人。”康生很咬重“四野”两个字，带着权威者的神气长吸一口气。他还伸出一只手掌看了看，好像满把抓的都是人，都是要人，他无不了如指掌，停顿片刻，又意味深长地补充一句：“同北方局派去的东北的干部关系一般。”

陈伯达只是微微点头，并不作声。今天，他专门看过陶铸的资料，对这位刚调来的中央新人的了解，自然不仅仅是这些。

陶铸，原名际华，字剑寒，又名任陶。1926年18岁入黄埔军官学校，

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叛变革命后，1927年参加著名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福建从事秘密工作期间，先后担任福建军委秘书、闽南特委书记、厦门中心市委组织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组织和指挥了闻名全国的厦门劫狱斗争，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判无期徒刑。在南京监狱里，领导难友进行了绝食斗争，1937年9月26日被党营救出狱后，赴湖北开辟了鄂中抗日游击区，任鄂中区省委常委。以后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先后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宣传部长。解放战争期间，一直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先后任辽宁省委书记、辽西省委书记、辽吉省委书记以及东北野战军（四野）第七纵队政委、沈阳军管会副主任，沈阳特别市委书记、四野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职。并受中央委托，进入北平，与傅作义将军谈判和平解放北平，以后又担负起了部队的改编和组织领导南下工作团的工作。全国解放后，先后担任武汉军管会副主任、广西省委代理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四书记、广东省委书记、省长、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

不过，陈伯达对人的历史不如康生的兴趣大，每当政治变动发生时，他特别注意各派政治力量的情况，他不太留意是非，他只关心来头。他那福泰的肚子里装货很多，站在哪一边都能掏出120个道理。

他也了解身边这位同盟者，他一生从来没有与天斗，与地斗，他全是跟人斗了。大概中国的高级领导干部，很少有不令康生感兴趣者，他都想去窥探，想去查一查；发现点什么，抓住点什么。

康生在延安的地位已经很稳固了，中央委任他担任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务。

从那时起，康生给自己定了一个行动准则。待人，要因人制宜。对待手握大权的铁腕人物，要学会号脉，对症下药，投其所好；对待同级，要和蔼可亲，左右逢源；对待下级可又打又拉，恩威并用。随着地位的巩固，康生很想在延安有番“作为”。整人，是康生的拿手好戏，一旦时机成熟，他就会大展拳脚，再现莫斯科时期玩的那套把戏。

这个时机果真被康生抓住了！

在延安整风运动后期，康生借“抢救失足者”之名，大搞逼供信，把大批干部打成“叛徒”、“特务”、“内奸”，这就是所谓延安“抢救运动”。这场害人运动，可以说是由康生一手策划、制造的。

1943年七八月间延安进行的“抢救运动”，其发生有一个过程，大体经过整风运动、审查干部工作和反特斗争以及掀起“抢救运动”四个阶段。

1943年初，康生就提出这样一个理论：“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这是预言？暗示？还是指令？人们不得而知。人们只知道整风是党中央全力以赴开展的一场思想教育运动，康生充其量也只是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社会部部长，怎么敢说这种话呢？但人们忘了，康生又是整风学习委员会的副主席（毛泽东是主席），在整风运动中，这是一个极其显赫的官爵，“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际上他用一种更隐蔽的手段，影响毛泽东本人。当中央于1943年4月3日发布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之后，隐藏在康生心底的变被整为整人的罪恶目的，终于变成了中共中央的明文指令。

《决定》说：

“一年的经验证明，整风不但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办法，而且是发现内奸与肃清内奸的最好方法。凡整风尚未深入的地方，不但干部的错误

思想尚未纠正，内奸问题也不曾引起注意。”

《决定》强调说：

“纠正错误思想与肃清内奸分子，是在整风过程中互相联系着，但在性质上又互相区别，绝对不能混同的两件事。因此，在进行程序上，在各地整风的初期与中期，除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应十分注意外，在公开号召中，必须绝对不提审查干部与肃清内奸的任务，只提纠正错误思想与检查工作的任务，否则，不但干部的错误思想难于纠正，内奸亦不能发现与肃清。”

自然，康生对这一《决定》的精神驾轻就熟，由他亲自负责、直接指挥的一场审干运动（包括抢救运动），如洪荒时期的汤汤大水铺天盖地般涌来，漫淹了整个延安和各个根据地。

1942年11月间，年仅19岁的原甘肃地下共产党员张克勤，被康生亲自出马，打成特务。

张克勤，1937年入党，后经甘肃工委和中央代表林伯渠同意调延安深造。张克勤的父亲在兰州开了一个照相馆，光顾照相馆的人，自然是什么人都有，国民党的军官、特务之类的人也去。据此，康生就说张克勤父亲的照相馆是“特务联络点”，张克勤的父亲当然是“特务”，而张克勤当然是他父亲派到延安来的“特务”，于是逼迫张克勤承认，张不承认，就搞车轮战，审讯了6天6夜，肉体受到百般折磨。在“坦白了可以保留党籍”的诱逼下，张终于承认了自己是“特务”，还供出了“甘肃党是红旗党，假共产党”的假口供。接着康生便在八路军大礼堂亲自主持召开了张克勤坦白大会。开会那天，延安各机关、学校的代表们带着几分好奇、还有几分胆怯汇聚在一起，如潮水般涌进了礼堂。会议开始，康生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蹬一双长筒马靴，大摇大摆地踏上主席台，简短的开场白之后，他便指着张克勤说：我们在西北农学挖出了一个隐藏很深的特务，叫张克勤，他父亲就是特务，大家说，他能不是特务吗？

读者可能觉得逻辑不通，其实这就是康生铸就的铁的逻辑。他将那么多人打成特务，几乎都用的是这种逻辑。他在整人的时候，动不动拍着胸膛说：“看×××那个样子就像个特务。”“××要不是特务我把康字颠倒写。”甚至给一位女同志下了这样一条海外奇谈式的结论：“你长得那么漂亮，你不当特务，谁当特务？”这种主观臆断、荒诞不经、信口雌黄的诬陷，在康生那里就像魔术师甩扑克牌那么简单，那么容易，而扔在被整的人身上，便变为了一口巨大的黑锅，它使人喘不过气，甚至会被压死、闷死。

在这天的会上，亮出他自己获得专利的“铁逻辑”之后，康生将金丝边眼镜一提，用阴阳怪气的音调说：“你张克勤肯定是特务，要不，我康生敢拿20年党龄做保证！”

这样一个大人物，在张克勤心中，哪怕是自己19岁的全部生命，也抵不了他1年的党龄，更何况是20年呢！权势者的威力，一旦和荒淫无耻结为联盟，那淫威足以使白的、红的刹那间变得漆黑一团。张克勤无言以对，只得装出一副老老实实的样子，交待自己的“特务史”。还交待说：国民党对我们白区的地下党实行“红旗政策”，即用特务、内奸搞假共产党。甘肃地下党就是“红旗党”，而且说他本人就是一个被发展的特务。

谁都难以相信：张克勤围此而吃上了小灶，并擢升为副科长。这真是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他成了坦白的“典型”了。他周游遍了延安大大小小的机关学校，现身说法，为所有打成特务和未被打成特务的知识分子、

文化人树立起一个“坦白光荣”的榜样。

接着康生便借用这个案件大做文章，认为这是审于工作的一大突破。于是他将此情况一面抄送中央，一面以此为资本到处宣扬说，“红旗政策”是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对共产党实行内好政策的新策略，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靠不住，必须“重新估计”。请看他在一个干部训练班的讲演：

“张克勤案件使我们对国民党的特务政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对大后方的党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对延安的特务分子数量得到一个解答，使我们的右倾思想有了一个触动。”随即，他领导的社会部和保卫机关工作人员在延安各机关内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查，把来自甘肃、河南、湖北、四川等地下党的一些他认为可疑的人，捕押起来，审问逼供。并将曾在甘肃工委工作过，当时已分散到各地工作的很多同志先后押到延安受审。同时，康生抓住一些未经调查核实的案件或一些人的口供，大肆渲染，造谣惑众，一步一步地把整风运动引向了所谓肃清反革命、肃清内奸特务的斗争。

1943年4月初，胡宗南派代表来延安，康生借防止边区内部特务与胡来往的名义，亲自批准保安机关，于4月1日晚上一夜之间在延安抓了200多个“嫌疑分子”。康生得意地说，这叫“秘密突破”。但在红色政权的首府，一下子就捕获这么多的“特务”，人们的心理猛地失去了平衡，群众根本接受不了，有的人当面向康生提出，“捕人证据不足。”

康生蛮横地说，“先抓起来再说，正因为不清楚，才关起来审问，审问是为了弄清问题。”

身为保安机关的最高长官，竟以这样毫无法律常识的语言来作大肆捕人的注解！

康生在“抢救运动”中的一大发明是所谓“特务如麻”。为了证实他这一估计的正确性，就必须使用逼、供、信的手段逼人就范。

炮制“坦白典型”，利用“坦白典型”公开演讲，现身说法，制造“特务如麻”、“坦白光荣”的气氛，这是康生操纵运动的杀手锏。从1943年4月至7月，这一阶段除了炮制典型外，还让人人自觉坦白，写思想历史自传，从思想上反省，坦白自己是否有问题！在这3个月内，仅延安中央系统（不包括边区所属各地区）各单位就有四五百人坦白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7月15日，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向中央直属机关干部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明确提出：“现在是紧急的军事动员时期，他们（指失足者）要在这紧迫的时间内，挽救自己，而共产党也要在这紧迫的时间中挽救他们；我们要警告那些不愿意坦白的人们，宽大是有限度的，这一点要严重注意。”

在这一次关键性的会议后，又刮起一场横空弥漫的“龙卷风”。整个边区从机关到学校、工厂，从城镇到农村，从上层到中下层，开始了“全线进攻”，弄得人人自危。10天之内，搞出的特务超过了前几个月的总和。在康生亲自操纵下，逼供、诱供、劝供一齐下手。凡从国统区、敌占区来的自不必说都是“特嫌”，甚至生长在边区根据地的人，只要和敌人有一丝瓜葛，“特务”的桂冠就算是戴定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达到了无以复加、骇人听闻的地步。

当时在延安普遍流传着这样一件事：有一位从国统区千里迢迢来延安求学的学生，在抢救运动中受到了审查。

问：你家中还有什么人？都在干什么？

答：父母亲都在战火中死亡，只我一个。问：国民党内有你的亲戚吗？

答：没有。

问：那么你来延安是国民党派你来的？

答：不是。

问：你是怎么来延安的？

答：坐火车来的。

问：坐谁家的火车？

答：坐铁路上的火车。

问：铁路上的火车是共产党的吗？

答：不是，是国民党的。

问：坐国民党的火车，你还能说与国民党没关系吗？

答：噢！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当即承认自己是“特务”或“敌探”，就可以戴一朵大红花，名曰“再生花”，坐在主席台上以示“光荣”。甚至还可以吃到一顿延安少有的好饭，西红柿挂面、红枣稀饭等。如果不承认，那就“五刑具上”，各种方法都来了。下面介绍几种当时较普遍的“抢救”方法：

一、精神折磨，刑讯逼供。首先给被怀疑的人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接着进行肉体的折磨。康生曾召集一次讨论起草《审讯条例》的会议。会上为可否用刑逼供出现意见分歧，两种意见尖锐对立。为此，康生大发脾气，说：“不用刑，那么怎么审讯？！”有同志说用材料嘛！康生理直气壮地说：“有材料还要你审讯？！”所以在“抢救运动”中用刑逼供是相当普遍的，如打人、骂人、抓人、关押、“车轮战”、“疲劳战”、假枪毙等等，无所不用其极。被关押的犯人则常常不让吃饱饭，不让睡觉，用这些办法逼迫被审查的人假交代、假坦白。

二、滚雪球。坦白了的人，还要受到这样的质问：“你的上级是谁？”“你的下级是谁？”“你的联系人又是谁？”如不交待这些情况，还不能是彻底过关。于是，有人供出了自己的好友，有的人供出自己的亲戚，有的人则供出了同事、同乡。就是这样滚雪球，伤害了许多好同志，有的被逼致死，同时也使多少个家庭破裂！其造成的后果严重地伤害了同志间的感情，破坏了党内团结！

三、审查档案，无限上纲。康生要求各单位的组织部门翻阅干部档案，从档案中找问题，美其名曰“调查研究”。怎样找问题呢？康生规定每个来延安的人都要写3次自传：刚到延安要写，整风中间要写，到反省机关还要写，然后前后对照，找矛盾，找缺口。更荒诞的是，康生发明了一种“填月表”的办法，即突然要求被审查的人当场按月填写出自己的历史，一面交待，一面填表，如有一个月填不上，或填的有出入，就以特嫌论处。

四、布置人员，“引蛇出洞”。康生在审于开始时，就专门布置一些人，故意说些过头话、错话甚至反动的話，把另一人的言论“引”出来，然后揪住辫子不松手。

五、“面条的诱惑”。“坦白光荣”是精神鼓励和刺激，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诱惑，人们谁都不愿在红色的边区当一名落后分子，只要胡编乱造几句假话，就可以从“地狱”升入“天堂”，那些少有主见或别有用心的人，又何乐而不为呢？与“坦白光荣”紧连着的是“物质奖励”——面条的诱惑，绝不能低估。因为延安在1942年、1943年间，面粉极为缺乏，一个礼拜，甚至一个月也吃不到一顿白馍。对那一顿管饱的鸡蛋挂面真是馋死

了！自然科学院有名四川来的小学生，为了吃一顿让人垂涎三尺的鸡蛋挂面，便说自己是刘湘直接派来的。

在各种抢救方法面前，有些人的意志在诱惑面前倾斜了；有些人由于对党的朴素的信仰，“光荣地坦白”了；有些人坠入五里雾中随波逐流了；有些人在逼供的淫威下屈服了。

这种突击造成的“特务如麻”的假相，在后来两年的甄别工作中证明90%以上的人是冤假错案。

“抢救运动”的错误，很快被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发觉纠正了。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央向受委屈的同志赔礼道歉。七大代表不少是在抢救运动中挨过整的。他们在会上提了不少意见，对康生极为不满，为了平息众怒，毛泽东在七大专门讲了一段话，指出在抢救运动中搞错了不少同志，冤枉了好人，不要“一人向隅，举桌为之不欢”。说不少同志受委屈，我代表中央向各位受委屈的同志道歉，说：是则是，痛改前非，团结抗战，一个不杀；非则非，取掉帽子，赔个不是。毛泽东同志把手举到帽沿下说，现在，我把戴错了的帽子给你们取下来，向你们行个礼，赔个不是。你该还我一个礼吧，你不还礼，我这个手就放不下来了。当时台下的同志感动得热泪盈眶。可是直接负责“抢救运动”的康生，却神色不动地坐在台上抽烟，未作任何检查。散会后大家向外走，李富春同志问康生，你怎么不讲几句？康生恶毒地说，我不会当两面派人物。不仅如此，康生还对甄别工作进行阻挠，硬给许多同志的结论“挂尾巴”、“留辫子”。“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又乘机为“抢救运动”翻案，把在延安已经甄别平反的问题又重翻出来，使许多老干部再次受到诬陷迫害。

耐人寻味的是，康生的阴谋伎俩在当时就被一个外国人看穿，他就是季米特洛夫。

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就中共党内状况问题写信给毛泽东。信中写道：

不言而喻，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它原来的领导人当中谁也不能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好的角度我不能不向您谈谈中共党内状况在我这里所引起的不安。您知道，从1935年起，我曾有幸近距离地并常常是直接地研究中国问题。我对康生的作用也有怀疑。因为像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加强党的团结这样一种党的正确措施是由康生及其机构以很成问题的方式实施的。这些方式只能造成相互猜疑，只能引起普通党员群众强烈不满和帮助敌人瓦解党。早在今年8月，我们就从重庆得到一份十分可靠的情报，说国民党分子决定向延安派一些奸细，其目的是要离间您同王明和党的其他活动家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制造对所有在莫斯科住过和学习过的人的敌对情绪。关于国民党分子的这种阴险企图，我曾及时提醒过您，国民党分子的如意算盘是从内部瓦解共产党，进而轻而易举地消灭共产党。我确信，康生是以自己的行动在为这些奸细效劳。请原谅我这种同志式的坦率。这是我对您的深深的敬意和我的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即相信您作为党的公认领袖是愿意看到事情的真相的，才使我如此坦率地谈出了自己的看法。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讲讲、天

天讲。面对着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的形势，康生感觉到他兴风作浪的时候到了。他在会上给毛主席递了个“写小说反党”的条子，于是产生了所谓“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最高指示”。这句话像一枚重磅炸弹，使参加会议的人都目瞪口呆，会议立即改变了原来讨论经济工作的中心议题，全部集中到“阶级斗争新动向”上来。

所谓“反党小说《刘志丹》”案，是康生一手策划的大冤案。这桩现代文字狱前后持续了 17 年之久。

1956 年，工人出版社为了对广大工人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拟定了一个出版革命烈士传记和革命回忆录的选题计划，小说《刘志丹》就是其中的一种。当时，出版社看到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和弟媳李建彤写的回忆刘志丹的短文，于是约请李建彤写作小说《刘志丹》。

小说在创作过程中，先后得到中央领导、文艺界的老同志和社会各方面人士的帮助。1960 年，曾在西北工作过的刁仲勋两次向作者和出版社同志谈了他对《刘志丹》稿样的意见，强调写书是教育青年一代，通过写革命领袖人物刘志丹，写西北大革命，把刘志丹经历的时期写成为全国的缩影。小说的主导思想就是毛泽东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通过刘志丹具体体现。

作者六易其稿，在小说将要出版之前，《工人日报》等几家报刊选登了部分内容。

此时，康生正处心积虑地搜罗所谓阶级斗争的“典型”，他正愁着没有什么是非可以拨弄，恨不能鸡蛋里挑骨头。当他抓到小说《刘志丹》这根“稻草”后，他连书稿还没拿到手就武断地说：“我一看小说就知道完全是为高岗翻案。”按照他的逻辑分析，刘志丹是陕北根据地的创建人，颂扬刘志丹和陕北根据地的丰功伟绩，不就是贬低毛泽东在江西建立根据地的作用了吗？不就是抬高一直在陕北根据地的反党分子高岗的地位，为他翻案吗？于是，康生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得发表《刘志丹》，接着，又写信给中央办公厅，武断地认定：“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问题，看来是个带有政治倾向性的问题。”并责令工人出版社，把《刘志丹》第五稿印 600 本，第三稿印 300 本，送中央会议审查。

康生鼓足一口气，非要把这个事捅大不可，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他竭尽全力煽动对小说《刘志丹》进行批判，硬说是为高岗翻案。定下这个调子，小说作者及其相关人员的处境便可想而知了。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以康生为首的，包括中央几个单位都必须派人参加的，而实际上是康生一人说了算的“三合一”专案组，开始对作者李建彤进行“三堂会审”。同时，没收她的全部采访记录，按记录上的姓名寻找那些被采访过的干部和群众，由康生下令逐一加以迫害。

给小说《刘志丹》提供过创作材料的刁仲勋、贾拓夫、刘景范三同志也被打成“反党集团”，还成立了“刁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

“文革”中，康生和“四人帮”，对小说《刘志丹》的诬陷更是变本加厉，株连无辜，因小说牵连受害的各级领导干部 300 多人，一般干部和群众，受害数字无法统计。

刁仲勋同志曾应出版社要求审阅过小说初稿，被打成《刘志丹》小说的“黑后台”，诬陷他“勾结”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授意，炮制、抛出反党小说”，不但被撤销了副总理职务，还被隔离审查了 16 年，在狱中关押了 8 年。这还不算，在他 40 多年前担任过地委书记的庆阳地区，被揪出的所谓

彭、高、习“黑爪牙”竟达1万2千多人。

原计委副主任贾拓夫，被打成“反党分子”后，撤职下放。十年动乱中，被害死在西安郊外。

刘景范同志在答辩时给康生提了点意见，叫他不要搞“逼供信”，这一句话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当场被捕，后又监禁了7年。

宋任穷同志也被牵连挨整。

因为小说的选题是工人出版社定出的，原社长高丽生，受尽肉刑，被折磨致死。

小说的责任编辑何家栋，一家老小被赶到河南乡下，老母和两个儿子在病困凌辱中死去。

就连给作者李建彤带过路的陕北老贫农于悦贤和刘景华，他们也不放过，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一生忠勇的烈士刘志丹，在“文革”中也被当作“叛徒”来鞭尸了。当时，陕西省的主要头头找到刘志丹的女儿刘力真，要她出面声明，同意取消志丹县。刘力真说她无权同意，要这位头头去请示中央，结果西安市到处贴满了“缉拿叛徒刘志丹的女儿”通缉令。刘力真无路可走，只得逃回陕北乡下躲藏了1年，后又被人告密，被五花大绑地揪回西安“归案”。

刘志丹一个驰骋疆场，出入于枪林弹雨的革命烈士，曾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誉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上下五千年，英雄成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的“红军模范”，就因为一本如实反映他的革命经历的传记小说，竟然株连了如此之多的人，制造了现代中国的文字狱大冤案，荒唐之极，无与伦比，九泉之下的英灵，也会为之悲恸、愤慨啊！

我们常说历史是最公正的，苍蝇飞得再高也是苍蝇，雄鹰飞得再低也是雄鹰。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终于为小说《刘志丹》冤案平反昭雪。1980年2月25日，中央为所谓的“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使一桩持续了17年之久的现代文字狱终于结束了。正当康生大抓阶级斗争，放肆制造《刘志丹》冤案的时候，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将他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他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又开始稳步上升。

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更让康生如鱼得水，风云际会，先后当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乃至中央的副主席。

……

“这个人能放炮。”康生继续他的“通气”、“交底”，并且意味深长地瞟一眼陈伯达：“主席说他是党内的一头牛，横冲直撞。他确是头上长角，顶过不少人。这一点知道的人很多。”

陈伯达脸上有点热，康生显然知道他与陶铸之间的芥蒂。尽管他厌恶这位洗不净阴森的“三洗老人”，虽然他知道康生对谁都可能捅一刀，但仍然走得更贴近些，步调更一致些，听康生介绍。

“他是朝刘少奇开过炮的……多次开炮。”康生朝贴近过来的陈伯达流出一丝神秘的浅笑，声音压低了，“这是最根本的。”

陶铸与刘少奇没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关系，是1942年在延安才认识。刘少奇从华中口到延安主持工作，陶铸对这位中央领导人，这位党的领袖之一，是怀了敬重之情的。

1943年，陶铸调任军委秘书长，代表中央军委去晋西北检查工作。

他从晋西北回到延安时，刚进家门就听到一个吃惊的消息：柯庆施被关起来审查了！

柯庆施在中央城工部工作，与陶铸私人友谊较深。两人来往不少。对于柯庆施，党内许多老人将他列入极“左”之列，这多是由于“大跃进”、庐山会议以及以后反右倾机会主义等运动中他的态度所留给一些同志的印象。不过，在延安，多数同志都认为他是个心胸豁达的人。他爱喝点酒，当时刚结婚不久。那天，礼堂里开会，他去了。还在下边嘻嘻哈哈跟别人逗乐呢，就听台上一声喝：“柯庆施上来！”

据说他根本没听台上讲什么（也许有些夸张），闻声稀里糊涂上了台，一上去就稀里糊涂被批成了“特务”。

柯庆施受到隔离审查，不许出门，不许任何人看，长一头长发也不许剃。他新婚不久的妻子来自白区，受到时势的压迫自然更惨，后来被逼得跳井自杀了。

陶铸本是一副燃油般的性子，一点就着。听说了这些情况，茶水也没喝一口便喊起来：“冤案，我去看他！”

“不行，正审查呢，”同志们劝阻：“谁也不许看。”

“我偏要看，岂有此理！”陶铸拍响桌子，拔腿就朝外走，“柯庆施我了解，什么特务？冤案！这种时候我不去看还算什么朋友！”

他硬闯去看望了柯庆施。

不少同志替他捏把汗：“小心陷进去……”

他敞着大嗓门，声音传老远，“这个时候不敢为朋友出头，等于落井下石！”

对于1942年的整风运动和1943年联袂而来的“敞开思想”，“抢救运动”，中国共产党内始终存在着不同看法。毕竟，这场运动伤害了一些好同志。

然而，从根本上看，从大局看，“整风”清算了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危害并继续造成危害的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无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这种出自教条主义的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严重巨大的危害，已经由实践做了结论。

这场运动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人心；使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实现了空前的教育和普及；也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刘少奇在支持和解释这场整风运动，在掌握运动的本质和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方面，建树了卓越的功绩。他在一篇被收入《整风文献》的文章中说：“过去我们党遭遇了许多不应有的挫折和失败，走了许多不必走的弯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我们党内存在着些假马克思主义者，许多党员不自觉地盲从在这些假马克思主义者之后……”

这里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指王明一类只知背诵一些马列主义条文的教条主义者。

少奇又说：“必须用中国革命的经验来教育中国的革命者，用中国党的经验来教育中国的党员，才能收到更直接的实际的效果。如果抛开如此丰富的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如果轻视我们党22年来在伟大历史事变中的斗争经验，不用心研究这些经验，不用心向这些经验学习，而只去学习离开我们较

远的外国革命经验，那就是轻重倒置。”

刘少奇这种“中国化”的思想，无论那时、现在、将来，都在中国革命的山巅之上，永远地明光闪烁。

但是，世界上，历史上，都是只有巨人，而无完人；只有伟人，而无神人。

在柯庆施的问题上，陶铸认为主持工作的刘少奇看法有偏，对他产生意见。陶铸重感情、重义气，又性情梗直，敢放炮。

他朝刘少奇当面开了一炮，而且是在众人面前公开的一炮：“我觉得刘少奇不如毛主席那么有本事。”

此后，陶铸对刘少奇一直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建国之初，刘少奇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新秩序。现在回过头来，不难看出刘少奇同志这一思想的科学性。毛泽东思想确是全党智慧的结晶，许多杰出人物都为这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毫无疑问，堪称理论家的刘少奇同志便是其中的一个。

思想的科学性不等于每句话都讲得准确恰当，刘少奇在上改工作和天津的讲话，个别问题在提法和用词上可能值得推敲。在 1953 年的中央财经会议上，陶铸又向刘少奇放了一炮。对少奇同志在土改工作和天津的讲话提了意见。

这一炮不得了，差点被高岗利用。

解决高饶事件的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刘少奇主动找陶铸长谈一次话。陶铸承认自己在“高饶”问题上犯有错误，同时也谈了对刘少奇的意见。刘少奇向陶铸做了耐心的解释工作，并且承认他看人有时有些偏。

前面说过，1956 年中央八大召开前后，毛泽东已流露出辞去国家主席，避开日常琐事，而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党的理论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上来。这些想法终于变成了“一线”和“二线”的计划。

在八大，邓小平进入了政治局常委会这一制定政策的权力中心，并担任了党的总书记这一重要职务。

毛泽东谈接班人，第一说出的是刘少奇，第二说出的是邓小平。虽然没有过任何正式文件，但国内外亲耳听到的人并不少。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结束后，陶铸回广东传达文件。讲到国家主席问题，陶铸说：“如果选邓小平当国家主席，我举双手赞成。”广州市一位副市长为此向上写了信，说陶铸的讲话，公开反对刘少奇。

中央委托叶剑英同志调查这件事。叶剑英找一些同志谈话，澄清事实后，结论为“没有这个事”。

陶铸的那句话是不能说成反对刘少奇的。但其中包含的意见，毕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

陈伯达像桑丘一样走在唐·吉河德那种身材的康生旁边，了解了这番“背景”，吁一口长气。

他已经明白，今天来到钓鱼台的陶铸，是今后“党内斗争”中的一头有用的“牛”，一个大有用场的“炮筒子”。

陈伯达随着康生散步“通气”，绕山绕水终于绕到陶铸下榻的 9 号楼。

他们拜访了刚刚到京的陶铸，并且不虚此行地尝到了“炮筒子”的火药味……

虽有芥蒂，陈伯达想到今后的斗争，想到陶铸与毛泽东的渊源，与林彪的历史关系，还是又作揖又握手，嘘寒问暖地亲热几句。

陶铸自然也对将来的共事者们表现出应有的热情、礼貌和谦让。

康生偶尔要吸支烟。在他点烟时，不吸烟的陈伯达目光与不吸烟的陶铸相遇了。

彼此不自在，但也没避开。毕竟要“共同战斗”了。

陈伯达的圆脸上绽出两朵笑：“这次来，有什么消息吗？”

陈伯达爱问这句话，与毛泽东爱问“有什么新闻吗”不同。毛泽东问的目的是了解社会，了解群众，了解下情。陈伯达问的目的是了解上情，了解来头和背景。

所以，毛泽东喜欢向实际工作者提问，陈伯达喜欢向有背景有来头的人提问，特别是向那些能够直接接触毛泽东的人提问。

他认为陶铸是有这个资格和条件的。

“这话是应该我问你哟。我是刚到中央来，”陶铸笑着将双手抬一抬，这是他讲话时爱作的手势：“情况都不了解。”

“哪里，哪里话。你是一方诸侯，我是小小老百姓哪。”陈伯达谦虚着，很具有中国文化人的某些特征。他的“小小老百姓”后来一度成为中国人民熟悉的东西，跟陈伯达的政治地位一道兴起，一道败落。

陈伯达一边说着，一边转过头去望康生。交谈还得靠康生。

康生肩膀耸起来，这口气没有用来讲话，却将双肩猛一沉落，从肺里沉闷地呵出一声长音，随即走向痰盂。

“啊——呸！”

如果读者目睹康生吐痰，你会跟他一道吃力费劲，感觉劳累。

他用手绢擦着嘴，不慌不忙地说：“形势很好，斗争还很激烈。聂元梓的大字报广播以后，成千上万革命群众涌到北大去声援。北京50多所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的师生都起来了，集中火力斗争那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康生的口气很大，自露权威性。聂元梓的大字报是他通过老婆曹轶欧私下授意写出来的，又是他将大字报底稿直接转给了毛泽东。

“这样一哄而起，不管好坏，乱斗一气，会不会把阵营搞乱了？”陶铸下无忧虑。

“群众运动。”康生讲得轻松自然，“哪个好哪个坏我们不了解，那里的群众最了解。要相信群众么。”

“党委呢？党委在干什么？”

“瘫痪了，有的半瘫痪。”

“没有党的领导怎么行？”陶铸开始冲动：“谁说了算？”

“《五·一六通知》里讲了，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些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

“那毕竟是少数。主席历来是讲两个百分之九十五。”陶铸轻轻敲击桌面，“而且我是讲党委，是各级党组织。”

陈伯达插一句：“这个时候不能党委说了算，搞的就是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怪事！”陶铸冲动之后开始发作：“共产党的天下却不让共产党当家，你想让谁当？”

康生摆手，他知道陶铸的性子。这头牛“横冲直撞”，他可不是只会顶刘少奇。

陈伯达便憋一口气不再作声。

陶铸也平静一下情绪。毕竟刚到中央，以后还要共事。但他心里话从来咽不回去，结果只是放低了一些声音，继续把想法说完：“北大不是派了工作组吗？在北大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保证党的领导，这办法还是可行的么。”

“派工作组不是好办法。”陈伯达摇头，“束缚群众手脚，不利于运动。”

“派工作组是我党多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陶铸终究是胆汁型，声音和手势又激烈起来，“‘四清’就是派工作组，是中央批准，毛主席批准了的！”

康生摆手，息事宁人地说：“北京新市委今天开始向大专院校派少数试行工作组了，运动刚开始，这才走到哪一步？慢慢看么。”“我是坚决主张派工作组的！”陶铸抡一下胳膊，算是明确了态度。

陈伯达面有温色，却也不再吱声。

陶铸的激烈态度使他有些心虚。虽然他不乏接受毛泽东的机会，但别人也有接近的机会，运动刚起来，形势不明朗。毛泽东讲话有时很含蓄，不好揣摩。当初《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文章，他就没有揣摸清底细，告诉天津等地的朋友：“不要转印，还不清楚来头。”

陈伯达本是原则不多，机敏在于善观源头。如今陶铸态度敢如此强硬，怕不是有了什么来头？……

于是，一场争论便这样不了了之。陶铸送客时，双方都恢复了平静，恢复了礼貌。

警卫曾云是这样描述的：

陶铸送客，已经看不出是吵过架的。双方都是很客气，很礼貌，都有了笑脸。但是陶铸不像以往那样豪爽地笑，而是客客气气地谦让地笑。后来陶铸也去回拜了陈、康两个人，我的感觉是礼节性的。他们都住在钓鱼台，但从没一起散过步，没在一起吃过饭。除了共事的工作关系，始终没有建立起任何友谊或者私人关系……

以后，陶铸先后去看望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朱德、林彪、董必武、李富春、李先念、陈毅等等老同志。

陶铸上任4天，6月9日就飞往杭州参加毛泽东召开的一个会议。会议着重讨论文化大革命派不派工作组的问题。飞机离地时，陶铸对此行将获得“真经”是坚信不疑的。

一屁股坐在刘邓一边

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这次会议，多数与会者都是带着迷惑不安的心情。

特别是主持工作的刘少奇，他在汇报北京的形势时，那种沉重不安的心情任何人都不难看出，尽管他以沉着、镇定、冷静而著称。

刘少奇沉重地汇报说，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党委领导人被揪、被斗，党委都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北京新市委为了稳定学校秩序，仿照中央向北大

派工作组的做法，从6月4日开始，向北京大专院校派了少数试行工作组。现在许多学校的学生纷纷涌向党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委所在地，要求派工作组进驻学校……

毛泽东对于“天下大乱”从来不皱眉，轻松地将手一拂，毫无担忧他说：“可以不派嘛，乱就乱他一阵子。”

陈怕达充了气似的猛一耸身：“我是提议不要派工作组的。相信群众，这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不要派。”

陶铸脸孔泛起红晕。在毛泽东面前他不会“横冲直撞”，但也发表了意见：“我是积极主张派工作组的。我们做实际工作的都懂得，派驻工作组这是我们党几十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从土地革命时期到全国土改到‘四清’，这是实践证明过的。”

会议出现两种意见，多数同志主张派工作组。当然，最后要由党的主席说了算。多少年来已经是这样。

陶铸望着毛泽东，他相信毛泽东讲“乱就乱他一阵子”，并非真不要党的领导。这正反映出无产阶级领袖的大无畏气魄，也只有毛泽东才能说出这样有性格有气魄的话。但在实际工作中，决不能没有党的领导。毛泽东讲过：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只是听两种意见的争论，并不明确表态，脸上一副凝重的若有所思的神情。

他在想什么？与会者心里都没底。

也许，毛泽东的思想已经飞上育王山。

育王山又名育龙山，坐落在西湖和钱塘江之间。据说山顶福星观里的签，抽来极灵验。山腰有紫来洞，洞前可以俯瞰南宋皇帝的八卦田。

不过，那天毛泽东看到的不是八卦田，而是一场大火。那是山下的茅屋，甚至只是茅草和席子搭成的茅棚。那火烧得突然猛烈，竟没人救。

其实救也救不及，茅草苇席烧起来还不是眨眼的事？救火徒为劳民伤神。

毛泽东望着火，脱口一声：“烧得好！”

工作人员不解：“失火了怎么还叫好？”

“就是叫好。”毛泽东指那茅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烧光了他就盖瓦房了，不烧他就还在茅屋里凑合过。”

这固然是“不破不立”的思想。

可是，工作人员又产生新的疑问：“他们是盖不起瓦房才住茅屋的呀；有茅屋盖不起瓦房，没有茅屋就一定能盖起瓦房？盖不起瓦房的连茅屋也没得住了。”

毛泽东一怔，望着那火焰陷入沉思。片刻，小声喃喃：“是啊，也可能是盖不起。那怎么办呢？……”

无论怎样说，毛泽东对他不满意的东西总想破字当头；茅屋是这样，党组织和国家机关也是这样，哪怕他是自己亲手缔造的。

也许，他的思想又飞到了延安？

这段时间他一直住在杭州西湖丁家山前的水竹居。这里原为晚清刘学询别墅，俗称刘庄。背山濒水，环境幽静，楼台水榭，室内陈设古朴典雅。但他始终不忘延安的宝塔山和泥土味十足的窑洞。当他凭窗而立，久久不动一动时，他一定想起了延安的故事。

那是 1945 年 7 月 3 日，来延安访问的黄炎培先生，与毛泽东秉烛夜谈。

毛泽东问：“黄先生这次来延安感想如何？”

黄炎培侃侃而言：“我生 60 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惊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凝思片刻，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20 年过去了，毛泽东不曾忘记黄炎培的话。那老先生是有见地的。当初抗美援朝，就是那老先生出来提意见，才使毛泽东豁然将“支援军”改作“志愿军”的。

如今也是，“环境渐渐好转”，有的“自然地惰性发作”，若不早抓，“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

历朝历代多少“政怠宦成”，斯大林便是“人亡政息”。毛泽东决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怎么办？

毛泽东讲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过去搞过许多政治运动，都是自上而下，没有根本解决他认为的问题。看来要变一变，要变为自下而上，要搞大民主。

从逻辑上讲，从后来事物的发展分析，毛泽东是会这样想。

各种意见都发表过了，民主之后就是统一。毛泽东最后表态说：“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

毛泽东的最终目的是发动群众搞大民主。派不派工作组只是形式，这个形式也许可以用，但更多的可能是不利于发动群众搞大民主，所以毛泽东如是说。

刘少奇不无忧虑地请求说：“北京大、中学校的混乱局面，我们确实心里没数。不知运动下步怎么搞？希望主席能尽快回京主持工作。”

毛泽东吸着烟，略作思考后说：“暂时我还不准备回去。运动中的问题你们相机处理吧。”

刘少奇、邓小平赶回北京，立刻召集有各部委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赶到会场，陈伯达友好地向他招手。如果说陶铸原来不知道毛泽东的态度，坚决主张派工作组，那么，现在毛泽东的意见倾向该是不难看出了，陈伯达相信陶铸会有个变化。

确实，陶铸还不曾干任何违背毛泽东意图的事。

陶铸朝陈伯达礼貌地点点头，但是没有坐过去。而是在他的斜对面，在

所谓“刘邓的人”中，一屁股坐下去了。

陈伯达若无其事，也许这就叫宿怨？

陶铸向主持会议的少奇同志点头致意。历史上，他朝陈伯达放过一炮，朝刘少奇放过三炮。但这一次，他坐在陈伯达对面，向刘少奇致意。于是，陈伯达有些变色：看来不是宿怨。理性世界在不断创造出必然性事物。

毛泽东并没有明确说不许派工作组，那么，决定陶铸态度的便只剩一条：按照几十年来所信奉的一切最神圣的原则去思考问题；按照自己对运动的思考和理解去行动。

在派工作组问题上，陶铸坚持一屁股坐在了刘、邓一边：“没有工作组不行。学校党委不起作用了，谁来代替党的领导？工作组就代表党的领导。”

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必须派工作组。最后会议决定：哪里出事，哪里派人去。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消防队救火一样快。

会后，刘少奇把派工作组的决定电告毛泽东。毛泽东回复同意。

那时说到形势，总爱讲“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中国在乱，世界也在乱。习惯的说法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

50天的日子，陶铸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是在紧张、激动、亢奋而又焦虑、不安、疲劳中度过。

红旗车刚停稳，等候在9号楼前的陶铸便迎上去。他看到卫士小张从前门下来，迅速打开后门。

车里钻出周恩来。

陶铸紧走一步握住周恩来的手：“总理。”

“和越南同志谈话，拖了几分钟。”周恩来说着便朝楼里走。奇怪的是，当你握住周恩来的手，听到他的声音时，心理就会发生一种微妙的变化。焦躁会变得平静，不安会变成坦然。陶铸像获得休息一般，松了一口气，随周恩来进了楼。

“胡主席近来好吧？”陶铸关心地问。

“很好。”周恩来笑着说，“你们是好朋友么。”

在客厅里坐下，陶铸皱眉道：“听说文化革命已经开始涉及国外，特别是东南亚。”

“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能强加于人。”周恩来揭开茶杯盖，吸吮，他很注意第一口茶。他向许多人介绍经验：“茶水就是第一杯揭盖的时候最香；香气四溢，不能浪费。”

“越南党内的事情，有些也复杂。”陶铸感慨。

“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有全局观念。”周恩来放下茶杯，意味深长地说：“事情复杂，我们的头脑就不能简单。”

陶铸像学生一样细细品味这话。他刚到中央，便深深感觉到事情的复杂。而他的脾性，在复杂面前有时总是过于简单。就比如对胡志明的那件事……

专机在机场徐徐降落，轰鸣着滑行到候机楼前。

陶铸率地方党政军负责人朝飞机走去。

舱门打开，胡志明主席将身体探出招手，边招手边走出舱门，脸上挂着微笑走下舷梯。那个年代，这张刚毅而又慈祥的面孔，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熟悉，谁都知道“胡伯伯”。然而，没有几个人知道，胡伯伯的性格中，同时又带着几分孩子般的天真和孩子般的认真。那性格显露出来的时候，会使你惊讶，想笑，又因为感动而更觉他亲近可爱。

不是吗？你看他从钻出舱门那一刻起，一瞥眼光，一次招手，迈步走每一阶梯都是那么认真得体，有条不紊。他很注意自己代表英雄的越南人民。“胡志明”成了一切反美战士心目中的英雄，就连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通人民也是将这个名字作为英雄的象征。

他与陶铸热烈拥抱。他习惯法国式的礼节，拥抱、亲颊，接受鲜花。

可是，那些摄影师直到这时才气喘吁吁地跑来，满头大汗，又急又不安：少拍了一组“历史性镜头”。

“机器太沉，扛、扛着跑，跑不快。”摄影师气喘吁吁，“晚，就晚了……”

陶铸没有发火。那年代摄影是大事，机器一个人扛不走，又大又笨又重，拍不上也是常事，在北京，在莫斯科都一样发生过。

“胡主席，上去，你再上去。”陶铸对胡志明笑着递眼色。他们太熟了，胡志明每年都要到广东来几次，无论休假，路过或是开会，每次陶铸都要尽地主之谊，早已是同志加兄弟。陶铸所以敢对这位一国元首用开玩笑似的口气说：“你再演一次，叫他们拍个影。我们重新迎接你。”

胡志明抚着胡须笑，并且频频点头，交还鲜花，便噤噤地顺梯子回到飞机里。

舱门又打开了，胡志明仍是先探出身招手，春风满面，热情洋溢，而后钻出舱门，一边招手一边认真走下每一级台阶……

陶铸笑得很开心。

胡志明也笑得很开心，据说他后来在莫斯科又遇到了摄影师迟到的事，便认真建议：“那我重新降落一次。”

胡志明结束休假回国，以个人名义再三邀请陶铸一家去越南作客。于是，经中央批准，陶铸带着妻子曾志，女儿陶斯亮，来到了河内。

例行的参观、访问、游览之外，当然也要到几位主要领导人家中作客。因为越南党政军负责人及其子女，都有去广东休假的嗜好。并且去了之后，都享受着住“小岛”的待遇。

胡志明请陶铸一家到自己家作客。胡志明组织一群小孩子欢迎客人，就在公园里唱歌跳舞；唱完了跳完了，就在一片胡伯伯的热烈叫喊声中给孩子们分发糖块；并且不忘抱抱这个，亲亲那个，情景十分感人。

胡志明喜爱孩子，他出国喜欢接受孩子们的欢迎，在国内也总是组织孩子们迎接客人。

陶铸一家在越南，无论去哪里参观，欢迎他们的都是又唱又跳的孩子们。

胡志明住所极为简朴，是个孤孤单单的亭子，形状很像云南傣家的竹楼。那亭子建在树林里，旁边是政府的两层小楼。陶铸一家听介绍，这孤零零的亭子就叫巴亭。

那年代，“巴亭”在越南就像中国人成“中南海”。

巴亭里清洁干净，又几乎一无所有。大家盘腿而坐，谈笑风生。胡志明平时就是一个人在这里独自生活。当他总是想跟孩子们在一起时，有几个人能全部了解他感情世界的另一侧面？

终于，在离开巴亭时，越南联络部一位同志私下同陶铸谈话，提出请求。

“胡主席的生活你们也看到了，”这位同志诚恳地望着陶铸：“我们想请中国同志帮个忙。帮他找一个合适的伴侣。”

陶铸略感吃惊：“这种事，要我们帮忙？”

“你们是很好的朋友……”越南同志心里在措词，怎样说明才好？未了

只讲两句：“他喜欢广东的……他曾在中国参加革命……”

胡志明原名阮爱国，既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既是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又是领导越南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民族英雄。

胡志明曾经长期在中国从事革命活动，据说他过去的伴侣就是广东人。妻子死后，他再不曾另找。但他心里一直怀念着广东籍的亡妻。

这是大事，又是好事。

陶铸很激动，对曾志讲了。并想好了回去请区大姐一道帮忙。

区梦觉与胡志明的关系也非常好，在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战斗友谊。这种事她会最热烈地响应和帮助。

不过，陶铸还是热烈中有冷静。离开河内时，他私下问胡志明：

“不能在越南找吗？”

胡志明摇摇头，摇得沉重缓慢。

片刻，他沙哑地喃喃地说：“大家都叫我胡伯伯……”

那一刻，陶铸心里忽然涌出一种异样而又复杂的感觉。是啊，怎么能跟一位称你胡伯伯的人成为那种生活伴侣？

陶铸用力握了握胡志明的手，全部意思便都表达了。

胡志明感激地点点头。

回到广州，陶铸立刻把这件事告诉了区梦觉。于是，胡志明在广东省的朋友们积极行动起来。经过慎重的努力，有了一些候选人。

陶铸介绍了一位广东女医生。

区梦觉介绍的似乎更合适些，是位中年的女同志，并且是老革命了。大革命时期，曾与后来成为元帅的那位战神结婚，后来这位女同志没有去中央苏区而断了关系。抗战时这位女同志才到延安，在中央组织部工作。她虽然是四川人，但对广东生活也熟悉。她长得好，有风度，又稳重，年龄也相当。

其他同志也提了一些人名。

陶铸想到这么大事不能不向中央汇报，便直接找了周恩来。

在中国，与胡志明友谊最深的大概莫过于周恩来。他又激动高兴，又有些担心忧虑。

“好事是好事，但又是复杂的事。”周恩来抚着腮沉吟道：“越南党内的情况你们考虑了没有？他们党内一些同志对我们的态度你考虑了没有？……在这种情况下，这件事就会带来政治问题，那些同志更要认为我们想控制和影响越南党，这就不利于越南党内的团结，也不利于中越两党的团结，甚至会影响到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这件事，经中央研究，决定与越南党联系，请他们研究决定。

这件好事未能办成。

陶铸心里虽然同情、惋惜，甚至歉疚，但是再见到胡志明时，还不得不隐下实情，只是说：“那个事还得慢慢来，是大事，有政治影响，所以得慎重……”

胡志明点点头，不接话，改谈其他事。

“胡主席的事，我心里总有些不是滋味。”陶铸充满人情味，眼睛湿润地回忆说：“要是……唉，那多好啊。”

“这大概就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周恩来对自己的老朋友也是不无感伤。他缓声说：“还得顾大局。我们准备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一次百万人参加的集会游行，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胡主席17号发表了《告全

国同胞书》，我们要有最坚决的支持。我们将由少奇同志发表声明，表示我们的态度：中国准备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支援越南人民战胜美帝；中国七亿人民是越南的后盾，中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都是越南的后方。”

“我们自己如果强大了，不管是美国还是什么国，也不敢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开枪开炮搞侵略。”陶铸和许多老干部一样，敢于在周恩来面前说出真实想法。天天到学生中去“经风雨，见世面”，一夜一夜参加批斗会，陶铸想得最多的自然还是“文化大革命”。他说：“运动突然一下子起来了，思想总跟不上趟。搞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我是坚决的。1945 年离开延安时，我对主席讲过：我今生政治方向是定了的，决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我担心的是国家。前几年搞得粮库粒粮不存……唉，我跟别人说过多次，真是搞怕了啊！”

周恩来神情不乏忧郁，沉默片刻，说：“有毛主席掌舵，船是翻不了的，这一条还是有信心的。”

“这一条我坚信。”

“你刚来中央，情况还不熟，要多听多问少表态。”周恩来关照，“遇事要多思多想，勤汇报。不要怕麻烦，什么时候找我都行，我不怕麻烦，你也不要怕。”

“谢谢总理的关心。”陶铸感激之余，早已酝酿成熟的念头便冒出来。他曾冷静分析过形势，看出钓鱼台这边的人都是放火的，而周恩来领导之下的国务院是“消防队”。当时代精神从四面八方施来压力之际，最要紧的莫过于冷静地选择应该走的方向。他说：“我考虑，我的工作主要在国务院这边。我准备离开钓鱼台，搬到中南海。有事也方便。”

“那好么。住处有了吗？”

“尚昆同志调广东后，家已经搬走，准备住他那里。”

“那好。曾志同志什么时候来？”

“这段时间她正闹病，一直发烧。等病好以后再说吧。”

“什么病？查清了吗？”

“主要是身体过于虚弱，还没发现什么器质性病变。”

“没大毛病就好。”周恩来将茶杯盖好。他每次离开时都很注意盖好茶杯，所以就成了告辞的信号。“烧退了以后，可以接她来北京休养嘛，互相也有个照应。”

周恩来说着，已经起身。

陶铸跟着起身，送周恩来往出走，一边问候：“大姐身体好些吗？”

“这几年好多了。”

“来京时，曾志还让我给大姐捎个好呢。”

“谢谢她了。你代我们两个向她问好吧。你又不在于身边，让她自己多注意，早些恢复早些来北京。”

说话间，两个人已经走到外屋。

周恩来发现外屋坐了一个年轻人，已经立起身，向着他微笑致意，显得从容大方，便朝他走过去。他有同工作人员聊几句的习惯。

陶铸跟上来介绍：“这是我的秘书。”

“看出来。”周恩来微笑着同年轻的秘书握手：“叫什么名字啊？”

“张汉青。”年轻秘书用双手握住周恩来的手。

“好名字。”周恩来频频点头，转望陶铸，讲得充满感情：“留取丹心

照汗青！”秘书的名字，那个“汗”字不是“汗”，但是谁也没解释。因为周恩来讲得分明另有一番深沉的含义。

陶铸显出庄严和激动，肃然地点了点头。

1966年7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刘少奇主席发表的声明：中国最坚决地最热烈地支持胡志明主席7月17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

同日，北京近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到24日，全国各地共有1000万人为此举行了集会和游行示威。

同一天，陶铸离开了中央文革小组办公所在地钓鱼台，搬入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

搬家后不到一星期，工作人员紧张地报告：“江青到了！”

陶铸匆忙起身朝门外赶去迎接，可是江青动作更快，已经一阵风似地走了进来，声音很大地问候着：“陶铸，听说你搬家了，为什么不住钓鱼台了？”……

江青“交底”

陶铸在延安就认识江青，建国后就更熟悉了。因为她在情绪消沉时总是去广州，有时一住小半年。那里有她乐于居住的小岛，有她的大兰花和小猴子。

据一位负责过接待工作的同志陈良顺回忆，他们还曾为这位喜欢动物的女人养过马和兔子。但是江青看到兔子便叫起来：“不要养它，它到处刨洞，会伤害树木花草的根系！”

陶铸对江青的态度，大约是与曾被称为“国母”的宋庆龄相一致的。

宋庆龄在50年代曾经款待过年轻的江青，并对身边不少工作人员说：“江青很懂礼貌，讨人喜欢。”

然而，当江青在1966年的夏天大步跨入宋宅时，宋庆龄一时竟未能认出她！

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宋庆龄和其他人一样，喜欢不介入政治的江青。当发现江青热衷于权力之争时，便讨厌江青了。”

江青曾为自己作了一幅自画像：“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在她“锁在云雾中”时，确实令很多人朦胧过。而朦胧又往往与“神秘”“美妙”“遐想”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

在延安，见过宋庆龄又见过江青的布里顿·罗伯特·佩恩这样谈起江青：“她直率而且客气，很像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她比蒋夫人漂亮多了。”“她问许多人的身体怎样？听说好，她脸上放光；听说不好，就显出同情的样子。”

斯大林的摄影师罗曼·卡门沿延河骑马去见毛泽东，被一匹急驰的马赶过了。令他吃惊的是骑手竟是女人。他回忆说：“她勒紧缰绳，和我们并驾齐驱，以豪放的姿态表示欢迎。”“她缓缓地说：我去告诉毛主席，你们在路上。她突然调转马头，策马时身子向前一倾，右手在尘埃中一挥……”

1943年重庆报纸有篇评论延安的文章说：“自从电影明星蓝苹嫁给了毛主席，共产党堡垒里过去沉闷单调的生活发生很大变化。资产阶级的跳舞、

封建主义的地方戏、好莱坞的情歌，都涌进了延安……”

约翰·谢伟思回忆说：“江青很会跳，地上高低不平也不在乎。大多数人不会跳，也就无所谓平不平了。每个人都穿着布拖鞋或几根带子的凉鞋，小孩钻在中国革命领导人东倒西歪的舞伴当中，地面的差别还有什么意义呢？”

文章描写说：

毛泽东跳得不好，好像在进行体育锻炼。

周恩来跳得特别好，既轻快又优美……他和江青一跳，乡村的谷仓舞简直就跟上海盛大舞会的劲头一样了……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握着朱德将军的手，这一对就像两只大象，把法国的小步舞跳成了坦克出动。

中国人民的朋友史沫特莱后来对埃德加·斯诺说：“好像全中国的军队都在我脚上踩过！”

文章描述中有评论：“休息时，江青从神气十足的林彪将军和朱德夫人中间穿过去，帮毛泽东物色舞伴。江青是个满不错的政治妻子。她喜欢给丈夫一点自由，希望丈夫也给她一点自由……”

读了这些文字，当年延安生活的另一侧面再现，一种活生生的新鲜气息扑面而来。

重庆谈判时，江青与毛泽东住在张治中将军的公馆“桂园”里。毛泽东公开了他那着著名的词《沁园春·雪》，却不许江青在国共和谈的公开场面扮演什么角色。只有少数人见到她，评价也还可以：“标致的青年妇女”，“穿一件短袖上衣和裙子，挺像大专女学生的制服，短发没有烫，只留着前刘海”。“她不像刚从窑洞出来的人。”……

建国后，随着政治运动之风不断，江上的“云雾”时时被吹去，她便越来越多地“偶尔露峥嵘”了。

接近江青的人背地里越来越多地用这样一些词语形容她：“性格极端”，“飞扬跋扈”，“充满权力欲”……“女皇式的”！

她与家人打得翻翻的，与儿子儿媳打得翻翻，与女儿打得翻翻，与亲家打得翻翻，甚至常常与丈夫打得翻翻。

毛泽东多次说她“刀子嘴，是非窝”，“她到哪里，哪里就扫兴！”

作为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他管辖着毛泽东的故乡湖南。陶铸发现，江青几乎哪儿都去，就是没有去过湖南。她似乎憎恶亿万中国人民景仰的毛泽东诞生地韶山，始终不曾涉足那片圣土。

由于江青在广州住的时间多，陶铸遇到的“打架”事便也跟着多。那位愁眉苦脸，束手无策的公安厅长苏汉华，常常唉声叹气地向陶铸汇报江青新演的一些闹剧。诸如撵走保健医生和护士，公安厅不得不另派医生，而给她带来的医护人员安排临时住所；罚卫士的站，自己去躺着睡觉，让公安厅长也无法开劝；半夜又哭又闹调飞机，要马上走，就为了与毛泽东吵不赢而示威……

这时，作为一方“诸侯”的陶铸也只能紧锁双眉，叹一声：“唉，这个女人！”

是啊，清官难断家务事。

陶铸是很有点大男子主义的，他与妻子曾志也经常打得翻翻的，尽管他十二分爱着妻子，却仍然断不了吵。终于，妻子住到市委那边去了，剩他自己与女儿住在广州军区，只有星期六相聚一次。

见面少了，便会珍惜相聚的短暂时刻，吵架自然也会减少。即使如此，也不敢说不吵，曾志还曾向毛泽东告过陶铸的“御状”。

所以，陶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把江青想得简单了。以为就是“一个女人”。三个女人一台戏，闹翻天也不过是“女人”的戏。

对于陶铸的“大男子主义”，他的妻子和独生女儿都曾经讲过，并不讳言。

也许正因为如此，陶铸与江青相处得反而可以。

据工作人员和陶铸的家人回忆，每当江青住到广州，陶铸赶来看望时，走廊便开始轰隆隆响，进了屋也是轰隆隆响。他的脚步重，动作全是大幅度，门摔得响，说话不会小嗓门，笑起来更是声震屋宇，还时时大声咳嗽，大声吐痰。这一切对江青来说无不犯忌。

因为江青是怕声、怕风、怕不受尊敬。

卫士李连成曾经回忆：我刚进门她就冲我尖叫：滚出去！我急忙退出门，却仍然不明白为了什么？她又喊进来：没脱鞋你就进来？那么大声响！我望望那厚有半寸的地毯，没敢吱声，脱掉鞋子，光着脚重新走进去……”

护士说：“我刚走几步，江青忽然叫起来：吵死了！我怔怔地站住不敢动，也不敢喘气了。我是光着脚的，地毯又那么厚……可是江青瞪起眼开始教训：你那两条腿夹那么紧干什么？裤腿磨得刷刷的！从此，一见江青我就变成了‘罗圈腿’，拐啦拐啦地走。然而，当我有次从她身前走过去时，她又叫起来：你想叫我死呀！像吃了一道具，我被定在那里一动不敢动。这时她才教训说：你没看你身子有多宽，走路生风，吹死人了！从此，我再不敢挨近她走快步，要弯子大大地绕着她走……”

许多高级领导干部见了江青，也是“恭敬拘谨”，“蹑手蹑脚”，这是工作人员们常看到提到的。甚至有一次，党和国家一些领导人的夫人去见江青，因为江青“休息了”，便不得不安静地坐等一个时辰。

这就是“第一夫人”的派头和作风。

由此也不难对比出陶铸的“放肆”；他自己不觉，别人却替他提着一颗心。

独生女儿陶斯亮曾对当代著名军旅作家权延赤回忆：“那时，我跟李讷比较熟，合得来。她一个人在广州孤单，母亲让我去陪李讷玩。母亲告诫我说：江青身体不好，尤其怕声响，你去了一定要注意。这种情况我过去也听说过，所以去了很紧张，越紧张越不灵，抓杯子杯子响，动动身子衣服响，嗓子就拼命痒痒，痒得憋不住，又不敢咳，忙赶到屋外，这才找个地方尽心尽力咳嗽一番。

“可是，父亲来了，从楼道轰轰轰一直响到屋里，没有一个动作不出声，真把我紧张坏了，替他提了一颗心。他可旁若无人，门响、桌椅响、茶杯响，说话和大笑更是响得震耳。真奇怪，江青丝毫不恼，还说起母亲向毛主席告状的事：你总是压制曾志，她也有她的事业。父亲说：就是你们女人多。江青就说：你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父亲居然说：你也够给主席找麻烦，三个女人一台戏，都一样。”

陶铸只把江青当作一个女人看，根据作用与反作用的原理，江青便也将

陶铸当作一个十足的男人看。也许正是这样一来，他们的关系反而变得好相处。甚至陶铸干出一些“冒犯尊严”的事，江青也可以容忍。

那是1964年的年底或1965年初，看大比武的纪录片。陶铸先到放映厅，正与人聊着什么，江青来了。

江青在公开场合露面时，是很讲究衣着打扮的。她不想过分女性化，因为她一直想闯入过去属于男人的世界；但她也尽力避免看上去像个男人，因为她毕竟还是个女人。

50年代，她认为最好的打扮，是穿上庄重严肃的套服，而将脖领部位作为女性的窗口，稍稍露出内衣的色彩，并且尽量把头发收拾得漂亮些。会说好话的人可以称这种打扮为“刚中有柔”，陶铸却不大会说好话，称之为“男不男，女不女”。

这一次江青赶了时髦，正是全国学习解放军的时候，她也穿上军装，戴上军帽，但是没有领章帽徽，看上去便有点说不出的别扭。后来听说是罗瑞卿不同意她戴领章帽徽。

江青自以为飒爽英姿地走进门，被陶铸一眼见到，想也没想就把别人说不出的感觉高门大嗓地嚷出来：“这个江青，你怎么总是打扮得男不男，女不女的？”

这一声，不仅他的独生女儿吓了一跳，周围不少领导干部都有些吃惊变色。

陶铸自己还不觉得呢，好像完全是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打趣，其他政治的社会的附加物统统见鬼去了。

江青对陶铸的无心和放肆居然不恼，只是脸有些红地争辩道：“只许男人穿军装吗？你就是大男子主义！”

现在，江青又是一身军装地闯入了陶铸的屋门，所不同的是她通过“斗争”获得了领章帽徽。那位不允许她攫取领章帽徽的大将军罗瑞卿，已经在7个多月前被突然袭击打倒。

她显得春风得意，喜气洋洋。一边像老朋友那样同陶铸握手，一边用她的与生俱来的尖细嗓音大声问：“听说你搬家了，为什么不住钓鱼台了？”

陶铸的变化是明显的，过去那种男人对女人的热烈、豪放、无所顾忌的随便不见了，换上了礼貌、客气，甚至是谨慎的神情。这种变化说明他已经明白，他面对的再也不是一个“女人”，而是大步闯入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

这种礼貌和客气也同时宣告，他与江青过去那种相处良好的关系行将结束了。

“我考虑，我的工作主要是在国务院这边。”陶铸声音不高，客客气气解释：“我是副总理，住这边和总理联系方便，可以多协助他搞些工作。”

“你还是文办主任么，怎么能不管文化革命？”江青昂然走入客厅。她的变化也是明显的。如果说她过去“只是一个女人”，她所拥有的一切只是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夫人，那么现在就不同了，她已经独立起来，有了自己的职务、责任、权力……大约是要证明这一点，证明她再也不只是“一个女人”，她走得很威风，很有一股冲劲，大咧咧坐到沙发里，并且翘了二郎腿。她用很有身分的声音问：“是不是文革小组名声太小，不如国务院响亮啊？”

陶铸张了张嘴，没有马上说出话。

他居然少有地被女人噎住了。

那原因只是因为毛泽东发过话……

陶铸调中央后，便介入中央文革的活动。

前不久，7月18日，毛泽东从南方回到北京，听了一夜汇报，第二天才会见等待中的刘少奇。

毛泽东十分严肃地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毛泽东略一停顿，带了命令口吻：“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毛泽东说出“稀巴烂”这种词，那种愤激的情绪已是再清楚不过。

24日，全国各地还在举行支援越南抗美救国斗争的集会和游行，毛泽东已经再次向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及中央政治局常委们表示：

“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毛泽东作了挥之即去的手势：“工作组，统统驱逐之！”

没有谁当面站出来反对。毛泽东在晚年听不进反对意见，是产生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刘少奇、邓小平曾经对毛泽东晚年的一些错误观点和判断提出过中肯的不同意见，比如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结果反而使他们与毛泽东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他们都是毛泽东几十年的亲密战友，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为确立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无法替代的突出贡献。

令人难过和遗憾的是，毛泽东在晚年越来越离开了他过去的正确思想，而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仍然忠诚地坚持着那些正确思想。为了大局，他们无法，也不可能公开反对毛泽东。他们甚至不得不违心地作检查。

但他们内心的痛苦、焦虑、委屈和担忧就是在检查中也不难体味出来。

受到毛泽东批评后，刘少奇在群众大会上讲话：“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人员，也不晓得。”

刘少奇迷惘，“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刘少奇痛苦忧虑：“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名其妙……”

陶铸已经在沙发里坐下，摇摇头表示江青言重了。

毛泽东表态文革小组“名声很大”，江青反问“是不是文革小组名声太小”，明摆着是江青不满陶铸的搬家。

陶铸的全部矛盾、痛苦在于：思想上，他与刘、邓相通；但几十年的革命经历决定了他只能跟毛泽东“继续革命”。他明明看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越来越倚重中央文革，但他还顽强地让自己相信：我只跟毛泽东干革命，不跟你们中央文革小组的那群人掺和。

“文革那边我只是参加，国务院这边我是副总理，有具体职责。”陶铸勉强笑着解释，“而且还有中宣部，都是具体的一摊子。”

“现在可以冲击一切的是文化革命运动。”江青口气大得像是给陶铸上课，一副高高在上的神气：“办公室安在哪里了？”

陶铸已经笑不出来。但还能保持不失礼，客客气气地：“在西楼。”

“噢，”江青放下二郎腿，朝沙发仰去，“乍一到中央，可能情况有些不熟悉，工作中难免遇到困难多些，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

陶铸的脸色变了。他在中南局是一把手，长期以来是说话算数，拍板就

定案的人物，习惯了千万人起立鼓掌，投来信任和热烈的鼓掌，江青这番“关心”的表示，若出自毛、刘、周、朱、陈、林、邓等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自会感激不尽。可江青算什么？过去不过一个女人，现在不过是文革小组副组长，也不过刚当上，未必能算是进了中央，就用这种口气对他陶铸讲话！

心高气傲的陶铸鼻子里哼一声，变脸变色，又不软不硬地回了一句：“在广州我是个西瓜哟。到了北京就变成粒芝麻了。”

江青微微一怔，马上回过味了。

她当过演员，表情丰富，又会作戏，便发出一串笑，似乎很随便，心里什么事也没装。她朝陶铸移近一些身体，不失亲近地说：

“每次去广州，你和曾志都是尽了地主之谊。你到了北京，我还没尽尽地主之谊呢。”她将两手一摊，旋即又抬起一只手环指房间和院子：“不过你来不是做客，你现在也是地主了么，而且是西瓜。你不是芝麻，我才是芝麻哩。”

这一来，陶铸不自在了：“江青同志，你太客气了……”

“这是真话。”江青更加认真地说，“主席很器重你，信任你。林彪同志也很看重你。他说过，你是独当一面的人物，在东北他就很看重你。”

陶铸一时说不出合适的话，但明显动了感情，因为这是讲的实话。他对毛泽东始终怀着最深挚的崇敬热爱之情，在东北受到林彪重用也是实情。以往他到北京，总要去看望一下林彪；若是林彪到了广州，他更要去问候关心，尽尽地主之谊。

“好了，说正经事。”江青把手一摆，似乎很自然地扭了话题：“政治局生活会上的发言，你准备好了吗？”

陶铸心头一颤，又被难住了。

事后陶铸向曾志讲述这次会面，曾紧锁眉头说：“唉，江青越拉我，给我出的难题就越大。”

8月1日，中共中央将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陶铸早已得知。其间毛泽东要召开政治局的生活会。生活会历来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思想斗争的会议。这一次毛泽东明确讲了刘、邓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镇压学生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那么，生活会的主要目的当然是批评少奇、小平同志。

可是，他能批判出口吗？

如果说刘、邓错了，那么自己也有一份。陶铸是“坚决主张派工作组”的。对于工作组怎么搞，也参加了意见。

何况，陶铸对“方向、路线错误”虽然不可能表示相反意见，其实内心并没想通。

何况，对于运动下一步怎么搞，他心里不无忧虑。比如新近出现的“红卫兵”，“大串联”，陶铸便不无忧虑。毛泽东对这两个事物还没表态，陶铸自然要照总理吩咐的“多听多问少表态”。但只要做工作，有些态度就不能不表。昨天他亲自给北大聂元梓写信说：“要积极搞好本身的革命，创造好经验……派人出去，当然以搞好本单位的运动为前提……有的同学要去外地地点革命之火，自己走了当然不好。”

陶铸不仅对运动发展的方向、路线、政策有忧虑，更对领导这场运动的班子有忧虑。就比如身边这位“雄心勃勃”的江青，她那个思想水平工作能力，怎么可以胜任这样一场运动的领导工作？

陶铸双眉紧锁。那一瞬间，他已想起了江青刚刚作出的一次亮相……

那是毛泽东表态，要将工作组“统统驱逐之”以后的晚上，天气十分闷热。

北大校园东面有一些明代风格的亭台楼阁，江青来到其中的一个高台上。挂在树上的大灯泡照亮了江青得意洋洋的面孔，她的两边站了一高一矮，一瘦一胖的康生和陈伯达。

“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江青高声喊时，那声音便无法改变地成了尖细，并且像二胡的丝弦一样发出颤抖声。她和年轻狂热、激情洋溢又毫无实践知识的学生们喊过一阵口号后，便宣布工作组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布中央决定将工作组全部撤走。

毫无阅历和经验又极易“热血沸腾”的学生们，此起彼伏地大喊大叫：“江青同志，我们爱你！”“江青同志，我们欢迎你！”

江青立刻亢奋了，她终于威风凛凛如愿以偿地成为“中心”，这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她喘着，起伏躁动着，她要发泄了。

正像“母鸡的理想不过是一把糠”，初登中国政治舞台的江青，她心里装的一堆恩恩怨怨是什么档次的东西呢？

“我要控诉！”江青忽然把双手抱到胸前，浑身哆嗦着喊叫起来。

“她从来就不是真正的儿媳妇！”江青浑身发抖，周围的大树也都惊讶得浑身发抖。“她妈是个政治骗子！我从来不承认她是毛主席的儿媳，毛主席本人也不承认！”

那位庄重善良的原北大中文系学生韶华，不知成了“走资派”还是“黑帮”，在这种场合变成了江青攻击的第一目标。仿佛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这一刻，突然变成了只是为了解决家庭矛盾、婆媳关系和市井之间的长舌妇才津津乐道的那些恩恩怨怨永远纠缠不清的矛盾的一场“革命”一次“造反”。

江青是真“反”了，冲着麦克风拉长声音地控诉她胸中郁闷已久的仇恨：“韶华是趁毛岸青神志不清和他建立了关系，是骗他和她结了婚！……”

江青“横扫一切”地挥臂，突然遇到了“阻力”。

陈伯达轻轻拍打江青肩头：“这些事不要在这里说了……”

江青生气而又吃惊地循声盯住陈伯达，久久难以从她自身的角色中摆脱出来。

“热血沸腾”的、刚才还大喊大叫江青同志的学生们都缄口不语了，上万人的会场，刹那间哑了一般静，简直掉根针都能听到。

“我的确非常烦恼。”江青泪花迷离地昂起头，表演出任何导演都不敢相信生活中会存在的一场戏：“10年来，我一直受这个女人和她一家的气，这就是我烦恼的原因。”

像作梦一样，大树在抖，不少学生也在抖。江青的声音却千真万确地渐渐提高，继续她的控诉，麦克风将她的声音清清楚楚地送到了偌大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要谢谢她啊！”江青从胸腔里叹出一股粗气，随即便塞塞了：“我的心脏病又犯了……”

没有人将这件事告诉毛泽东，怕他也会因此气出心脏病。

陶铸叹出重浊的一口气。

林子大了，什么鸟的叫声都能听到；世界大了，什么人都会遇上。生活

中有江青这样的人本不足怪，严重的是她所处的特殊而又重要的地位……

不是问政治局生活会上的发言吗？陶铸考虑出一个聪明的办法来回答。

“我正在准备。”陶铸不看江青，只盯住侧面的墙壁，“运动来得突然，我思想没跟上，在工作组的问题上我有错误……”

“过去没跟上现在跟上就是了，没人要纠缠你算账。”江青再移近些身子，几乎要触到陶铸，“你是左派，这一点我们文革小组的人心里都清楚。你早就同刘少奇有斗争么！”

陶铸一怔，心跳仿佛停止了，全身瞬间变得凉冰冰。他一直摸不清这场运动究竟要解决什么具体问题，可现在江青来通了这样一个气：同刘少奇有斗争就是左派……

“这次生活会就是要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我来就是向你作路线交底。是向左派交底。”江青特别咬重最后一句。

陶铸惊疑地望着江青，舌头恰似粘住上颚一般动不了。

“你喜欢打炮弹。”江青脸上那种自鸣得意的神情又浮现出来，“我也喜欢打炮。我是芝麻，你是西瓜，你是最有资格开头炮的。”

陶铸苍白了的脸陡然又涨红起来，那是由于心脏的猛烈抽搐，使热血一下子在全身奔涌。这是干什么？这不是拉宗派，搞地下串联进行非组织活动吗？党内怎么能这样子搞法？历史上，凡是搞阴谋搞非组织活动的都没有好下场，更要给党的事业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这是陶铸几十年所信奉的原则所决不可能接受的，也是他的情操品格所决不能接受的。

“我是一个传令兵。”江青故作一种深不可测的表情，这是她在“文革”中惯用的一手。她很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拉大旗做虎皮，真真假假地吓唬一些人，以致于毛泽东后来不得不在会议上公开声明：她就是她，我就是我，她代表不了我，她只能代表她自己！不过，江青现在还是要表演，嘴巴贴近陶铸的耳朵：“这是一次考验，左派也要不断再立新功……”

陶铸本能地歪歪头，躲开那股吹到耳朵眼里的潮热的湿气，身上却早已起满一层鸡皮疙瘩。

他对形势还看不清，但江青讲话的意思已然再清楚不过了。他像是思考。

要当“左”派很容易啊！

要正派非有点勇气和骨气不可……他带着沉思的表情朝窗外望去，隐隐能望见一簇松枝。

他写过《松树的风格》。

陶铸两腮无声地鼓突一下，转回头，望着满怀希冀和期待的江青。陶铸这时的神情，像是风雨之后波涛受了阳光的照拂而渐渐趋于平静，缓慢地摇了摇头，声音低沉，却很坚定：“江青同志，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一点也不了解……”

“是啊，所以我来向你交底。多少人想摸底我们不说，不能随便告诉。可我们先来找你了，因为你是左派。”

“我不行，讲不出什么。”陶铸艰难地摇头，好像脖子落枕了一般，“更不能开头炮。”

江青的眉毛逐渐收拢，目光里流出失望和气恼，但很快又变幻成疑惑和不解：

“你怎么讲不出？你过去就开过炮，一直有斗争么。”

“那是工作上正常的意见分歧。”陶铸又一次摇头，这次摇得干脆果断：

“不一样。”

事过半年后，陶铸曾向曾志详细回忆了江青的这次交底活动。并十分沉重他说：如果江青不来找我“交底”，后来的生活会上我也许会放炮；她这一来找，我就毛了。这么搞法子算共产党还算国民党？到底是她江青搞阴谋还是我陶铸搞阴谋，历史总有一天会作出结论……

君子之心，小人之腹。陶铸的态度江青也是无法一下子理解的。

她眼里闪过一下亮，像迸出火来，瞬间又消失，浮出更大的疑惑和猜测：“有顾虑？你不是那种人么。延安抢救运动，那样的形势下你还坚持去看了柯老。”

陶铸垂头久久不语。

他是在回忆当年在延安？

“我去看柯庆施……我说的是，”陶铸舔了舔嘴唇，声音很低：“我说的是……我不能落井下石。”

那是一段难堪又难熬的沉默。

江青的表情变化陶铸再没见到。

后来他听到起身的声音，便也跟着立起身。

“你很有人情味么。”江青的口气说不清是恼火还是讥嘲，脚步声朝外响去。陶铸只送到屋门便不走了。他听到江青在院子里留下的一句话：“你再多想想吧。”

明天就要参加政治局生活会了。

那一夜，陶铸失眠了……

1908年1月16日陶铸出生于湖南省祁阳县石洞源陶家湾下院子的一个贫苦知识分子的家庭。祖父陶益斋是个读书人，怀才不遇，愤时慨世；郁郁以终，年仅37岁。父亲陶铁铮，母亲董氏唐姑。陶铸兄妹四人，陶铸排行第二，长兄耐存，三弟际恒（两岁夭折），妹妹月梅。

陶铁铮毕业于湖南南路优级师范学堂，曾参加同盟会和武汉的辛亥革命起义。为人慷慨正直，不畏权势。曾任湖北都督府理财部煤务转运官，并与人合伙开办小煤矿。1914年陶铸6岁时，随全家迁居武昌，在武昌私塾读书。第二年父亲经营的小煤矿倒闭，煤务转运官的职务也失去，兴办实业计划破产。此时袁世凯捕杀革命党人，无法在武汉立足，1915年举家迁回老家祁阳。陶铁铮将家中田产变卖，只剩下祖传的五间房子和几分园土，与友人在家乡倡办文昌阁新学，担任文昌阁小学校长。陶铸就在文昌阁小学读书。陶铸的父亲因倡办文昌阁新学，将原有义学学田及会产每年两百多担租谷，作为办学基金，遭到当地几个豪绅反对，怀恨在心。1918年，北洋军阀吴佩孚部进驻衡阳，其部下萧耀南旅进驻祁阳一线，与南军谭延闿、程潜部形成对峙。陶铁铮接受南军陈嘉佑部委托。拟在祁阳组织武装，牵制北军，策应南军。

正在此时，石洞源来了以游年宝为首的所谓“土匪”（实则是一批为饥寒所迫的穷人，其中有个头头曾在铁铮开办的小煤矿当过小工）。地主豪绅们都吓跑了，陶铁铮思想开明，见过世面，乡亲们公推他出面，以陶氏族公名义办了几桌酒席招待。陶铁铮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把游年宝拉过来，作为策应南军的武装力量。事过之后，对陶铁铮一直怀恨在心的几个豪绅，向北洋军阀萧耀南部告密，并用1500块现大洋，贿通了县团防局局长黄子珠，军法官王信之，以“通匪”罪将陶铁铮及其三弟陶柏生逮捕，未进行公开审判，于1918年阴历6月14日，将陶氏兄弟秘密杀害于祁阳王府坪。

陶铁铮被害时，年仅 31 岁。时陶铸大哥耐存 12 岁，陶铸未满 10 岁，妹妹月梅仅 6 岁。陶铸的一家，原来是个大家庭，男女十余口。遭此横祸，竟至家破人亡。

陶铸从小生性刚强，不怕吃苦，不畏强暴，在村里的孩子中，他外号叫“猛子”。父亲受害，迫于生活辍学在家，10 岁就上山砍柴，背树下河，养家糊口，生活极苦。同房祖辈陶苏光，曾劝陶铸母亲说：“你一餐斋汤，一餐粥，这样日子怎么过？有个财主，想找个男孩做儿子不如把际华送给他，有吃有穿，又有书读。”遭到陶铸母亲严词拒绝。中午时分，陶铸挑柴回来了，母亲将陶苏光的话告诉陶铸，陶铸听了气愤地说：“哼！想得真好，叫他给我做儿子吧。”

1919 年春，陶铸父亲的老友申暄老师，把陶铸带到清水塘申氏小学读书，学费、膳食全部都是申老师负担。陶铸天资聪颖，接受力强，记忆力尤为惊人。夜晚村里的孩子都在禾坪上嬉戏欢闹，陶铸却坐在微弱的桐油灯下，聚精会神地看书练字，直至深夜。

申暄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就给陶铸谈今论古。

有一天晚上，申老师对陶铸说：“铁铮哥提倡办学，造福桑梓，振兴中华，是正大光明的事。他遭人杀害，这穷人的血海冤仇，你长大了一定要报。”

陶铸问：“这仇怎么报？”

申老师对他说：“现在我就教给你本领。”

陶铸又问：“先学哪些本事？”

申老师说：“多看书，精通兵法。”

陶铸又紧跟着问：“是哪些书呢？”

申老师告诉他：“《水浒》、《三国演义》、《薛刚反唐》，远至写陈胜、吴广，近到洪秀全等这些书都可以看。”

第二天深夜 12 点，申暄起床去给陶铸盖被子，掀开帐子一看，人没有了。最后在学校附近一间小屋里发现了陶铸，他正伏在一盏菜油灯下看《三国演义》。申老师伸出大姆指说：“好伢子，真有骨气。”

陶铸的母亲不愿多给申老师增添负担，只念了半年书，便令他辍学回家。1921 年 3 月，刚满 13 岁的陶铸，就告别了祖母、母亲，跟着姨外婆离开祁阳，到武昌白沙洲和安徽芜湖，连续 3 年，在同族陶瑞卿经营的“瑞森样木记”排上当学徒，学习记数码，做些招待客商的杂役。瑞卿号的账房先生，见陶铸非常好学，每当工作之余，总是手不释卷，刻苦自学，便利用晚间，教他诗词和古文书法。陶铸又等于半工半读了三年。同时陶铸姨外婆家里，也珍藏着许多书籍，如：《洪杨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西游记》、《红楼梦》，唐诗，宋词等书都拿来认真阅读。1925 年，“瑞森样木记”亏本倒闭，陶铸随着陶瑞卿一起回到武昌白沙洲，经陶瑞卿介绍，去汉阳鹦鹉洲，在竹木匣金局当录事，负责开大票，每月工资，只够糊口。自幼好学的陶铸，在武昌、芜湖的三年学徒杂役生涯中，从报章杂志上，开始接触了新事物，认识生活，认识社会。“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他面前，展开了新的视野。在竹木匣金局只干了几个月，就在同乡友人的资助下，奔向大革命的广州，揭开了他革命光辉历程的第一页。

陶铸在芜湖认识了一位叫刘嘉傅的祁阳老乡。他见陶铸勤学好问，有见地，不平凡，就对他说：“你不是做生意的材料，最好是去报考黄埔军校，

会有前途的。如没盘缠，我可以资助你。”1925年秋末，陶铸在他四叔的同窗好友、黄埔军校毕业的蒋伏生、傅国期（黄埔三期毕业）的帮助下经上海转赴广东，刘嘉溥特地送给陶铸18块现大洋做路费。到广州后，因黄埔军校尚未招生，乃经蒋伏生介绍到一军一师教导二团二营当司书。1926年黄埔军校第五期招生，便被保送入军校为第五期入伍生，陶铸在入伍生中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各种活动，经常看共产党书刊。当时周恩来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有一次进行沙盘作业，陶铸与担任此课程的教官发生了争执，当时虽被勒令退出教室，事后那教官却对别人说：“陶铸这个学员不简单，敢对我指挥打仗提出意见，将来是个将才。”此后不久，当年18岁的陶铸，便由赵世嘉（江西人）、陈葆华（黄冈人），詹不言（浙江人）介绍，在黄埔军校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陶铸入党之后，在军校刻苦学习军事技术，1926年6月至9月，在军校第五期入伍生受士兵训练4个月，10月升入军官班，编入第一学生总队第三大队第十二区队。就在这一年，即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布了《北伐宣言》。

1927年3月，黄埔军校内部的气氛还很平静。“四·一二”政变前，军校内部的形势，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广州的反动气焰，日益嚣张，共产党人萧楚女在一次报告中，列举蒋介石倒行逆施的种种事实，气愤地提出：蒋介石是新军阀。

党的特别党部执委会决定派军校党组织负责人和学生代表陶铸、陈葆华、高仰之等20人组成控诉蒋、李反革命行为代表团，向武汉国民党政府控诉，要求制止广州的反革命活动。陶铸等换上服装，乘船到上海，转乘一只英国船前往武汉。

陶铸到达上海时，蒋介石已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陶铸从上海抵达武汉不久，就被党分配到湖北农民协会。党正拟派陶铸去鄂东，组织农民自卫军，这时湖北地主豪绅走卒、原武汉政府所辖独立14师师长夏斗寅率部叛变，党采取紧急措施，命令叶挺率部讨伐，经英勇反击，打退了夏斗寅潜袭武汉的反革命阴谋。这时陶铸接到中央军委命令，派他到叶挺部24师71团2营当副官。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面临着一个新的转折点。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彻底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统治，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最主要任务。会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回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组建中国工农革命军。10月，毛泽东率起义军进驻井冈山茨坪，开始了以井冈山为根据地的“工农武装割据”。

1927年7月，陶铸随叶挺部队开发至江西九江，进驻南昌时，陶铸已被任命为二营营部副官，南昌“八一”起义期间，他带领营部特务连，与二营连指导员萧克带领的一个排，负责解决驻守城内程潜部一个团部。

起义胜利后，被任命为二营六连连长，随叶挺率部经广昌、瑞金、会昌等地南下，沿途与敌人冲杀，抵潮汕时全连减员一半。离开潮汕，陶铸率领部队行至普宁流沙镇又陷入重围全军覆没。陶铸突围至惠来城郊，9月底在甲子镇化装，由当地农会护送，于当年阴历9月底到香港，旋即被英国巡捕房关押，一星期后被引渡到广州，在广州市警察局关押审讯20多天。陶铸在

一次被押送到工兵营修路时，乘看管不备逃走。11月初，陶铸在广州和党接上了关系，党决定派他重新打入张发奎、黄琪翔的警卫团工作，任务是帮助建立主要由工人组成的第三营，并掌握特务连，秘密策划广州起义的工作。12月11日，广州起义。陶铸掌握的警卫团负责解决驻长堤的张发奎、黄琪翔的总部，陶铸被任命为起义总部参谋，起义后任参谋长，起义原定12月13日举行，由于保密不严，敌人提前作好准备，起义被迫提前到11日凌晨两点半。次日起义失败，起义总部下令撤退。一部分同志撤到左右江地区，开展农村游击战争。陶铸等在越秀山阵地，与总部联系断了。敌人又已进到市内，到处是枪声。阵地团指挥所剩下人数不多，大家商量集合撤退已不可能，相机分散撤退，往沙河方向赶队伍，但下山即遇见敌军士兵，陶铸逃脱了敌人的搜捕，改名换装，在广州大东路芳草街一位湖南同乡家中隐蔽。

陶铸在广州同乡处隐藏了一段时间后，化装乘火车离开广州到韶关，然后徒步经乐昌、越九峰，于1928年1月底到祁阳家乡。不久即找到与陶家有点亲戚关系的共产党员申庆礼的关系，找到了祁阳县委，县委派常委李用之与陶铸谈话，县委决定恢复陶铸的组织关系，并参加县委作宣传工作。县委书记是钟德贵（即刘东轩）。由于当时湘南特委的盲动主义，布置湘南总暴动，陶铸觉得用单纯军事观点去搞武装的干法不是办法。加之江华白茫营民团的枪未能拖出来，特委又指责祁阳县委没有行动，县委感到不好办。此时陶铸回祁阳被敌人知道了，要抓他的风声越来越紧，行动甚为困难。陶铸提出离开祁阳。经县委同意，介绍他到湘南特委另行分配工作。

1928年6月22日，祁阳县的党组织遭到突然袭击，县委书记刘东轩等6名党员被捕遇害。当日傍晚，国民党反动武装，沿祁山山脉包抄了石洞源，直奔陶铸老家。敌人未能抓到陶铸，在陶铸家里，翻箱倒柜，威逼乡亲实行“联保切结”。陶铸祖母年66岁，在这场横祸中惊吓而死。陶铸母亲董唐姑擦干眼泪，将祖遗五间住房，卖去三间半，埋葬了祖母，孤苦无依，就离开石洞源祖居之地，投奔女儿月梅家。

陶铸离开祁阳后，因湖南各地白色恐怖，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接不上党的关系，他先后去衡阳、武汉、徐州找党，最后在北平与党组织接上关系，接受党的任务，先后在驻唐山一带的唐生智旧部做兵运工作，在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下做群众宣传工作。1929年农历8、9月间，奉调去上海，陶铸到上海后，中央军委欧阳钦通知他：中央又派他去红四军工作。

这年9月，陶铸前往红四军途中，抵福建厦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正加紧向闽西南红色根据地发动三省“会剿”，省委亟需有作战经验的军事指挥人材。陶铸一到厦门，福建省军委负责人王海萍与省委书记罗明通知他：经中央同意，留他在省军委负责兵运工作，任军委秘书。

陶铸在福建接受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组织并亲自指挥攻打厦门监狱，带领12名同志，救出关在狱中的40多名党团员，我无一伤亡，震动全国。

当时在厦门恩明监狱里关押了40多名“政治犯”，其中有厦门市委书记刘端生，团省委书记陈柏生等党的重要干部。福建地下省委决定武装劫狱，营救这些同志。陶铸按照省委的决定，多次化装深入监狱，对监狱的地形地物、监狱内部情况作了详细的调查。

1930年3月，中共福建省委经过多次精密研究，决定由省委书记罗明、军委书记王海萍、组织部长谢汉秋、军委秘书陶铸、团省委书记王德组成五

人破狱委员会，委员会负责规划破狱的一切工作。陶铸要求这次破狱，战略战术要求速战速决。陶铸还就劫狱路线、接应地点，作了周密布置。

担任破狱第一线总指挥的陶铸，沉着地将武装队组成内队和外队。陶铸带领外队。外队一共 5 人，当他们冲进大门时，正在吃早饭的警备队长刚刚从边门探出头来吆喝“干什么？”话音未落，陶铸眼明手快，立即打出一梭子弹击倒警备队长和 1 个队员。此时，牢里的 40 多位同志，听从武装队的指挥，一个紧跟一个，快步冲进了县政府的大门。狱中的战友全部冲出看守所。早就散布在县政府门口的接应队同志，每人带三五个出狱同志，引路赶往船只停靠的口岸，同安县委书记许宗英站在堤岸上，指挥出狱同志分两边上船。仅用 10 分钟，出狱的 40 多位同志全部上了船，立即扬帆开船，驶往同安。

1930 年 6 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统治了全党，根据这一错误方针，刚刚发展起来的福建地区的革命武装力量，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冒险向敌人强大的广东东江地区出击，以实现所谓“闽粤桂三省总暴动”。为此，革命力量再次受到严重挫折，福建地区的党组织，受到严重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1930 年冬，陶铸受命到漳州重建中共闽南特委，任闽南特委书记。陶铸通过厦门一位姓林的党员的哥哥林惠柏在漳州一个中学任教的关系，寄居在漳州南山寺。南山寺有个叫萧达如的和尚，也是湖南人，同情革命，经过了解考察，陶铸在这位名叫萧达如的和尚帮助下，即把中共闽南特委机关安在这“终日念经诵佛，与世无争，但求正果”的佛庙里。陶铸任闽南特委书记期间，经常化装成南山寺的和尚外出活动。

1956 年，陶铸重访漳州南山寺时，写下五言诗一首，回首 30 年前在南山寺的这段传奇式的革命经历，表达对革命战友的深情怀念：

南江古寺规模在，
含笑依然花满枝。
鬓白重来千百感，
江山妩媚故人稀。

1930 年 12 月 13 日深夜，陶铸亲自主持组建的由南乡、北乡 20 多位农民组成的闽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在漳州南乡一个村庄的词堂里宣布正式成立，王占春为支队长，李金发任政委，陶铸代表特委随军行动。在支队成立会上，陶铸根据他到漳州后调查到的情况，向游击队队员分析了全国和闽南的斗争形势，总结了前一阶段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今后的任务是“立即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武装保护闽南，准备成立漳州苏维埃政府”。随后，陶铸指挥支队武装袭击了龙虎庵乡公所，缴获了 20 多条民团的枪，镇压了最坏的敌探、狗腿、地主，狠刹了民团的凶焰，游击队的士气大振，闽南各地农民运动又活跃起来。陶铸坚定执行党中央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方针，打开了闽南地区的革命新局面。

1931 年 12 月，陶铸调回厦门任中共厦门中心市委组织部长。翌年初，调任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书记，负责闽东北一带的革命斗争。

1932 年，陶铸和曾志结婚。时陶铸 24 岁，曾志 22 岁。此时陶铸任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书记，曾志任福州中心市委秘书长。

秋来风雨费吟哦，铁屋如灰黑犬多。

国未灭亡人半死，家无消息梦常过。
攘外空谈称绝学，残民工计导先河。
我欲问天何瞶瞶，漫凭热泪哭施罗。

这首诗是陶铸 1935 年在南京军人监狱的牢房里，为悼念邓中夏和罗登贤两位革命志士写的悼亡诗。表现了陶铸身陷囹圄，对革命坚定不移的信念。

陶铸是 1933 年 3 月，奉上海的党中央局调令来上海。到上海不久即被叛徒王善堂出卖被捕，先关押在上海公安局，后转押南京中央陆军监狱，被判处无期徒刑。在被关禁近 5 年的时间里，陶铸在狱中始终斗志昂扬，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在敌人的威胁利诱面前坚贞不屈的革命气概。国民党的法官审讯他的时候问他：“你信仰什么？”

陶铸在敌人森严的法庭上昂然回答：“我信仰共产主义。”

法官又问：“放你出去，你可相信三民主义？”

陶铸斩钉截铁地对国民党的法官说：“不。我不骗你，你放了我，我也不相信三民主义。信仰是不可以随意改变的。”

在国民党中央军队监狱服刑期间，与同狱的共产党员萧桂昌、喻屏、赵希愚等秘密成立党支部，团结难友，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为反抗敌人的压迫，争取改善生活待遇，进行合法斗争。因此，常犯“狱规”，而受到惩处。

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党中央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释放政治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经周恩来与叶剑英和国民党政府多方交涉，始营救出狱。9 月 26 日，叶剑英派黄文杰代表八路军办事处，到中央军人监狱接陶铸出狱。同时营救出狱的还有赵希愚、萧桂昌、顾玉良、周云德、陈曾因、曹瑛等共 7 人。出狱的当天，他们 7 人合拍了一张照片，陶铸还在照片上题词“百战归来认此身”，以表狱中斗争的胜利。并作题照诗一首，作为与出狱难友纪念：

五年狱里艰辛过，
一笑昂然对镜头。
珍重此身须记取，
阶级仇恨尚深留。

在狱中 5 年多的时间里，陶铸刻苦学习，阅读了《史记》、《昭明文选》、《古文观止》等中国古典作品以及《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等报刊，抓紧狱中时间，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历史、文艺等理论，并对马恩著作进行了深入地钻研。陶铸原本没有上过凡年学，从事革命后，更无暇读书，出狱后，他感慨他说：“我的四年大学是在监狱里上的。”后来有人问他，是什么学校毕业的？陶铸爽朗地回答说：“我是监狱大学毕业的。”

遥望延城光万丈
沔上巍峨此庙祠，
才高管乐命何之。
车行风雨催人急，
何必低徊两出师。

——过沔上谒武侯祠

停车闲步瞻遗容，
敢效亡秦抒所衷。
遥望延城光万丈，
轮声欲起夕阳红。

——过留坝谒留侯庙

这是1940年3月，陶铸被选为出席党的“七大”代表，离开鄂中敌后游击区，赴延安途中，路过陕西沔阳、留坝时，参观蜀汉丞相诸葛亮的武侯祠和西汉开国名臣张良的留侯庙时，写下的两首七绝诗篇。这两首诗都是采用借古抒怀的艺术手法，表达了一位长期坚持敌后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奔赴久已向往的党中央所在地的迫切心情，抒发了这位历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对抗日大业的坚定信念与抱负。

陶铸是从鄂中到宜昌，乘船到达重庆的。在此之前，陶铸出狱后，党中央分配他到董必武领导下的湖北省委工作；任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为推动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实施，为训练敌后游击战争的骨干，为建立鄂中党的组织，做了大量工作。现在他又来到重庆；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以少校副官的名义，经西安赴延安的。由于时局的变化，到达延安后才被告知，党的“七大”延期召开。当时陶铸是出席“七大”的华中代表团代表，华中代表团的团长是陈毅。因“七大”暂不召开，1941年春末，调中央办公厅党务材料室任副主任，整理“六大”以来党的历史资料，负责军事文献资料编纂及研究根据地的一些政策问题。研究室主任为王首道。

1942年到1943年，陶铸参加了延安的整风运动。陶铸和其他一些同志一起，参与编写了《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和《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材料》这两套党内历史文献，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路线的正确，批判了王明的错误路线。1941年4月4日，陶铸和曾志唯一的女儿在延安出生了。为了纪念革命者日夜向往的革命圣地，特给女儿取名亮亮（陶斯亮）。

1942年经中央决定，陶铸调任王稼祥的政治秘书；1943年调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宣传部长，主管总政治部的日常工作。在此期间，陶铸工作扎实，深入实际作调查研究。1943年秋天，陶铸带领几个干部，到晋绥解放区120师的连队作调查，他亲自调查了358旅8团2连，写出调查报告。1942年正是我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处于极为困难时期。日寇正集中主要兵力，在伪军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的配合下，对我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大扫荡，我抗日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在各个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中，创造了武工队的新鲜经验。陶铸听取了358旅敌工科关于一个武工队的情况汇报后，非常高兴，他不顾个人安危，又亲自带领几个同志，化装深入到晋绥前线敌人的据点三交镇附近的村庄向群众调查，以军委总政治部的名义，通报各解放区和根据地，发展武工队，主动出击，粉碎日寇的大扫荡。1944年陶铸又亲率总政宣传部的干部，组成几个工作组，到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的一些英雄、模范连队进行调查，总结连队政治工作的先进经验，写出了好几篇典型材料，汇编成册，作为全军政治工作的教材。陶铸亲自主持编写了《官兵关系》、《军民关系》、《领导作风》三本小册子，以总政治部名义，印发全军。在边区大生产运动中，陶铸写了《论精兵简政》和《再论精兵简政》两篇文章，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1945年4月25日至6月11日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陶铸为

正式代表，曾志为候补代表，出席“七大”。党的“七大”，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路线，党中央决定从延安调派大批得力干部，到沦陷区去建立新的解放区。“七大”闭幕前夕，根据中央关于在湘粤桂边区发动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的决定，陶铸被任命为边区党委副书记兼部队副政委。1945年6月15日，即“七大”闭幕的第四天，陶铸就离开延安，随一支南下部队，奔赴远隔重山万里的南疆敌占区去开辟根据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陶铸率领南下部队，正行至洛阳附近，就接到中央急电，停止南下，调头北上。命令特别强调：日夜兼程进驻沈阳。陶铸接受新的指示，一行十多人，经太行、冀中、冀东、山海关，快马加鞭，直奔沈阳。当时铁路破坏，有马骑马，没马就凭两只脚走。雇到牛车，晚上就睡在牛车上，日夜兼程，赶赴新的斗争前线。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9月中旬到达沈阳。

彭真根据中央指示，已于9月15日建立了中共中央东北局，他已先期到达沈阳。按照中央指示，从延安派出的20000多名干部，和从华北、山东解放区调来的10万大军，都陆续迅速进入东北。陶铸到达沈阳后，就任辽宁省委书记。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作了充分准备。陶铸十分清醒地估计到当时的形势，首先以全副精力，抓部队，组建人民武装。他9月中旬到达沈阳，10月初就成立了辽宁保安司令部，组成了4个保安旅，1个工人训练总队，1个回民支队和沈阳市公安大队。

1945年11月，蒋介石就在美军援助下，从海陆空三路向东北大举进攻。根据中央指示，我军于11月26日退出沈阳。邓华、陶铸率领保一旅、保四旅、工人训练总队、回民支队和沈阳市公安大队，经新民撤到法库。12月底，东北局决定，以辽河为界，建立辽西军区，陶铸任辽西省委书记，随着战局的发展，辽西省委机关从郑家屯撤到吉林的白城子，辽西省委就改称辽吉省委。

同年12月28日，党中央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陶铸坚决执行中央提出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正面配合主力，抗击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又要清匪反霸，支援前线作战。1947年4月，以辽吉军区为基础，组成西满军区野战军（后改为七纵队），以邓华为司令员，陶铸任政委，吴富善为副政委，下属三个步兵师。陶铸和邓华一起，亲率野战军，在当年的夏季攻势中深入前沿阵地参加了第一次四平攻坚战；在秋冬季的攻势中，参加彰武攻坚战。

东北我军夏季攻势和冬季攻势之后，10月31日我军完成了对沈阳的包围，11月1日陶铸在沈阳北郊的前线指挥所，和聂鹤亭司令员接见对面守敌53师师长许庚扬派来的求和代表，兵不血刃，11月1日下午，当面之敌许庚扬师撤出阵地，陶铸立即亲率先头部队，长驱直入沈阳城内大西关中国银行旧址，一举直捣敌军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的司令部，友邻部队，也直插入沈阳“东北剿总”大楼，端了敌人的老窝。

中共中央东北局任命陶铸为沈阳特别市委书记兼军管会副主任（陈云为主任），伍修权力军管会副主任兼沈阳市卫戍司令。沈阳解放不久，就接到中央命令，东北的部队组建为第四野战军，1949年1月，陶铸被任命为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随军挥戈南下，迎接解放全中国的新的历史使命。

1948年9月至11月，我军在东北战场上胜利结束辽沈战役后，12月，平津战役的炮声，震撼着华北大地。驻守北平的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傅作义，深明国家民族大义，响应我党号召，同我平津前线司令部谈判和平解放北平的问题，我国北方这座历史名城古都，就要回到人民手中了。傅作义的密友、国民党“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榆林地区国民党军总司令邓宝珊，在包头接到傅作义从北平拍来的急电，邀请他立即来平，面商要事。12月28日，邓宝珊乘傅作义派来的专机“追云号”飞来北平。

北平地下党崔月犁奉令会晤邓宝珊时，邓宝珊提出：要求与我解放军天津前线指挥部负责干部见面，当面商谈和平解放北平事宜。1949年1月13日上午，邓宝珊作为傅作义将军的全权代表，由傅部政治处长周北峰等一行4人陪同，于当天下午到达通县城外马各庄，平津前线司令部就设在这里。陶铸作为我军前线最高指挥部的代表，和前线司令部参谋处长苏静出面接待邓宝珊一行，并把他们接送到马各庄一个临时招待所里。1月14日下午，平津战役总前委三位负责人：四野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和华北野战军司令员聂荣臻等来马各庄会晤邓宝珊，就在马各庄那间临时招待所里，开始了和平解放北平的正式谈判。

在14日和谈开始前，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对天津已下总攻击令，当晚深夜天津解放，守军司令陈长捷被俘。邓宝珊前来谈判的主要内容，原来包括平、津、塘、绥四地实行和平解放，此时天津解放，实际只剩下北平、绥远两地了。谈判决定在北平成立联合办事处，处理和平解放北平有关事宜。联合办事处主任为叶剑英，我方参加的有陶铸、徐冰、戎子和；代表傅作义参加的有“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郭宗汾、政治处长周北峰以及焦实斋。

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方案，经国民党中央社公告，1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宣布北平停战。邓宝珊亲自出城到马各庄前线指挥所，迎接我方人员到北平具体商谈和平解放北平后国民党部队的具体改编的各项细节。1月23日，我平津前线司令部正式派陶铸为全权代表，在邓宝珊的陪同下，分乘8辆吉普车，进入北平城，与傅作义直接谈判，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最后协议。随行人员除两名警卫员外，有苏静和陶铸的秘书宋群。新华社特派记者刘白羽、华山，以工作人员的名义随行。苏静、宋群、刘白羽、华山等都穿着缴获的美军皮夹克，陶铸穿着我军自制的皮领军大衣。车队离开我军前线指挥所时，我方的4辆吉普车走在前面，邓宝珊一行的坐车随后。宋群乘坐的吉普车走在最前面开路。沿途我军岗哨，见插有红旗的我军标志，事先已接到通知，都持枪致礼，一一放行。在通县与北平之间，离开我军前沿阵地，有一段中间地带，即进入傅作义部队的前沿阵地。在经过中间地带时，邓宝珊一行乘坐的吉普车，就从后队改为前队，由傅部周北峰处长为向导，从朝阳门进城，经东四牌楼，东单大街，直驶东交民巷御河桥二号“华北剿总”联谊处内。这是傅作义秘密接待陶铸的招待所，稍事休息，傅作义就亲临住处看望陶铸，并约定时间正式开始谈判。

参加与傅作义代表谈判的只有陶铸和苏静两人，接连谈了3天。谈判在楼上，有时在大厅里还听到陶铸严厉的争吵声。第四天晚上，听到大街小巷僻僻啪啪的连天震耳的鞭炮声，宋群他们才知道这是1948年的大年三十，1949年的春节来到了古城北平。

陶铸顺利完成了与傅作义的谈判使命，“华北剿总”所属第四、第九兵团共25万人按协议规定，自1月22日起开始撤离市区，开赴指定地点听候

整编。北平古城，未受炮火威胁，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1949年2月21日，平津前线司令部、政治部召开北平受编的原国民党军师级以上军官会议，正式宣布改编方案。林彪、罗荣桓、谭政、陶铸、刘亚楼出席了这次会议，傅作义的代表郭宗汾等出席会议。陶铸从秘密进入北平与傅作义谈判，达成国民党部队的改编协议后，就一直留在北平，代表叶剑英担任起和平解放北平联合办事处的日常工作。2月下旬，第四野战军41军按协议完成接受北平的工作后，陶铸就搬出御河桥二号大院，住到东四四条四号小院。这段时间，他每天的主要精力，就放在对国民党起义部队的繁重而复杂的改编工作中去，历时1个多月，完成了华北国民党军13个军，50个整师及非正规军的4个师，共约40万国民党部队的整编任务。

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淮海战役相继胜利结束，我百万雄师，已陈兵长江北岸，陶铸此时已奉命组建南下工作团，动员平津3万多知识青年，参军南下。

吸收平津大专院校学生，组建南下工作团，是陶铸倡议，在野战军党委的支持下作出的决定。为了动员北平大专学生参军南下，陶铸还出面邀请北平一些大学的著名教授，在前门外全聚德宴请晤谈，请教授们帮助部队做好这件工作。

南下工作团的消息一公布，向往革命的大学生们，欢腾雀跃，招生处设在东四三条的华文学校内，由四野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陈亚丁主持口试，同时在天津设立招生处。不到半个月，就吸引了3万多青年。在南下之前，由陶铸负责，对这批青年进行了短期训练，同时他还教育部队，重视和帮助这批知识分子。他向部队做报告时强调指出：“没有文化，政治觉悟是不可能提得很高的。我们的政治工作，决不能以‘老粗’为光荣。应把‘老粗’改变成‘老细’作为一项很重要的任务。”部队南下时，陶铸就把招收来的大批知识分子，分配到各连队，每个连队就配备了两个文化教员，1951年至1953年，部队开展文化学习时，这批南下的青年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了作用。

谭政担任南下工作团总团团长，陶铸任副团长，离北平南下时，中央已内定陶铸为武汉市委书记。5月8日武汉解放。陶铸统率南下工作团，随同前线指挥部立即乘火车转郑州向武汉急进。火车行至许昌，因平汉路许昌到汉口段尚未完全修复，就改乘汽车南下。陶铸抵达武汉时，中央任命谭政为军管会主任，陶铸为军管会副主任。市长为吴德峰，警备司令为萧劲光。谭政主要负责部队工作，武汉三镇的接管工作，实际由陶铸全权负责主持。

南下工作团下设3个分团。陶铸十分重视新闻文艺工作，在南下工作团3个分团之外，又专门成立了一个直属新闻文艺队，由陈亚丁、刘白羽带队，负责接管新解放城市的报纸、文艺部门。

抗战初期，陶铸在南京由党营救出狱，来到武汉，这次重返故土，已整整10年，面对国民党留下的这一堆破烂摊子，陶铸几乎一连几个月都在日以继夜地工作。由于他在沈阳担任过沈阳市特别市委书记，协助陈云同志接管沈阳，具有处理接管城市的实际经验，采取“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法，并首先抓紧解决在政治上、经济上有助于恢复秩序、稳定人心的一些关键性问题，特别是在南下途中，就组织了接管大城市的班子，并在开封逗留期间，抓紧时间，编印了“入城手册”，发给接管的干部，人手一册，参加接管的干部到达武汉后，严格遵守纪律，执行政策，武汉三镇的接管工作，顺利进行。

对党的宣传舆论工作，陶铸在接管武汉的千头万绪的繁重的工作中，都亲自过问。武汉解放后，陶铸委派范长江接管了国民党的《武汉日报》，主持出版《长江日报》，《长江日报》每天大样，陶铸必亲自审阅后，才签字付印。他的办公室在德明饭店二楼，里面是他的一间卧室，外面一个套间是办公室，他的秘书宋群就住在他隔壁的一间房子里。每晚12点多钟，范长江派通讯员送大样来给陶铸审阅。他亲自撰写对部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爱国主义教育大纲》，提高部队对形势的认识。

他在对部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报告中，多次精辟地分析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国内形势，教育干部战士“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彻底扫除“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天下太平的麻痹思想，特别提醒干部、战士：“我们要以备战的姿态，从事建设。因此，我们不可能关起门来进行和平建设。”

由于劳累过度，肺病复发，这年7月间，他又吐血了。组织决定让他先后到武昌东湖和庐山去疗养。8月4日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率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部在长沙宣告起义，陶铸在庐山疗养1个多月，就迫不及待地返回武汉，随即奉命去长沙，受中央军委委托对长沙起义改编为21兵团的全体官兵授旗授印。陶铸离开武汉时，特从第四野战军中选调一批政治工作干部，随同去长沙，加强起义部队的政治工作。

陶铸刚从湖南返回武汉，就在参加中南局的会议上，接到毛主席发来电令，令陶铸即赴广西，主持广西剿匪工作。来电传达中央指示，即令半年内完成广西剿匪任务。陶铸来不及整理行装，就匆匆离开正在召开的中南局会议会场，率领一个班的警卫人员，于当天深夜12点，冒着大风浪乘船渡江，从武昌南下赶往广西。这时，是1950年10月上旬。

1951年11月，陶铸结束了在广西1年的工作，返回中南局。就在他从南宁返回武汉途中，这才抽出短时间，顺道回祁阳老家石洞源探望阔别20多年的乡亲。这时是农历9月12日，只带秘书关相生和警卫员赵国智、邢光文等七八人，他谢绝当地政府的接待，在祁阳雇了一只小船，沿湘江顺流而下，天黑从下街口上岸，在他胞妹月梅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他步行8里山路，去石洞源老家看望。

他在石洞源只呆了半天，参观了陶氏以山小学，还和教师们谈了话。中午吃了一顿家乡用盆子淌的红薯粉皮，当天下午就离开祁阳赶返武汉。

刚到武汉，就接到中央电令，调广州工作。12月“日中央任命陶铸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兼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军区第二政委。

1951年11月，陶铸受命回到他战斗过的广东主持工作，在繁忙的工作中，他把广州建设成祖国美丽的南大门的设想，时时装在心中，他到广州不久，就去专门看望他的老战友、当时的广州市委书记王德，听取这位老战友对建设广州的设想。在攻打厦门监狱时，陶铸和王德都是“破狱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一见面陶铸就笑着对王德说：“你这个市委书记，不要光顾了抓工业、商业，我一路到你这来，路上坑坑凹凹，还有好几条臭水沟，这些地方，可以修建街心花园嘛，广州天热，让市民晚上好乘凉嘛！广州是大革命的发源地，是祖国的南大门，我们要抓紧时间，把广州建设好，让海外归侨一踏进南大门，就看到解放后的新中国的新气象。”

解放初期，广州市百废待举，城市建设经费困难，市委书记王德不但不放想修建街心花园，甚至连城市道路的维修费都拿不出。群众对市容变化不

大，很有意见。陶铸说，“老王，社会上又流传起一首国民党统治广州时期的民谣，你听说了吗？”

王德说：“听到了。”

陶铸当即顺口念起那首民谣：“电灯不明，自来水不清，电话不灵，马路不平。”接着，陶铸深感内疚他说：“这是对我们共产党的批评啊！”

王德说：“我何尝不挂在心上呢？广州现在是口袋空空，没有钱啊！”

熟悉陶铸的干部，都摸准了他的脾气，只要他认准是该办的事，再大的困难，你只要在他面前乘机叫苦，把困难摊出来，让他狠狠地批评你一顿，他会挺身而出，拍板相助。1953年5月，当他接受中央任命，兼广东省代主席时，他就决定，把广东省市政建设经费中的四分之三拨给广州市。经常亲自找负责城建的曾生、林西等同志去汇报工作，限期完成一些城建项目，并对广州市政建设的远景规划，群众切盼解决的那些问题，他都经常提出具体意见。

广州早先称得上公园的，只有一个中山公园。陶铸发动机关干部义务劳动，改造臭水沟，把沼泽地的淤泥挖出来，淤泥变成山，沼泽地变成湖，接连在广州市内建成有山有水、花果满园的7个公园。著名的建湖、浏花湖，就是他这样精心设计出来的。广州的每一项市容建设，都凝结着陶铸的心血。

生活在广州珠江上的“水上人家”，有3万多人，他们世世代代，都挤住在一条祖传的破旧木船上，陶铸亲自找设计人员共同研究改造、建设珠江南岸的滨江东路、滨江西路和跃进路，分期分批为“水上人家”建造新的住宅，从此结束了广州沿珠江两岸的渔民、船工成年在风雨中飘摇的苦难生活史。

陶铸经常说：“不关心群众的生活，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内忧未艾叹萧墙”是1942年6月，陶铸悼念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在反“扫荡”战役中牺牲写的挽诗中的一句。萧墙：右代君臣相见之地的屏墙，后人一般称内患为萧墙之祸。

陶铸临危受命来京，就投入极为艰难复杂的特殊战斗之中。

成为第四号人物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首都高校部分代表列席了会议。

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主持召开了政治局的生活会。

第一次生活会宣布开始，陶铸便下意识地端起了茶杯。

周恩来说过，揭开盖后的第一口茶最香。陶铸吮吸着喝了第一口茶。

这工夫，谢富治脱颖而出，抢头功，开头炮，猛轰刘少奇和邓小平。

半年后，陶铸向妻子回忆了那次生活会，虽然说得不细，也能给人一些印象。

“谢富治开了头炮，攻得厉害。”

“其他同志呢？”

“有的积极，有的勉强，是不得不说几句。”

“你呢？”

“我喝茶。我不会抽烟，我只会喝茶。”

“主要批评什么？”

“运动所犯方向、路线性错误。也有算旧账的。谢富治最厉害。”

“可能跟他也交底了？”

“会务组要向大会各小组发简报，我说，谢富治的发言不要印简报，不要下发。”

“这就得罪了……”“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发言都是不偏不倚，不带感情。但是诚实正派总该做到么。”

“总理呢？”

“他没发言。”

“谢富治可是左派了。”

“总理跟我讲过，留取丹心照汗青。”

谢富治在“文化革命”中患癌症去世，天安门降半旗志哀，一切都是超规格的隆重。

陶铸也是在“文化革命”中患癌症去世，他的情况还是留给后话再说吧……

8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虽然没有点名，但是再明显不过是针对刘少奇和邓小平。大字报里公开提出了中央存在两个司令部的观点，并且“联系以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表示了新账、旧账一起算的决心。

毛主席已经亲自“炮打”，作为党内有名的“炮筒子”，作为历次重大政治斗争中坚定地站在毛泽东革命路线一边的陶铸，他陷入困境，陷入极大的痛苦中。

这种痛苦，他的独生女儿陶斯亮从侧面也能强烈地感受到。陶斯亮到北京串联，住在家中，她发现父亲回到家时，总是一副忧思重重，郁郁寡欢的神情。陶斯亮找话说，朝着父亲喃喃：“爸，现在学校里到处贴了大标语，踢开党委闹革命，喇叭里也整天这么喊。这不是取消党的领导吗？许多人都担心闹成无政府主义呢。”

陶铸一声不吭，皱着眉头，在屋里急速地踱来踱去。“爸，你们到底是怎么打算的？党团员可是都懵了……”

突然，陶铸停下踱步，两眼吓人地瞪起来，就那么怒气冲冲瞪住女儿吼：“你怎么问我？为什么偏偏问我？啊！”

他又急促地踱一个来回，然后住了脚，吼一般嚷道：“是我搞的吗？我也想不通！这样子搞法又不是我决定的，你去报告主席吧，就说我陶铸想不通！”

他蓦地扭头急走开，又猛地回头冲过来，激烈地抡起一条胳膊，用力朝下甩去，在面前划过一道无形的线：“你要是怕我犯错误，同我划清界线好了，现在就划清！”

陶斯亮惊得目瞪口呆，身体悄悄战栗。

什么无法排解的困扰和痛苦使父亲如此愤怒，大发脾气？那时她不清楚。她只觉得父亲脾气发得莫名其妙，她也惊惧得莫名其妙。

第二天，陶铸立在门前的他水边，望着初绽的荷花，独个儿神情冷冷，四周围人迹寥寥。

这种时候没人敢凑前找不愉快。

陶斯亮踮着脚，轻轻地从父亲身后走过。

“亮亮，”陶铸叫一声，陶斯亮便住了脚不敢稍动。

陶铸淡漠的目光始终朝着多姿多彩的荷花池，那失神的样子与其说他是在跟独生女儿讲话，不如说是自言自语。他的声音低沉缓慢：

“亮亮，你愿意当造反派还是当保皇派都无所谓，只要你是独立思考的，是自己判断的就好……像你弟弟志修，他就是保皇派。”

刘志修是陶铸的外甥，自小在舅舅家长大，与陶斯亮像亲兄弟一样。

陶铸停了片刻又说：“我自己也不知道运动如何搞，该向哪里发展？……也许这次运动是个群众性的自我思想教育，一切由自己去判断？独立思考，接受教育……”

他的声音消失了，却又在他的女儿耳畔久久回响。他从没用这种低沉彷徨的声音对女儿讲过话。

他依旧站在那里，痴痴地望着荷花池，久久地，久久地不动一动。

陶斯亮突然觉得父亲变陌生了。那个叱咤风云、八面威风，那个充满自信，总是像坦克车一样向前隆隆开进的父亲到哪里去了？……

陶斯亮不可能知道父亲正遇到的困境——政治局生活会上，围攻刘、邓的炮火越来越猛。陶铸尴尬而又不安地坐在那里。会前会后或是会议中，那一瞥眼光、一声咳嗽、一次握手、一个努嘴，甚至是杯盖与茶杯碰出的声响，都会使他的心脏改变跳动的节律。

他喝茶多，出汗也多。他的思想在激烈翻腾：

不错，历史上我曾三次朝少奇同志开炮，那是因为工作中有意见。但是少奇同志不是主动找你谈心了吗？互相批评自我批评，增进了解也增进了团结。

谈话后，我是表了态的：疙瘩解开了、没意见了。那么，如果现在又摆出这些已经解决的问题来参加围攻，我还算什么人？

何况，我三次向少奇开炮，少奇从来不记前怨，对我不错，对中南的工作也很重视和支持。他如今有了难，我如果……唉，我陶铸做人可是有一条原则：不搞落井下石的事。这是人品问题。过去没搞过，现在不能搞，将来也不会搞……

对刘少奇同志我有什么新意见吗？扪心自问，没有啊！

要说派工作组以及工作组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路线，那么我也有一份。

三年困难是全国性的。不过，广东恢复生产最快。

老百姓总是喜欢把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情绪借助寓言和笑话来表达。大概就是这个缘故，所以出了那一说法：火车向南开，车轮敲击钢轨便发出“前途光明，前途光明”的音响。

生产恢复快，靠什么？

解决生产关系问题。

许多老同志曾说，“大跃进”时，陶铸和王任重也曾有头脑发热的时候。但时间很短，他们俩都是喜欢调查研究，搞实事求是，所以改得快，纠正迅速。

陶铸与王任重是同志，也是挚友，他们一道去广西龙胜县搞调查研究，目的就是调整生产关系问题。

龙胜县是穷困山区。当地老百姓说，大清朝出兵，打败了当地的上王。天子胜利了，便叫了“龙胜”。由于山高势险，这里的老百姓居住分散，一家一户棋子一般散落在深山老林中，不好组织集体。

据当时的秘书丁励松同志回忆，陶铸与王任重跋山涉水，深入各家各户

调查研究，对当地如何调整生产关系的问题，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实行产量责任的办法。其主要内容就是将田间管理，从种到锄到收，归家庭承包。超产了，个人得一部分，集体得一部分，从而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

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报告上写了批语：问题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报告作为文件印发全体会议。会议精神传达到各县后，陶铸见到一位县委的张书记，劈头问一句：“愿不愿搞产量责任制？”

这位张书记谈虎色变地用手割脖子叫喊：“割了我的头也不敢呀！”

能怪张书记吗？多少年反右倾真是反怕了。

广东清远县洲心公社在1961年率先搞了产量责任制，陶铸抓注典型迅速在几个县组织推广。会上讲，会下讲；对干部讲，对群众也讲，有些话在当时是很够“出格”的。

他说：“我不怕说资本主义，我就怕饿死人！”

他指点着县、社、大队的干部们说：“你们不要怕说右倾，我首先要求你们让人民吃饱肚皮，做不到你们就不配当领导！”

经济形势好转后，头脑发热的情况便又产生了。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错误地批判了邓子恢所谓的刮“单干风”和“翻案风”。其中便有几个组批判了广东的责任制。

陶铸不慌，心里有数，反正是毛泽东主席亲笔写了批语。批上天也是马克思主义的。

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提出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陶铸没有这样做。

邓子恢过去到广州，都是被安排在“小岛”。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接待人员降低规格，安排他住到另一个地方。陶铸听说后，发了脾气：“缺德的，你们落井下石呀？”一道命令，又将邓子恢安排到中央领导人居住的“小岛”。

八届十中全会9月结束，陶铸10月到广东从化、花县、清远、台山、开平等县进行农村调查研究。11月至12月又访问湖南湘乡等6县9个公社、10个大队、20个生产队，进行调查，并向毛泽东作了情况报告。

随陶铸一道下乡的秘书马恩成这样回忆：那是1962年的冬天，正是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我跟陶铸下乡，连走十几个县，一口肉没吃。因为他搞了一个约法三章：不请吃、不送礼、不迎送。他对违章的人很有办法治：扔下筷子就走。你想请他回来吃？他说饱了，不吃就饱了？他大发脾气：早就气饱了！这一来，再没有敢违章的了。违章等于叫陶铸书记饿肚皮。

到湖南调查，张平化和王延春同行。陶铸是中南局第一书记，但主要是在广东，到湖南不多。湖南省委行政处的一名副处长负责接待工作，认为他好容易来趟湖南，怎么也该招待一次，他严厉拒绝了。我们把陶铸的约法三章一讲，他也不敢招待了，一路就是吃素。

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可他在湖南一路上只讲产量责任制，田间评比责任制。这种责任制就类似我们现在实行的承包制。

可他一路就是没讲阶级斗争。

他每到一县，都是找最穷困的大队搞调查，讲多种经营，讲评比奖励，帮助干部想办法挖潜脱贫。我当时刚从部队转业来给他当秘书，所以对这些名词还不大听得懂。

他同某些领导干部的想法不大一致。有的领导干部挂来电话，说湖南农村主要问题是出现五股黑风，是阶级斗争的表现。陶铸认为主要应该调整生产关系，搞责任制，把经济发展上去……秘书们的这些回忆，不难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为什么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政治局生活会上，没有向刘少奇开炮。因为他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和政策上，与刘少奇的想法是基本一致的。

所以，陶铸在后来受审查时，向妻子作了这样一番倾诉：

曾志，说我保刘、邓，我承认，可我并没有私心。我跟刘少奇 1942 年才认识，还朝他开过炮，谈不上渊源，我对他的好感是在实际接触中渐渐增加的。尤其三年困难时期，粮库搞得粒米不存，真是搞怕了。那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政策上，我都是赞成他的观点的。现在他落了难，我又反过来骂他，那我还算什么人？

我跟邓小平也该不上渊源。1949 年二野进军西南，路经武汉时我们才第一次见面。八大后，他担任总书记，接触才多起来。我跟他就是工作关系，谈不上多少私交。我佩服他也是真的，那是工作上产生的观感。1954 年我在党代会上就讲过：如果党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我讲这话代表们都是听到了的，现在他落了难，我就翻脸朝他开炮？我做不出哪！当年那些代表们知道了又会怎么想？

那次政治局生活会我一直没吱声。

幸亏还有周总理。全开炮了，总理没开炮。

林副主席批判发言时候，我最坐不住。他是我的老领导，老上级，打国民党立了大功；他信任我，我也尊敬他。他发言那么激烈，我就想，莫非我错了？可我也是革命了几十年，这样搞法明显不对么。刘邓就算再严重，也只是讲到路线斗争，是党内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么，怎么能那样搞？那么搞我们是有教训的哟……

陶铸在落难时的这种倾述，无疑表明了他的真实性情。他所说的教训，或许可以从秘书了励松的一段回忆中得到答案。

毛主席曾经指示：将军下连当兵，省的领导要兼大学教授和县级领导。所以，陶铸一度兼任中山县县委书记，我兼县办主任。在中山县，他集中解决一些体制问题。他对大队办食堂提出怀疑，但是没有彻底否定。那时说大食堂是社会主义的一块阵地（后来他在广东还是率先放弃了这块“阵地”，是在中央下指示之前，这也是非有些胆量不可的）。他在中山县看出不少问题，1959 年去庐山开会，他的看法和彭德怀类似。会议前期，他讲了许多和彭德怀类似的话。后来风向一转，他给毛主席写了封信。他起草，我帮助斟酌文字和抄写，信首写明：周总理并报主席。他在信中表明心迹：“我对党中央、毛主席无任何二心，坚决保持一致……”庐山会议后没有整到他。

那时，绝大多数老干部，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都得到了这样一条经验：跟着毛主席就是正确，就是胜利。

陶铸也不例外。

可是，实践证明，庐山会议毛泽东确实有错误，并且毛泽东本人也承认了。

1965年10月，毛泽东在彭德怀出任大三线副总指挥前，同他谈了话。毛泽东说：“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分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应当为后代多想事、多出力。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一边。”“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头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

不难联想，陶铸在政治局生活会上不向刘、邓开炮，以后又坚持保刘邓，各种原因中，庐山会议的经验肯定也是起了作用。

当然，陶铸向曾志倾诉心声时，不曾明确讲到庐山会议的经验。他讲得多的是：“总理不打炮，我就有伴儿，有依靠。我就好坚持住。”

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于8月12日结束，发表了公报。陶铸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又被任命为中央文革顾问。

当时陶铸的心情实在难以名状。

他不曾向刘、邓开炮，在党内的位置仍然获得跃升。这说明他在政治局生活会上的态度是对的，至少不能说错误吧？

在政治局常委的排名中，陶铸开始排在较后面。名单交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认真看一遍，抓起粗大的红蓝铅笔，用红笔将“陶铸”勾到“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

于是，陶铸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四号人物”。

这说明，陶铸在政治局生活会上坚持不开炮，虽然属于不积极响应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号召，但他所表现出的品德和勇气，还是受到了毛泽东的承认和赞赏。

为此，陶铸又激动，又感激，又不安。

他求见毛泽东，怀着复杂的心情说：“主席，我是新上来的，排大前不好，我认为应该把我放到富春同志后面。”

毛泽东用亲切而又透彻的目光望定陶铸，微微一笑：“就是因为新上来的吗？”

陶铸微微低下头，恳切地建议：“把陈伯达同志调到第四位比较合适。他长期在您身边工作，对主席思想领会比我快……”

陶铸讲的是真心话，尽管他与陈伯达有芥蒂。无论是派工作组问题还是炮打司令部，看来都是陈伯达站对了。

毛泽东理解地点点头，将大手由里向外轻轻一扬：“已经定了，不变了。伯达那里我找他谈谈。”

陶铸抬起眼帘望着主席，眼睛突然一红，潮湿了。

他动了感情，他是个喜欢动感情的人。

毛泽东却微微皱了一下眉。毛泽东也是一个喜欢动感情的人，但是在严肃的政治问题上，他不喜欢掺人私人感情。也就是说，毛泽东不喜欢在政治上带有人情味。

这样讲也许不准确，不全面。不过，胡耀邦1988年2月在小范围里有个讲话，其中一段话似乎也有这种意思。

胡耀邦这段话的意思是，与林彪、陈伯达、康生相比，毛泽东对陶铸只是不很喜欢，有个“很”。原因是“但是还有一股人情味”。至于林、陈、康，那就谈不上“很”，只是一个不喜欢。

胡耀邦讲话还是有一定权威的。这倒不光是因为他在粉碎“四人帮”后，出任中组部部长，掌握情况全面、细致、准确，而且与他的阅历有关。

在延安，陶铸任军委秘书长兼政治宣传部长时，胡耀邦任组织部长，住在一起，很谈得来，是感情融洽的朋友。胡耀邦很聪明，每次开会，陶铸等人不会记录，只能记几个大字。胡耀邦不然，笔下哗哗，不丢不落全记下来。每次会后，大家都令秘书去抄胡耀邦的记录带回去。有的时候领袖讲话不让记录或活动中有即兴讲话，胡耀邦回来也能追记，他记性好。

胡耀邦相对年轻，大家喜欢跟他开玩笑，叫他少先队员。50年代他经常穿西眼，因为他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常要率代表团出国。但他和李富春是党内领导干部中有名的一对漏嘴巴，常把饭菜汤水洒在衣服上，结一些饭嘎巴，陶铸便认真拎起胡耀邦的胸襟问：“你搭了块什么布？”胡耀邦纳闷：“没有呀？”陶铸一本正经地打量：“噢，是衣服。我以为是剃头师傅肩上搭的那块刮刀的剃布呢。”

由此也不难看出陶铸与胡耀邦关系之亲密随便。彼此了解当然也深。

写这些，无非是想说明，胡耀邦那段话还是属于知情人讲出的话，而非意念性的推断。

胡耀邦对于陶铸还说过：“他敢于负责任。看起来粗、严厉，但样样都有成果。管那么细还能管出名堂来。”

这些话对于认识陶铸以及“文化革命”中陶铸的命运发展何以如此，还是有帮助的。

陶铸从毛泽东那里告辞出来，感觉得到了理解和支持。他便坚定了信心：按照自己对运动的理解继续走下去……

很不理解

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开始进入高潮。

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晚上，陶铸随周恩来一道去看望林彪。

盛夏天气炎热，林彪为避暑，迁入那座40多米高、体量巨大的人民大会堂，住在浙江厅。

当陶铸在前驱车的引导下风驰电掣地驶上长安街时，听着车轮轻快的沙沙声，那位老首长苍白瘦削的面孔便时时闪现在眼前。

那是一张永远不动声色的面孔。无论是在闽西赣南还是在延安，不论是在东北，还是在北京，在广州，陶铸看到的总是那张石头一般不动声色的面孔。

他的两服深不可测时，一般都是没完没了地踱步；他的目光犀利或阴酷时，总是咬定牙齿横下一条心。他出名地“不打无把握之仗”，也出名地“敢于冒险”。

他一生伴了“神鬼莫测”的定语。

打仗神鬼莫测，“政治”神鬼莫测；面孔神鬼莫测，心灵神鬼莫测。他九大是“神”，十大已经变成“鬼”，并就此盖棺。

不过，在1966年这个炙人的夏天，当陶铸来到人民大会堂看望林彪时，

实事求是讲还是带了尊敬的感情。那时能看出林彪最终是鬼的人还寥寥无几。人们更容易看到的只是他从黄埔军校生到连长、营长、团长、师长……直到国防部长和“副统帅”的履历。

对于陶铸来讲，还可以亲自感受到林彪那近乎清教徒一般的生活：喝白开水，嚼黄豆，甚至茶也不用一点。大概是眷恋远逝的戎马生涯？除了散步，他的运动便是乘车出去颠簸。为了这个颠簸，林彪到广州时，接待人员还为他弄辆摩托车，固定在室内，只把排气管通到室外，让他每天骑上去颠一番。

对于林彪的这些怪癖，陶铸和许多人一样，那时都是“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的。

西大厅的灯光骤然高了。

人民大会堂的厅都是名副其实；作为“大跃进”时期的成果，北京的十大建筑无疑具有“百年大计”的思考和价值。西大厅长近50米，宽20米有余；长度两端由两扇高大的屏风挡在门口，一个屏风绘的是孔雀开屏，另一个屏风上是放大的毛泽东手迹《满江红》词。顶棚很高，使人走入便生出开阔感；与外面世界的闷热相比，这里的空气凉幽幽沁心润脾。头上高悬了几盏大吊灯，只开了一盏；吊灯上的小灯泡组成一团漂亮的灯火图案。地下满铺地毯，走在上面悄无声息；转圈摆着几十个大小沙发，人迹寥寥，更生空旷寂寥之感。

陶铸随着周恩来经西大厅，在内勤人员的引领下，走入浙江厅。林彪已经迎出门来握手问候。

据一些卫士说，林彪即使见毛泽东，如果不是闲聊，脸上也很少有笑；正襟危坐，目不旁视，一副严肃的公事公办的样子。

现在见了周恩来和陶铸，他却满脸绽出带皱褶的笑。那笑既有热情，又含有几丝尴尬。他在党内的排名已经上升到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位，而他曾经长期是周恩来作出决策后的许多执行者中的一名。

主要是周恩来与林彪交谈，陶铸多数时间是注意听，努力想从中领悟一些什么。

因为陶铸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始终是“抽象起来清楚，具体起来糊涂”；“听起来满世界都像有那么回事，搞起来没一样是那么回事”。

李富春的秘书贺光辉曾回忆说：那时，“文化大革命”一下子起来，真是天下大乱。陶铸和先念时不时就到富春这里来，几个人琢磨毛主席的话是什么意思？琢磨来琢磨去琢磨不透。主席究竟要干什么？具体怎么搞，达到什么结果？谁也猜不透。他们保持有延安时代的深刻烙印，无法也不可能理解那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

按照当时的说法，林彪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陶铸寄了很大的希望，从林彪这里得到一些“真经”。

但他听了半天不得要领。林彪只讲原则话，不对任何具体问题作具体回答或表态。

陶铸望着他的这位老首长，心里第一次浮出一种不安的神秘感。这个足有羽毛球场大的方形的浙江厅，地毯浅绿，沙发浅绿，四周的帷幕也是浅绿；只开几盏小灯，暗淡的光线也变得绿荧荧，以至于林彪那张本来苍白的脸，如今也成了浅绿色。

看见绿色可以使人清凉舒适，但淹没在绿色里就会生出窒息。什么事情都怕走极端，可是林彪的怪癖，就连室内的颜色也要走极端。

“林总”，陶铸终于忍不住插入问话，他仍然保持了过去习惯的称呼，“现在社会上很乱，群众一下子起来了，成立了各种组织，很活跃。可我们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怎么起作用？大家心里没底。”

林彪望住陶铸，仍然一副不动声色的面孔。当然，林彪心里是一直将这位“第四号人物”划归自己一边。他考查干部极重历史渊源。他的“以人划线”现在已经是天下皆知；但是他的以人划线决不只是看你跟不跟他走，有人想跟他走他还不要哩。因为信不过。他首先选择那些“经过历史考验”的人，曾被历史证明“跟他走过”的人。

陶铸在东北“跟他走过”。

当年，东北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日子里，林彪讲过）“今天我们在东北还没有根据地，还没有家……如果我们没有家，没有房子，就好比流浪者，漂来漂去的二流子，遇到狂风暴雨就会无家可归，无房子可住，就会被狂风吹掉，被暴雨淋死，遇到严寒冬天就会冻死饿死……死无葬身之地。”

先后任辽宁省委书记、辽西省委书记、辽吉省委书记、辽北省委书记的陶铸，无疑为建立根据地，为建立这个“家”，作出了重要贡献，立下功劳。以后调任“四野”政治部副主任，从东北到京津直到过长江……

谁也不难看出陶铸是在跟党走。

只有林彪认为陶铸是在“跟他走”。

“跟他走”便是“他的人”。林彪对于陶铸进中央，对于陶铸跃为“第四号人物”都是可以接受的。

越是“他的人”，他回答问题越深奥，“绝大多数党委以及领导干部，对于这场伟大斗争很不理解，很不得力。”

陶铸懵了。他问的是党组织怎么起作用？林彪的回答使他更不知道该怎么起作用了。

“我同全国各省市部委负责同志一样，对于这场运动，的的确确很不理解……”陶铸用目光盼望林彪帮他理解。

“不理解就必然不得力。”林彪回答干脆。

陶铸嘴张开又合上，不知再问什么好了。他的思想够跳跃，也够能联想；见了松树能想到人的品格，见到海边的石头能想到革命者的立场。可是林彪的话他就愣是跳跃，愣是联想，仍然跳跃不出这方形的浙江厅，联想不出这满目的浅绿色。

“可是，”陶铸搓搓泛青的腮，这是他为难时的习惯动作，“许多具体事情必须我们去处理。比如学生静坐……”

“抓关键环节。”林彪吝啬地吐出五个有用的字，五个可以叫陶铸想一想的字，但绝不吐什么“比如”之类的具体。

陶铸不再言声，似乎在琢磨这“五字真言”，其实已经想通：再问也是徒劳。

告辞时，林彪确信谈话可以到此结束，才对他的老部下“具体”两句。

“关键环节，”林彪一手撑膝，一手朝站立起来的陶铸脚下指，像是指出一条路，“《十六条》里讲得很明确：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搞折中主义。”

很具体又根本不沾具体。

陶铸也只能很具体又根本不沾具体地真诚表示：“我坚决执行《十六条》，按照主席的意图去搞好文化大革命。”

但到具体中，就不像林彪口吐“五字真言”那么简单轻松了。

中南海西楼，陶铸的办公室里，人来人往，电话铃声此起彼伏。4名工作人员忙得团团转，喧闹声像进了股票交易所。

陶铸将全部精力和热情都投入到运动中去了。他是协助总理工作，总理多忙他多忙。所不同的是，总理忙了10年，他在忙乱7个月后便嘎然而止，那就是后话了。

中央文革小组那些人也忙，所不同的是，文革小组的人到处放火，放起火后就由总理和陶铸去“救火”；放火的主动，救火的被动；放火的点燃之后看热闹，救火的却要付出十倍辛劳去做具体工作；工作见了效果，放火的又煽燃，救火的只能再付十倍百倍的辛劳……秘书们这样回忆：陶铸有一种病，叫“工作癖”。工作越多他越兴奋、越精神，一旦失去工作准病。一天不工作会发烧，两天下工作会难食难寝。过去他总觉得工作不够他干的，唯独“文化革命”起来那半年多，他真是过足了工作“痛”，像一张拉到最大限度的满弓固定住，他不得不叹息：“唉，干不完哪。于不完……”特别是“8·18”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之后，他每天就不只是拼命工作了。拼命工作之后还得挣扎着再工作……

“8·18”之后，那真是天下大乱，机关、院校、厂矿、农村……只要有人群的地方都分裂成两派、三派，甚至七八派。各部委各省市党委都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几天不得睡一觉。

下决心爬上床去睡觉，刚爬上床又得爬下来。电话追来了，都是十万火急。李井泉、宋任穷、刘澜涛、陈郁……都来电话告急：红卫兵静坐绝食啦、冲砸档案馆啦、勒令交人啦……

陶铸的独生女儿曾讲过几件事，或许有助于从侧面了解陶铸在那段动乱中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红卫兵杀向社会，破“四旧”，父亲就更忙了，心情也更糟糕。

父亲常说：教我怎样作人的，不光是马列主义，更多的还有民族文化。对于中国的文化遗产，他历来珍惜爱护；他视察工作时，每到一地都要求当地政府关心保护名胜古迹。

1962年底，父亲一路调查研究并检查工作，从广东到湖南，又到了广西。在柳州市工作之余，他问市领导：“哎，柳宗元是曾经贬在你们这里吧？”

市委书记点头：“是呀。”

“有名胜古迹没有呀？”父亲马上问。

市委领导互相望了望，其中一位犹豫道：“可能有个小庙。”

“在哪里？”

市委领导谁也没答上来。

“你们不行啊，”父亲脸色变得难看，“没文化，没水平！”

后来打听到，就在市里。父亲去看了，其中有个很小的破房子，里面有块碑，碑上长满青苔。父亲皱起眉头批评：“这么重要的人物，这么重要的碑，长满青苔，无人知晓忘了祖宗啊！”批评之后，专门拨款重修了柳侯祠。

1965年3月，父亲再次去湖南检查工作时，到了郴州。郴州有块“三绝碑”，是一天然的悬崖石壁。北宋词人秦观被削职到郴州后，作了《踏莎行·郴州旅舍》一词，苏轼写了跋，大书法家米芾把秦观的词和苏轼的跋书写下来，世称“三绝”。后人将“三绝”翻刻在崖壁上，那壁便成了“三绝碑”。

父亲专门去看了“三绝碑”，“览秦少游词，感其遭遇之不幸，因益知生于社会主义时之有幸，乃反其意而作一阕……”

《踏莎行》

翠滴田畴，绿漫溪渡，桃源今在寻常处。英雄便是活神仙，高歌唱出花千树。

桥跃飞虹，渠漂束素，山川新意无重数。郴江北上莫辞劳，风光载得京华去。

父亲对文化古迹珍惜倍至，可是红卫兵破“四旧”，冲击寺院、古迹，捣毁神像、文物，焚烧书画、戏装，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通令宗教职业者还俗，进而发展到抓人、揪斗、抄家、游街，直至打死人。这场“大火”一时哪里灭得了？父亲心痛得声音发颤：“娃娃们乳臭未干，讲也是对牛弹琴，真是造孽无穷呀！”

讲不通也得讲，劝不赢还得劝，父亲经常是几天几夜不得一睡。

我每天盼望的就是父亲能回家睡两三个小时。可是，他不回来我还“眼不见心静”；他回来了，电话文件也跟着追来，反而让我更为他焦虑担忧。

那天凌晨三四点钟，我突然被父亲的吼声惊醒。侧耳细听，屋子也跟着嗡嗡回响：

“不许砸，一定制止！……”

我赤着脚立在黑暗中静静地听。父亲显然是在打电话，那边声音听不到，这边父亲的声音却一阵一阵地震响：

“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家！毛主席也讲过，谁敢怀疑？”

“……”

“谁否定？红卫兵狗屁不懂！”“……”

“我再再说一遍，他们不懂历史也不懂革命！”

“……”

“你们要做工作，只要你还是共产党员，就要挺身而出，去给他们做工作！”

父亲摔下电话，接着是急促的踱步声，接着是咕噜咕噜的喝水声。唉，父亲这下子又睡不成了！

我双手抱着肩膀窸窣作抖。当年在东北，我还是幼儿，仗打得那么凶，飞机、大炮、坦克、机关枪；大军如潮，军旗猎猎，战马嘶鸣，我都看见过，心却始终安宁踏实的。现在呢？没有枪炮声，心却总是悬在黑暗中起伏战栗，把持不住。

后来才得知，红卫兵造反造到了孙中山纪念堂。那里有孙中山写的“天下为公”，红卫兵说是资产阶级的，要砸烂。南京告急，父亲发了脾气。下令一定要制止，决不允许损害孙中山纪念堂的一草一木。

一天夜里，父亲难得回来了，弄了一点饭吃。可是没吃两口就干呕，无法下咽。

“爸爸，你太缺觉了。困到极点就会有这种反应。”我是学医的，向父亲建议，“好好睡一觉就会好的。”

“嗯，我懂。”父亲放下筷子，喝两口汤。他起身踱几步，想了想，没有进卧室，却又要出去。

“爸，都半夜了，还干啥去？”

“造反派抓了十几个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同志，就蹲在中南海墙根下。这么晚了，天又这么凉，他们……”

父亲哽住了，推门进入夜色中。

9月下旬的一天，我忽然发现父亲一个人孤零零地面壁而立。我的心忽悠一沉：又是谁死了？

父亲有这个习惯。柯庆施去世他是这样，罗荣桓、刘亚楼等同志去世他也曾这样……

我清楚地记得，有天傍晚放学回家，家里出奇的静。我以为父亲不在。因为父亲只要在，就无时无刻不伴着各种生动的音响。

我径直去推他的门，一个黑影蓦地跳入眼帘，吓我一跳。定睛细看，正是我的父亲。暮色苍茫中，他面壁而立，静悄悄一动不动。

我蹑手蹑脚走过去，怯怯地问：“怎么了？爸爸。”

父亲不回头，喉咙至塞地说：“我很难过。”

我已经站到他侧面，于是看清沾在他睫毛上的晶莹闪烁的泪珠。我惴惴不安地又问：“为什么？爸爸。”

“我听到一个消息。”泪珠顺着父亲的脸颊淌下来。他长长叹息一声：“唉，刘亚楼病得很重，已经不行了……”

我的感情脆弱。父亲一哭，我也不由自主地陪着哭起来。

现在，父亲又是这种姿式地面壁而立，像一尊雕像；灯光下，那“雕像”隐去了一切细腻琐碎的纹路，只剩几条明确简练的大线条。他又在为谁哭泣呢？

这一次我没敢问，默默地站在一边跟着他伤心。

“万晓塘死了。”父亲低哑地喃一声，显然知道我立在他身后。

我知道万晓塘是天津市委书记，与父亲并没有特殊深厚的友情。显然，父亲是从万晓塘之死，联想到许许多多正在受迫害的老战友、老干部。

后来，父亲去打了电话。批准新华社播发死亡公告。

为万晓塘之死，天津市召开了50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

然而，毛泽东主席听到情况汇报后，严肃指出：“这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毛主席决心排除一切干扰，达到“文化革命”的目标。巨人在为一个理想和目标奋斗时，无疑必须具备这种精神和气魄。

但是，我的父亲毕竟是在做大量具体工作。他一心想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想法却又常常不符合毛主席本人的心意……

又是一个难忘的晚上，父亲背了双手，低着头在室内踱来踱去。可以看出，什么事情在他心里酝酿着，却又费掂量，拿不定主意要不要端出来？

非常时期，我不能不关心：“爸爸，又出什么事了？”

“不关你事！”父亲双眉紧锁，鼻孔里沉闷地哼一声，下了决心的样子，抓起电话拨号。

他叫通了一位有关负责人，表情有些不自然，勉强带着笑，好像对方就站在面前：“周扬同志过两天要从天津回来，住中宣部不安全，希望办公厅能帮助找个地方……”

屋子里很静，可以听到电话里传来的对方的声音：“怎么，你想把周扬保护起来？”对方是质问的口气。

父亲绷紧一下嘴唇，我真担心他的烈性子发作。但他很快又克制住，换上坦然，解释说：“周扬同志患癌症，在天津开刀才不久。这次回来接受群众批判，但身体还应该照顾。请你设法给他找一个比较安静的住处。王明住过的房子，现在不是空着吗？”

片刻，那边才冷冷一声：“好吧，跟他们商量一下吧！”

父亲放话筒，两次才放正。他没有马上走开，就那么望着电话机出神，胸脯起伏，那里翻腾着什么？……陶铸对于这场运动确实很不理解，很不得力。

可是他还累得不轻，精神压力更重。

他终于感到，除了几位秘书及工作人员，他还缺少了点什么。他缺少一个可以倾吐胸中块垒的对象，缺少一个可以让他解除浑身甲冑，彻底放松放松身心的对象。

这个对象就是人们常说的“内助”。

妻子不在身边，家就不成家。

于是，他拿起电话叫通广州。他很快便听到了妻子曾志的声音，几乎是迫不及待地问：

“病好些了吗？既然是休养，那就到北京来休养吧……当然是越快越好！”

夫妻之间

飞机缓缓上升，钻入茫茫烟云之中。想到3个小时之后就要见到陶铸，曾志心里有些激动。30多年的夫妻生活，多少如烟往事难以忘却……

曾志随毛泽东下井冈，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后来便留在闽西搞地下工作和建立地方武装。

她长得很漂亮，但国民党报纸把她宣传得很丑，以致出了不少笑话。

福建军委书记王海萍去闽西检查工作，曾志拉着贺子珍一道去看王海萍。自我介绍后，那位军委书记“噢喏”一声，端着饭碗呆呆地望着曾志，惊讶得半天合不拢嘴，惹得贺子珍哈哈大笑。直到这时军委书记王海萍才如梦初醒，顿时羞红着脸，尴尬地喃喃，“对，对不起，你确实太漂亮了。”

这种场面在陶铸和曾志之间重新发生了一次。

那天，曾志从闽西游击区来到厦门，去找省委书记罗明。她穿了一件素净可体的旗袍。她还不满20岁，青春将她身上蕴藏的美充分表现出来；那是由匀称和自然的线条勾勒出来，又被垂肩的秀发和脸上红白相润的色彩所增光的“天生丽质”的美。她走路又轻快又活泼，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路人朝她多看几眼也只会猜她是大学生，或是银行里的小姐，没有谁会想到她是山林里跑出来的共产党的领导人。

曾志来到罗明住处，发现这位受人尊敬的省委书记正在同人争吵。

争吵的对方是一位陌生的年轻人，个头不高，很精壮；四方脸带棱带角，肤色微黑，腮帮子刮得泛青；眼锋咄咄逼人，上面还横着一道粗黑的浓眉。他穿一件咖啡色的广东衫，比常见的中式对襟衫要考究一些，下面是西裤皮鞋，这人算不得英俊魁梧，谈不上潇洒文雅，却另有一股逼人的英豪之气，那是由粗旷豪迈、精明强干又血气充溢而显示出的“非等闲之辈”。

他吵得实在“凶巴马”，野味十足。罗明看到曾志像看到救星，忙不迭

岔开话题摆脱：“哎，你来得正好，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陶铸，军委秘书。”

曾志心里咯噔一下。竟是他？早闻大名，福建军委的“灵魂人物”。

“她就是曾志同志……”

陶铸正吵得厉害，只是随便扭头瞟一眼，谁想到这一眼竟如被人施了定身法，怔怔地不动了，那一刻他大概忘了吵架也忘了是什么场合。

“你就是那个闽西女将啊？”陶铸突兀地叫出声，“你怎么，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樣？”

“你就是黄埔军校出来的那个陶铸呀？”曾志反唇相讥：“你跟我想象的也不一样么。”

陶铸脸红了，为自己的失态而尴尬。从井冈山来到闽西的女将曾志，谁个不晓得？国民党报纸上也常有宣传。陶铸心里自来有个定式——操刀舞枪的女人必丑无疑。顾大嫂、孙二娘一类《水浒》中的角色，不是母大虫便是母夜叉。为此，曾志的前夫蔡协民在牺牲前，来到过厦门。陶铸曾经大大咧咧问：“喂，老蔡，你老婆长得什么样？”蔡协民眨巴眼：“怎么了？”陶铸认真问：“是不是像个母夜叉，很凶的？”蔡协民哈哈大笑，说：“以后有机会见，你别吃一惊。”

现在果然见面了，陶铸也果然吃一惊。

“你真漂亮。”陶铸搓搓手，真心地感叹：“你这么苗条，还白白的，真不像是山林里打游击的……”

陶铸和曾志就这么认识，见了第一面。

曾志曾说，“第一面我对陶铸印象不好。太傲慢、太粗鲁。”

问题不在印象好坏，而在留没留印象。陶铸性格鲜明，无疑给曾志留下深刻印象，这正是他们结合的起点。

陶铸办的几件事，使曾志对他的印象由“坏”转好，终于发展成爱情。

一次，陶铸去张贴标语，被国民党兵发现。那个大兵嚎叫着要抓陶铸，陶铸不但不逃，反而迎着国民党兵笑嘻嘻走过去。事出意外，大兵愣住了。而陶铸脸上已显出一股肃杀之气：“喊呀，喊呀，怎么不喊了？”他将标语卷成纸筒在衣襟上顶出一个鼓包，“你再喊，老子给你一枪！”

“别，别，别开枪……”大兵摇着两手后退：“我，我走，我走……”他蓦地回转身，拔腿就逃。

陶铸望着逃兵背影，吹着口哨继续贴他的标语。

国民党武装军警逮捕了40多位革命者，包括共产党厦门市委书记在内。陶铸听说敌人要杀害这批“政治犯”，便组织了11人的破狱特务队。这些人没打过仗，陶铸在短时间内教会他们用枪，又制定了详细而严密的行动计划，便带领他们前去破狱。

这位南昌起义中的连长，作战有一套。一个突然袭击，不但救出了所有同志，而且亲手击毙了警备队长，自己的特务队还无一伤亡。

这次破狱战斗前后不到10分钟。敌人大批军警赶到时，空空的监狱只剩十几具警备队员的尸体。而陶铸一个人居然敢混在看热闹的老百姓中，欣赏自己的杰作。尤其大胆的是，他居然边看热闹边跟国民党政府一名职员拉起老乡关系来。

更令曾志动心的是，豪迈剽悍的陶铸，也有十分温柔细致的一面。

王海萍要去闽西苏区检查工作，但妻子小梁正闹腹膜炎，躺在行军床上

发高烧，无法行动。王海萍放不下心，陶铸说：“交给我，你放心去吧。”

30多年后，曾志对她的女儿陶斯亮讲述了自己的感情：“那段时间我常去看小梁。小梁没钱住院治疗，一个多月的时间，全是陶铸一个人在那里照料。每天喂水喂药，熬粥买面包，甚至端屎端尿。他才23岁，就那么耐心，那么细致。当他用汤匙搅动稀粥，吹着热气，一匙一匙喂小梁，又帮她轻轻擦去头上的汗水时，我的心动了，悄悄定了主意……”

1932年，陶铸与曾志结婚了。

婚后不到一年，陶铸奉命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不久便被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曾志在闽东一带，同叶飞、范式人一道领导游击战争。

陶铸与曾志一别5年，直到抗日战争爆发，陶铸被周恩来、叶剑英点名营救出狱，夫妻才在武汉重逢。

空中小姐送来了饮料，曾志点头表示谢意。她没有喝，朝窗外望去，可以看见下面乳白色和铅灰色的云团，变幻着各种奇异美妙的形态。

飞机在近万米的高空，飞行得很平稳。

是啊，只有在延安时度过了5年相对安定的生活。女儿亮亮便是这5年安定生活的结晶。曾志心里继续想着。

可那5年的安定生活，心也不能安定……

当陶斯亮还在小床上呀呀唔唔的时候，曾志又怀上了孕。她与陶铸有一段对话：

“我又有了……怎么办呀？”

“瓜熟蒂落，你有经验了。”

“不要工作了？”

“工作是你的生命。”

“我需要的是独立工作。”

“什么意思？”

“我最讨厌别人叫‘首长夫人’，我讨厌只当夫人。”

“明白了。”

“肯定还要扛不少大仗。”

“我们无权选择安定。”

“那么……这孩子不要了？”

片刻，陶铸干哑地进出两个字：“同意。”

曾志做了人工流产。

不久，她患阑尾炎，要求切除阑尾的同时做绝育手术。

“不行。”医生劝说，“将来你会后悔的。”

曾志说：“我已经属于党，我个人不会有什么后悔。”“那就得征求组织意见……”医院请组织批准，并说：“曾志说她属于党，那就请组织决定吧。”

组织上的态度也有趣：“生命属于党是对的，生活上得属于自己，属于陶铸。”

既然曾志有了态度，组织上只需再征求陶铸的意见。

陶铸用白纸黑字作出回答：“尊重曾志同志意志，同意。”

于是，曾志做了输卵管结扎术。她是有远见的，不久便与陶铸一道投入了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东北战场。

曾志将东北战场那3年多的夫妻生活，形容为“聚短离长”。

从曾志 30 年后的回忆中，不难明白什么叫“聚短离长”以及战乱中他们夫妻生活的情趣：

1946 年 7 月，我参加省委召开的群众工作汇报会。路上吃了有虫子的冷水泡饭，得了痢疾，便脓便血，痛苦不堪。唯一自慰的是，能见到陶铸，可以得到他的关心和照顾。

天亮赶到省委机关，正好陶铸在门口迎住了我。他瘦得厉害，脸色发灰，吭吭咳着说，“你先歇歇，我正忙呢。”

我忍着腹中的绞痛看他匆匆离去，一个人冷冷清清，弄盆水洗脸，我千里迢迢赶来相会，却满腹话没处说，只能对着盆里的水顾影自怜。他深夜才回来，仍是踱着步思考，伏在桌上批阅文件。我忍不住诉说得了痢疾，他吭吭咳着，吐着，喘上一口气也只说了声：“我注意些。”便继续他的工作。

他对我的关心就只有不亲不热的一句话啊！我委屈得眼里含了泪。想起年轻时我患虹膜炎眼病，他对我那么关心照料，又请医生又做饭，贴着耳朵说温柔的安慰话……我心里酸酸的想冲他喊句什么，忽然发现他吐的痰是红色的……他是在吐血！我慌了。他坐监狱时得过肺结核，显然犯病了。我情急地忘了自己的病，冲他喊的是：“哎呀，你吐血了！怎么不去治疗？”

他吭吭咳着摆了摆手中的笔，目光不离文件地说：“顾不上。”

我再也提不起痢疾的事了，我觉得什么话也没有了……会议一结束，我便匆匆赶回地委，赶回自己的战斗岗位。

落雪的时候，我去西满分局开会。途经省委所在地白城子，在邓华司令员那里又见到了陶铸。他们正在吃饭，邓华高兴地喊：“快来吃饭，你来得正巧，你如果迟来一步，你们俩就碰不上面了。陶政委吃完饭就去你们地委那边检查工作。那好吧，你来了，今天不走了，明天再出发。”

我听了真不知是高兴还是难过。我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地赶路，就为了和他多聚两天。可他马上就要走。

回到他的住地，我汇报了地委和军分区的工作，他也只谈工作，没有夫妻之间的温存话，还吭吭地咳。我还是想说点别的。他一贯吃食堂，可现在厨房里放了几斤半肉，一篮子鸡蛋。我问：“你为啥单独起伙了？是不是又病了？”他吭吭咳，点点头：“老是吐血，天冷吐得更厉害，总感到疲劳：组织上照顾我，让增加点营养，又送来这些东西，刚吃两顿。”我说：“多休息几天吧，会议还早，我能再住几天。”他吐一口血痰，喘着摇摇头：“通过五地委和你们一地委撤出来，都要赶紧去整顿一下，顾不得那么多了。”

第二天早晨，他将别人送他的一件狐裘皮统子转送给秘书长萧桂昌同志，又叫警卫员将牛肉鸡蛋之类送还公家，这才与我握手告别。

我立在马蹄荡起的烟尘后面，心里一阵冷一阵酸。他明知我只穿一件夹衣，冻得飒飒作抖，却将狐裘送给了别人；他明知我还须在这里住几天，却将牛肉鸡蛋全交回公家。可是又一转念，他是怕我穿了狐裘，吃了照顾病人的营养品，在群众中造成不好印象啊！

难道这不是一种关心吗？我泪眼朦胧地望着他纵马奔驰的背影，久久没动一步……

1947 年 6 月，陶铸来我们地委检查工作，我们又见面了。他咳嗽吐血一直不好，骨瘦如柴，连说话都没了力气。听他作指示，同志们都要贴近他坐才行。

夜里，我照顾他上床。没等我关心他的身体，他却笑着开口了：“曾志，我们的亮亮来了。她没死，老杨同志把她带来了！不容易啊，过封锁线，过敌占区，整整走了一年！”他掏出女儿的照片给我看：“夏天了，她还穿一身破棉衣，像小要饭的……”

我看不清，我眼里都是泪。我说：“咱们的亮亮傻乎乎的……”他马上为女儿辩护：“一点也不傻呀！亮亮连着给我讲一个多小时呢，走了一年，她记住那么多的事，可她才几岁呀……”

我和陶铸谈了大半夜，都是谈女儿。女儿无疑是联系我们之间感情的最牢固的纽带。

参加省委扩大会议，我在洮南又见到一次陶铸。他患了急性关节炎，全身关节，包括手脚上的所有关节，都肿得又红又透亮；不能弯腰，不能下蹲，向下伸不直，坐下立不起来，走路躬着腰，上厕所只能坐在条凳上，痛得连觉也不能睡。一位日本医生和一位日本护士为他打针敷药，用10个灯泡制成的电热罩烘烤关节；肿胀的关节上烤得滴滴水珠渗出来。还用硫磺水泡澡按摩。

别的治疗我帮不上忙，硫磺水泡澡按摩就包在我身上了。我替他脱去衣服，扶他下池子里躺下，然后我蹲在浴池里用硫磺水摩擦他全身。一天两次，每次一小时。他静静地躺在那里不声不响，可我知道他看着我呢，我的心能感觉到他颤动的波光闪耀的目光。

终于，他微微地笑了，用一种直接从胸腔里发出的低音说：“曾志，你太好了。你对我这样好，我永远也不想同你离婚……”

我半开玩笑地问：“我对你怎么好了？”

他认真说：“你从不对我提要求，影响我工作。而且还帮我尽快恢复正常工作……”

唉，他想的还是工作呀！

一个星期后，陶铸就一跛一拐地出发了……

1947年12月，“四野”的冬季攻势开始。那年特别冷，零下37度；大雪纷扬，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几十万主力部队经我们五地委所辖各县开赴前线，沿途有几十万群众为他们扫雪开路。我听说陶铸就在这支洪流中，赶去看。看了几天几夜，只有过不完的兵，过不完的车，过不完的炮！大军呼出的热气化成了滚动的雾霭；马蹄声声动地，千万副金镫磕响；士兵的洪流奔涌东去，刺刀划出几十里银辉！

我没有看见陶铸，但我从那山摇地动的进行曲中，听到了历史隆隆的脚步声，听到了他的呼喊：一道前进吧，我们将相会在红旗下……

耳边又响起空中小姐清脆明快的声音，北京已经快到了。

曾志将飘到面前的一络黑发轻轻抹到耳后，像是要抹去那萦绕脑际的回忆。

但是，越接近北京，越是心绪起伏，那回忆怎么能抹去？

是啊，经过了聚短离长的战场生活，接下来便是那不断浓化工作，淡化生活的漫长的日月……

在广州，陶铸与他的妻子、女儿终于稳定地团聚在一起。然而，准确地说，应该是团而难聚。他们住在一座城市，却没有生活在一栋住宅里。

一次吃饭，陶铸和曾志进行了认真对话：

“在你心目中什么是第一位？”曾志问。

“工作。”陶铸回答干脆。

曾志略作停顿，倔强地点点头：“一样，我也是工作。而且我说过，是独立的工作。”

陶铸说得很平静：“在工作上，政治上，我尊重你的选择。我不干涉你。”

曾志也说得很平静：“我不和你一起工作，可以避免别人的闲言碎语，凭自己的能力独当一面，理直气壮地干，心里自在。”

陶铸望着曾志：“我理解，我不责怪你。”

曾志心里有些酸。话就这样谈下去吗？这确是自己的本意和愿望吗？但是，她的个性是决不会后退的。她想了想，低下头，喃喃：“我最讨厌别人只把我当一个‘夫人’看待，我这一辈子决不会当‘夫人’过日子。”

陶铸蠕动嘴唇，似乎在品味。他勉强笑了笑，很有分量他说：“我最讨厌别人说怕老婆，听老婆的话。我这辈子决不会怕老婆！”

曾志怔了怔，明白事情已经是这样，别无选择。她不无伤感地叹口气：“唉，我们个性都很强……”

她默默坐了会儿，立起身，全凭理智克服感情地说：“看来我们谁也不会退步。就这样吧，我们都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我会常来看你们的。”

于是，曾志走了。

陶铸是省委书记，带着女儿住在广州军区大院里。

曾志是市委书记，住在市委机关附近。

他们都选择了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只有星期六晚上，曾志才会到军区大院与丈夫女儿相聚。

陶铸对来客们说：“这个家，是个和尚庙，孤家寡人一样。”虽然是玩笑话，其中不无伤感。曾志却顶上一句：“在业余活动方面，我看他比和尚还要和尚。有些和尚还喜欢下棋和运动呢。”

稍一交锋，双方都自觉停下来，都明白继续顶下去会有什么结果。事后，陶铸曾大动感情地对女儿叹气：“唉，我那时候光看见你妈妈漂亮了，没想到她个性这么强。”

其实，陶铸是很爱妻子的，爱得深，也爱得笨。

陶铸从苏联回来，很认真地对女儿说：“亮亮，我在莫斯科看见一件小大衣，真漂亮，正合适你穿……”

“真的？”陶斯亮高兴得跳起来。因为父亲出门从来不曾往家买过东西。“在哪儿呢？”

陶斯亮去翻父亲的皮箱。陶铸立刻尴尬了，拦住女儿说：“别翻了。我想了想，没给你买，不能养成你那个毛病，物质欲。我买了个锄草机，叫省里研究研究，看我们能不能制造出来。”

陶铸教育完女儿，却给了妻子“物质利益”。那是一双狗皮靴。他动感情地说：“曾志，结婚20多年了，你就跟我张过一次口，我一直记着，这次才兑现。喏，你要的狗皮靴。”

曾志愣住了：“我什么时候跟你要狗皮靴了？”

陶铸皱起眉头：“哎，你忘了？在齐齐哈尔，富春同志和蔡畅同志都在场的么……”

“你气死人不是？”曾志哭笑不得，“那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那是齐齐哈尔的冬天，零下40度！这是在哪儿？广州有穿狗皮靴的吗？”

陶铸愣怔一番，好像想通什么重要哲理一般，轻拍额头：“嗯，好像没

看见……”

陶铸并不怕挫折。他下次出门，又替妻子从上海买回一件塑料雨衣，两件衬衣。雨衣是草绿色带圆点的黄点，衬衣一件是水绿色抽纱的，一件是玫瑰红丝衬衣。

曾志又是那副哭笑不得的样子，喊着：“你到底是给我买的还是给亮亮买的？”

“你不是找别扭吗？”陶铸也皱眉头：“亮亮能穿吗？”

陶斯亮早已穿上了那件漂亮的雨衣，可惜一大截拖在地上，真像洋娃娃扣进了水桶里。

“我能穿吗？”曾志一边将那衬衣贴在胸前照镜子，一边问：“你看我能穿吗？”

陶铸大声说：“你不穿上试试怎么知道不行？我说了你的尺寸？”

“我说的是颜色！”曾志扭回头来，“我多大岁数了？18还是20？太艳了！”

“真是的，尺寸完了还有颜色……”陶铸大概也看出太艳了，小声嘟哝着溜走了。

“爱得笨”，自然留下印象深，关键时刻便会发生作用，特别是夫妻矛盾闹大的时候。

有一次，曾志在中央党校学习，陶铸到北京开会，把女儿也带去了，放在王鹤寿家里。

王鹤寿是陶斯亮的干爹。说来也有趣，在延安，陶斯亮还不懂事时，只要哭得止不住，她的父母便赶紧去请王鹤寿。大概王鹤寿长得太善良，性情太温和吧，只要他的面孔在小亮亮眼前一出现，她就会停止哭；王鹤寿再那么一笑，亮亮也会跟着笑起来。这也叫一份缘分吧，王鹤寿理所当然地作了陶斯亮的干爹。

那天，陶斯亮在干爹家里正睡得香，忽然被一种声音惊醒了。仔细听听，像母亲的声音，如诉如泣。她就不安地叫了一声：“妈！”

片刻，母亲来到床前，捧了一杯热茶水，让蒸气熏鼻子，大概是鼻子堵塞吧？眼睛红红的，泪痕未干，张口就说：“亮亮，妈妈要和你爸爸离婚！”

陶斯亮吓了一跳，自卫似地扑楞一下跳起身，在一点朦胧的知识驱赶下，大声问：“是不是我爸又有别的女人了？”

曾志摇摇头：“那倒不是，你爸不是那种人。他老压制我，多少年来大男子主义，压制我，我也有我的事业，可他处处压制……”

陶斯亮立刻松下了一口气，提醒母亲：“可爸还给你买狗皮靴和花衬衣呢，爸可从没给我买！”

曾志扑哧一声，不知是哭还是笑，反正两眼泪汪汪，火气熄掉不少。

王鹤寿进来了，拉曾志出去，一边劝道：“这些事也要跟亮亮说，她还是小孩子。你呀，走走走，老陶马上要来呢。”

工夫不大，陶铸来了，赔了不少好话，王鹤寿也在一旁敲鼓敲锣地帮腔。

“反正我是你的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曾志似怨似嗔地嘟哝着，被陶铸带走了。

矛盾闹到一定尖锐的程度，那就不是一般人能劝解的了，甚至毛泽东都出了面。

那是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广州市推举曾志为人大代表。名

单报到省里，陶铸不同意，将曾志的名字勾了，换上了苏蕙。

曾志很生气，找陶铸评理：“你为啥不同意我当代表？”

“要照顾方方同志么。”陶铸说出他的考虑，“方方受了批评，人大代表还是叫他爱人苏蕙当合适，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

据广州市一些老人讲，当时反地方主义，方方是受了不应有的伤害。

曾志不满地指出：“你照顾方方，说到底是拿别人政治上的待遇去照顾你个人的政治关系。我是独立的，不许你这样做！”

“我就这样决定了！”陶铸很火。

“我告诉毛主席去！”

“你告！我怕你告？”

曾志再不多说一句，回头就走。她还真向毛泽东告了一状。告状信的大致意思是：我不是争当人大代表，我是由大家推举，组织上最后确定的代表。可是被陶铸一个人给否定了。他要照顾方方同志受了批评，叫他爱人当代表，这不是从工作表现考虑，也不是按标准衡量，这是从维护私人关系考虑，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表现。我反对这种错误作法。

报告被毛泽东身边负责机要工作的人打回到广州市委。市委开会讨论后，决定仍由曾志任全国人大代表。

类似的事情以后仍然不断，曾志终于当面向毛泽东告状了。

“唉，善人受人欺，良马任人骑哪。”毛泽东用同情的目光望着曾志：“这个陶铸，长了犄角，连你也欺侮起来了。”

“生活上的事好说，工作上没法忍受，我要是谈点工作上的意见，他一概不听，正确的也不听。同样的意见，我请区梦觉、林李明、赵紫阳这些人去说，他就听，就满口说好。他只把我看成老婆，不是一个负责干部。大男子主义，封建主义的一套……”

“这个陶铸！”毛泽东沉下脸，“你告诉他，曾志是我党一名高级领导干部，讲了正确意见他就要听，不听是要犯错误的，就说我讲的！”

之后，他又笑着对曾志深表同情地重复道：“还是那句话哟，善人受人欺，良马任人骑……”

从毛泽东那里回来，曾志已是心平气和。世上的“告状”并非都要打官司，许多时候只是为了找地方发泄发泄，发泄完了，便如打赢了一般，也就可以过段顺心日子……

曾志走下飞机，眨动着一双大眼张望。她估计会是张秘书来接。

突然，她怔住了，朝她大步迎来的竟是丈夫陶铸！这可是结婚30多年来破天荒第一次！

刹那间，一种从未有过的异样感觉袭上心来。那感觉中除了激动、热烈，还隐含了一丝莫名的不安。

人的预感有时是灵验的，这个小小的插曲，不久就被事实证明是揭开了她与陶铸从此患难与共的序幕……

汽车朝着北京城里疾驶。

9月的北京，炎威已过，暑气渐消，正是明媚而又舒适的季节。

然而，这年不同。成群结队的红卫兵拥在大街上，高音喇叭的吼声随处可闻，仿佛使那气温也比往年高出许多。

陶铸和曾志并排坐在车里，默默注视着车窗外的情景。满眼是红旗和语录牌，满眼是涌动的“造反”的人流，满眼是大字块、大标语、大字报，没

有一块墙壁是干净的。

“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不断从眼前掠过，他们的后面总是跟着“讲话”、“支持”、“号召”。他们是煽风点火者。

更多的名字是颠来倒去地写着，并且用红笔划了“×”。这些名字对于陶铸和曾志来说都是熟悉亲切的，能唤起美好的回忆，带来友爱亲情。现在，那些姓名却使他们痛彻心髓。因为不论哪个姓名出现，其后必然有批斗、游街、戴高帽子、作喷气式和各种毒打……

他们是受难者。

“我已经搬出钓鱼台，”陶铸望着窗外小声说，“现在住在中南海杨尚昆同志的房子里。”

曾志继续望着窗外，不在意地嗯一声，多少年后她才明白，陶铸在车上讲的唯一的一句话，它的分量有多重，含意有多深。

车开进中南海，拐进一条两边是高耸红墙的窄巷里，在一座中式的大门旁停下。陶铸引领妻子迈进了新家。

这所住宅不算宽敞，但很精巧。主房只有三间，中间大的一间被隔成两半，一半做客厅兼餐厅，另一半是书房，两侧各一间卧室。室内陈设简单，但很实用。由于没有把广州的家当全部搬来，只带了些随身行李用品，因此这个家缺少生活气息，倒像是部队临时来队家属的居所。

房门前是一个小小的院子，栽着两棵海棠和几株桃花。再往前走几步，是一座架在荷花池上的游廊，因为迂曲回旋成“”字，因此得名“”字廊；

荷花池很大，长满了荷花和睡莲。荷叶遮得满池绿油油、碧森森；挺拔的荷秆上顶着盛开的花朵、肥硕的莲蓬；满院洋溢着淡淡的清香。

“我就是为了这池荷花，才选中这个地方。”陶铸立在曲廊中讲。

“我喜欢这里清静。”曾志并肩一字地立在丈夫身旁。

“哦，我在西楼食堂吃饭。”陶铸瞥一眼妻子，忽然想起什么似地说：“一天两元钱标准，太贵了。你来了很好，我们可以自己开伙。”

“只是因为食堂伙食贵才叫我来吗？”曾志自顾观赏荷花，抿着嘴唇笑。

“嗨，我这个人，”陶铸也笑了，不自在地耸耸肩，“你了解，只要有辣椒吃就高兴。”

“你是勇气不足还是革命性不够？”曾志认真地望着陶铸。

陶铸神色转严肃，甚至微微蹙起眉头。片刻，小声叹息：“唉，不像你想象那么简单……很快你就会明白。”

“你在延安那些学友、牌友，你都想过怎么办吗？”

在延安，陈云、李富春、陶铸、王鹤寿、王德等同志在一起组织了个哲学小组，认真学了两年。至于牌友，那是王稼祥同志病中寂寞时，每逢节假日，工作之余，胡耀邦、罗瑞卿、陶铸，王鹤寿、张经武、边章五等同志常到王稼祥那里去，打几圈牌，为王稼祥同志的窑洞增添不少热闹。

“耀邦聪明，很会算牌。主席当时形容他是一个‘幼稚味还未完全脱掉的同志’。他手里总留一张王牌，出牌跟工作一样认真。”陶铸回忆着，“罗瑞卿是咬着牙算牌，咬着牙出牌，他受那个伤是子弹从左颊打进去的，一辈子只能‘咬牙切齿’。主席说过，‘天塌下来不要紧，有罗长子顶着’。可现在……唉。鹤寿那么文质彬彬一个人，输赢不放心上，对谁都是那么热情

关心，他给陈云当政治秘书，我给稼祥当政治秘书……还有乔木同志，他是给主席当政治秘书……”

陶铸说出的这许多老战友，现在名字都是颠倒写在墙上，并且打了红叉。

“你还是辣椒没吃够。”曾志弦外有音。

“那要你给增加些了？”陶铸望着曾志。

“那好了，我给够你辣椒！”曾志脸上涌起片刻青春的红晕，使人可以想象到井冈山时期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共产党游击队领导人。

“就这么说定了。”陶铸显得异常严肃，声音压得很低：“这种事急不得，那些被抓的同志，第一步先得跟造反派办交涉，弄出人來，放军营里或招待所，这就是保住了；然后看形势，时机成熟就进一步解放、任用……”

陶铸后来确是这样去做的，可惜仅仅是个愿望而未曾实现。当他自己被打倒后，凡受过他不同程度保护的同志，都变本加厉地受到迫害。他在身陷囹圄时听说一些战友备受迫害，曾潜然泪下道：“虽我不曾杀伯仁，伯仁却为我而死啊！”比如陆定一被打倒后，陶铸曾指示：生活待遇不变，搬家后一定要安排沙发。当陶铸也被打倒后，陆定一专案组来了十几个人，进屋便施暴力，并要他低头弯腰向毛主席请罪。原因就是主持陆定一的专案，几个月都搞不出名堂来，而谢富治一接手，马上有了重大突破，说明陶铸是在“包庇”陆定一。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就这样，一贯坚持独立工作的曾志，第一次留在丈夫身边，甘心只作他的“内助”。

这是曾志对整个形势及陶铸肩上的担子进行了清醒的分析判断后，作出的一次重大选择。

陶铸无疑是一位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他那善良质朴率直的性格中，从来没有脱去天真。生活中童心未泯，政治中也常有天真。

陶斯亮曾回忆道：

他有时真像个孩子，一次，他蹑手蹑脚地朝我走来，神秘地招手：“亮亮，快来，你快来看。”

他的声音像孩子怀了什么秘密，要叫小伙伴同享。我也蹑手蹑脚随他身后，走到秘书的房间门口。他朝里指，贴着我耳朵讲话，压抑不住那种活泼开心：“快看，嘻嘻，他睡觉还张着嘴，还睁着眼呢！”我看到秘书仰在躺椅上睡着了，果然是睁着眼张着嘴。于是，我和父亲捂着嘴，无声地笑成一团，不得不赶紧跑开，以免惊醒疲倦的秘书。跑到父亲的办公室，我们才放开手尽情笑了一番。于是，父亲恢复了精神，重新埋头书案开始工作。

还有一次，父亲和几个孩子玩“打仗”，就在地上爬来爬去地替孩子们捡“子弹”并且不断地表演被子弹击中，“痛苦悲壮”地“倒下”。孩子们高兴地哈哈大笑，他“死而复活”，也跟着开心大笑……

就是这样一个陶铸，他要做一名“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他保这个保那个，保得最坚决的是“中国最大的走资派”。

第一个向江青开炮

当6月1日陶铸奉调进京时，曾先去湖南为韶山引水渠剪彩。就在剪彩仪式上，他曾深情地讲话：“湖南是毛主席、刘主席，两位主席的家乡。”

那时他不明白，“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指向了刘少奇、邓小平；八届十一中全会实际上是把刘、邓“拉下马”了，陶铸却仍然不相信，也不这样看。

陶铸对妻子说：“他们只是犯了错误。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邓小平也还是政治局常委么。过去王明曾经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红区几乎损失90%，白区几乎损失100%，可是在延安七大毛主席还说服大家选他当中央委员。与王明错误相比，少奇、小平即便是有错误，也不会有那么严重，还是团结、批评、团结。”

何止陶铸这样想，绝大多数中国人在1966年的下半年都是这么想。就是说，陶铸的想法在中国有深厚广大的社会基础、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甚至在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后，那些首当其冲地起来“造反”的红卫兵们也并没都联想到刘、邓身上。从“8·18”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到10月1日国庆节的盛大游行，那些热血沸腾的红卫兵不是还在有节奏地高呼吗？

“刘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刘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

那个时期的人们，一定还记得那大潮般的场面和声音。

尽管林彪已经跃居第二位，但红卫兵要见毛主席时，首先想到的还是刘主席。这就是历史的分量。

没有刘少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人民的解放史、中国革命的历史甚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都将出现巨大的空白。这个空白是任何其他人其他办法所无法填补的。

这也是历史的严酷无情。它是不以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国庆节，毛泽东第四次检阅了百万红卫兵大军及革命师生，工农兵代表。盛会之后，新华社有关负责同志都到陶铸这里请示：“今年国庆的新闻照片如何见报？”

依照惯例，新华社每年国庆之后都要发一组新闻照片。过去中央有规定：其中必须有毛主席和刘主席两人在一起的一张。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形势明显有变，这次怎么办？

陶铸略作沉吟，拍板决定：“按过去的规定办！”

见报是件大事。陶铸对准备见报的一组照片进行慎重审查，并马上发现了问题：

“怎么没有小平同志的镜头？”陶铸问。

新华社的同志互相望望，犹豫道：“没有合适的。”

“怎么回事？”陶铸立即指示：“一定要有小平同志的照片。”

自从大搞“三面红旗”之后，毛泽东便多次抱怨“邓小平耳朵聋”，可是一开会就“躲”他很远。看来，这位倔犟的总书记，即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被“拉下马”后，仍然是这样。新华社的同志报告：“我们选过了，没有拍照上。”

这可真棘手了。陶铸深明现在这种“非常时期”报纸的重要性。多数大轰大嗡大吵大闹的造反派对这场运动本来就具有很大盲目性，何况当时还存在一些政治投机者，任何一次大的政治活动，哪些人见报了哪些人没见报就成了他们十二分关注的事情，他们就是从这里嗅查“问题”，从而决定其行

动的。

“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吗？”陶铸问。

新华社的同志说：“可以做技术性处理。”

陶铸再一次拍板定案：“可以这么办。”

于是，毛主席和刘主席在一起的照片见报了。

于是，新华社的同志将一帧照片上的陈毅隐去，将小平同志的照片移补过来，也见报了。

这样做决不是要损害陈毅同志。因为陈毅同志还有其他照片可以上。

这就是后来哄动一时，被江青大肆渲染的所谓“换头术”事件。

按照我们党的传统，主席夫人是不能与主席并列检阅的。按着名次的排列，江青的位置在比较边远的地方。这也是陶铸的决定：“按照规定办。”

那时有句叫得很响亮的话：枪杆子，笔杆子，革命靠这两杆子。

陶铸在“笔杆子”问题上所作这一番决定，毫不奇怪地得到了“反作用”。

国庆节后，他的眼神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回到家里坐下歇息的时候，总是用手指无意识地在沙发上划来划去；或者背着手，低着头在室内很不安地踱来踱去；眼神沉郁，面色灰黯。这种心事重重的神态引起曾志的关注。

“出了什么事了？”曾志小声问。

陶铸不吭声，只是一个劲踱步。

“到底出什么事了嘛？”曾志忍不住提高一些声音。

“没什么！”陶铸只扔下这么一句。

曾志被噎得憋住一口气半天吐不出。她对丈夫最大的意见就在这里，哪怕把她当作一名普通的同志呢，也该交流一下思想，何况这一次是丈夫主动希望她留下来作“内助”呢。

不过，曾志很快就想通了，丈夫这种态度不能只看作“大男子主义”，其实这正是组织纪律性强的表现。对于自己所主管的工作，决不对外人乱说，哪怕是对自己的妻子。

曾志开始留意观察周围的事物，很快便发现，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已被派到陶铸这里来协助工作，而陈伯达的老婆也被分配到陶铸所主管的工作部门中来。

毫无疑问，陶铸已经成为不可信任的人。他与中央文革已陷入很深的危机中。

终于，陶铸也有憋不住的一天。他在急促的踱步中，从齿缝间漏出四个字：“这个婆娘！……”

只有四个字，却足以使曾志惊心动魄。只有曾志明白这四个字的分量和意义。因为在广州，陶铸便经常把江青称为“婆娘”，而且声音很大。只要江青不在场，他从不忌讳其他人听了会怎么样。

他已经和江青对立起来，江青可不是当年去广州“养病”的婆娘了，她已经被标上了“旗手”……

陶铸走进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一眼就看见了他最不愿意看见的江青。

不见是不可能的，这是中央文革碰头会，他是文革小组的顾问。

陶铸的眉毛本能地抽缩了一下，他的弱点就是不善于掩饰感情，缺少城府。大概他也有自知之明，忙转身关门，避开江青的目光，顺势右拐入座。

可是，江青颐指气使的尖声已经追过来：“你们看报纸了吗？这些照片发得是很有讲究的，我找了半天也认不出哪个是我。”

江青发难了，她被排得“边远”了。

陶铸坐下时，已然竭力克制了情绪。他平静地望住周恩来，建议：“江青在党政机关没有正式职务，不如让她担任文化部副部长，联系工作或是参加活动也有个名义。”

“你们碰到鬼了！”江青叫起来，那声音带着穿透力直冲陶铸耳膜。他忍住没有回头，但可以想象到江青盛怒的面孔。他听到江青拍了沙发扶手：“我怎么能作这种事情！”

厅里有那么片刻如哑了一般静。

陶铸的建议无疑是在提醒江青自重，也是对国庆照片的人员排列作出回答，表明这里存在着原则性。而江青的尖叫无疑表明陶铸简直是在污辱她。她自认为主席夫人、文革小组副组长，凭这两条就该列入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了。

碰头会进门就来势不妙，那结果便可想而知。刚宣布会议开始，江青便首先发难了。

“陶铸，”江青直呼其名，矜持得连二郎腿都不曾放下来，以此提醒陶铸明白明白她是处于什么地位，那完全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质问口气：“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吴传启为革命左派？”

陶铸是烈性子，听到直呼其名的声音尖厉，口气凶恶，说话蛮横无礼，差点跳起来。只因为及时接到一个信号才忍住了。那信号就是周恩来的目光。可是陶铸还是以眼还眼地望住了江青。他的眼睛闪烁一下，迅即又变得漆黑，腮上突起了肉棱，微微作抖的身体预示着一触即发。

那一刻，整个河北厅都凝固了。挑战者和应战者剑拔弩张地对峙着。

江青很赏识两个人：教育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卢正义和学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吴传启，一再催促陶铸去教育部和学部，封他们两人为“革命左派”。

陶铸掌握了很多确凿的事实和材料，证明这两个人都是有重大历史问题的心怀叵测的人。为此，他再三向江青说明事实情况，表示不能封他们为“革命左派”。可是江青哪里肯听？只顾坚持催逼。

后来，在卢正义问题上陶铸作了些让步。他去教育部讲了一次话，对卢正义的大字报表示支持，但是对卢正义的历史问题，仍然表示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并且没有按江青意图封卢正义当什么“左派”。

至于吴传启，陶铸始终坚持一步不让。

在周恩来的目光暗示下，陶铸松开紧咬的牙齿，低头喝了两口茶水，算是主动缓和了气氛，然后掀起眼帘，换上较温和的目光重新望着江青，竭力用一种平和的语气说：

“吴传启的的确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经看过……”

“我看过了！”江青自我感觉赢了一个回合，口气更硬。

陶铸皱起眉头问：“既然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

陶铸的态度已经有所退让。与过去相处比较，他对江青这样讲话已是很礼貌很客气。但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感觉，从来不是靠语言，而是靠无所在直觉。直觉可以从眼睛的一瞥，肌肉的一颤体会到那微妙的所在。何况，陶铸在炮打刘邓还是保刘邓的问题上，在派工作组和“文化革命”的搞法上，都与中央文革、与江青的观点大相径庭。江青不识大局，不识大体，只凭个人好恶走极端。小肚鸡肠又鼠目寸光；肚里容不得人，眼里放不下事。比如对陶铸，感情好时，看他是男性十足的男人，说什么都好接受。感情不好了，

便看他是恶意十足的恶人，一无是处，一句话也听不进去。

“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江青完全是用教训和命令的口气讲话。

“不问动机目的，不问政治历史背景？”陶铸几乎想质问：是不是蒋介石在台湾写了第一张大字报的话，你江青也要支持也要封他为革命左派？但在这种会议上，陶铸不会这样说。他只是摇摇头：“我不能不问动机，不看历史。”

“至于历史问题么，那有什么了不起！”江青嘴唇开咧成喇叭形，鼻子两侧出现挖苦的纹络：“你不也是国民党吗？”

现在说个国民党似乎问题不太大，对外开放了。那时不得了，“文化大革命”就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你站哪一边？

陶铸猛地瞪起眼，红红的，像打开了火山口。他本来嗓门大，这时的吼声更加火山喷发一般隆隆震耳：

“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还想怎么着！你先读读历史去！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员？他的国民党员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员混为一谈吗？”

陶铸吼罢，山摇地动地啐了口痰。

“文化革命”期间，政治局会议，文革碰头会以及中央处理各省市自治区问题的接见会，都发生过不少争吵，甚至是惊心动魄的“大吵大闹”。比如后来发生的所谓“二月逆流”；比如处理青海、云南等省的问题。但是跟江青真刀真枪面对面地大吼大叫，许多工作人员都说，陶铸是第一个。

他没朝刘邓开头炮，却朝江青开了头炮。

江青最初被吼懵了；脸色煞白，两颊的肌肤都松松地垂下去，嘴唇开咧着微微颤抖。她当上“第一夫人”后，哪里遇到过敢如此“放肆”吼她的共产党干部？转瞬间，她的嘴唇绷紧，一股血冲上头来，脸孔甚至头发根都涨得紫红。她眼里冒出火，那是狭隘刻毒女人常会冒出的怨愤之火；她嘴角两侧朝下气势汹汹地延伸出两道深纹，你若听听现在工作人员的形容立刻可以想到后来江青受审时的一幅照片，就是那照片上的形象。但她那时不是依在被告席的铁栏上，而是坐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的沙发里，并且奋力拍打一下沙发扶手，锐利地叫喊道：

“你给我去，到学部去，去支持吴传启，你非去不可！”

“我就不去！”江青的手还没从沙发扶手上缩回，陶铸的大巴掌已经紧追其后拍在了茶几上，并且跳起身。他一辈子英雄主义，也从没遇过敢这样喝斥命令他的人。于是脑袋像穿甲弹，硬梆梆地挺出去：“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

他感觉有人拉他，但盛怒之下哪里肯退让？怒目圆睁地继续吼：“这是共产党的组织，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陶铸被拉着坐下，那边的江青却痴痴地睁着眼，不知所措；上下牙床拉开距离，半晌合不拢。

突然，她哭了。

不少文章都写过江青哭，一写就是“大哭大叫”，其实简单化了。

她的哭很复杂。最初是从积满怨毒之气的胸腔里迸出一股短促的气流，像是憋不住而冲突出来，马上被哽住。这短促突兀的怨气直冲鼻腔，多数从鼻孔里冲出，极少数从嘴里溢出，将嘴唇激得“啵”一声抖；只这一声，眼里便溅出泪来，没有泪水充溢眼圈再决堤而出的过程；泪水是被怨毒之气驱赶着从泪腺直接溅出眼眶，落在眼睑下两滴，像掉落下的两颗雨点。

然后，眼圈才开始循着规律充血变红，大量的泪水才滔滔不绝地涌出。可也没有马上吼叫，而是先掏手绢。

康生无动于衷地坐着，甚至眼睛也眯起来，目光从眼缝里闪出，轮替在江青和陶铸身上稍触即离，频触频离。张春桥也坐着不动，冷冷盯紧陶铸，目光阴森，一边用手轻触江青的手臂。陈伯达和姚文元早已跳将起来，本能地靠近江青，保驾一般。一边指着陶铸吼叫，一边对江青俯耳劝说。

只是到了这时，江青才开始口头出声，喊出声，并且像某些色厉内在的孩童一样，越劝越起劲，越劝越声大，成为真正的大哭大叫：

“我这一辈子还没受过这么大气！你陶铸想干什么？想压迫我？你给我说明白！……啊，你欺侮我，你镇压我，你算什么东西？你到底想干什么？……”

事情闹到这步田地，周恩来明智地宣布散会。陶铸起身就走，身后还响着江青的哭叫。

唉，躲了今天躲不过明天。陶铸脸色阴沉地登上汽车。据警卫曾云同志回忆：

从文革碰头会出来，他心情沉重，眼里潮湿，上车时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让她这么个搞法，以后怎么得了？当时我知道江青他们中央文革那帮人闹得凶，打倒干部太多。每次碰头会都是在河北厅，他们在里面吵，我们一大帮警卫在厅外等候，聊天，我们不谈政治，这条大家心里都有数，只谈地方特色和生活。那天陶铸是第一个出来，走得很快，一路无语，只到上车才自言自语地说了那么一句……”

第二天，陶铸又接到通知，参加文革碰头会。汽车驶向人民大会堂时，陶铸仰靠坐椅，以手加额：刚吵过，今天还怎么碰头啊……

“保刘邓，我是对的”

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地方，也是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政治活动场所。黄绿相间的琉璃屋檐，正门顶上镶嵌着国徽，迎面12根25米高的浅灰色大理石门柱，使任何从它旁边走过的人都不不得生出庄严和肃穆之感。何况，背后就是用1.7万多块花岗石和汉白玉砌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大须弥座束腰部嵌有从虎门销烟到百万雄师过大江为主题的八块巨石浮雕。这时，你迈步向前，心里怎能不激荡起那雄浑的旋律：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人民的期望……

陶铸每次就是以这样的情感走进人民大会堂。

然而，当他临近大会堂内的河北厅，想到中央文革小组里那些永远不想见到的嘴脸，想到碰头会上避不开也不能避的争吵，再听见从门缝飞出的江青那颐指气使的尖声，他的脚步伴随着心跳一道越来越沉重。

他在门口停下步，深呼两口气，算是平静一下心，也算是作好憋气准备，然后推开门。

就是这么背兴，第一眼看到的又是江青。他心里响一声：这个婆娘。

江青可不像陶铸，笑得一脸灿然，好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好像不愉快早已忘掉，以致于陶铸生出疑惑：莫非反倒是自己气量太小，心胸狭窄了？他不大自然地也朝江青笑笑，并点头。

就在这刹那，江青尖细的声音响起来：

“喂，陶铸，你现在很精神么？”

陶铸站在那里一时不明白所以然。但他的心已经开始抽缩，江青的声音有些来势不妙，她的眼睛在陶铸身上膘来膘去，对着王力、戚本禹们努嘴巴，叫你浑身不自在。

“我说，你又不是解放军，你有什么资格穿军装？”江青像演员一样作出讥笑的表情：“啊，你穿的哪门子军装？”

陶铸沉下脸，阴沉沉道：“我怎么不是？我是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为什么没资格穿？”他的目光在沙发上坐着的文革小组成员身上锐利地一扫：“你们也穿军装，你们又是什么解放军？”

姚文元红了脸，尖刻地说：“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的，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才有资格穿军装。”

陶铸鼻子里哼一声，立刻回敬道：“我参加南昌起义，跟毛主席干革命的时候，你还不知在哪里当‘人之初，呢！”

这话回答得太精彩，姚文元一时语塞，他后悔自己怎么忘记了陶铸也是能武更能文。

“平谷县的‘大民主试点’调查报告，我已经批过，‘此材料很好’。你为什么扣压下来？”江青开始质问。

“《十六条》明文规定农村和城市中的企业不搞四大，不进行串联。违背《十六条》的东西怎么可以拿出去抗议？”

“革命就是要不断打破各种条条框框！”

“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十六条》是在总理主持下搞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性文件，你们想不要政策？”陶铸严肃地说出心里话：“如果生产被破坏了，再搞成粮库里粒米不存，文化革命还怎么搞？”

“压制群众，不让群众革命的是你，大搞经济主义的也是你！”江青激烈地嚷道：“你的目的就是一个，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

陶铸明白江青所指内容，正色道：“你们动员中学教员和各地文艺戏剧人员来京上访告状，中央三令五申通知他们不要来，可你们说是革命行动，他们还是大批大批地来，一来就向我要吃要住要生活费。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我管不管？不管是压制群众，管了你们又反过来指责我搞经济主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无论什么人，无论过去有多大的功绩，如果坚持错误路线，他们同党同人民的矛盾性质就会起变化！”陈伯达撇开具体问题，用似乎威胁的语气警告：“非对抗性矛盾可以变成对抗性矛盾，那时他们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陶铸冷冷投去一瞥，从鼻孔里哼一声：“还有毛主席健在呢！”

陶铸明白，这些人说到底还是让他站在中央文革一边，站过去就什么麻烦事情都没了。但他恰恰无法站过去。信念这个东西是无法勉强的。一般人勉强不得，高压之下也只能是口服心不服。像陶铸这样奋斗大半生的人，就连“口服”也是难勉强的。

陶铸也有一份自信。他每隔三四天，总要陪周恩来总理一道去向毛泽东作一次情况汇报。他并不知道毛泽东听取汇报还有中央文革另一条线，他只相信自己讲的话毛泽东都听进去了，他认为自己是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和保护，并不将中央文革那帮人放在眼里。

当然，他也不能和那帮人彻底闹翻，任何稍懂政治的人都不难意识到这一点。那帮人总是冷嘲热讽，找碴子，出难题，给他穿小鞋，陶铸不得不使用最大的忍耐力，日子过得窝心、憋气、艰难。

10月18日，他跟随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大军，接见时照例要和绝大多数人保持一致，穿上军装。接见之后，某一天又去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为减少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他特意脱下军装，换上便服。

可是，当他着便服走入河北厅时，遇到的又是难以忍受的场面。

中央文革那帮人故意上下打量陶铸，而且是斜着眼。交头接耳，而且那目光在你身上稍触即离，频触频离还伴以吃吃窃笑。叫你莫测深浅，叫你感觉孤立，叫你背后是人议论的中心，叫你浑身爬了虱子一样地难受。

这是精神折磨的恶劣手段。

这是那种心态阴险的小人所常喜欢玩弄的低俗下流的把戏。

可是这一套把戏现在搬入了人民大会堂，搬上了严肃的政治舞台，并且毫不犹豫地用到了陶铸身上。

“哎呀，陶铸怎么不当解放军了？”

“喂，陶铸，你什么时候又成老百姓了？”

评头品足的奚落便这样开始了。这就是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的开场白。这一点恐怕那些响当当的“造反派”也是没想到的。

一年后，陶铸向他的妻子曾志倾诉：“唉，谁个会相信我陶铸能受到如此的凌辱！那时我不得不顾全大局，若是过去，说什么也容不得他们如此猖狂！”

陶铸说的“过去”，当然是“文化革命”以前。那时若遭到这种情况，以他的烈性子，为维护尊严是不惜动拳头的。

现在，陶铸不但要忍受，而且还得听质问：“你为什么镇压中组部群众的革命行动？”

“林彪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经明确点了刘、邓的名，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你为什么压制群众，不许他们喊口号，不许他们贴刘、邓的大字报？”

……

1966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是为了排除“文化大革命”的“阻力”。会议已经开了十多天，至今尚未结束。

毛泽东在会议讲话中指出，运动来得猛，有抵触，是可以理解的。他主张“乱它几个月”，“大字报要上街”，“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

林彪也讲了话，指名刘少奇和邓小平推行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

陈伯达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的报告，矛头也是直指刘少奇、邓小平。他在报告中甩出一顶“怕字派”的帽子，明白不过地要那些心存疑虑的人“丢掉怕字”，朝刘、邓攻击。

会议情况被中央文革有意透露出去，知道内情的中央组织部300多名群

众便要求去中南海向毛泽东、党中央送交决心书，表示彻底揭发批斗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决心。

陶铸闻讯后，当即予以阻止，明确表态说：“组织部几百人去中南海喊打倒刘少奇，贴他的大字报，这种作法我不赞成。”

显然，这一态度已经被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们知道了。

“刘少奇同志是犯错误，不是敌人，不能喊打倒。”陶铸面对中央文革小组一群人的质问，毫不隐讳地亮出观点：“我是不赞成写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他是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错误，应该是团结——批评——团结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戚本禹激烈地说。

“学生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要问我，我是不同意的。”陶铸反而平静下来。这是因为观点已经讲明，心里便踏实了。

“中央工作会议还没有结束。”陈伯达阴沉沉地提醒。

这句话是极有分量的。会议没结束，这期间暴露的新问题自然也属待解决之列。一旦会议最终作出与陶铸观点相反的结论，那么陶铸便很可能不打自倒。

因为他事实上已经自己把自己连到了刘、邓身上。

因为林彪早在8月18日就在首次接见红卫兵的群众大会上讲过：“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就是说，谁当“保皇派”，谁就是资产阶级的，谁就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牛鬼蛇神”一样属于被打倒之列。

陶铸心情沉重地回到家里，又开始在房间里不停地踱步。

对于“文化大革命”，他与周恩来有同感，认识也相近。周恩来在会议上的讲话，用了“方兴未艾，欲罢不能”来概括形势，并且百感交集地说：“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大的局面”，“这么一想就不寒而栗”。

在当时条件的束缚下，在“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现象和过程的本质尚未充分暴露的情况下，陶铸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与周恩来也相近，与大多数人也相近，是怀着真诚的愿望，努力从好的前途去理解“文化大革命”，希望通过这场运动能够真正克服和消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确实存在的某些弊端及阴暗面，以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所以，陶铸在会上发言，也明确表态，“搞阶级斗争我是坚决的，搞文化大革命我也是坚决的。”

但是，陶铸坚持认为在无产阶级已经执政的条件下，这样的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有组织有步骤的方式，在尽可能不影响社会正常生活秩序的前提下，沿着健康轨道发展，才能达到上述目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想法与毛泽东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想法相去甚远。

差距就是矛盾。陶铸陷于这种矛盾中，既想紧跟毛主席，又时时感到那“掉队之虞”。

在他踱来踱去的时候，他那善于大跳跃善于联想的大脑已经又在天马行空，驰骋无边。

他甚至一下子想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想到那次会议上一段未曾引人注目的小插曲……

陶铸是带了妻子曾志，女儿陶斯亮一道上的庐山。会议期间，陶铸听说冯白驹病了，在南昌住院，忙赶下庐山前去看望。

曾志和陶斯亮一道下了山。借这个机会，曾志带了女儿去看望了她的老战友，闲居南昌的贺子珍。

那是一个非常简朴的家。贺子珍穿一件褪了色的绸褂，一条南方老太太常穿的灰色短裤，脚下是双拖鞋，发现有客来便迎上去，手里还拿着一把大蒲扇。

曾志一进门便看见了贺子珍，立刻激动起来，在井冈山和赣南闽西的生活刹那间便活跃在脑际，她大声问：“子珍，你还认识我吗？”

“你不是曾志吗？”贺子珍一把拉住客人的手，“我怎么会忘了你！”

曾志眼睛湿润了，被贺子珍拉进屋坐。她向贺子珍介绍了女儿陶斯亮。

陶斯亮回忆道：“贺子珍头发已经灰白，但人还清秀，可以看出年轻时秀气的样子。老太太亲切、和蔼、慈祥，看不出有任何毛病……”

“我还记得你到西安，我是看到你的行李。”贺子珍拉着曾志的手，很动感情地说：“我等你，怎么等你你也没来，我看到了你的行李，你怎么没来？你为什么不来看我。”

曾志一时百感交集。她知道贺子珍说的是1937年，那正是贺子珍离开毛泽东，后来去了苏联的时候。曾志那时本是要经西安去延安的，行李由萧克的爱人和吴德峰的爱人带去了，但她本人经过武汉时见到了出狱不久的陶铸，便留在武汉没有继续北上。若那时她能到西安，或许可以劝劝贺子珍，毕竟她们关系不一般，过去是无话不说的呀……

“子珍，那次我是在武汉碰见了陶铸，就留下了，所以行李去了人没去。”曾志解释着，“不是我不去看你，我也不知道你在西安。”

“你们怎么到这里来了？”贺子珍问。

“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我跟老陶一起来了。今天老陶去看望一位老同志，我就借机下山来看你了。”

贺子珍听说庐山正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脸上显出肃然和忆念。片刻，她轻声问：“毛主席来了？”

曾志点头：“来了。”“他，怎么样？”

“很好，身体很好。”曾志明白贺子珍的心情，向她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一下毛泽东的身体情况。

据陶斯亮回忆：“贺子珍很正常，一再问毛主席怎么样？当她问话时，态度很恭敬，同时让人体会到确是一往情深。”

告辞出来，曾志觉得贺子珍很正常，过去的共同生活和深厚友谊搅得心里不安，一上庐山，她就去找毛泽东。

“主席，”曾志见面就说：“我下了一趟山……见到子珍了。”

“哦，”毛泽东一怔，马上问：“她怎么样？”

“她很好么，看不出神经病。”

毛泽东嘴唇翕动一下，两眼有些黯淡，显然，他想起了过去的岁月……

忽然，毛泽东胸脯起伏一下，眼睛变得湿润了，深深叹出一声：“唉，我们是10年的夫妻哟……”他眨动双眼，驱走渗出的泪，用出自胸腔的低沉的声音说：“我很想她……想见见她……”

“应该见见。”曾志说得很干脆，那一刻，她好像又回到了挺进赣南、闽西时的生活。

“这件事千万不要叫江青知道。”毛泽东吩咐，显然已经同意见面。

“放心，”曾志鼓劲说：“她不会知道。”

毛泽东想了想，伸出一根手指，小声交待：“你去找汪东兴，叫他来办。”

当时汪东兴正在江西当副省长，搞调查研究。曾志说：“我明白，主席放心吧。”

汪东兴精心安排了这次见面，请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和江西省省长方志纯的爱人朱丹华接送贺子珍，方志纯是方志敏烈士的弟弟，朱丹华是毛泽民烈士的遗孀。毛泽民牺牲后，她改嫁了方志纯。

水静和朱丹华陪同贺子珍乘一辆小轿车驶进毛泽东居住的“美庐”。

水静和朱丹华先上楼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轻声说：“你们可以走了。”

水静和朱丹华走后，卫士把贺子珍领上楼。毛泽东对卫士说：“你也走。”

毛泽东同贺子珍谈了近一小时，又由水静和朱丹华把贺子珍送回了住所。

事后，曾志又赶去见毛泽东，见面便急切地问：“谈得怎么样？”

“唉，不行。”毛泽东凄然叹息，“头脑还有毛病。”“怎么有毛病？”曾志又关心，又着急。

“她怪我对王明不对，说王明还要害我，让我小心王明。我吃药，她来抢，说是毒药，她说她就不吃药，在上海就不吃药……”

毛泽东讲不下去了，望着屋顶长长叹息，回忆着什么，眷恋着什么，伤感着什么……

曾志卧忆此事时还讲道：“贺子珍在上海就曾不吃药，不吃饭。护士只好和她一起吃。护士吃什么，她才吃什么。子珍和我一起吃饭时不怕，她说：唉，那时我住广东就好了，我住广东有你就不会得什么病了……”

这些，后来曾志都一一告诉了陶铸。

往事历历，陶铸思潮起伏。

贺子珍的事，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他这样想。

毛泽东含泪叹息：“我们是10年的夫妻哟……”这说明毛主席恋旧，而且容易动感情。少奇和小平同志可是跟他患难与共几十年的战友，即便犯了严重错误，怎么可能彻底打倒他们呢？

贺子珍的病，正是王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证明，是对王明路线的控诉。王明当年迫害打击毛泽东，以致贺子珍至今以为他还要毒害毛泽东，抢毛泽东的药，不叫他吃。这样一个王明，毛主席还要讲团结，说服大家选王明当中央委员。少奇和小平同志即便错误再严重也不能同王明相比呀！

陶铸停止了踱步。他觉得信心倍增，自言自语：“保刘、邓，我是对的。”

他将日历翻去一页，因为已经过了零点。

新的一天开始了。这天毛泽东要亲自主持中央工作会议。陶铸深信，到时候毛泽东会讲话的……

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宣布会议开始。

毛泽东一向善于以自己的情绪感染别人，影响周围的气氛。当他吸燃一支香烟，用柔和的目光向与会者一扫时，他那轻松平和的神情立刻感染了大家。紧张了十几天的陶铸，也不由得全身一阵松弛，悄悄吁口气。

直觉告诉他，他的判断没有错。

毛泽东的目光停在周恩来身上，随意地问一句：“这个会已经开了半个月了吧？”

周恩来点头：“差不多了。明天再开半天，具体问题回去按大原则解决。”

毛泽东又望着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你回去打算怎么办？”

刘澜涛说：“回去看看再说。”

毛泽东对西南局的同志抬抬下额，说：“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搞。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让红卫兵看看《阿Q正传》。”

陶铸脸上掠过一丝不为人察觉的笑意。经历了多少折磨，受了多少气，现在是非总该清楚了。

毛泽东已经转向康生，问：“聂元梓怎么样？”

康生的眼睛在厚厚的镜片后面眨动一下，蹙眉道：“还是要保。”

“关于这场运动的时间，”毛泽东夹烟的手在面前划了半个圆，是界线的意思：“大家讨论一下，有个大的安排。”

沉默片刻，周恩来说出设想：“机关到春节，大、中学校到明年暑假。”

毛泽东没有马上表态，这毕竟不是随口可定的小事。不过，毛泽东后来讲过：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句话讲在1967年7月13日，考虑应该是从1966年的10月便有了。毛泽东在随后视察大江南北时，又在武汉讲：文化大革命要在1968年春天结束，或者稍迟一点……不能再搞了。到了9月26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再次讲决心：明年春天结束文化大革命，接着开九大。而事实上，直到毛泽东逝世后，“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才告结束。实际为何一再违背毛泽东的初衷？因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因为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除了指导思想和路线的错误，还不能不看到林彪、江青们利用“文化大革命”之名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之实。那时常讲的一句话叫“树欲静而风不止”。林彪、江青一伙说“风”来自“走资派”。现在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怀疑了，“风”其实来自林彪、江青一伙人。

但是，在1966年10月24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包括毛泽东在内，恐怕还没有谁意识到这场运动最终会变成那样惨重的一场浩劫。

毛泽东仍然是一身轻松地移动着目光，望着副总理李先念，问：“你们的会，今天开得怎么样？”

李先念皱眉：“财经学院说他们要开声讨会，我要检讨，他们不让我说话。”

毛泽东吩咐：“你明天还去检讨，不然人家说你溜了。”

“我明天要出国。”

“你也告诉他们一下。”

毛泽东将目光活动着转向全体：“要准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我没料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来了这么大的事。”

10月25日，林彪讲话，指名道姓地说：“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路线的尖锐对立。”

“什么路线错误，改了就算了。”毛泽东松弛地摆一下手，语气平和，“我的责任是分一线二线，为什么分一线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我想在我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大权旁落，我是故意地大权旁落，

万没有想到走向反面。去年九十月份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我就感到我的意见在北京不能实行。”

康生插话：“八大政治报告里就有阶级斗争熄灭论。”

毛泽东紧接着纠正道：“报告我们看了，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个负责。”他吮吮下唇，又强调：“刘少奇不能一笔抹杀。”中央工作会议10月28日结束。毛泽东讲话后，虽然还有一些人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甚至言词尖厉。但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所采取的谅解态度已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陶铸回到家里，终于朝妻子痛痛快快地叫一声：“曾志同志，毛主席讲话了。对少奇和小平同志还是保护的。”

正直、豪爽又十分天真的陶铸，他哪里想到就在这同一时间，江青正在召见北大的聂元梓：“给你个光荣的任务，到上海去。你只要把上海搞乱，就立了大功……”

斗争逐步升级

进入1966年11月份，陶铸与江青一伙人的对立越来越尖锐，斗争像越南战场上的形势一样，呈“逐步升级”的态势。

陶铸独个儿坐在沙发里出神，他又接到通知，去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

在工作面前，他从来不曾这样畏难。

“我不是畏难，是为难。”陶铸向他的独生女儿解释，“江青就是利用她的特殊地位，总是打着主席的旗号，我们难辨真假。”

女儿知道，违心的事爸爸不会干。可是中南海里那些知情的叔叔阿姨是让她传过话的。

“亮亮，因为保一些干部，你爸爸跟江青、陈伯达他们顶得很厉害，听说江青对他发了好几次脾气，这样下去可要吃亏的。”

“亮亮，你该提醒爸爸，江青不好惹，能退让就退让点吧！”

……

陶铸明白亲人对他的担心忧虑。他看到妻子进来，目光显得忧思重重。于是陶铸勉强一笑，振作精神立起身。

“干脆请假算了。”

“这个婆娘，疯疯癫癫。”陶铸开始穿制服，朝妻子点点头：“确实难招惹，但她也成不了气候。她不具备办大事的任何一点素质。”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半年，因为天天打交道，陶铸已经把江青这个人看透了。

进入河北厅，陶铸绷紧的神经稍稍放松一下。江青还没到。至于王力、关锋、戚本禹甚至包括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他都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他朝自己座位走去。除了正式开会，他常感到没什么话可说。

屁股刚坐稳，厅门砰地响了一声，顿时引来所有人的目光。

江青黑旋风似地卷进来——黄军衣，黑斗篷，脚步又急又冲。进门猛地立住脚，尖利的目光一扫，立刻钉子一般戳在陶铸身上不动了。

“你想干什么？”江青喊第一声时，气血已经直冲脑顶，整个脸都膨胀得红上来：“你搞特务活动！你说清楚，现在就说！”

那一刻，陶铸已经提起一股气，硬起了头皮。他一声不响望着江青，岩

石一样冷峻，岩石一般淡漠。

于是，江青越加愤激怨毒，那眼神恨不能将陶铸一口吞下去：“你在卫生系统讲什么？你搞我的鬼，你给我说清楚。”

陶铸依然冷峻，依然淡漠，整个河北厅受了他的影响，竟如凝固了一般无声无息。

事情的起因是陶铸接到医科大学一位学生的来信。信中说：我们同学里有争论：有人提出要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我认为不对。毛主席就不能怀疑，不能打倒。

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又很难回答。

马克思讲过“怀疑一切”。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这句话无论从认识论上还是从政治斗争上都好解释。

然而现在，在无产阶级执政掌权的社会主义中国，又是处于“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这句话就不可能只是从认识论上去解释。理论指导行动，对这句话的任何解释都将带来巨大的政治后果。更何况那“怀疑一切”的后面紧跟着“打倒一切”。

陶铸慎重思虑，认清这个口号的政治目的就是将所有党的干部统统打倒。他立即给写信的学生回信说：你的意见和主张是正确的，我同意你的观点。不能怀疑一切，毛主席就不能怀疑。

接到陶铸回信，这位学生所在那派群众组织马上将信公布出去，表示得到了陶铸的支持。另一派就起来反对，说“怀疑一切”是马克思与女儿的对话，说陶铸反对“怀疑一切”就是反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的任何一句话，那个年代都叫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于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中，就不能不为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服务。

戚本禹站出来支持另一派群众组织，讲话说：“怀疑一切”是马克思主义的，必须肯定。并且明确攻击陶铸；反对“怀疑一切”是为了保护走资派，保自己。

两派群众组织关心的不是哲学认识论，而是在这场“斗争”中谁吃掉谁，谁压倒谁。

同样，上层领导人物关心的首先也是政治，是运动。一个口号的提出，将影响运动的发展方向和政治结果。

陶铸毫不退让，在卫生系统讲话时，针锋相对指出：“怀疑一切是不对的。但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究竟你是真革命假革命？还是可以怀疑。但是，毛主席、周总理、共产党、社会主义、马列主义不能怀疑。其他有些人你们可以怀疑怀疑。调查清楚了，就可以解除怀疑。搞清楚就不能再怀疑。”

陶铸讲到这里，特别补充一句：“江青可不可以怀疑呀？可以去调查，可以去了解么。”

这一句话击中了江青的要害。她让戚本禹支持“怀疑一切”，是要将群众引向所有党的老干部。陶铸“请君入瓮”：既然谁都可以怀疑，那么你江青自然也在其中。

都调查吧，查清了可以解除怀疑。老干部不怕查，江青可经受不起“内查外调”。此前，她已求助叶群，抄了郑君里等了解她30年代底细的人们的家。这次，她迫不及待找叶群、谢富治，将上海市政府和公安局所有知情者，共20余人投入监狱，紧接着又将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等一大批文艺界的知情人投入监狱……

紧张忙乱一番之后，江青现在要和陶铸算账了。其势虽然汹汹，却碰了岩石般的陶铸。

“你干涉得太多了。”陶铸终于说话了，声音冷冷地：“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文革顾问，什么事情都要向你报告吗？”

陶铸鼻孔里哼一声，这一声像捅了江青一棍子。江青朝陶铸冲前几步：

“你讲清，你怀疑谁？”江青把“谁”字拖得很长，双手抱拳，按在胸前奋力吐气，全身哆嗦。然后大喘一口，以新的气势重新又喊：“你怀疑一切就不怀疑你自己！”

那个“己”字又拖得很长很长，直到胸腹里的气全部哆嗦着用尽。

相比之下，陶铸越发不动声色，冷冷问：“为什么戚本禹讲这个话，你不管？他说了没事，我说了你就不干？”

江青略一怔，这“请君入瓮”的威力，竟使她一时语塞了。但只片刻，她已经又喊起来：“为什么不许批斗余秋里和谷牧？谁作梗？他们不能怀疑吗？”

陶铸上下晃动右手食指：“明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要安排制定，是我不让斗。”

张春桥、陈伯达和姚文元蓄力已久，几乎同时喊：“党内最大的保皇派就是你，陶铸！”

不容陶铸张口，江青突然举起拳头高呼：

“保皇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这突兀而来的举动堪称绝招，陶铸居然目瞪口呆，张春桥们也目瞪口呆，有幸见到这一场面的两名服务人员也目瞪口呆。

他们什么场面没见过？可是在高级领导人的谈话中，能跳起来振臂高呼口号还是第一次见到。这场面恐怕连脱下皮鞋敲联合国的桌子的赫鲁晓夫也只能自叹弗如。

赫鲁晓夫 50 年代看江青有误，称她为“绣花枕头”。

陶铸咂了咂嘴，醒过神来。这还成何体统，中国若是由这种水平的人来领导，还有个不亡国的。

于是，他又拍了桌子：“对我们党的干部为什么不该保！”

他起身就走，这样的会没法“碰头”。

警卫回忆：

陶铸中途破门而出，走得很快，我几乎是小跑着追上去……

这天，吃过晚饭，陶铸对妻子说：“你动作快点，要到点了。”

陶铸与曾志要去人民大会堂观看少年京剧演员的汇报演出。

曾志抓紧时间换衣服。过去一道出门，陶铸常常不耐烦：“跟你们女人出门真麻烦，哪来的那么多事！”现在丈夫心情不好，更容易不耐烦。

刚穿好衣服，电话铃响了。陶铸抓起电话，听了两句，沉吟着。是有关负责人请示：“剧团另一派群众要求观看演出，可以不可以？”

陶铸终于决定：“都是革命群众么，让他们来看。”

做这样一个决定也要费沉吟，原因仍然在于江青。江青从开始便是支一派，打一派，而陶铸始终坚持“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的观点。早在北京红卫兵成立什么司令部时，他们就闹过矛盾。江青只许支持“首都红卫兵第三司

司令部”，因为他们最“造反”。陶铸一视同仁，第二司令部成立时，邀请他就去参加了。江青曾对此大为不满。

陶铸与曾志来到人民大会堂，同许多观众一样，坐候很久，江青才姗姗来迟地走进礼堂。

她扭动颈项，亮相一般走上前时，早有人迎上来报告：“江青同志，剧团另一派也进来看了。”

江青陡地停下来，脸色很难看。她目光顺前排就座的领导人物一扫，冲陶铸看一眼，却并未理睬。她明白，演出是陶铸安排，放另一派组织的群众进来观看自然也是陶铸决定。

这次，她偏不理睬陶铸，故意冲着陈伯达大声发牢骚：“什么人搞的？放他们进来，两派打起来谁负责？”

陈伯达一时没反应过来，江青已经哼一声走过去。陈伯达的圆头圆脸红起来，冲着江青背影低低骂一声：“乌鸦！”

陶铸心里却镜子一样明，心里骂一声：“婆娘！”

陶铸的骂是出于斗争中的了解。陈伯达的骂却是出于在同一营垒中江青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以后发生的一个小插曲更能证明这一点，那是一个月后，在毛泽东召集的一次碰头会上。

会议谈到当前社会秩序有些混乱，学生没有人管，已经形成无政府主义。毛泽东同意派军队干部训练学生，实行军训，加强组织纪律性。正议到如何下发通知时，江青忽然叫了一嗓子：“我有意见！”

与会者一怔，江青立刻变成“中心”。

“你们总是不让我说话，总不让我民主。”

大家不明所以然，怔怔地无语。

“为什么不把贺龙揪出来？”江青出语激烈，不知讨论军训触动了她的哪根神经，斜刺里杀出一枪：“我有大堆的材料，非常确凿的，他是个大坏蛋！他要搞军事政变。要把贺龙端出来，你们不敢，我去触动他！我什么也不怕，他老婆也不是好人！”

会场一片沉默，是十分复杂的沉默，掩盖着某种汹涌的情绪。

毛泽东吮吮下唇，吐出一声：“此事现在不议。”

江青转向毛泽东，忸怩地说：“毛主席，不让群众起来，我要造你的反！”

语出意外，姿态更出意外，毛泽东立刻陷入难堪境地，居然一时无法作出反应。

早已气血冲顶的谭震林，忍无可忍，怒视江青呵斥：“你岂有此理！毛主席是我们全党的主席，全国人民的主席，今天是中央会议的主席！在这里，你有什么权力胡闹？”他运足一口气，虎吼一般：“你是什么东西！”

江青被噎得几乎断气。与会者也都屏住了呼吸。

“散会。”毛泽东终于作出反应，马上离席而去，这无疑是摆脱难堪的最明智的选择。

谭震林余怒未消地继续怒目看一眼江青，抓起帽子拍拍讨厌的灰，朝头上一扣，悻悻而去。

会场一阵骚动，潜藏着一种过了瘾的痛快开心的情绪，纷纷准备离去。

噤了半天的江青，鼻子和嘴终于“啵”地一声冲出气来，泪水便溅出来。这次迅速，转瞬间已变成放声大哭。

大部分人心满意足又明智谨慎地退出了会场。

陈伯达殷勤，知道若没人理睬江青，说不定几小时之后就得送医院抢救。他走到江青面前用老夫子的口气劝：“太悲要伤心的，制怒、制悲。你也太过了点。”

像公共汽车和小巷里那种闹红了眼的泼妇一样，无处发泄的江青腾地跳起来，一把抓去，嘴里放尖声音叫喊：“你是什么东西！还穿着军装！”

蹦蹦两声断线响，陈伯达的领章被江青撕扯下来。

陈伯达挨了迎头棒一般懵怔半晌，脸一下子涨红起来。他本来口吃，如今讲话更哆嗦得困难：“我，我瞧、瞧不起你！你听，听清了吗，我瞧——不起你！”

江青已然不哭，撇嘴反唇：“我也瞧不起你！”喊罢，使劲提着脚后跟走了。快到门口处，又回过头来喊：“我就是瞧不起你！”

后一声喊，那情绪已变成获得发泄后的得意和高兴。

陈伯达全身哆嗦，用声音追击远去的江青：“不是毛主席，谁，谁会把你放在眼里！乌鸦——！”

福建腔喊乌鸦像羊叫的一样别致。

不过，出于同一营垒的陈伯达还是讲出一定道理：不是毛主席，谁会把江青放在眼里。正由于这个缘故，当江青来观看人民大会堂的京剧汇报演出时，还是有一些老同志与她打招呼。那是毛泽东的面子。

曾志与蔡畅坐在一起，悄声聊着什么。江青端着肩走过来时，见了蔡畅，立刻满脸堆笑，热情打招呼：“蔡大姐，你也来了啊。”

蔡畅点点头，笑着同江青握手。

“身体好吧？”

“还可以。”

江青是隔了曾志与蔡畅打招呼。本来，江青与曾志也是熟悉的，甚至是热情的。以往，她每年冬天都到广州，曾志总要尽地主之谊。曾志刚到京时，江青还到家里来看过曾志和陶铸。但是现在，当曾志出于礼貌抬起身子准备招呼寒暄时，江青却视而不见，如同陌路人。

曾志朝陶铸瞥去一眼，心里已经全明白。

回到家，曾志同女儿谈了话。

“亮亮，你一定要退出你那一派组织的勤务站。”

陶斯亮听话地点点头，但还是不解地问：“为什么？”

曾志的神态非常严肃认真，表现出了她的清醒和远虑：“你爸爸在中央工作，弄不好会跌得粉身碎骨，你要有思想准备才好。”

江青是个睚眦必报的人。

陶铸在卫生系统讲话不久，江青登上了陶铸分管的文艺界大会的讲台。她在讲话中，一字一板地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

台下不乏有心人，特别是各“勤务站”和头头及负责动态的人物，马上得到启示：连陈伯达和康生都点到名了，唯独没有提陶铸！

这是一个信号！实际上等于宣布：陶铸已经被排斥于毛主席亲密战友之外，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人了，人们可以任意怀疑并进而打倒他！

讲话立刻通过电话，通过铅印或油印的传单形式传遍全国。

中国之大，不少人想当乱世“英雄”，挖空心思打路子，寻梯子。其中

便出了个浙江的学生，抓不着别的阶梯往上爬，如今得到启示，便专写起批判陶铸两本书的大字报。

这个学生千里迢迢赶到北京，挑选繁华的前门大街，用掉 60 张大字报纸，贴出了 20000 多字的大字报，轰动北京城。

没人关心大字报的内容，人们注意的只是大字报攻谁。这次是指名道姓攻陶铸，而且用了 60 张大字报纸。

那年月人们已经摸到规律：能打倒一个“大人物”，就可以红起来几个“小人物”。但若打错了，也免不了尝尝铁窗滋味。盲目开炮的自然有，多数还是有背景有靠山的。

一个学生用 60 张大字报纸攻陶铸，并且安然无恙，没人出来制止，只此一条便足以动摇陶铸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

大字报被人抄下来带回中南海，曾志借来看一遍。于是，这份大字报就成了饭桌上的话题。

“大字报呢？我看看。”陶铸心存疑虑。

曾志随着形势的变化，已经越来越发挥起“内助”的作用。

她不屑地一摆手：“听胡说的是傻子，看荒唐的是呆子。不傻不呆看它于什么？”

“总得知道批些什么吗？”

“批《松树的风格》，批你的《革命的坚定性》。”

曾志将一根红辣椒夹给陶铸。

陶铸夹起辣椒又放下，到底不放心：“怎么批？”曾志淡淡一笑，说：“你不是说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定要像岩石一般坚定吗？”她回忆着背诵：“当狂风暴雨之夜，风想把它们彻底掀翻，雨想把它们打进沙滩，浪涛想把它们卷入大海，但是它们屹然不动。当风雨过后，当浪涛退后，它们仍旧矗立在大海边，指向青天，面对大海……”曾志一眨眼，望着陶铸，“是不是呀？”

“怎么了？”陶铸听不出名堂。

“面对大海，就是面向台湾；指向青天，就是指向国民党的青天白日。你是写文章向往蒋介石呢！”

有人说精神病与非精神病是没有明确界线的，这话不无道理。生活中有时会出现一些奇怪的思维方式令正常人瞠目结舌，却偏有人以病态的执著在那里支持，并为另一种非病态而别有用心的人加以利用。一旦社会也有了病态，这种现象便尤其多见。

以陶铸的性情本该扑哧笑得喷饭，这次却皱起眉头笑不出口，他不无忧伤地摇摇头叹息：

“唉，造反派是不是把精神病院全砸烂了？”

这一来，他的妻子和女儿顿时粲然，笑声轰起。

陶铸夹起那根辣椒塞到嘴里大嚼，一边继续摇头：“不看了，不看了！”

曾志心细，沉吟一下，说：

“问题不在大字报的内容，而在它是指名道姓批你的两本书。我看，你还是找出两本来，我送主席去看，让主席说一句话。”

陶铸望着他的妻子，片刻，缓缓地点了一点头。

两天后，陶铸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径直走向沙发坐下休息。

他心情郁郁、若有所思。

曾志将一杯热茶放到他面前。

陶铸能够感觉妻子的目光在自己身上闪动，他不朝妻子望，淡漠的目光凝视着脚下的某一点。

“你准备什么时候下去？”妻子小声问。

陶铸仍然无语。

毛泽东下来指示，要陶铸和谭震林去中南及华东地区视察。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指示，都毫无疑问是毛主席对陶铸作出的一个保护性措施。

陶铸与中央文革的对立和矛盾不断加剧，毛泽东心里有数。陶铸的“保皇”态度，毛泽东也清楚。因为他是两条线——中央文革和国务院——的汇报都听。

毛泽东肯定是不想陶铸倒。这决不只是由于历史上的渊源（历史上渊源很深的也打倒了不少），而是他需要陶铸这样一个人。中央文革是放火的，没有那些人“文化革命”就不能如火如荼；倘若光是他们，也不行。这场火就将烧毁一切，包括毛泽东前半生所创建的全部伟业。周恩来可以控制这场火，陶铸是协助周恩来工作的，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对于广大干部也是这样，毛泽东认为不烧不行，全烧死了也不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他支持红卫兵是为了烧这些干部，但是红卫兵若想将这些老干部根本地取而代之，毛泽东绝不会答应。

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运动现在需要的是加火加温，陶铸在与中央文革的对立中自然处于不利地位。他又性烈如火，容易冲动，容易被人揪辫子，要想不倒，只好先放下去避一避，暂时离开风口浪尖。

陶铸却不这样想，他认为这场火已经成灾，他不能“见火不救”。他从来不是一个躲避矛盾的人；恰恰相反，他是越顶牛越要争个输赢。

何况，他所主管的部门都是“文化大革命”中首当其冲的受灾部门，打倒干部最多，“难民”队伍最大，遗留问题也最多。

“走得了吗？这一大摊子。”陶铸将手摊开，终于回答了妻子。他叹口气，双眉紧锁：“总理那么忙，再都甩给他？那么多干部都倒了，没头案子一堆，至少也得有个安排和交待呀。”

曾志不再言声，丈夫说得有理。

可是，谁知道明天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她忧思重重地去安排晚饭。

“你要被动被动再被动”

叶群从外边回来，便匆匆朝林彪房间里钻。

林彪在房间里踱步。大凡中国的领导人物，都有这种踱步思考的习惯。

“101，”叶群总是这样称呼林彪，“他们要动陶铸了。”

林彪停步，望一眼叶群，是毫无反应的平淡表情，什么也不说便继续踱他的步。

叶群早已习惯林彪毫无表情的面孔，即便现在房间里爆炸了一颗炸弹，那张脸大约也不会有什么变化。

叶群的脸却像一切喜欢大惊小怪的女人一样，永远变个不停：“11号楼说，陶铸镇压她，是最大的保皇派。”

江青住在钓鱼台11号楼，叶群常称她11号楼。

林彪一声不响地踱步。8月18日接见红卫兵，他已经讲过话，“走资派”和“保皇派”是联在一起要打倒的。

叶群眼睛追着林彪运动，嘴里一刻不停：“15号楼讲，他又保了王任重。主席叫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开个联席会，给王任重提提意见。中央文革准备在会上动陶铸。已经研究过，在16号楼开了会，要最后看陶铸的态度……”叶群停了片刻，想起什么地抽口气，又补充：“8号楼还找陶铸做了最后一次路线交底，告诫他不要当阻力。”

15号楼住着陈伯达，16号楼是中央文革住地，8号楼是康生住地。

对于叶群朝钓鱼台跑，林彪是发过脾气的。争吵之后，又默许了。

林彪对中央文革，特别是对江青不无戒心。这是强盗对强盗，窃贼对窃贼的戒备与警惕。在打倒大批久经考验的老干部，篡党窃国方面，他们是一致的。但他们只有一致的利益，没有一致的友谊。具体到各自的利益，他们相互间又有着矛盾，有时甚至是很尖锐的矛盾。

此后，林彪曾与江青“紧张”过。林彪还曾大喊大叫让叶群把江青从他房间里赶出去。

年初，“文化革命”爆发前发生的一件事最能说明他们之间互相厌恶又互相离不开的关系。

林彪年初住在苏州，江青从上海不期而至，一见林彪就气冲冲问：“你为什么不看戏？”林彪淡淡一句：“我身体不好，正在养病。”江青说：“你该多关心一些文艺工作。”林彪说：“我不懂。”江青说：“主席最近关于文艺工作有两个指示，你看过没有？”林彪说：“看过。”江青又问：“你对建国后17年的文艺工作怎么看？”林彪说：“方向总理已经解决了，主要是艺术水平问题。”江青搬出毛泽东的指示，林彪不吭气了。江青又说：“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不是我要搞的。主席让我请尊神。”林彪说：“我身体不好。”江青看到林彪身边放着几张京剧唱片和电影插曲唱片，说：“到了这时候，你还听这种东西？这都是坏戏，坏电影！”林彪已经不耐烦，口气变粗：“我只是用它调剂一下精神。听上一段，身体就好些。”

谈话不欢而散，江青一个人当夜返回上海。她没请动这“尊神”，只是受委托在上海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由陈伯达和张春桥参加写出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是2月20日。林彪虽然“身体不好”，“不着戏”，但一见有利可图，便于3月2日写信给中央军委常委，转去了这个《纪要》。这位离不开“坏戏”“坏电影”插曲来调剂精神的林彪，却在信中说：“16年来，文艺战线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结果，江青靠了这个《纪要》而名声大振，林彪也因为“委托”和写信而大沾其光。

林彪不是没读过马列主义，看不出矛盾，不是没有一点能力，否则他也当不了元帅。他的主要问题是，调动他动力的不是主义和信仰，而是野心和权力欲；他把握方向不是靠原则性而是靠个人利益；是权衡对个人的利害关系来决定行动的方式方法和方向。

什么“保皇派”，林彪也保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们，因为是他的人。对于陶铸保刘、邓，林彪自然恼火，但是像陶铸这样一个“第四号人物”同中央文革及江青闹对立，于林彪来讲却未必是坏事。林彪不能

不想到“有朝一日”，那时陶铸也许能为自己所用，与中央文革那群人在“权力再分配”上重新一斗。

何况，林彪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陶铸在历史上是自己山头上的人，对自己也尊敬信服。保刘邓是认识跟不上，根子毕竟是在自己山头上……

“8号楼去谈过了？”林彪终于向叶群开了口。

“谈了，还是想最后拉一把。”

“你去打电话，”林彪的神情好像完全在讲一件无关的事，声音淡淡的：“要被动……”

1966年12月26日，陶铸很晚了仍然在办公室里低头踱步，时而在办公桌上将一份材料拉过来望一眼，接着又将手反剪身后继续踱步。

他忽然立住脚，抬头望着墙上的毛泽东像：今天是主席的生日呵……

他眼睛湿润了。前年的这一天，毛泽东请客，那品字形鼎立的三桌还历历在目，他有幸与工农兵代表同毛泽东共桌。当时一屋吃饭的人，现在过半数都在水深火热之中了。那时主席讲的一些话，到今天才觉出含义之深，可今天也仍然不能全部理解。

晚饭时，他喝了一杯酒。虽在迷惘痛苦中，主席的生日却一定要喝一杯。

他对毛泽东的忠诚爱戴是真挚的。但他对这场运动的不理解也是确实的。

电话铃突然急促地响了，是那部政治局的电话。他身体微微一震，匆匆走去抓起电话机……

“喂，我是陶铸……”

陶铸心里忽然一阵激动，是林办那边来的。

听筒里传来叶群的声音：

“陶铸吗？对，是我。你现在怎么样？……首长很关心你。你记着，要被动。就是这句话。你从现在起，要被动被动再被动。”

那边电话放了。就“关心”了这么一句。

被动被动再被动，没错，是林彪的语言。

什么意思呢？陶铸一时琢磨不透。

有两点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处境确实危险了；林彪还是想保护自己。

陶铸又开始没完没了地踱步、思考。后来，他踱到办公桌旁，重新拿起那份材料沉吟。

材料上面有毛泽东的亲笔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陶铸久久凝视，继而又扔下材料继续踱步。渐渐地，眉头皱起来，仿佛又看到了那个瘦长驼背的阴森森的老人。

“你不要保这个保那个了，”康生用谈心的口气说，烟雾从熏黑的齿缝间一字一股地迸出来，“保得住吗？”

陶铸低头不语，他想多听听。

康生倾倾身，将嘴巴凑近过来：“我是给你路线交底，不要保王任重了，你保不住，别人也不要管那么多，你还是保保自己吧……”

陶铸掀起眼帘，望住康生好大一阵，嘴唇一张，低低吐出四个字：“咎由自取。”

陶铸说的是大实话。“文化革命”中打倒的干部，不少人是别无选择，可以通向巩固地位，通向继续升官，通向声名显赫，至少还有一条退路能够

自保。但他偏偏都不走，只走了一条通向倒台的当“保皇派”的路。可不是“咎由自取”吗？悲剧在此，高尚可贵也在此。

康生皱皱眉，陶铸也皱皱眉，那一刹两人的目光相遇，做了无言的对答交流：

“再慎重想想？”

“我想好了。”

“不让你过于为难，只请你退一步自保。”

“我想好了。”

康生移开目光，将烟蒂拧熄在烟缸中，费力地从沙发中立起身，冷冷道：“既然如此，我先走了。”

陶铸将他送到门口。康生做个止步的手势：“不要送了。你再多想想。”

陶铸想到康生，便又想到叶群的电话，两处联系起来想，他便一阵心颤。康生的意思再明白不过是叫退一步自保。林彪让他被动被动再被动……是了，这也是叫他赶紧后撤，不要再保这个保那个，甚至是叫他检查认错站过去。

陶铸心里一阵痛楚，闭上了眼：他变了，他已经不是当年的林彪了。当年他是叫我主动进攻的……

第二天，陶铸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很晚才回来。

他面色阴沉，两眼黯淡，刚在饭桌旁落座，便十分严肃地对妻子说：

“曾志，告诉你一件事。今天中央开会，江青他们正式批评我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他略一停顿呼出一口粗气，“很严重。”

这一天终于来了！

曾志反而平静下来：“他们为什么突然批评你呢？”

“这次不是一时矛盾，大吵大叫。这次是以组织形式……”陶铸将筷子的尾端在桌面上轻轻一放，思索着说：“说来话长，也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的。”

屋里静默片刻。

陶铸又仰天长叹一口气：“唉，不过这次的事情要从任重同志说起……”

王任重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陶铸过去同王任重并不熟悉。只是后来在中南局，陶铸任第一书记，王任重任第二书记，一道共事才渐渐熟悉起来。

他们对许多问题意见观点一致，很谈得来。大家逗趣说他俩是“性相近，习相远”；革命性都非常强，生活习惯和工作方法又有很大不同。

陶铸干工作魄力大，精力旺盛，大刀阔斧，是开拓型，像坦克车隆隆驶过。他又事必躬亲，有些像总理的“举轻若重”。生活中，他最好的消遣和娱乐就是“剃光头”，“牵头牛”，“下乡转转，跟老乡聊聊”。

王任重是才子型，有水平，有能力，文化修养也高，人又潇洒，很得毛泽东赏识。他善于抓大事，抓住就不放，一定要搞出名堂，做出不同凡响的成绩。所以做同样的工作，他常能够比别人发现和解决一些新问题。比如在“四清”中，他领导搞出的9个材料，中央在批转时就作出关于改进领导方法问题的指示。中央指出：领导干部到基层单位蹲点，了解真实情况，取得解决问题的经验，然后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解决面上的问题，这是领导“四清”运动的重要方法，也是领导其他各项工作的重要方法；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在今后的各项工作中，经常地坚持这种领导方法，改变主观主义和官僚主

义的领导方法。

时至今日，这仍是我党坚持的好的领导方法。

王任重善于抓大事，但小事很能放得开手。“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让下面的干部去干，自己不多干涉。有了空闲时间便拉胡琴、唱京剧、看书、写诗、游泳，生活多姿多彩。

赵紫阳当年曾感叹：“陶铸和王任重我都学不来；我做不到陶铸的拼命，也达不到王任重的潇洒。”

毛泽东曾经称王任重是个总理的人才。中央文革成立后，点名将王任重调来担任文革副组长兼北京市文革顾问。

王任重到中央后，也和陶铸一样，同文革小组那帮人合不来。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都是“暴发户”，无法和王任重素有的声名相比。许多人有事都愿找王任重，他又是敢拍板敢负责的性子，对问题的看法及处理方法又不同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那些人，没多久便同那些人发生矛盾，无法共事了。

江青在与陶铸大吵大叫的同时，也指责王任重“架子大，个人搞一摊子，干什么事都不与文革其他人商量”等等。

王任重原来就患有肝炎、肝硬化。来北京工作后，由于劳累，心情也不舒畅，身体情况越来越糟糕。天天发低烧，脸色灰暗，人一天天消瘦下去。

陶铸想：主席那么喜欢任重同志，肯定会保他。现在他处于文革一帮人围攻下，无法再干下去，身体又不好，本人也提出休息，干脆叫他回中南当书记去吧。

陶铸向毛泽东正式建议：让任重同志回中南，先休息一段。

毛泽东未表态。

陶铸又找周恩来谈自己的想法，两人便商量决定，让王任重先去广州养病。

正在这个时候，出了一件大事。

毛泽东回韶山时，住滴水洞，祭父母坟时折了几根松树枝。当时王任重是陪着去了。他有感于松枝祭坟，写了一首诗。诗中有句“老师同志兄长”，是称毛主席的。他的儿子三宝将这首诗抄到了笔记本上，传出去，被武汉造反派看到了。

这下子可不得了。造反派大骂：“王任重胆大包天，竟敢跟伟大领袖称兄道弟！”

中央文革不失时机地介入。江青也骂：“王任重狂妄自大，敢与毛主席称兄道弟！”

于是，中央文革和武汉造反派形成对王任重的合围阵势，他的处境岌岌可危。

陶铸见状很急。他想，主席喜欢任重，指名要他来中央。他现在处境危险，也只有主席能保护他。

于是，陶铸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再次建议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副组长职务，仍然回中南局去工作。而目前最首要的是应该让他治病。

毛泽东在此报告上批了那段陶铸反复看过的话：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这便是今天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的会议。周恩来主持，除尚未打倒的政治局委员参加外，中央文革将全体人马都拉来了，甚至连一般工作人员

也在这种共产党的最高级别会议上占得一席之地。会场的气氛可想而知。

陶铸有些担心。康生会前的“路线交底”，说王任重“保不住”。看这架势……

然而，文革小组向王任重提过一些意见后，陶铸便放下一些心。不像想象的那么严重。

就在陶铸稍稍松口气之际，会场气氛陡转，矛头突然转向陶铸，猛烈开火了。

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马——江青、陈伯达、康生重点批判。中央文革不论小的还是大的，个个板起副面孔，凶面凶相，恶言恶语。批判的主要内容是“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继续推行刘邓反革命路线，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

陶铸介绍完会议情况，垂下眼帘，神色严峻地思考什么。

曾志想了想，小声问：“政治局的同志提了什么意见没有？”

陶铸摇摇头又点点头，“政治局的同志只是在听，没有什么人发言。先念同志讲了两句，是工作方式方法上的意见，没有提路线错误。”

屋里出现一段沉寂。陶铸和曾志各自想着心事。

“最后富春同志说了几句。”陶铸微微低着头，仍是思索的表情，讲得低沉缓慢，他说：“我看让老陶回中南工作算了……唉，他是想保我哟。”

又是一段沉默。

“你打算怎么办？”曾志问。

陶铸掀起眼帘，严肃地望着妻子：“康生最后也讲了一句。他说，陶铸昨天讲咎由自取，这种态度是极端错误的。”

“他们会以为你是赌气？”

“你还不清楚吗？”陶铸显出愤激，“他们就是嫌我保了这个保那个，他们就是要我站过去！”

曾志点点头，小声说：“你写给主席的那份报告，分明是保任重同志的。你保得了他吗？”

陶铸身体猛一耸，手脖子上的汗毛乍起一圈，眼睛瞪起来，脸孔也由于冲动而涌起红晕，大声嚷道：“人家在那里还怎么能工作下去呢？身体又那样不好，我可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能帮总要帮人家一把么，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条！”

曾志太了解陶铸了：这才是他的本色和本性！曾志连连摆手，表示理解，请陶铸安静。

她叹口气：“唉，我不怪你。你想得对。事已至此，既来之则安之，也只好正确对待吧。”

陶铸稍平静些，却仍然紧锁双眉。他迷惘、委屈、愤懑、不解，心情很沉重。

曾志望着落难的丈夫，眼圈忽然一潮，那股真情便涌了上来。她用女性特有的温柔的声音说：“我和你的个性都太强，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总要为一些事情争论不休，有时甚至吵得很凶……”

她突然哽住了，垂下头，很快又朝天仰起，泪花在眼眶里转啊转。她自小就是极刚强的人，比陶铸掉泪还少。当年在井冈山，在闽西，革命缺少经费，她连亲生儿子都卖掉了。那是她与蔡协民生的儿子。蔡协民牺牲后，她

和陶铸结合了。几十年来，她总是觉得陶铸大男子主义，总觉得自己委屈。但这一刻她忽然感觉全变了，她觉得世界上还能找到比陶铸更好的丈夫吗？丈夫随便退一步就行，但就是一步不肯退！还有哪一个男人能赋予他的妻子比这更强烈的自豪感！

于是，委屈变成了歉疚。曾志含泪道：“从今天起，我再也不同你争论了……”

当夜，曾志到李富春和蔡畅的居所，向蔡畅介绍了事情的概况。曾志与李富春、蔡畅渊源深、关系密切。陶铸更是长期在李富春领导下工作，感情深厚。

诉说完情况，蔡畅也只能说几句宽慰的话。那个时候，中央文革已是大权在握，老同志说话越来越不灵了。

曾志回来后就闭门谢客，同陶铸一道等候处理，等候最严峻时刻的到来。

1966年12月29日，陶铸受严厉批判后的第三天。

政治局的那部电话突然响了。

陶铸三步并作两脚，赶去抓起话筒：“喂，我是陶铸……嗯，嗯，是，我马上去。”

曾志已经赶来一旁，观察着丈夫的神色。

陶铸放下电话，目光与妻子相遇：

“通知我去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曾志两眼仍然望着丈夫不动。

“毛主席主持召开。”

曾志眼里闪过一道亮，随即又黯淡下来：也许是要做最后的组织处理了……

她只喃出一句：“既来之，则安之。”

陶铸理解地点点头。

“林总，今天主席保了我”

元旦已经临近，却毫无节日气氛，有的只是造反的狂潮和西伯利亚袭来的寒流。

早晨的北京城披上了灰沉沉的外衣；除了天安门和中南海的红墙，无尽的房屋连天连地都显出古老的灰色；落了叶的枯枝，飞扬的尘埃和大字报纸，涂抹一墙的黯黑色的标语，更增加了阴郁的情调。冷风掠过空旷的长安街和广场，仿佛带来了绵长不断的忧思和哀凉。

陶铸的脚步时而沉重，时而匆匆。当他拾阶而上，低垂着头走向会议室时，他是怀了怎样一种期待而又惴惴不安的复杂心情啊！又可以见到毛主席了，又有说话的机会了！可是，主席会怎样看待自己所犯的错误呢？

唉，我自己也不清楚究竟错在哪里啊！

保刘、邓？主席也保了么。

保王任重？主席也没有打倒他的意思么……

工作人员已经打开门。陶铸微低着头走进，目光贴着上眼皮一扫，蓦地仰起脸，精神顿时振作，那是一种无法自持的激动。

他看见了毛泽东！

那一刻，他百感交集，嘴唇翕动着，千言万语把喉咙一下子壅塞了。

毛泽东微笑着冲他点头，大声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

陶铸眼圈立刻湿了。毛泽东一句话就等于把他保下来了。

毛泽东的目光在与会人员的脸孔上缓缓滑过，一边说：

“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这时，他的目光恰好移到江青身上，眉毛皱了皱，迅速将目光跳开一边，接着说：“江青太任性，喜欢伤人。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这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

聚坐一起的中央文革成员们都半垂着头，面无表情。

陶铸向周恩来投去感激的一瞥，他相信这些情况是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的。

他心情一阵轻松，在位子上坐下，很快便将精力全部投入到会议的议题上。

但是，他谨慎了，只是听，不讲话。

会后，毛泽东招招手：“陶铸，你留一下。”陶铸走到毛泽东面前。

“你坐下。”毛泽东作手势。

陶铸坐下，恭敬地将身体稍稍向毛泽东倾过去一些。

“江青这个人很狭窄，容不得人。”毛泽东将手大幅度一摆：“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

陶铸严肃认真地点点头。

“你这个人啊，”毛泽东将撑在沙发扶手上的胳膊从肘部支起来，手指头伸出，指了指陶铸：“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

“主席批评的对，我一定注意改正。”陶铸诚恳地检讨。

“说说吧？你的想法。”毛泽东开始吸烟。

陶铸略一思考，便从经济建设开始谈起，讲了抓革命，促生产的重要性，谈了过去运动中忽视经济建设带来的严重后果，谈了自己的切身体会和《人民日报》发表一论和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指导思想。他在毛泽东面前历来是敢于直言不讳，慷慨陈词的，讲着讲着便激动起来，嗓门也越来越大。他坚信毛泽东信任自己，毫无保留地谈了对党的作用的关心，说明当初坚决主张派工作组的真实想法。同时也谈了自己对干部思想和社会风气的种种考虑和担忧。

陶铸讲完，毛泽东没有对他的观点表态。

沉默片刻，毛泽东转开话题问：

“你今年虚岁是 58 岁，实岁应该是 57？”

陶铸很受感动：“对的，主席记得这样清楚。”

毛泽东将烟头拧于烟缸中，说：“选你来中央，这也是一条。”陶铸垂下眼帘，手指在沙发扶手上划来划去：“从心里讲，我真愿意在外地工作……水平低。”

“京官难做，婆婆多。”毛泽东理解地点点头：“听说你以前讲过，在广州是个西瓜，到北京就成了芝麻。西瓜芝麻两样都是稀罕作物，都要的。”

陶铸已是望着毛泽东，毛泽东也在望他。目光一遇，毛泽东先笑了，于是，陶铸也轻松地笑起来。

毛泽东敛去笑意，换了一种严肃认真的神情：“早就透了话给你，一个

多月了，你为什么还不下去？”

陶铸解释说：“近来事情大多，总理一个人忙不过来。再说这次下去时间较长，需要把工作安顿一下。我还差两个部的工作没有交待好，打算过几天就下去。”

“赶快下去才好。”毛泽东情真意切，陶铸不由得动心，似乎体会出里面深有含意。毛泽东又接着说：“这次谭震林不去了，你自己去就行了。过罢新年就下去，你到几个省市去考察一下，去看一看运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亲自去望一望。几个省、市委第一书记要保呢，上海的陈丕显、曹获秋，云南的阎红彦，江苏的江渭清……”毛泽东亲自拟定了一个20多人的名单，交给陶铸：“这些同志烧是要烧的，但是千万注意不要烧焦了。凡是能保的都要保。要救人于水火呀！你代表中央去，讲话的作用会大些，要把他们保下来。”

陶铸十分激动，起身说：“主席，我马上报告总理，过了年就下去。”

毛泽东点点头，最后又意味深长地告诫说：“你这次下去，要多听少说，多走多看，遇事要谨慎。两个月时间不够，三个月也可以。”

毛泽东合上茶杯盖，表示送客。

陶铸向毛泽东点头：“主席，我走了。”

毛泽东想起什么，立起身，送陶铸走。

“你的那两本书，曾志寄给我，我都看过了。《松树的风格》好是好，但是也没有多大意思，还是粮食主要。”毛泽东略一顿，含了强调的语气：“在中南戏剧会演上的讲话，你说现阶段应当把人民内部矛盾提到重要位置上来，这可是个原则性问题。”

毛泽东打住话，因为已经来到门口。毛泽东送客历来不出门坎。

陶铸已经明启毛泽东最后一句话提醒的意思是：现阶段还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陶铸告辞毛泽东，不敢稍停地整理了谈话记录，立即报了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看过谈话记录，很激动。他是办事慎重的人，再次去请示毛泽东：“具体地保哪些人，主席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毛泽东将手大而“划”之地圈半个弧：“我看，凡是受严重冲击的，都可以保。”

当天下午，在继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正式宣布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

最后，周恩来说：“主席的指示，现在就作为中央的决定。把主要工作安排一下，过了新年，陶铸同志就出发。”

若是这个决定真执行了，云南省第一书记阎红彦同志也不会十天后被陈伯达逼死，一大批党的优秀干部也不至于被迫害得像后来那么惨。当时谁也没料到会“风云突变”。

周恩来是振奋的，下来还握住陶铸的手说：“62年，你为救一条命找了主席。这次可是几十条人命不止啊。保住一个，就是一大批。担子不轻啊！”

“总理放心，我明白。”陶铸神情庄严。他深深吸一口气，仿佛当年的事情又在胸中翻腾起来……那还是“大跃进”的年代。

河南的领导人提出三高：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人祸天灾，河南信阳饿死不少人。

何止河南？安徽更严重。其他如山东、四川、河北等省都死了不少人。

对于这一悲剧，领导者尽管主观愿望是好的，毕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其中有位县委书记马荣山便被推了出来。

马荣山的问题确实严重，饿死那么多人罪责难逃。但他被推出来并非只是高征购、饿死人，更由于他“主观愿望”，是“反动”的：因为他的老婆是地主的女儿，地主女儿对他腐蚀，使他变质了。

材料报上去，许多领导同志看到老百姓所受的苦难都流了泪，义愤填膺。上级下令枪毙。

命令下来后，中南局监委书记毛泽东同志要来案卷，认真审查。人命关天哪！

看过案卷，毛泽东摇头了：高指标、高估产、要征购是上边搞的，马荣山只是一个执行者。执行者枪毙了，决策者怎么办？死者不服，于理于法都不通么。

毛泽东从中央政法干校调来中南局监察委员会任书记，长期从事政法工作；正派耿直，认真负责。他不同意枪毙，同志们都劝他：“这是上边定的，你不要闹了。”

“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关系到政策和法律。”毛泽东决定：“我向上面反映。”

原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听说这件事后一再找毛泽东作检讨：“信阳问题我有责任，河南饿死人我要负责任。中纪委要枪毙他（指县委书记马荣山），能否缓期执行，以观后效？……毛泽东找到河南当时的负责人问：“对于马荣山你是什么意见？”这位负责人不敢表态，摇着头说：“哎呀，中纪委决定了，那就执行吧……毙就毙了吧。”

毛泽东很失望，亲自给中纪委挂电话。

中纪委有关负责同志回电话：“这是领导决定的，一定要毙！死那么多人不毙怎么行？”

毛泽东反驳：“县委书记毙了，那地委、省委书记怎么办？要不要毙？”

电话那边沉默片刻，回答：“这是领导的意见，态度很坚决，一定要毙，不能乱改。”

中纪委的意见，中南局也不好否认。毛泽东沉吟着，想到了陶铸。

他与陶铸是在延安认识的，一道参加了党的七大。他对陶铸印象很好：政治性强、思想敏锐、仗义执言、敢于负责。

于是，毛泽东找到陶铸，汇报完情况，激动地说：“找替罪羔羊这不行，人心也不服，后果更不好。我们不好办，陶铸同志，你有机会是不是跟主席讲讲？”

“嗯，”陶铸实事求是地点头道：“他不是决定者，而是执行者，你枪毙人家？这个案子你们先缓一下。”

人命关天，陶铸召开了常委会，讨论了这个问题，然后专门找毛泽东作了汇报，并谈了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当即表态：此人不该毙。

陶铸马上给毛泽东打电话：“我和主席谈了，马荣山这个事缓期执行……”

“大跃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是不能完全由某个个人负责的。那种“大气候”下，举国都有一种奋发向上，尽快甩掉一穷二白的落后帽子，赶上世界发达国家，使我们中华民族以最强盛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烈愿望。对此。就是今天回过头来看也不能简单地全部否定。当时更不存在“抵

制”和“反对”的可能。客观地讲，发现问题早，改得快，这就是好干部。

陶铸走出会场，那感觉真是“冬天里的春天”。

他的脚步完全恢复了往日的自信和轻快。更准确些说，上午同毛泽东谈过话后他就已经恢复了。

不是吗？中午他回家时，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大声嚷道：“曾志，我的问题没有那样严重，今天主席保了我！”

他对妻子讲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后，饭也不吃，便坐到办公桌旁：“我得抓紧整理谈话记录，报告总理。”

现在，总理已经正式宣布：毛主席的指示，就作为中央的决定了……

就在陶铸一身轻松地回到家时，秘书来报告：“林办那边来电话，林副主席要见你。”

陶铸匆匆赶到戒备严密的毛家湾。

经过一段屋脊相连的走廊，陶铸被引入林彪的会客厅。

这个会客厅大约有五六十平方米，对面还有一间面积相仿的会客厅，可以保证林彪在接待一批客人时，另一批客人能在另一个厅中等候。

陶铸还不曾在沙发里坐下，沉默寡言，感情绝少外露的林彪便进来了。

握手、寒暄、落座。

内勤人员为陶铸放下一杯清茶便退出了。

“有什么新情况吧？”林彪淡淡地问。

“林总，”陶铸的喜悦之情仍在两眼里闪烁：“今天主席保了我。”林彪听见就和没听见一样。据了解情况的同志讲，林彪除在公开场合或仓皇出逃那一刻，对运动中出现的和发生的一切大事小事，都表现出“五不”：不在乎、不着急、不动情、不吭气、不表态。

陶铸汇报了全部情况。

接下来是令陶铸不安的一段沉默。

林彪本来就叫人莫测高深地神秘，这一段沉默更使他莫测高深地神秘。

按陶铸的了解，林彪不可能话长，更不会话多。过去的经验，如果他没新的意见，至多一句话：“你去处理吧。”

可是，林彪讲话了：“你呀，现在就被动。”

陶铸一怔。林彪说话历来是不琢磨听不懂，这句话就像佛门秘语一样叫人难以参悟。这已是第二次听说了。

这句话可以理解为陶铸现在仍然被动。但陶铸明白，正确的理解应该是：要从现在就做到被动。

陶铸望着林彪，就像望着卦摊上专说似是而非的半截话的“王半仙”，犹豫道：“林总的意思是……”

林彪不露山不露水地点头，“要被动被动再被动。”

就像浇了一瓢凉水，陶铸明光闪烁的两眼顿时黯淡了。

出了毛家湾，陶铸仰靠在车椅上，心里反复掂量这句话：被动被动再被动……

他的心蓦然一跳，跳到1945年底，冰天雪地的东北。

他依稀记得，林彪那时也讲过：“现在就被动”。在国民党的进逼之下，曾步步后退；他陶铸就曾经退出沈阳，退出马三家子，退出法加，退出……

那么林彪的意思就是后退后退再后退了？

是以退自保，以退求生的意思！可是，既然主席已经亲自出面保了我，

江青、陈伯达一伙又能奈得了我何？

这位7年前便已经“知天命”，却到如今仍然天真无邪的陶铸摇了摇头，发出一声不着边际的苦笑：“还能怎么着？过罢新年我就离开了……”

就在陶铸苦笑摇头之际，钓鱼台16号楼也正在开会。

没有记录，没有服务员，房间里只开了黯淡的辅助灯。

毛泽东讲了话，不好明确反对，所以发言多是用反问句：

“照这个决定，运动还搞不搞？再怎么深入？”

“已经搞了，半途而废，我们怎么办？”

……

“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一天忙于交待工作，陶铸天黑才回到家。

这是1966年12月30日，毛泽东保了陶铸的第二天。

草草吃几口饭，陶铸又开始在房间里踱步，思考还有哪些工作需要安排交待。

晚10点，电话铃又响了，响得很急，拉警报一样惊心动魄。

陶铸抓起听筒：“我是陶铸。”

没听几句他握着听筒的那只手，露出袖外的腕部便支楞起一圈黑毛，两道浓眉也攒起峰来，片刻，终于光火地迸出五个字：“我今夜就去！”

这一声吼像迎接挑战一般。难怪妻子事后要叹息：“唉，都知道他那燃油似的性子一点就着，还有个不被算计的？……”

专程来京的“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队”，把中南局一名书记李一清抓为人质，带来北京，要求陶铸接见。这些人在广州没有能“揪出”王任重（他被安排在一处隐秘地方养病），便赶来北京。到京之日，立刻通过《红旗》杂志社的关锋和林杰与中央文革取得密切联系。

中央文革批判陶铸“死保王任重”，这支“造反队”便联合一部分湖南红卫兵要求陶铸接见，并交出王任重。

毛泽东保过陶铸后，钓鱼台那边就下了决心，于是，这伙“造反队”、红卫兵也随着口气转强硬，转激烈，转为迫不及待。原来讲好陶铸在第二天接见并与他们谈话，现在这伙人忽然狂妄横蛮地“勒令”了；勒令陶铸立即接见：如果当晚不接见，就要全体绝食！

大凡受某些政治势力所左右的年轻学生，那一腔热血常被利用来“绝食”。陶铸闻风而动，固然是烈性子不容他回避这咄咄逼人的挑战；另一层原因，他也是不忍心幼稚无知的学生因绝食而身体受损。

陶铸仓促决定接见，工作人员迅速动作起来。秘书张汉青匆匆通知警卫曾云：“今天晚上要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红卫兵，你马上安排一下，陶书记很快要走。”

曾云迅速调车，并通知警卫局。

如军人一般，五分钟后，陶铸已经来到国务院小礼堂。

一进会场，陶铸立刻发现气氛不对便生出几分警惕：

造反队、红卫兵历来是将中央文革视为“一国的”或“一家人”或“坚强后盾”。所以举凡中央文革头面人物接见时，掌声致敬声不断，至少也是带着盼望、渴求支持的热烈情绪。

今天陶铸是以中央文革名义，而不是以国务院名义来接见这些“造反派”、红卫兵，但会场是一种只有“走资派”受批斗才会出现的粗野、疯狂、暴烈的气氛。人群骚动着、激颤着、汹涌着，像嗜血的动物在园子里望见了被人投进来的牺牲品；像暴风雨到来之前马上就要颠狂起来的大海……

但是，陶铸不会后退。

他用坦诚的面孔和从容的步子在满头大汗又眼睛充血的“造反派”、红卫兵中穿过，不理睬敌意的拳头、目光和一声两声呐喊。

他没有到台上去，而是在台下落座，近在咫尺的地方，面对满场散发出火车厢里馥出一身汗尿酸腥味的红卫兵，微笑着点了点头。

立刻，人群中响起了反应：

“揪出湖北最大的走资派王任重！”

“斗倒斗臭王任重！”

“打倒王任重！”

“陶铸必须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

“陶铸不革命，就叫他灭亡！”

……

陶铸面无表情，岩石一般稳坐不动。

呼喊的声浪降下来，变成一种低沉的无所在无所不在的喧哗，偶尔夹着几声咳嗽，似乎有一些人在大风大浪中感冒了。

陶铸也清咳一声，这不是感冒，是表示：现在我来回答。

“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陶铸竭力咬清每一个字，他已看到面前的录音机，用诚恳的严肃的声音表态说：“王任重同志有错误，可以批判，但是你们采取‘揪’的办法，揪啊斗啊，我们不主张……”

人群轰地炸了，声浪和汗腥气一起翻卷。喧嚣声中可以听到吼叫：

“陶铸必须交出王任重！”

“陶铸当保皇派决没有好下场！”

前排跳起几个人，大约是头头脑脑的人物，或拿出一张纸，或不拿稿纸而只是挥动手臂，声嘶音哑地喊着列举王任重的罪状：

“1959年，王任重狗胆包天，作黑诗疯狂污蔑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狂妄叫嚣什么‘老师同志兄长’，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称兄道弟，是可忍，孰不可忍，你说，他的野心何在？……”

“1961年王任重大肆鼓吹‘三自一包’，鼓吹田间管理家庭承包和产量责任制……”

王任重的“罪状”被摆出来十几条，强迫陶铸表态：

陶铸望着质问者，下意识地用手搓着青幽幽的两腮。据曾任过他秘书的丁励松介绍，他在恼火时喜欢拼命摸胡子，就像拼命在安抚情绪，以便保持冷静。

他必须冷静，因为他已经有所警惕，对方明显是在寻衅，是成心要激化矛盾，这样做的目的还不清楚吗？这样的气氛不讲话看来是不行，但在这样气氛中讲话最容易出漏子……

陶铸的手离开两腮的胡子，向下压一压。声浪降下来时，他不忙回答质问，一字一板地提出思考好的建议：

“你们提出许多具体问题要我表态。我是即席讲话，这种情况下难免有

口误，而且这个讲话有传出去的可能。为了慎重全面准确地表达清楚意思，我提三点建议：一是不要搞录音，会后双方合作搞一份谈话纪要；二是让中南局书记李一清同志参加；三是派代表提问，集中回答问题……

“不行！”人群里响起吼声：“非录音不可！”

一声吼引来一片吼：“不行！坚决不允许李一清参加！”

“他算什么东西？他没资格！”

“我们都是代表，我们可以任意提问！”

……

震耳的喧嚣声中，一个头头跳上前来，太阳穴和脖颈上暴突着青筋，手指几乎戳住陶铸的鼻子，大吼大叫：

“陶铸，你听着！今天是我们勒令你回答问题，而不是你接见我们！对于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你必须老实回答老实交待！”

陶铸眉峰高攒，手脖子上的汗毛森林般挺立起来，但随即又倒伏下去，不是被动被动再被动吗？他深深吸气，缓缓吐出，脸上显出青石一般隐忍的凝重气色，放低声音，却更显严正：“同学们今天对我采取这样的方式是不恰当的，我是政治局常委，我坚持认为今天是接见会。”

“胡说！你只能接受我们的质问！”几个喉咙一齐喊。

“你必须老老实实回答我们的一切问题！”又一伙人跳起来吼。

“我拒绝接受质问。”陶铸坚持尊严地守在“阵地”上，一步不让：“我今天来这里参加接见会。”

“你有什么资格接见我们？”

“你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嚷叫声中，早有人喊起口号：

“陶铸与群众对抗绝无好下场！”

“保皇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陶铸微低着头，两臂撑着桌面，眉毛一点一点向上扬起，手脖子上的汗毛一恨一根直立，那是勃然大怒之前的来势不妙的沉默。什么奶子的被动被动再被动，原则问题上能这样软弱可欺吗？一名战士只能是主动主动再主动！他心里有千百面鼙鼓同时擂响，千万层巨浪翻涌连天……

这种表情变化刺激着某些造反头头，他们更显得亢奋激烈，一个接一个挑衅和污蔑性的质问密不分点地朝陶铸“砸”来，终于有三四个人环形包围了陶铸，同时用手指着他的鼻子和眼睛，让唾沫星子朝他脸上喷：

“回答！”

“你必须马上回答革命群众的质问！”

“我们勒令你立刻回答！勒令！”

陶铸猛地昂起头，直视那些扭曲僵硬的面孔，那些奇形怪状的嘴巴，声若巨雷：

“你们这样强迫我，我们还有什么商量的余地？你们是人，我也是人！我以我个人的身分，向你们的这种作法提出抗议！”

会场陡然一静，最多只持续了三秒钟，便轰地一声响，以新的更大的势头乱吼乱叫起来。那愤激的吼声中分明跳荡着一种惊喜，像终于获得了朝思暮想的好结果：陶铸落井了！落套了！

“陶铸抗议群众就是抗议毛主席！”

“陶铸抗议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就是抗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陶铸疯狂反对文化大革命罪该万死！”

“打倒陶铸！”……

有人拼命往上冲：“把录音带拿走，快拿走，那就是罪证。”

陶铸轻蔑地看着那几个人冲上来把录音带取走了。

会场已经乱成一片，小声策划的，大声叫喊的，纷纷围逼上来。

中央警卫局一位同志悄悄报告秘书张汉青：“他们有伙人正在下面商量要把陶铸抓走。”事情闹大了！张汉青抽身往外挤，他知道陈毅和李富春同志就在隔壁，刚接见过另一个单位的群众。

“陈老总，李副总理，那边红卫兵闹起来了，要把陶铸抓走！”张汉青匆匆介绍了一下情况。

“我不走了！”陈毅更是烈性直肠，大巴掌火爆爆拍在扶手上：“我要保护陶铸同志。”

李富春说：“我和老总守在这儿，不会让他们带走人。”

这时间，陶铸那边的会场更乱了。

警卫曾云本来是站在礼堂边，中央警卫局一位丁科长同他站立一处，见围攻愈演愈烈，根本无法对话了，而且还动手动脚要抓走陶铸，忙上前维护。按照警卫制度，警卫人员身上是带着枪的，拥挤中，被红卫兵摸出了腰际挂着枪，尖叫声立刻响彻会场：

“枪！他们带着枪！”

这一声喊，不啻火上浇油，某些人更是喜大于惊，正好扩大事态，他们立刻鼓噪叫喊成一片：

“他们拿枪来对付我们革命群众了！”

“陶铸动用武力镇压革命群众运动了！”

“陶铸拿枪对准了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

……

中央警卫局的同志火速跑去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赶紧向秘书周家鼎下令：“你马上到会场去，帮助做工作。要保护好陶铸同志，不能让红卫兵带走。”

接着又指示警卫局同志：“叫富春、陈毅、先念都不要走，在一起等候陶铸，不要离开。”

尽管有这么多人做工作陶铸还是被围攻了6个小时，几位老同志也守候了6个小时。“造反派”和红卫兵在天亮前抱着“罪证”匆匆离开，天亮时已然赶印出大批传单和小报。那题目一个比一个骇人：

“陶铸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

“陶铸丧心病狂地向毛主席提抗议”

“陶铸昨夜拔枪镇压群众”

这些传单小报再经人口头一传，就更可怕了。

北京人传的是：“陶铸丧心病狂，朝毛主席拍桌子提抗议，手腕子都拍脱臼了！”

传到外地是：“陶铸夜里朝群众开枪，制造了重大惨案，死人老鼻子了！”

再传到国外已是惊心动魄，血淋淋惨不忍睹……

难怪一位哲人说：我做错事时，人人都看得见；可是我撒谎时，却并非如此。

陶铸对那些造谣报纸只是嗤之以鼻。他相信谣言的腿长不了。

但他忘记了一条：对于阴谋者来说，无须谣言腿长。有段时间，甚至有几个小时能利用就已经足够了。

1967年1月4日，对于陶铸来讲是普通而繁忙的一天，也是“在高速运转中嘎然而止”的一天。

这天，他还是扮演着“消防队员”的角色。

一早，他便驱车去工人体育场。三军文艺造反派闹得正凶，要求接见。

陶铸同周恩来、叶剑英一道去接见，向群众做工作。

参加接见的还有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

当陶铸紧随周恩来步入会场，走上讲台时，他并不知道江青在他身后投来一种什么样的眼光；那是从一双由于古怪的微笑而眯细了的眼睛里闪烁出的目光，带着讥嘲的神色和狡诈的阴影，还藏了一丝酸溜溜的得意味道，在你的后脑颈和后背飘过来、滑过去，似乎等待着什么好戏就要开场一般。

中午，接见结束。陶铸在车上草草吃了点东西，充作午餐。汽车直接开到人民大会堂。陶铸气也没喘一口便来到福建厅，与周恩来商量政治局会议议题。

大约2点，江青、陈伯达、康生中途离开，说要到另一个厅去接见红卫兵。

当陶铸与周恩来研究保护各省市第一书记的具体方案时，可惜墙壁隔音效果太好，来自隔壁厅里的吼声掌声他们竟一丝儿也没听见。

隔壁，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正在接见“专揪”王任重造反派。

江青特意立到狂热的满头是汗的“造反派”中摆出一副与群众站在一起的姿态，用尖厉的声音叫着：“王任重的后台是谁？是陶铸！你们哪，先不要赴广州，先在北京，先揪陶铸！他是你们中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派！为了挽救他，我不遗余力，我对他很耐心，费了很大劲去帮助他，可他就是不肯改悔！他是刘邓新的代表人物！他跟我，跟我——”

也许是过于激动？也许是过于表演，她忽然喊岔了音，发出一种金属摩擦似的刺耳的噪音，虽然咽口唾液，却仍然未能把话讲下去，眼里竟挤出了泪！

陈伯达连连作手势，将话引过来，也将“造反派”的注意力引过来：“陶铸这个人很坏！他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行同他是有关关系的。他是文革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问题从来未跟我们商量过……”

“他独断专行——”江青按捺不住，嗓子刚缓过劲又尖叫着插上一句。但这一声又喊岔了音，大约是心里那团火把嗓子烧干了，烧嘶哑了。她下意识地揪揪脖子，咳两声，不得不设法吮出些唾液先润润嗓子。

陈伯达已经接着江青的叫声往下讲：“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了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老板就是陶铸！他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你们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

江青似乎嗓子歇过劲来了，似乎嫌陈伯达那个福建腔表达不出应有的义愤和力量，连连张扬双臂，抢过来话头，继续她没有讲完的话：“他独断专行，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我跟他，他跟我……不，是我跟他吵了多少架，每次我都几乎昏过去！他镇压我，他还镇压中央文革！”江青又变得眼泪汪汪，仿佛她这个可怜的女人受了多少欺侮和委屈。她猛抽一口气，双手捏成

拳头，按在胸前剧烈地抖动着，从肺里挤压出全部的愤怒和怨恨：“他是特务！他——”

江青第三次喊岔了音。

“他是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是1937年。”康生的声音很大，他有一副自来响的大嗓门，“在里头呆了2年，是叛徒！”

这位阴森森的驼背老人就是这样，不知是糊涂还是装糊涂，陶铸在狱中4年他说2年，又将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说成苏州反省院。没一条说对，但他敢给一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下“叛徒”的结论。

不过，江青还是受到康生的提醒：喊特务不如喊叛徒。她刚咽下一口搜集来的唾沫，马上跟着喊一声：“他是叛徒，我们有证据！”

“他是叛徒！”康生先定调，再提要求：“希望同学们把材料收集起来，整理出来，有材料就胜利了，这是策略。”

“对，我们希望同学们把材料搞到手！”江青历来说后句不记前句，似乎她忘了说过“我们有证据”。她感激地瞟一眼康生，大声疾呼：“请同学们帮我们搞出来。红卫兵是我们的小太阳，相信你们不会让我们失望！”

在一片欢呼声、口号声和掌声中，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退出会场。几句话的工夫，他们又鱼贯而入福建厅。

陶铸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仍在研究工作，抬头望时，康生还是一副不死不活的阴沉的样子，进来便大声咳嗽，仿佛恨不能把整个肺尖都咳出去。陈伯达用手绢擦着头皮上的汗粒，照老习惯向所有与会者点头送笑，肩膀跟着一沉一扬的。江青脚步轻快，一脸粲然，难得有这么好的神情。

周恩来望一眼江青，欲言又止，神情阴沉得蹊跷。他曾出去解手一次，回来神色便有些异样，但是陶铸沉浸在所研究的工作中，全然未觉。

“唉，我们是帮陶铸同志擦屁股哪。”江青朝陶铸走来，“总算是说服这些小将先把王任重放一放，人家正闹病么。”

陶铸虽然大感意外，但听说劝住了红卫兵不去揪王任重，还是真诚而感激地笑了，并且不无歉意地说：“那天我激动了些，一句话没讲好，惹那么大麻烦。”

江青已经坐到陶铸身边，笑着问：“还研究出巡的事呢？”

陶铸点头：“刚研究完。”

“择好日子了吗？”江青不减笑意地扬扬下颔。

陶铸说：“就这一二天吧。”

“噢，天气冷了，”江青不再笑，认真关照一句：“出门要带好衣服。”福建厅的门外。康生的警卫，一位姓聂的同志几乎是和江青同时讲的话。

“哎，那边点了陶铸的名了。”他捅一捅陶铸的警卫曾云。

“不会吧？”曾云吃一惊，“他还要代表中央下去……”

“点了。”聂同志附耳小声说：“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曾云目瞪口呆。

他始终没敢告诉陶铸，厅内散会后，他看到陶铸仍是精神抖擞地走出来，简直以为聂同志在开玩笑。

“马上赶去国务院小礼堂。”陶铸看一眼表，吩咐司机，“那边大概等着急了。”

10分钟后，陶铸已经出现在安徽来京的学生和红卫兵之中……

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李一清，汗淋淋跑进中南海圻字廊陶铸的家。

“老陶呢？”进门他就慌慌张张问，“老陶在吗？”

“不在。”曾志迎过来，“有事吗？”

“不是有事，是出事了！”李一清神色全变，拍着腿着急：“今天下午文革小组在人大大会堂接见了‘专揪王任重造反队’，学生们回来后扬言陶铸要揪出来了！”

“这不可能。”1926年入党的曾志，虽然早作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却决不会相信李一清的话。一名政治局常委未经任何会议怎么可能被抛出去呢？就算陶铸早晚要被打倒，至少也得像对刘、邓一样开个会，走个形式呀。她摇头说：“秘书刚来过电话，陶铸去小礼堂接见红卫兵去了，5分钟还不到呢。”

“真的？”李一清不由得松口气，“这些学生……唉，不知还要乱到哪一份上呢！”

按照党章和党的传统思考问题的人，都不大容易相信这种事。然而，没过2个小时，中南海西门外的高音喇叭忽然响了：

“揪出没有刘邓的刘邓代理人陶铸！”

“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口号声中，又有男高音和女高音“激情澎湃”地宣读了文革小组接见“专揪王任重造反队”的讲话内容，而传单也像雪片一样撒遍了北京城！

尽管吼声震耳，震得心肺欲裂，曾志仍存着一丝疑虑。毕竟，这种作法是建党以来所不曾有过的。如果说过去一直没有给“法”以应有的权威与尊严，人们习惯于“无法无天”，但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的生活准则呢？这可是几十年来所一直强调的啊！她请警卫要来一张传单。

传单上的通栏大标题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曾志的目光匆匆地扫过字里行间，读罢之后，终于相信了这件无法相信的事实。她心里一阵阵绞痛，不单是为陶铸，更为党内民主生活所受到的践踏。她拖着两腿走到西门口，那里就像中国政治斗争的一个小窗口，任何大的事件发生都会在那里有所反应。她看到了黑压压的人群，“打倒陶铸”的亢奋的喧嚣声动地惊天，恨不能立时传遍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但曾志还不肯绝望。她来到陈毅家，来到井冈山一道吃过“红米饭、南瓜汤”的陈老总身边：“老总，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嘛？”

“大姐，你放心。”陈毅高门大嗓地劝慰，“他们这样搞，老陶也打不倒。前几天主席还保了他呢！”

西门外的吼声可以清楚地听到，曾志默默无语，陈毅的自信忽然动摇了，声音一落千丈地喃喃：“除非，除非主席又改变了主意……”

“老总，我回去了。”曾志觉得已经无话好说。“大姐，要放宽心。老陶就是一时被打，将来还会爬起来，历史不就一直这样证明着吗……”

陈毅一直把曾志送出院门外。

深夜12点多，陶铸才回到家里，一边扯着大嗓门问：“西门外那些人喊什么奶子呀？深更半夜闹鬼叫！”

“文革小组公开点你的名了。”曾志尽量使自己显得镇定些。几十年大风大浪过来了，最初的打击过去之后，她已迅速恢复平静，向陶铸简要讲了情况。

“不可能么！”正派豪迈又过于天真的陶铸连连摇头：“今天我跟他们一起去工人体育场接见三军文艺造反派，下午开会还说说笑笑，没见什么异

常么！中央文革接见‘专揪王任重造反队’，就在我隔壁，怎么我一点都不知道呢？江青回来问我几时出巡……”

大概是西门外的吼声不止息，陶铸的自信心忽然一阵动摇，立即去给周恩来挂电话。

周恩来的回话沉重含蓄：“我正在与群众代表谈判，待处理完后再打电话给你。”

陶铸的脸色变了，不祥的预感已经袭遍全身……

“老子跟你拼了”

凌晨2点多，电话铃响了。

陶铸抓起话筒：“我是陶铸。”

传来周恩来的声音：“陶铸同志，你现在就到我这里来一下吧。”

陶铸带了警卫曾云，一道赶到西花厅。曾云留在接待室，陶铸独自进了总理办公室。

“江青他们的讲话我也是才知道。”周恩来第一句话便这样说。略停一下，又说：“下午研究工作时，我去给陈郁同志打电话，回来见他们接见红卫兵，站下来听了一会儿。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讲过了，我没听到。”

陶铸怅然若失地望着周恩来。忽然，他眼里闪过一道亮光，急切地问：“主席是否知道？”

“不清楚。”周恩来声音降低一些：“不过，昨天我去主席那里，主席曾问我，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我向主席汇报了那天事情的经过。我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态度有些不好。主席说：哦，是态度不太好。以后也就再没讲什么了。”

陶铸的眼神黯淡了。他明白，那天接见会上的争论，江青等人已经去告了状。

周恩来犹豫一下才说：“这几天你就不要去了，在家休息。外面红卫兵正要揪你，不要惹出麻烦。”

警卫曾云在20年后回忆说：“总理送陶铸出来，最后一句话是‘歇一歇，先不要工作了’。陶铸当时的神情很沉重。”

就在陶铸同周恩来谈话的同时，也是凌晨2点多，陶斯亮在上海被几个同学从睡梦中叫醒，递给他一张“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传单。同一时刻，陶铸的外甥刘志修在广西南宁也被惊醒，听到高音喇叭里在吼：“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短短几小时的时间，全国都知道中央文革所有头面人物全讲了话，集体表态：打倒陶铸。

在中南海乐字廊，陶铸第二天便失去了自由，但他并没绝望，等待。他没有绝望，各种文件还照常送给他。

曾志知道他在等待什么。

7天过去了，毛泽东迟迟没有表态。

他不好表态，他十分恼火。但他也不能不冷静地分析这种“既成事实”。

他没有想打倒陶铸，但全国都已“打倒陶铸”了，是由于中央文革成员几乎全体一致地表示了态。否定“打倒陶铸”，那么中央文革将威信扫地。这场运动的火也将就此渐渐失去势头。他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无产阶

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他晚年的判断和抱负都将受到根本的打击……

而在这同时，全国形势仍在迅猛发展，斗争越来越尖锐激烈；中央文革又源源不断地将陶铸的“罪状”送来，从坚持派工作组直到所谓“换头术”……

8天后，毛泽东权衡利弊，终于下了决心。他在上海夺权的“一月风暴”材料上批了几个字：夺权是个好事。

在讨论“一月风暴”的会议上，他表了态：陶铸是邓小平介绍的。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

从这天以后，有关部门停止向陶铸送文件。两个星期后，卅字廊加派了四名警卫。一个月后，政治局的红电话机被拆除。电灯线改为36伏，以防自杀。

曾志看到了毛泽东表态的话。她不相信毛泽东会这样看陶铸，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问是否整理材料的同志笔误？陶铸是“不老实”还是“不老成”？

两天后，毛泽东答复了。一句话也没写只在“不老实”三字下方划一横道，横道上画了一个“？”

陶铸久久地，久久地望着那个问号。他的嘴唇在翕动，泪水一点一点盈满眼圈，颤抖着，闪烁着，终于在眼角冲溢而下。

他哭了。无声地哭了。

一清早，陶铸便进了厕所。他每次上厕所时间都很长。

这是1967年8月的一天。

自从毛泽东表态后，陶铸的名字便与刘少奇、邓小平历史性地结合在了一起。那以后，“打倒刘邓陶”已成为最时髦响亮的口号，以至于当时在中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陶铸同刘少奇、邓小平一样，每天在警卫的押送下去西门看大字报。他曾多次受到批斗。昨天又冲进来一批人将陶铸和曾志双手往背后一扭就带走了，说他们是武汉“七·二”事件的总后台。

事情就这么荒谬。武汉军区司令员同中央文革派来的王力、谢富治作了最强硬的斗争，被囚禁7个月之久的陶铸却成了这次“事件”的总后台。谁叫他曾经是中南局的第一书记呢。直到深夜，被批斗一天的陶铸、曾志才回到家里。然而家已不是走时的家，箱子被撬开，柜门被砸开，房子里乱得一塌糊涂。文件、笔记本、书信和相片等统统被抄走。陶铸精疲力尽，冷漠地看着家里的情景。什么也没说便去上厕所。

厕所的窗子正对着春藕斋的墙，毛泽东时常在春藕斋那边活动……他望了很久，直到善良正直的老警卫曾云来劝，来搀扶，他才低低说一声：“不要拖累你。”自个儿回到卧室去休息。

今天一早，他又进了厕所，望着春藕斋。毛泽东夜间办完工，清早是要散散步的……

可是，屋外一阵喧哗，几名警卫队负责人嘈杂着进来，四处查看的样子进了厕所，不客气地训斥说：“看什么？上完了厕所就出去！”

陶铸没理睬，朝春藕斋那堵墙最后盯一眼，转向慢慢走出厕所；脚步沉重，像当年下乡劳动，扛了200斤重的粮食袋。

“昨天有什么人爬墙，知道吗？”警卫队负责人煞有介事地喝问。

曾志望一眼老警卫曾云。

昨夜3点钟的样子，外面是有人声，像是警卫报告，说发现有什么人爬

墙。早晨曾志问曾云，曾云说：“谁晓得他们搞什么名堂，哪来的人爬墙么！”曾志还认真猜测：“大概是猫吧？我好几次看见猫在墙上来回走。”

现在，警卫队一边喝问一边检查，随后将厕所的窗子钉死，并在玻璃上涂满墨汁。临走，又将“警卫”由四个增加到一个班。还不算完，电工随后赶到，在陶铸的睡床上方安装了一个白炽灯，规定：彻夜不许熄灭。

曾志这时才恍然大悟：什么有人爬墙，全是制造进一步迫害的借口。

下午，家里突然闯入十几名中南海的“造反派”，不由分说，将陶铸的双臂向后一扭，按住头便进行“批斗”。

陶铸几次挣扎着扬起头，马上又被蛮力按压下去。汗水从他鬓角、鼻尖、额头、脸颊，从全身的每一个毛孔朝外渗出，嘀嘀嗒嗒淌落脚下。他的声音却一直很高很硬，拒绝一切指责和咒骂。

一个穿空军服的转业兵，见陶铸一“罪”不认，挥起拳头，咬牙切齿从背后打来。陶铸猛地挣脱压迫，扭头吼叫：“你们怎么敢打我？”

老警卫曾云忍无可忍地上前直言：“批判就批判，你们别打人么。老人了，你们可以批判，不要打人啊！”

“造反派”略微一怔，马上又按下陶铸的头。穿空军服的转业兵睁起充血的眼睛，拳头砰砰地打在陶铸的头顶和额角，嘴里骂着：“打你狗日的怎么着？叛徒，特务！”“呸！”陶铸又一次挣起头，将一口血痰啐到转业兵身上：“你有什么资格骂我？我干革命的时候，你还没有生下来呢！”

“你他妈特务！”转业兵一拳打在陶铸的眼角。

“你他妈才是特务！”陶铸眨着打花了的眼，惊天动地对吼一声。

“你他妈国民党！”又是一拳。

“你他妈国民党的儿子！儿子都不是，是孙子！国民党的孙子！”

这十几名“造反派”叫喊惯了“造反派的脾气”，今天才尝试到什么叫“造反派的脾气”。他们万料不到陶铸身陷囹圄，居然敢“反”，敢与“造反派”对骂，一时有些发傻，不知所措。

“他妈的！”空军转业兵恼羞成怒地连续挥拳：“你嘴硬还是老子的拳头硬……”

陶铸挣不出手来反抗，连连挨拳，不禁暴跳如雷：“奶子的，要不是相信共产主义，老子跟你拼了！你们敢放开手，老子跟你拼了！”

在中国挨批斗的高级领导干部中，像陶铸这样敢于硬碰硬，甚至舍命反抗的确实罕见。空军转业兵胆虚了，面对这位年近花甲的被扭按住的硬骨头老人，嘴里虽然还在骂，拳头却举不起来了，步步后退，终于提前溜走了。

他一溜，其他心慌意乱的“造反派”们也再批不下去，呼几句口号便如鸟兽散。

第二天，忠心耿耿的老警卫曾云同志拖着两条灌了铅似的腿，艰难地走到陶铸面前。他嘴唇蠕动着，说不出话，难过地垂下了头。

陶铸立刻明白了，闭了眼问：“要走了？”他睫毛抖得厉害，低低叹一声：“唉，拖累你了……”

中南海西门已经贴出大字报，说曾云是“老保”。

“陶书记，他们收了我的枪，谈了话……”

曾云抬起头，望着陶铸头上几颗鸡蛋大的青包，还有鼻孔里的血痕，嘴唇抖了抖，“他们要送我进学习班，另外派人替换我……”曾云哽住了。

陶铸想从椅子上挣扎着站起来，伤臂无力支撑，又跌下来。曾云忙上前

扶住：“陶书记，我没尽到责任。”

“是我拖累你了。”陶铸眼角凝出一颗泪花。

曾志走过来，将一叠钱交给曾云：“你家困难，到了学习班还不知道怎么样呢，这200元钱你拿去用吧。”

曾云生活困难，过去陶铸夫妇每月补贴他15元。对于身边的工作人员，陶铸都是坚持这样做的。所以主前他没留下任何存款。

“不行，陶书记，我不能要。这么多年……”曾云不顾接替人员已立到身边，含泪说：“现在你们这种情况，这钱我不能再要了呀！”

他知道陶铸已经停发了工资。

“拿去。”曾志把钱塞到曾云手中，“我们这种情况才饿不死呢，倒是留着钱也没用处。听话，拿去吧。”

曾云捧着钱，最后望一眼陶铸，转身慢慢离去。快到门口，他突然冲回来喊：“陶书记，你要保重啊……”他哭了，就那么用胳膊擦着眼泪离开了陶铸。

1968年3月，对陶铸的看管第三次升级。“警卫”人员增加到两个班，在屋里设了三个岗。一个在房门口，一个在房后门，第三个如影随形地紧紧盯在陶铸身边——走路贴你屁股，写字贴你椅背，睡觉贴你床头，吃饭贴你餐桌，连上厕所都要贴你脸前！

江青下令：24小时身边不许没人。

这就是要使你分分秒秒都处在一种充满敌意冷冰冰的逼视之下！真如芒刺在背，鬼魅缠身，比五花大绑更让你感到麻木、窒息和痛苦。它要使你周围的一切，空间、时间、阳光、空气、饭菜、睡眠等等都像被施过魔法一般变得沉甸甸，成为一种负担。这种负担就是要迫使你精神崩溃，迫使你失常，迫使你自杀！

但是，陶铸有曾志。妻子的存在使那壁垒一般的外部世界被洞开了一扇春风入室的窗口。她一刻不离地陪伴着他，以女性特有的温柔安祥，从容不迫，抵销着冷森森的逼视，抚慰了陶铸的心。

善与恶就这样一分一秒都不曾停息地搏斗了两年。曾志研墨，陶铸抓笔，在监视者的眼皮底下写满一幅纸：

“自杀，就是有见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问题弄清楚。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你去见了马克思，问题还是弄不清楚。那也不要紧，事实终究是事实，最后还是可以弄清楚的。我相信我自己的四句话：‘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苕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

陶铸哪里知道，他写此明志篇时，马克思已经向他召唤了。1968年8月，在天安门召开了百万人的“批斗刘邓陶大会”。为了相呼应，在中南海分三个场子，分别斗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斗陶铸的有300多人，曾志也被拉去陪斗，并亲眼目睹了陶铸激烈反抗，被拳打脚踢，头上鼓起三四个鸡蛋大的青包，兀自怒吼反抗，挣扎有3个多小时。

此后不久，陶铸便头晕，眼花，呕吐。无人医治，拖了半年之久才给诊治，发现是癌。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才得到手术治疗。

可是晚了。手术后五个月，就是1969年9月，陶铸又感到腹内阵阵疼痛，发低烧。医生诊断是癌肿扩散。

他得到的不是积极治疗，而是一个命令：“紧急疏散”，“明日离京……”早晨7点，曾志被人叫到了汪东兴那里。

“北京要紧急疏散，可能要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怎么办自己决定”。汪东兴像学生背课文一样宣布着“组织决定”。他望一眼曾志，说：“你随陶铸去也可以，但是去了以后不准与外界通讯，不准与任何人来往；不随他去就去广东插队劳动，但必须与陶铸断绝关系。”

曾志晕眩得摇晃一下，终于又站稳脚。

“什么时候走？”

“明天。”

“明天不行，陶铸病得很重，至多也只能活两三个月，我要为他准备一下。”

“那就18日！陶铸到那里后，每月给他100元生活费，生活自理。”

曾志回来了，她想早点告诉丈夫，让打击推迟些，再推迟些。

然而，陶铸在床上说：“告诉我吧，什么事？”

曾志望着丈夫，那历尽磨难的瘦削的面孔，显出对一切突然事变和任何不幸打击都能泰然处之的平静。于是，她说明了发生的一切。

陶铸平平静静他说：“你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你去也帮不上忙。还是争取和亮亮在一起。你们能在一起，我也就放心了。我们只有她这一个女儿……”

屋子里沉寂了很久，曾志慢慢地垂下头，那是服从的表示。她轻轻喃出一声：“我们在一起……只有三天的时间了。”

陶铸将手覆在妻子的手上：“我们在这个卅字廊共同生活了3年。”

“我过去……忽略妻子的义务……对不起你。”

“不，我留恋过去的生活。”

“可是我……”

“那样的工作，那样的生活，我们不会再有了。我真想再有一次。”

“这3年多，我一直想着补偿……”

“不要说了。这是我最后送你的一点纪念。”

陶铸将一张纸片递给曾志。那是用钢笔写的一首诗。

曾志将那诗看了又看，小心翼翼卷起，用塑料纸包紧，然后一针一线地缝入棉衣里。

第二天，中直政治部主任王良恩来谈话。他刚提起疏散的事，陶铸便在床上说：“好吧，我同意离开北京。”

王良恩说：“审查你的历史，你有变节自首的政治问题。”

陶铸的嘴角不无嘲意地弯一弯，声音冷峻：“我已经是油尽灯残的人，你们尽可随意给我做结论。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我相信历史会对一切做出说明。”

王良恩走了。陶铸望着屋顶喃喃自语：“我的性质定了吗？不，谁也定不了，只有历史，历史会公平结论……”

曾志替陶铸收拾行装，把一件件衣服抚平，叠好，放入一个旧木箱。最后将一本《名臣录》小心翼翼放在最上面。遭囚禁后，这本书一直伴着陶铸。他一直以那些古代的直节忠臣自比……

“都准备好了吗？”陶铸在床上问。

“哦，都好了。”曾志从回忆的忧伤中回过神，小声说：“我放了洗澡水。我再帮你洗个澡吧？”

“好吧。”陶铸身体动了动，“我起来。”

曾志扶着丈夫起身，到浴室，帮他脱去衣服，再扶他躺入澡盆里。陶铸的一身血肉都已消耗殆尽，松弛的皮肤下清晰地现出嶙峋的骨骼，像耕耘一生的老牛，腹部赫然一条刀疤……曾志睫毛上凝出水珠，不知是泪还是聚结的水珠。她想起“他是党内的一头牛”；她仿佛看到了另一个陶铸，血肉过剩一般，每一处关节都红肿得透亮，对，那是在东北，那是如火如荼的岁月……

“不要这样。”微弱的一声，曾志感到丈夫那只枯干的被水泡得温热的手在自己的手背上轻轻摩挲。曾志飞快地擦一下眼，勉强想笑，终于笑不出，只挤出一句：“你还有什么话交待吧？”

片刻，陶铸低哑他说：“我怕是难见到亮亮了。你看到她，要告诉她，爸爸对不起她，让她跟我受委屈了……”

18日，曾志炖了一碗鸡汤，烤了一片面包，为丈夫送行。陶铸艰难地咀嚼，每咽一小口都要连续打嗝，眼里噙出泪，鬓角和额头也沁出汗来。因为他的肠道已经梗阻。这一片面包一碗汤，他足足吃了一个半小时。

“我……吃完了。”陶铸像打完一场恶仗，精疲力尽靠在椅背上。

“这都是为了我……我知道。”曾志眼里又溢出泪。

护士为陶铸打了一针杜冷丁。在药力作用下，陶铸恢复一些精神。他将毛衣、棉衣、大衣都穿在身上，仍然感觉冷。曾志要求送丈夫去机场，上面不允许。只好在家门口送行。陶铸柱着手杖，缓步踏上生命的最后旅程。神态庄严凝重。他与曾志在车旁用微笑互相道别：

“再见！”

“再见……”

曾志打开车门，扶丈夫坐入车内，再一次微笑握手：

“千万保重！”

“你也多保重！”

车开走了。曾志在门前挥手，陶铸在车上挥手。

一周后，曾志也离开了这所留给人无限思念、无限痛苦和无限空虚的家。

生命之火熄灭

1969年10月18日，“疏散”到苏州的林彪口授了他的“一号命令”。苏联谈判代表团20日到北京，林彪担心苏联利用谈判对中国进行突然袭击，命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

他已经“忘记”陶铸。他的老婆可没忘。不久前参加群众大会还带头喊：“打倒刘邓陶”。对此，林彪默许了。

林彪知道陶铸患了癌症，对他已经再无“用处”。

同日晚，合肥已是满城灯火，一架专机拖着凄厉的长啸朝机场跑道滑落下来。

机场灯光齐放，候机楼前的停机坪被照耀得一片光明。专机那秋意凄凉的啸音停息了，迎着探照灯的巨大光柱，舱门缓缓打开。

“谁叫你们开灯？啊！”不远的阴影里响起粗暴严厉的呵斥声：“关掉，立即关灯！”

倏忽间灯火齐灭，机场浸入了一片幽蓝的朦胧中，像是苦涩的海底世界。在这静悄悄的世界里，一簇人从飞机舷梯上静悄悄地走下来，走得缓慢，在干冷的空气中呈现了一种“悲壮的美”；然后又静悄悄地钻入等候在停机坪

上的一辆轿车，静悄悄地驶出机场大门，朝着西郊飞驰……

一切都是发生在静悄悄之中。然而，坐落在西郊的解放军某部医院里，有间房子里的电话却惊心动魄地响起长铃。等候已久的一位负责人抓起听筒，“嗯”了几声便放下话机，起身说了一声“走！”一名医生两名护士闻声而动。随那人匆匆奔向“秘密病房”。

工夫不大，从机场开来的那辆黑色轿车便在“秘密病房”前停下。车门打开，一个面戴口罩、身穿呢大衣、手拄拐杖的人缓缓走下车。他在冰凉的夜风里立住脚，而后缓缓四顾。直到这时，赶来监护的人才发现他有一双目光闪烁的眼睛；那不是病人的眼睛，那是漾着战士冲锋陷阵时特有的锐气。

他看过四周一眼，像是与这自然界作了庄严的告别，便艰难而又坦然地迈出步子。他似乎脱不开那手杖了；他身体稍向右侧倾，以便让手杖分担一些已经十分瘦削的身体的体重。他专心致志地对待迈出的每一步，像对待庄严神圣的事业一般，不求快，力求每一步迈得都要正，都要稳。没有人搀扶，他也不用人搀扶，步履艰难而又严肃认真地走着、走着，一直走进为他“精心安排”的“秘密病房”。

他在刺目的灯光下再次立住脚，再次环顾四周：这是朝北不见阳光的“阴间”。其实朝南也徒然，窗口用木板钉死，又蒙了厚实的窗帘。门口对着走廊，进来时他已看清走廊的一头从地到楼板全部堵死，耗子也钻不进来。只留下一道门进出。病床矮得出奇，显然床腿被锯掉一截，大约是怕“跳床”自杀吧？……

他眼角竟出现几丝浅浅的笑纹，似冷似嘲；手杖交于左手，右手朝口罩伸去。于是，所有监护人的目光都随着那只枯瘦的手移上去，紧张地盯住这位始终笼罩了一种神秘气氛的“特护”病人。口罩缓缓地、缓缓地摘落一角，顺序露出了毫无血色的岩石一样突兀的颧骨，坚挺而棱角明晰的鼻子和一圈短髭围拱着的嘴角微微下弯的抿紧了嘴巴……

监护人们一阵无声的骚动，这种骚动来自波颤的目光，抽动的脸肌和身体下意识的震颤。

陶铸！“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虽然重病使得人憔悴，但他无疑是那位名字曾经隆隆响遍中国大地的陶铸！

可是，就从这天晚上起，这位身陷囹圄的“保皇派”连陶铸这一真实姓名也如同他的自由一样被剥夺了。病历上写着“王河”的化名，那是押送者为他起的名字。所有监护人也都将“陶铸”封闭在心里，只叫他“王河”。

监护人员被专案人员召集起来开会。专案人员变态变色地警告说：“现在你们面对的是一个凶恶的敌人！他不但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第三号走资派，而且是叛徒，性质已定。他顽固对抗革命群众运动，当面辱骂红卫兵，还要拼命！对他一定要坚决斗争，也要讲究斗争策略。如果他不老实，大喊大叫，就堵他嘴！”又说：“你们对他监护，只要不出问题，就是完成任务。”

陶铸受到了特殊的“特级护理”——成立了监护小组，有一名组长，两名副组长，病房每天24小时都有看守严密监视病人活动，治疗只是“根据病情和这里的条件治疗用药”，却要不厌其烦地写下病人的“动态日记”。所有监护人员对这里发生的一切都要“终身保密”，“你们的名字都装在中央档案里，谁泄密谁负一切责任！”“监护措施有十条……”“是为了保存罪证”，“对他管理一定要严格！”

陶铸就在这个封闭而窒息的环境中开始了他的“特护”生活。这里没有

阳光，没有风云，没有绿色，但是有一颗顽强跳跃的心脏，有一条不甘死亡的生命。

一觉醒来，陶铸便起身运动。于是，这死寂的斗室有了声响：笃笃的手杖声和沙沙的脚步声。他就在窗前走来走去，虽然看不见自然，但他知道窗外是自然，那里有阳光，风云和绿色……

踱步 15 分钟，陶铸已是汗水淋漓。他将手杖靠在床头，擦擦汗，先用双手撑住床，再艰难地躺上去。这床太低了，他的身体也太虚弱了，以至于每次上床都不得不小心翼翼，作为一项特殊运动来完成。

但是，陶铸的头脑异常清醒。每当躺下歇息，他便开始“读书”，一页页、一行行翻阅自己的历史。他有时想得激昂，有时想得平静，想累了便起来再踱步。他在密闭的窗前走来走去时，常令人想起笼中的猛虎反复徘徊在铁栏后。他想像猛虎一样发出激愤压抑的吼啸，但他耐住了。他只是不断吟诵着李贺的诗句：“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唱天下白。”

三天后，吃了一点面条，觉得精神还好，又下床来。踱着踱着，索性把手杖“咣”一声甩开，不用任何支撑走起来，小小的病房，成了他作体育运动的场所。

20 分钟后，他扶墙喘息。于是，脑子便开始迅速运转。大凡上点年纪的人都有一种体会：越是久远的事情越记得清晰，越是切近的事情反而越模糊。他想把近两年的事想真切，却总觉得似一幅淡淡的水墨画，没有明显的界线，只有朦胧的深浅不一的色彩化出了层次和轮廓。

他依稀记得去年，1968 年 8 月，他在“批斗刘邓陶大会”上又挨了痛打。不久便开始头晕、眼花、想呕吐。他讲明情况，要求检查治疗，却一直拖到 1969 年 3 月才获准去医院检查。他做了大手术。亲人和医生都说胆囊肿切除术，他也对所有人说是胆囊切除术。然而。当他痛得在床上东倒西歪，前扒后仰，大汗淋漓之际，还是脱口叫出一声：“没想到癌是这么痛！……”他知道自己已是濒于死亡的人，却又被孤零零“疏散”到合肥。他想起与妻子说的话：“我不能死，特别是这个时候，不应该死！”……

于是，陶铸振作起来，擦擦额上的冷汗继续他的踱步。踱出几步，他发觉出体力不支，扶了墙喘息。他看到了负责看守的那名小战士。军帽下，那张脸盘分明是娃娃相，用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警惕而又好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位“特护”病人。

一种怜爱之情油然而生，陶铸忘记了“身分”，像当年视察部队时那样亲切地问：“小同志，今年多大岁……”

话没问完，那张天真稚嫩的脸忽然掠过一阵紧张愤激之色，接着便暴出厉声的呵斥：

“谁跟你是同志！你反对党，反对毛主席，你是反革命！……”

吼声中，那小战士怕染上瘟疫一般，朝后退了两步。

陶铸怔怔地望着那战士，脸色陡然变得青灰，接着，由于心脏的一阵绞痛，他的脸剧烈地抽搐几下，当抽搐停息下来时，嘴角留下了一丝凄楚的微笑。

他无声地爬回床上，静静地躺着，淡漠的目光始终凝望着屋顶的某一点。他反复哼唱着什么，当护士送饭来时，才终于听清那是一首诗：“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苍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护士等候很久，他没有吃饭，只是小声吟这首诗。护士走了，半小时后回来，他仍然没有吃。

晚饭的情形仍是这样。只是当护士准备撤走饭时，才听到微弱的一声喃喃：“放、放下……我吃。”

陶铸开始挣扎起身，几次努力，汗已淌下来。护士忍不住帮一把，被陶铸轻轻推开了那只相助的手臂。

“你们……还年轻哪。”陶铸望着护士轻叹一声，闭了眼。他最大的痛苦不是自己遭诬陷和迫害，他痛苦的是看到这么多年轻善良的心灵被蹂躏变得畸形。

陶铸刚一端碗就开始恶心。但他还是顽强地朝嘴里送去面条。嚼没几下，一阵剧烈的呕吐，不但吐掉了嘴里的面，还吐出了胃里的黄水。呕吐停止，他喘息着，望着饭碗，像面对着一场党性的考验。他又朝嘴里送进面条，嚼不过几下，又是一阵大呕大吐，直吐得昏天黑地，汗流如注……

护士蓦地扭开了脸。纵然被注入天大的“阶级仇恨”，此情此景也不由她不心颤欲泪！

陶铸终于“吃”完了一碗面，他像打赢了一场大仗似地躺下来，喘息着，任凭仟水淌湿枕巾，一动不再动。

护士脸色惨白，拼命咬紧嘴唇，收起碗筷，端走那大半痰盂的呕吐物。她始终低着头，怕别人看见她的眼睛，发现什么严重问题……

由于病菌和精神的双重折磨，陶铸到安徽不足一星期，便完全不能起床，不能吃饭，不解大便；再不作病情检查，很快就会饿死！

监护小组把病情反映给上面，勉强获准可以给陶铸作一次检查。同时也下来一道“指示”：“与病人接触的人不能再扩大范围，特别要注意保密。”

10月23日深夜，医院里的人都睡了。监护人员悄悄进了“秘密病房”，给陶铸戴上口罩，用担架把他悄悄抬到放射科。检查证明，病情已非常危重；肠子粘连，并发展成为完全性肠梗阻。

监护小组再次请示，直拖到11月15日，才得到“中央”批准，决定给陶铸再次施行手术。

腹腔打开了。无影灯下，医生目瞪口呆：淋巴结广泛转移，癌组织满腹都是，大的如蚕豆、小的如绿豆。血管焦脆，稍碰即破，随时都会引起大出血。手术根本无法进行。折腾大半夜，腹腔打开又缝合，连肠梗阻也未能解决。

极度衰弱的陶铸，手术中流了大量的血，却没为他输一滴血。部队医院里的血是无产阶级的，不能输给资产阶级的当权派——“血型”不对。

医院只给陶铸输液，靠输液长合那道刀口。在最后的日子里，陶铸忍受了怎样的痛苦啊！护士亲眼看到了他癌痛发作时的情况：“他坐起趴下，趴下坐起，一刻也无法安宁。坐着时就用拳头顶住腹部，腰勾着，强迫拳头对痛点产生巨大的压力。趴在床上时，两条腿伸展了又抽缩，蜡曲了又蹬直，辗转反侧，冷汗如注；眼睛瞪圆了又闭紧，闭紧了又睁圆，牙床咬得淌血，真是苦不堪言哪……有天晚上，一名护士心里实在不忍，在他一再要求下，给他打了一针止痛针，第二天就受到了上级的严厉警告和呵斥，说打止痛针必须请示‘中央’，‘中央’没批就不许打！”

那天，癌痛到极点，陶铸的身体剧烈地抽搐着，触电一般；每一条筋，每一束神经，每一块肌肉，每一个细胞都在战栗！病床在他身下咯咯作响，整个屋子都有它急促的节奏，那是陶铸无声的吼啸！他的脸孔像激荡着生风暴雨，他的眼睛像划过一道闪电，光芒逼人，却又一闪即逝，变得深幽幽，

黑沉沉；转瞬间，复又燃起钢蓝色的火焰；脸孔的抽搐停止了，好似有个雷霆万钧的意志把风势镇住了，那神圣的信仰和高尚的品格本已深深地透入灵魂，如今使他的全身都得到充溢和膨胀。夸地，他举起一只手，携了飓风之势猛然挥出，仿佛要扫荡一切彷徨不安，粉碎所有的痛苦哀愁……

砰！一声，陶铸的手重重拍在墙壁上，像旷野里轰响的巨雷。监护人都吃了一惊：那白壁上，粘汗沾掉墙皮，清清楚楚留下一只手印！

从此，陶铸安静下来。他静极了，静极了。

1969年11月30日22时15分，陶铸的生命之火熄灭了，但他的两眼依然圆睁，里面还在闪烁着火焰。一名护士看了心里发酸，上前用手将他的眼皮轻轻合上。

陶铸逝世的第二天，“中央”专案人员带着“六条意见”从北京飞抵合肥，在他们的监督下，对陶铸遗体进行“秘密处理”。

在严密的封锁下，第二天深夜，死者用“王河”这个名字，偷偷送进合肥火葬场。唯一为陶铸送葬的亲人，是他心爱的女儿的名字“斯亮”这两个字。因为火葬要有家属签字，奉命来执行处理陶铸遗体的专案人员，知道陶铸有个女儿叫陶斯亮，此刻已远远被发配在大西北，他们就在火化单上随意地签了“斯亮”二字，当时谁也不知道斯亮是谁。

母女奔走呼吁平反

“妈妈，”陶斯亮一阵风似地冲进屋，压抑不住激动：“邓小平要出山了！”

曾志正在为丈夫书写申诉材料，她停住笔，睁大眼望着女儿。她的头发已经斑白，衣服穿在身上显得空空荡荡；岁月和苦难耗尽她的血肉，她的体重只剩60多斤。

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她和女儿奔走呼吁两年，四处碰壁两年，几十万字的申诉材料如石沉大海两年。

小平要出山的消息使她心中顽强闪烁的火苗膨地胀大起来，将一股热流迅速发散到全身。她像丈夫生前思考问题时所喜欢的那样踱起步，然后冷静他说：

“我们只有去找小平同志了，现在就去找！如果等他出山后再去找就困难了。那时他工作忙，要见也难。现在他正在西山休养，空闲多，也好见面，也好谈话。”

曾志带着女儿陶斯亮一同找上西山，见到了邓小平。

邓小平赋闲在家，儿孙绕膝，似乎已经超脱于世外，除了天伦之乐再也别无所求。曾志怀了希冀向他陈述陶铸的情况，可是邓小平却笑咪咪地将手朝旁边一指，说：“你们听，这是最好的音乐。”

曾志和陶斯亮一怔，很快明白是指孙子孙女吵得热闹。

陶斯亮的心抽缩着打了一个寒噤：他在闪避？他对陶铸是什么态度？要不要管？肯不肯出面说一句公道话？……

曾志坚持讲完要讲的话，将陶铸的材料递上去。她的神态是那么庄重，仿佛双手托着全部希望和责任。

“哦，陶铸的。”邓小平淡淡地喃一声，或者说是随意地，不经心地，甚至是下意识地喃了这么一声，用一只手接过材料，看也没看一眼，随手放

到桌子上，就那么随随便便一丢，像丢一本过了期的毫无保留价值的旧刊物！

陶斯亮的心一下子凉到底。她尽了自己的努力，几次帮助母亲重提父亲的话题。她一心想听听邓小平对父亲的看法，哪怕“唉”一声，给个无言的感情流露呢？

可是没有。小平不表态不露情也不接陶铸的话题。

下得西山，陶斯亮再也无法掩饰那种绝望而痛苦的心情：“他怎么这样子啊？”

曾志却露出了微笑：“耐心等等，主席说他是绵里藏针。你爸爸生前也讲过，党内如果允许拜师，他愿拜邓小平为师……”

邓小平终于出山了！他出山后首先办的几件大事中，就有一件是将陶铸的案子从专案组调出来，交中组部胡耀邦负责审查，并且亲自交待了许多话，表示出少有的重视。

陶铸的案子原来就是卡在专案组，邓小平把它从专案组调出来交给中组部，问题一下子便解决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邓小平对陶铸的问题亲笔作出批示：

“关于陶铸同志的问题。陶铸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经过复查，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陶铸同志于1969年11月30日病逝，他的骨灰应该安放到北京八主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陶铸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里隆重举行，规格很高。同彭德怀在同一会场：两个遗像，两个骨灰盒。由邓小平主持，陈云同志致悼词。悼词摘要如下：

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在这里悼念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位卓越领导人，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忠诚的革命战士陶铸同志。

陶铸同志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于1969年11月30日含冤去世，终年61岁。陶铸同志的不幸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

陶铸同志生前同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陶铸同志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兼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宣传部部长。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他协助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处理党和国家的重要事务。他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抵制林彪、“四人帮”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倒行逆施，积极保护老干部和革命群众，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成为林彪、“四人帮”篡党窃国的障碍。1967年1月，“四人帮”采取突然袭击的卑鄙手段，捏造罪名，诬陷陶铸同志是什么“中国最大的资产阶级保皇派”、“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叛徒”等，在精神和肉体上对陶铸同志进行了残酷的折磨和摧残。这是林彪、“四人帮”陷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严重罪行。

……

陶铸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艰苦奋斗数十年，深得党和人民的信任……陶铸同志的一生，是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陶铸同志不幸逝世，我们非常悲痛。我们深切怀念他。我们要学习他对党忠诚，无私无畏，威武不屈，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高贵品质；学习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坚持真理，英勇斗争的革命情操；学习他密切联系群众，善于发扬民主，敢

于独立思考，多谋善断，勇于负责的优良作风；学习他艰苦朴素，忘我工作，严格要求自己，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紧密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和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努力奋斗。

曾志是个极刚强的人。当年与丈夫最后握别时，她不曾掉泪；广州军区向她宣布陶铸的死讯时，她仍然没有掉一滴泪。

可是，现在看见这隆重的追悼会场，她哭了。

泪雨滂沱，放声大哭！

她当众撕开衣角，将丈夫所赠那首离别诗取出来，高高举起，公之于世：

赠曾志

—

身世浮沉只自扪，
谁怜白发慰黄昏。
乾坤永照余肝胆，
生死难忘负马恩。
纵使投荒能赎愆，
不须醉酒为招魂。
每当梦醒难成哭，
羞效王章有泪痕。

—

重上战场我亦难，
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
桔槔更觉怯霜残。
如烟往事俱忘却，
心底无私天地宽。

第十四章 迎春堂出现可疑脚印，公安人员据报拍照。江青悉情大发脾气：你陈伯达给我搬出中南海。

搬入中南海

进城之初，毛泽东除了身边的许多工作人员之外，有着正式秘书4人，人称“四大秘书”，即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叶子龙。与毛泽东住在一起的是田家英和叶子龙，叶子龙是机要秘书，日常秘书工作由田家英负责。由于马列学院（后改称中共中央党校）设在西郊颐和园，陈伯达作为副院长也就住在那里。颐和园与中南海相距甚远，每逢毛泽东电召陈伯达，过了半个小时，陈伯达的汽车才抵达中南海。

“你搬到中南海来住吧！”毛泽东说。

于是，陈伯达搬入了中国的政治中枢，起初就住在勤政殿一间小屋里。那里毕竟不能久住，况且他又开始了第三次恋爱，没有房子怎么行呢？

总算给了他房子，让他住在迎春堂。这是一座由南向北有三个四合院上了“年纪”的建筑，陈伯达住在其中的一个，他的邻居是周扬和熊复。

中南海分为甲区和乙区。毛泽东住在甲区，陈伯达住在乙区。持有特殊通行证，才可由乙区进入甲区。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持有特殊通行证。一接到毛泽东的电话，他便从迎春堂步行前往勤政殿，约莫一华里，走十几分钟就到了。

1950年3月上旬，陈伯达在随毛泽东访苏和视察东北后回到北京。不久，他第三回当了新郎。

这时的新郎，已经46岁。新娘呢，28岁，比他小18岁，比他的前妻余文菲还小4岁——他先后的三位妻子，一个比一个年轻！

新娘原名刘肃宴，后来改为刘叔晏，又写作刘淑宴。她1922年生于四川灌县。1938年，16岁的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做过地下工作，从事过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工作。她曾在著名的社会学家邓初民教授（解放后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里做过统战工作，被邓初民认作干女儿。

刘叔晏曾经结过婚，前夫叫刘光，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1946年5月30日，刘叔晏生下一女，刘光为女儿取名刘海梅。

在刘光去世之后，刘叔晏带着幼小的女儿，来到延安。

后来，在北京，陈伯达担任马列学院副院长，而刘叔晏是那里的学员。副院长爱上了这位学员，开始了他的第三次恋爱。

新婚之后，陈伯达一家五口：诸有仁所生的陈晓达仍在莫斯科，余文菲所生的陈晓农与陈伯达、刘叔晏生活在一起。另外，刘海梅改姓陈，也成了陈伯达的女儿。

这时的陈伯达，有了一连串带“副”字的职务：除了马列学院副院长外，又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后来还兼国家计委副主任）……然而，他的最主要的、从不公开见报的职务，还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

陈伯达有了轿车，有了司机，有了公务员。中南海的警卫、局给陈家送花时，每一回总是四盆——这意味着他是部长级。因为送花的盆数多少，取决于级别。毛泽东那里，每一回送八盆。

开初，刘叔晏在北京远郊——通县双桥农场当副场长，一个星期才能回中南海一趟。陈伯达派车去接她，快到中南海时，让她下车，走回家中。

陈伯达到毛泽东那里，总是走着去。或者让车子开到勤政殿附近，下车走过去，从不让车一直开到毛泽东住所跟前。

办别的事陈伯达可以拖拖拉拉的，但毛泽东一个电话，不论白天黑夜，随叫随到，只要毛泽东找他。在毛泽东面前，他总是保持毕恭毕敬的姿势。至于一跨出毛泽东的门，他便是另一种神态、另一种姿势了。

他把岳母——刘叔晏的母亲，也接来同住。

陈伯达的小家庭，一般来说是安静的。日子久了，他跟刘叔晏有时也吵吵闹闹。每当刘叔晏高声吵叫，他就赶紧打开收音机，以求“冲淡”家中的吵闹声，免得家丑外扬。因为他知道他所住的不是普通的地方，而是高级干部的大本营——中南海。

刘叔晏和陈伯达结婚后，先生一女，取名陈岭梅。据云，陈伯达为女儿取名，源于他当年家乡的梅山小学。后来，刘叔晏再生一子，取名陈晓云。

公务员眼中的陈伯达

接受采访时，陈伯达的公务员李景如像聊天一样，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十分逼真地勾画出陈伯达当时的形象……

李景如到陈伯达家当公务员，是领导上分配去的。刚到他那里，就遇上麻烦事——他的话很难懂。过了些日子，才算慢慢地听懂了。

刚一去，叫他“陈部长”，他很不高兴，说道：“我不兴叫‘部长’、‘首长’的。我当过教员，你以后就叫我‘陈教员’。”

虽然李景如觉得有点别扭，但毕竟是陈伯达要他那么叫，也就喊“陈教员”。从此，一直叫他“陈教员”。

这位“教员”是吃特灶的。那时，陈家老小及工作人员都吃中南海乙区的大灶，但陈伯达夫妇是吃甲区特灶的。一日三餐，由李景如到甲区西楼大厅去打饭——他拎着铁饭盒去，风雨无阻。到了冬天，铁饭盒外边罩一个棉套子，以求保暖。

从迎春堂到西楼大厅特灶，大约要走半里地。从乙区到甲区，要通过岗哨。岗哨很严格。李景如虽然一日来回六次经过那里，跟哨兵很熟，但是每一回都得拿着通行证——一张像公共汽车月票大小的黄色卡片，上面贴着照片，写着姓名、工作单位、职务，盖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大印和杨尚昆的图章。通行证每月换一次，过期无效，从乙区进甲区时要查看通行证，从甲区去乙区则不查。

特灶的菜谱总是在前一天晚上送来。最初是陈伯达亲自点菜。后来由刘叔晏点菜。日子久了，李景如知道了他们的脾气和习惯，就常常替他们点。也有时，他们想吃什么，叮嘱他一句。他们一般中饭三个菜，晚饭三个菜，早饭一般是馒头、青菜、豆腐乳加两个煮鸡蛋。

陈伯达喜欢吃海鲜，如鱼、虾、螃蟹、海参，也吃清炖母鸡、肉丝炒米粉、青菜之类。不吃黄鳝，也不吃辣味、大蒜。有一回，李景如订了个清蒸甲鱼，陈伯达说是“王八鱼”，赶紧退掉。

陈伯达总是说，在他家看上去是为他服务，而他是为党服务，因此在他家工作也就是为党服务，是很光荣的。只有得到领导信任的人，才可能到他

家服务。在陈伯达这样的“教育”下，李景如当时工作是尽心尽力的，服务非常周到——因为这是“为党服务”。

有一回，天凉了，陈伯达要出门时，想起应该加件薄毛衣。可是，一时又找不到。他说：“不找了，不找了！”看看手表，走了。

陈伯达走后，李景如找到了那件薄毛衣。他见陈伯达是徒步离家的，猜出十有八九是到毛泽东那里去。李景如怕他着凉，便骑着自行车，带着薄毛衣，前往勤政殿。

李景如按了毛泽东住处的电铃，一位工作人员出来了。

“陈伯达同志在吗？”李景如问道。

那位工作人员点点头。

李景如把毛衣交给了那位工作人员，骑车回去了。

第二天，陈伯达特地找李景如谈话，脸色十分严肃：“你怎么知道我在主席那里？”

“我看你出门时朝勤政殿方向走。”李景如答道。

“以后不要给我往那里送衣服！”这时，“陈教员”用很严厉的语气说道。看得出，李景如昨天那么周到的服务，反而惹他生气了——因为他在毛泽东面前是很注意“影响”的！

其实，李景如完全出于一片好意。他在陈伯达身边日子多了，知道他最怕感冒。陈伯达常说：“一感冒，就会影响身体。”所以，他整年都戴着帽子，春、秋、冬戴鸭舌帽或干部帽，夏天也爱戴网眼帽。他理发、洗澡从不洗头，怕着凉。头发常用篦子篦一篦，篦去头屑。他甚至在家里也戴帽，睡觉时还要戴顶睡帽。起初戴顶破棉帽当睡帽，后来刘叔晏给织了顶毛线睡帽。正因为这样，陈伯达在种种新闻照片上，总是戴着帽子的。

陈伯达对于衣着倒并不讲究。平常，穿蓝色、灰色斜纹布中山装。逢“五一”劳动节或“十一”国庆节，要上天安门，才穿料子衣服。平常穿布鞋。他的布鞋，都是李景如给买的。李景如试穿时觉得稍紧一点，给陈伯达穿正好。陈伯达只有一双“三节头”黑皮鞋。要去天安门或者见外宾，便嘱咐李景如擦得锃亮。李景如知道“陈教员”常有稿费收入，经济上不紧张，劝他再买双皮鞋，可以轮换，“陈教员”直摇头。

陈伯达不抽烟，倘若来了抽烟的客人，陈伯达待客人一走，赶紧开窗。他喝点葡萄酒。

他常常腰疼、腿疼。他笃信狗皮膏药，总叫李景如去买，贴在腰上和膝盖上。

他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有时练练毛笔字，写完了就撕掉。他不大愿意给人题字，说是“太招摇”。所以他给谁题字，就表示很看得起谁。

他的唯一爱好是看书。他有好多书。要么坐在那里看，要么躺着看。看到得意之际，往往摇头晃脑，口中用福建话念念有词，李景如听来像唱歌一般，一双脚有节奏地抖动着。他的床和书桌紧挨着。睡得晚，起得晚。怕吵，所以特地叫人加了一道玻璃窗。桌上的书、稿，不许别人翻动。

他最喜欢去琉璃厂中国书店去淘古书。他坐着小汽车去，停在附近，然后自己进去翻找，不喜欢别人跟着。

他关照所有的工作人员，不论是准，一接到毛泽东那里来的电话，无论如何要马上通知他。即便是睡觉了，也要立即叫醒他。一听说毛泽东找他，就会风风火火赶去。

后来，李景如学会了开汽车，当过陈伯达的司机。凡是到毛泽东那里，他总是说“去勤政殿”。去周恩来那里，则说“去西花厅”。至于别人，就直说其名，如“去少奇同志那里”、“去小平同志那里。”

每年冬天，他差不多都要跟毛泽东去杭州，到了春暖花开，一起回到北京。

他对工作人员的生活很少关心。他所要求的，只是工作人员如何为他服务。

秘书眼中的陈伯达

陈伯达给毛泽东当秘书，到了1952年，他自己也有了秘书。

他的第一位秘书叫姚洛，1923年生，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江苏东台县委宣传部长。1948年秋，调到马列学院学习，1952年在马列主义研究室工作。那时，陈伯达身边需要一个人收发文件，可能是马列学院教务长杨献珍提名，把他调往陈伯达那里工作。于是，姚洛成了陈伯达的第一位秘书。

姚洛说，那时候的陈伯达，还不是党政要人，不处于政治的最高层，而处于中上层。虽然陈伯达兼着许多带“副”字的社会职务，但是他主要给毛泽东做文字工作，当政治秘书。

陈伯达写东西都是自己动手，从不叫姚洛起草。有时，叫姚洛抄一抄。不过，姚洛有一回把“党员”写成“T0”，因为他把“T”当作“党”的简体字，而“0”是圆形，亦即“员”。陈伯达常常挖苦姚洛为“T0”。

在姚洛的印象中，陈伯达可用一个字概括：诡！

平素，陈伯达总是摆出一副谦谦君子的样子，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小学生”，是“教员”，不是“首长”。尤其是在毛泽东面前，态度极为谦恭。

对下呢，他倒也不是那种张牙舞爪的气势。可是，他阴阳怪气，弄得你左右不是，捉摸不透。

只有在他身边工作多年，才能慢慢看出他为人的诡。

比如，他最关心的，是摸毛泽东的动态。毛泽东的一句话，一个主意，一个动作，他都很注意，他总是在揣摩着毛泽东的心思，千方百计迎合毛泽东，看风向，摸气候，是他的本领。

田家英看不惯他的这一套，跟他关系紧张。姚洛跟田家英有些来往，陈伯达马上就敏感，怀疑田家英是不是在背后搞他。他对姚洛说：“有人反映，你在背后搞你的‘老板’！”

他给毛泽东起草文件，在文件定稿之后，往往要把自己亲笔写的手稿撕掉。姚洛感到奇怪，这些手稿应当存档的呀，他却只管撕掉，不作任何解释（据别人解释，那是陈伯达生怕将来这些手稿给毛泽东看见，诸多不便。因为解放后毛泽东事忙，有些以毛泽东名义发表的文章，是由陈伯达起草的。陈伯达的心眼多，处处提防着，以免惹是生非）。

康生身边的人，一个个被康生提拔，身居要职。陈伯达不搞这个，这倒并不是说他不热心于培植自己的势力。他是另一种想法，怕自己身边的人一个个拉上高位，太显眼了，容易牵涉到他，给他带来麻烦。这与他总说自己是“教员”、在“文革”中声称自己是“小小老百姓”一致的。他是在“谦逊”背后下功夫。他与康生各有一套“拳经”。

50年代，他的主要工作就为毛泽东起草文件，做文字工作。他不大作大报告，也不大讲课，主要是因为他的话难懂。

除了为毛泽东起草文件外，陈伯达曾打算写一部理论著作《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他调来两个人帮助他收集材料，一个是陈真，一个是徐洪烈。徐洪烈成了他的文书。后来，又调来徐兵、史敬棠帮助收集材料。这样，他那里的工作人员多起来了。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没有写成。后来，把收集到的材料编成《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总共四大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解放后，陈伯达的文思不如从前，写东西不流畅，要反反复复地改。尤其是往毛泽东那里送去的文稿，陈伯达总是小心翼翼的。姚洛记得，有几次文稿装入大信封，已经封好，准备送往毛泽东那里，陈伯达忽然想起什么，又拆开来作修改。还有一次，文稿已由交通员送出，陈伯达又想起什么，派人赶往勤政殿，从毛泽东秘书那里追回刚收到的文稿，作了修改，重新送出。陈伯达生怕在毛泽东那里有半点差池，他深深知道，毛泽东对他的印象好坏，将决定他的仕途前景。

刘叔晏在通县工作了一段时间，想调回来，在中南海工作。可是，调动工作，一时难以办成。这时她生病，便住在家里。姚洛替她办通行证，证上要填写职务，姚洛写了“家属”两字，不料，这件事惹得她极不高兴。她说：“‘家属’怎么成了我的职务呢！”可是，不写“家属”，姚洛又想不出别的合适的符合她的身分的职务！

终于，在1956年，刘叔晏取代了姚洛，成为陈伯达的秘书。

姚洛调走了。

在“文革”中，姚洛挨整。陈伯达要姚洛交代：“你和田家英是什么关系？”直到那时，姚洛才明白他被调走的真正原因：原来，陈伯达早就对姚洛与田家英的接触生疑。陈伯达以己度人，因为他曾想通过田家英摸毛泽东的动态，因而担心田家英通过姚洛摸他的动态！调走了姚洛，由自己的老婆当秘书，陈伯达这才放心了……陈伯达确实“诡”！

长子陈晓达自杀

北京西南角，有一条经过西便门车站通往丰台的并不十分热闹的铁轨。1960年，当一列火车驶过西便门附近，突然一个男青年跳上铁轨，卧倒在上面，火车急刹车已来不及，惨剧便发生了……

死者26岁，男性，核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技术人员，姓陈，名晓达——陈伯达的长子。

陈晓达正处于青春焕发的黄金岁月，怎么会突然选择了这么一条绝路？

他，在苏联莫斯科大学物理系毕业之后，于1958年回到北京，与陈伯达生活在一起。有时候，他也去看望自己的生母诸有仁。

刚刚回国的陈晓达，讲一口俄语，而汉语却忘得差不多了。在家里，他跟陈伯达用俄语交谈。

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会讲汉语，不仅没法在中国工作，连日常生活也诸多不便，陈伯达不得不把儿子送到北京大学旁听汉语课。

大抵因为是高干子弟的缘故，陈晓达被看作政治上绝对可靠，所以他被分配到机密单位——核工业部工作，尽管他学的并不是核物理专业。

陈晓达住在中南海，工作单位又不错，领导上分配他与苏联专家一起工作，他的生活道路铺满了鲜花。

最使他感到幸福、得意的是，他有一位中意的姑娘。此处以 M 相称。

M 与他可以说“门当户对”。M 也住在中南海，而且住在甲区。M 的父亲职务比他的父亲高。M 与他从小结识，况且 M 也曾在苏联生活，也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

陈晓达与 M 处于热恋之中。M 常到陈晓达家，一谈便到夜深。陈晓达也去 M 家，听她从苏联带回来的唱片。

冬日，他俩从中南海向北，过了桥，到北海公园溜冰。他俩像春天的燕子一般飞快地掠过冰面，用俄语呼喊着，嘻笑着，引得许多年轻人投来羡慕的目光。

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关系也逐渐明朗化，咔嚓，咔嚓，照相机留下了他们的许多合影。

到了 1960 年，陈晓达 26 岁了，是该正式提亲了。

就陈伯达来说，对这门亲事举双手赞成。因为陈伯达在 M 的父亲手下工作，倘若能够结亲的话，还能力他在政治上提供“保险”——这么一来，M 的父亲也许会在政治上给他以支持，至少不会在风向大变时把他整倒。

可是，事与愿违。向来与陈晓达过从甚密的 M，突然提出与他中止恋爱关系，只保留一般的朋友关系。M 没有说明来自她家庭的意见。

陈晓达受此当头一棒，心烦意乱，而那几天，正由他主持进行一项重要的实验。在精神恍惚之中，他的实验出了大事故！

双倍的打击，使感情脆弱的陈晓达一时想不开。他曾想找父亲谈一次，可是，正遇上陈伯达手头事忙，对他说过几天再谈。

陈晓达苦闷已极，独自前往西便门，走上了绝路……

为了生怕陈伯达受刺激，陈晓达之死被瞒着。M 也不知道真相。

直到 1 年之后，陈伯达才知道长子之死。他大声嚎啕。可是，早已无济干事……

为“第一夫人”捧场

1966 年 11 月 26 日，毛泽东最后一次——第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从 1966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以来，三个多月中，毛泽东已接见了 1100 多万红卫兵。

已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站稳脚跟的江青，也急于公开亮相。她能“接见”谁呢？自诩为“无产阶级文艺英勇旗手”的她，要“接见”她的“文艺大军”。

1966 年 11 月 28 日，首都文艺界举行盛大集会。江青登台，陈伯达带着“中央文革”的“秀才”们为之捧场。

江青在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讲。这篇演讲，成为她继《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之后的第二篇“力作”，这篇讲话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公开发表，成为“学习文件”，而且还收入 1968 年 2 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青同志讲话选编》。

鉴于这是江青第一回登台公开亮相（她的以前的种种在群众场合的即兴讲话，只是被用油印机印成传单散发而已），她的讲话将向国内外发布，所以她在向“文艺界的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致以“无产阶级的革

命敬礼”之后，就“说说我自己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过程”。

江青从“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说起，到发现“《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到争取“批评的权利”……在谈了冗长的“认识过程”之后，江青谈及了“文革”。她提及了陈伯达：

六月一日，北京大学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发表以后，我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观察形势，分析形势，我感觉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这一个来月，我开始大量注意学校……毛主席是7月18日回到北京的，我是7月20日回到北京的。原来应该休息几天，但是听了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在京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们的意见，我就报告了毛主席。我感到需要立刻跟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去看大字报，倾听革命师生的意见。事实同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派工作队的人所说的完全相反，广大群众热烈欢迎我们，我们才知道，所谓北大“六·一八”事件，完全是一个革命事件！……

接着，江青大言不惭地谈起了“京剧革命”的“伟大成绩”。她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怕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在这次大会上，陈伯达又一次给予江青以“巨大的支持和鼓舞”。上一回——1966年4月24日，陈伯达在北京广播学院的那一番对江青的“高度评价”，还只是印在传单上。这一回，陈伯达发表讲话，对江青作了“热情赞扬”。他的讲话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理论家”的“热情赞扬”，对于公开亮相的江青来说，是何等的需要。

陈伯达在讲话中，称赞江青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讲话原文如下：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用无产阶级宇宙观，系统地、彻底地解决了我们文艺战线上的问题，同时，系统地、彻底地给我们开辟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一条完全崭新的道路。

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出了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在毛主席的这一伟大号召下，在毛泽东思想的直接指导下，掀起了京剧改革，芭蕾舞剧改革，交响音乐改革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革命改革的高潮，用京剧等形式，表达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群众英勇斗争的史诗。这个新的创造，给京剧、芭蕾舞剧、交响音乐等以新的生命，不但内容是全新的，而且在形式上也有很大的革新，面貌改变了。革命的现代剧，到处出现在我们的舞台上。这种无产阶级新文艺空前地吸引了广大群众。但是，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却咒骂它，恨死它。不为别的，就是因为这种新文艺的作用，将大大加强我国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将大大加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我在这里想说，坚持这种文艺革命的方针，而同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同志中，江青是有特殊的贡献的。

陈伯达的讲话，激起久久的“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号声。“理论家”的“赞扬”，为江青的亮相投射了一束明亮的光。

此后，陈伯达仍不时为江青当吹鼓手。1967年5月23日，陈伯达在首都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大会上，吹嘘江青是“打头阵的”：

江青同志一贯坚持和保卫毛主席的文艺革命路线。她是打头阵的。这几年来，她用最大的努力，在戏剧、音乐、舞蹈各个方面，做了一系列革命的样板，把牛鬼蛇神赶下文艺的舞台，树立了工农兵群众的英雄形象。许多文艺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同江青同志一起，成为文艺革命披荆斩棘的人。

陈伯达如此“热心”地“树”江青，拍江青的马屁，讨好江青，其实也是为了稳住他那“中央文革”组长的交椅。江青已在“中央文革”说一不二，掌握了实权。

江青当然感谢“理论家”为她捧场，不过，在这个骄横的女人眼里，陈伯达这“老夫子”只是个“迂儒”罢了。康生瞧不起陈伯达，骂他是“乌龙院”的“院长”，而江青也目中无人，骂他是“刘盆子”。

刘盆子何人？那是东汉时赤眉农民起义，欲立新帝，选中了刘盆子。刘盆子是西汉远支皇族，算是刘邦的后裔，起初在起义军中放牛，号力“牛吏”。刘盆子沾了皇族的光，在公元25年初立为皇帝，年号建世。江青骂陈伯达为“刘盆子”，挖苦他当“中央文革”组长如同刘盆子当皇帝一样。

江青还嘲笑陈伯达是“黎元洪”。黎元洪原是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旅统领。1911年武昌起义时，黎元洪吓得趴在床底下，可是革命军却把他从床下拖出来担任军政府鄂军大都督！

陈伯达和江青之间，捧捧骂骂，在“中央文革”里争争斗斗。陈伯达常常斗不过这位“第一夫人”。气愤之际，陈伯达竟然也说：“我成了刘盆子！”在陈伯达看来，刘盆子不过是傀儡，他也成了傀儡。

尽管“理论家”与“第一夫人”在“中央文革小组”勾心斗角，但他们毕竟是一伙，在推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完全一致。

陈家墙上的可疑脚印

就在“理论家”为江青的公开亮相捧场一番之后，他的家中发生了一桩不大不小的怪事。

一天，忽然有人向陈伯达的妻子刘叔晏报告：在陈家后门的外墙上，发现几个可疑的脚印！

刘叔晏过去一看，觉得那脚印确实有点蹊跷，怎么会落在墙上呢？

大抵是“阶级斗争”观点太强的缘故，陈家怀疑有人翻墙入院，或者爬上墙上观察陈家动静。

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家中出现这等怪事，那还得了？

刘叔晏马上告诉保卫部门。于是，来了几个公安人员，对着陈家墙上的脚印拍照。

究竟是谁的脚印呢？首先受到怀疑的，自然是陈家的近邻。

与陈家一箭之隔的是董必武家。董必武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解放后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的女儿董楚青在《我的爸爸董必武》

（见《历史在这里沉恩》，华夏出版社）一文中，曾回忆道：

第二十六届乒乓球锦标赛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乒乓球热，我爸爸竟然也被小小银球吸引。他每天在工作人员督促下，也要推挡近一刻钟的“卫生球”——爸爸把不激烈竞争、高抬平稳的推挡球，叫做“卫生球”，因为这是一种对于任何一个青年人都会出汗的打球法。球室设在我们家东边院墙外一个废弃不用的汽车停车房里。“文化大革命”前，爸爸常常是打完球，从球室的那扇很大的东门走向中南海海边，散散步，或坐一坐，为了消消汗。“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距乒乓球室东侧三四米远一个院子里住着陈伯达的保姆，据说为了安全，为了保密，有人——总是有这样一些眼睛、鼻子灵得“可爱”的人，他们灵活的头脑总分得清来头、势头——把爸爸常常走的这扇乒乓球室的大门用木板交叉钉死。事前没有商量一下或者通知一声，好像根本不屑于交涉似的，也许的确不用交涉，在一个国家主席可以被任意揪斗的年代里，难道为了钉个木条，钉上去几颗钉子，还有必要找人去商量吗？！

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这样的情况下，爸爸和妈妈商议搬出中南海……

除了董家受到那些“眼睛、鼻子灵得‘可爱’的人”的怀疑之外，那个关于脚印的问号还在中南海不断扩大……

消息终于传进了江青的耳朵。江青一听，发脾气了：“中南海是什么地方？你陈伯达拍什么照片、查什么脚印？你给我搬出中南海去！”陈伯达当时住在钓鱼台，知道脚印一事之后，回到家中，跟刘叔晏吵了一架，已无济于事。这位堂堂的“中央文革”组长，只得忍气吞声，受他的那位第一副组长的调遣，准备搬家。

没多久，陈伯达便搬离了中南海，到附近的新建胡同去住。

那么，陈家后门院墙上的脚印，究竟是谁留下来的呢？

据云，是一位中学生，出于对这位“中央文革”组长的气愤，对着陈家的院墙喘了几脚，如此而已。既没有翻墙而入，也没有“偷听”、“偷看”。

可是，这一起“脚印案件”，居然导致陈伯达迁出中南海，真是始料不及……

陈伯达埋怨着刘叔晏，夫妻关系原来已有些不和，这么一来更加紧张。好在已经搬出中南海——在中南海吵架，陈伯达生怕给左邻右舍听见。

“你别神气！如今，倒了那么一大片人，你也迟早会倒的！”刘叔晏跟陈伯达吵架，有时蹦出这么一句话，弄得陈伯达心中也好一阵紧张。

家中常常闹别扭。陈伯达就住到钓鱼台去，难得回家看看。

“你也迟早会倒的！”这句话不知怎么的，不时在陈伯达耳际回响。

“什么‘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吃人！”有时，刘叔晏言词更加尖锐。

“理论家”一听这话，脸色都变了。

从第四把交椅上摔下来

时光到了1970年8月。

毛泽东主席第二次选择了庐山作为中共中央全会开会的地点。从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成为陈伯达一生政

治生涯的终点。他，一下子成了全党批判的对象。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号召全党“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那样一些人的当”。毛泽东的这段话，是针对陈伯达说的。陈伯达顿时从政治的峰巅，跌入了峡谷之中。

毛泽东在庐山发动了一场新的运动——名曰“批陈整风”，迅速推向全国。“批陈”，就是批陈伯达。

陈伯达快快地从庐山回到了北京。他闷闷地步入北京地安门大街米粮库胡同家中。那是一座宽敞的四合院，原是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上将住的。陈伯达怕冷，搬进去时修了个玻璃走廊，这位“大秀才”嗜书如命，乃“万卷户”，秘书“二王”——王文耀、王保春特地为他请人修了个书库。书库里，放满陈伯达个人的藏书：30000多册自然科学书籍，30000多册社会科学书籍。另外，还有一间房子专放线装古书。

陈伯达不抽烟，不喝酒，“像样子”的衣服也没几件。他的一些稿费，全花在买书上。此刻，原本门庭若市的陈宅，冷冷落落，门可罗雀。他躲进了书房。平素与书为友的他，如今竟怎么也看不进书。

陈伯达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见一见毛泽东主席！他毕竟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政治秘书，希望向毛主席一吐心中的痛楚。

陈伯达一次次给主席那小个子秘书待业夫挂电话，求见主席。得到的答复，要么是“主席已经休息了”，要么“主席正忙”，反正休息了不能见，工作时也不能见。显然，毛泽东婉拒了他的求见。

陈伯达亲笔写下的回忆，有这样一段：

回北京后，想再三求毛主席、中央宽恕。晚上，打电话到毛主席处，想求见他。过了一会，毛主席的秘书回电话：毛主席刚开完会，很疲乏。当然，我不好——再求。打电话给康生，康生不接。要曹一欧（引者注：应为曹轶欧，即康生之妻）接，她也不接。

但是，当打电话给恩来同志时，周恩来同志的秘书要我稍等。不一会，周恩来同志来接了。说话的语气是亲切的。这是我终生难忘的。

周恩来同志不因为一个人犯过错误，遇到困难，就加以鄙弃，却是给以希望。我想，这是崇高的共产主义伪道德。

回北京后，有几个晚上，在郊外散步，为的是排遣自己的苦闷。后来，得到通知，不要再出去，国庆节将到，怕遇见外国人……

“遇见外国人”怕什么？何况又是晚上，又是郊外，会“遇见外国人”吗？

就连他的秘书也接到通知，不许往外走，不许往外打电话。不言而喻，陈伯达失去了行动的自由。

陈伯达在他的手稿中，继续写道：

从此，即禁闭在自己家里，开始，整本参考消息（引者注：即通常所称《大参考》）还给，以后也不给了。

有迹象，是要逮捕送监，我感到绝望，托那位管药的同志：在要实行逮捕时，请他设法把一批安眠药给我。我这样一说，他不愿意出事，把药都退给医务所了。

我的确不想坐自己的监（引者注：此处“自己”指“自己人”的意思）。

这一天毕竟来临了——1970年10月18日。

这一天，陈伯达原先的警卫调走了，新来的8341部队不再是“保卫中央首长安全”，却是对他实行就地监禁。后来，他的刑期就从这一天算起，他被判处18年徒刑。

在1970年10月18日这一天，他的两位秘书王文耀、王保春失去了自由。他们被押送到北京政法学院，隔离起来。

也就在这一天，陈伯达不再拥有三辆轿车：黑色的“红旗”、灰色的“吉姆”和褐色的“伏尔加”，他的司机于子云也被拘押。

就连他家的女工、保姆，原福建泉州制药厂女工陈顺意，也在这一天被关押。

他是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他名列第五。1967年初，在陶铸被打倒之后，他成为“第四号人物”，如今，他这个“第四号人物”，被一笔勾销了。

云谲波诡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又倒下了一名主角。

在秦城监狱过着“特殊囚犯”的生活

陈伯达过着如坐针毡、度日如年的日子。

如此这般，他度过了漫长的10个月又25天。

日历翻到震惊中外的一天——1971年9月13日。

陈伯达吃了安眠药，正在梦乡漫游。凌晨1点55分，一架编号为“二五六”的三叉戟飞机，由中国境内越过中蒙边界四一四号界桩上空，飞入蒙古境内。没多久，这架飞机的踪迹从中国空军的雷达荧光屏上消失。

飞机上坐着谁？中国方面是知道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他的妻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群，他的儿子、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

那架飞机越过边界之后，去向不明，下落不知。

周恩来通过长途电话向各大军区负责人通报了紧急情况，并发布命令：

庐山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叛国逃跑了！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以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

知道那架飞机“折戟沉沙”的消息，是在翌日下午——我国驻蒙古大使馆发来的报告。

就在林彪生死未卜的13日清晨至14日下午之间，已经被软禁了10多个月的陈伯达受到了密切注意——尽管他对庐山会议后的林彪情况一无所知。9月13日凌晨，安眠药的药力已经发作，陈伯达刚刚迷迷糊糊入睡，突然听见有人大声地在喊他，那声音是陌生的。

陈伯达吃力地睁开惺松睡眼，看见几个穿着军装的彪形大汉站在他的床前，他尚未弄清发生了什么事，不由分说，两个大汉像抓小鸡似的，一个夹着他的一只胳膊，把他从床上拉起，塞进了汽车。

汽车出了北京城，奔驰在郊区的公路上。

凌晨，汽车驰抵一个高墙包围着的地方。当时陈伯达并不知道这里是秦城监狱，但是他下车一看，便明白他落到了什么样的地方。

他在回忆中写道：

当逮捕送到监狱时，在狱门口不愿进去，我大声说道：“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儿的！”

什么“阜平”？河北省西部的阜平也。

陈伯达为什么要在押入秦城监狱时，大声提及这么个小县城？他在那里到底做过什么“好事儿”？

这“好事儿”，他往日从未在人前提到过；此时此刻万不得已，才大声地喊了出来。

这“好事儿”，他知，毛泽东知。

刚入秦城的时候，陈伯达被关在条件很差的牢房里，连床都没有。他想一死了之：

记得初进狱时，睡在地下草垫子上，看守的同志在门外很难察觉我在做什么。我在铺盖的掩护下，暗中的做法是想自杀了事……忽然，连他自己都未曾想到，他的监狱生活大为改善。他在秦城过的日子，竟比家里还舒服。有专门的炊事员为他掌勺，还不时前来征求他对伙食的意见！在秦城监狱里，像他这样的待遇，是颇为罕见的。

诚如他所回忆的那样：

过了几天，或许我在监狱门口说的那句话已往上报告（引者注：即把陈伯达所说“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儿”这句，向毛泽东汇报），于是把我转移到一个三楼上（整个三楼只关闭我一人），睡床了。生活特别优待，每天都有大夫来看，吃得很好，甚至比在家里吃得要好。我的性命能到今天，非常感谢秦城管理的同志。当然，他们是执行党的意见的，我非常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

我想：只要还活着，问题是可以说清楚的。因此，心情慢慢地平下来，断了自杀的念头。

我是很感念、永远感念毛主席的。就个人关系说，在三十年中，他给我重大的教育，使我能够稍为知道中国革命的某些道理。毛主席帮助给了我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些条件。虽然我极浅薄，常犯错误，即使看过一点材料，写过一点东西，也毛病百出，经不起严格审查，这只能说明我的无能。我真正感到求知之难。学生不成秦，是不能怪先生的。

我承认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天才人物。他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是前无古人的。当然，历史上任何天才人物，即使是无产阶级的伟大人物，也不可能不会有些缺点或错误。略读一下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似乎可以使人略知这类问题的一二……

陈伯达对于毛泽东主席迄今仍怀着深深的崇敬之情。尽管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狠狠地抨击了陈伯达的关于天才的观点，而他至今仍认为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天才人物”。

由于毛泽东的关照，陈伯达在那高墙四围、哨卡林立的秦城狱中，居然过着颇为优裕的生活。这时，批林批陈运动，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中国。

陈伯达在狱中，每天细细地读着报纸。

陈伯达的“特殊囚犯”生活，持续到毛泽东去世。

此后，他的铁窗待遇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大致相同。

1978年，他因病被送入北京公安部门属下某医院诊疗。他所住的是单间病房，约十平方米。屋里一张床，一个马桶，一个自来水龙头和一个小水斗。公安人员看守着那一扇小门。窗上装着毛玻璃，窗外装着铁栏杆。小门的插门不是装在门里，而是装在门外——他无法开门，而看守却可以把他关在屋内。

1979年，他的病房里多了一块地毯。

押上最高法庭被告席

1980年冬日，76岁的陈伯达在聚光灯的照耀下，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沉寂多年的他，成为众多的照相机、电影摄影机、电视摄像机镜头聚焦之点。通过报纸、电视、广播，人们得知他被押上最高法庭的被告席，第一个直觉式的反映是：“哦，陈伯达还活着！”

被告席上站着10名被告，陈伯达排在第五位，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在提及陈伯达时是这么说的：

被告人陈伯达，男，七十六岁，福建省惠安县人。逮捕前任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在押。

在10名被告中，最年轻的是王洪文，45岁；最年长的，便是陈伯达。那9名被告都是自己走上被告席，而陈伯达则是由两名法警左右挟扶，步入法庭。

他的中式棉袄外，罩了一件旧的卡其绿军装，戴着一副老式深色边框的眼镜，看上去目光呆滞。虽然步履蹒跚，头脑还算清楚。

作为被告，陈伯达在1980年11月20日与另9名被告一起，出庭听取起诉书之后，曾于11月28日及29日两次出庭接受庭审。他是10名被告中接受庭审次数最少的一个：江青五次，张春桥三次，姚文元三次，王洪文三次，黄永胜五次，吴法宪四次，李作鹏四次，邱会作五次，江腾蛟四次。

对于陈伯达的第一次庭审，主要是三项内容：伙同江青、康生批斗刘少奇；诬陷迫害陆定一；利用“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

对陈伯达进行第二次庭审，则是另两项内容：制造冀东冤案；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1980年12月18日，最高法庭就陈伯达问题进行辩论。

上午9时起，陈伯达用他那令人难以听懂的“福建普通话”，为自己进行了一小时的辩护。

在陈伯达结束讲话之后，他的辩护律师甘雨沛站了起来，为他作了如下辩护：

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我们接受委托，作为被告陈伯达的辩护人（陈伯达的另一位辩护律师为傅志仁）。我们接受委托之后，认真查阅

和研究了本案的案卷材料，多次会见了陈伯达……

我们对本案已经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特提出以下几点辩护意见：

一、被告陈伯达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被告陈伯达在诬陷、迫害刘少奇这一共同犯罪活动中，他负有一定罪责，但他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于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被告陈伯达早在1970年庐山会议时就被揭露，同年10月即被隔离审查……而事实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陈伯达被揭露以后，还继续进行犯罪活动长达6年之久……他不能对这些罪行负责。

二、关于被告陈伯达在冀东事件中应负的罪责问题……他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但是，成千上万人被诬陷、迫害，数千人死伤的后果，也绝非仅仅由于被告陈伯达的话所能造成的，实际上还存在一些其他因素……因此，陈伯达对此严重后果，应负一定罪责，而不能负全部责任。

三、关于被告陈伯达的态度问题。被告陈伯达在庭审过程中，承认了全部犯罪事实和所造成的后果，承认他的“罪恶是重大的”，并一再向法庭表示他承担罪责，接受应得的惩罚，态度是比较好的。

以上三点辩护意见，请法庭在评议本案，确定被告陈伯达的刑罚时，作为从轻的理由予以考虑。

在辩护律师结束发言后，陈伯达再度要求陈述，说了三点意见：

批判刘少奇这个问题我负有大罪，我只说一句。

对陆定一同志，在专案组上我写了那个三条，也是有罪的。

第三，冀东的问题，我说了那些话是有罪的……

至此，主持法庭辩论的审判长曾汉周宣告：“现在宣布辩论终结。陈伯达，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陈伯达第三次在法庭上发言。他请求法庭对他宽大处理。他说“整个案子可以判处死刑”，但是“不一定采取这个措施”，当然，如果“不能平民愤，那么杀掉也可以”。

陈伯达陈述毕，审判长对他说道：“被告人陈伯达，法庭要进行评议，你等候宣判。听懂了吗？”

陈伯达答道：“听懂了。”

法庭辩论至此结束。

一个多月以后，1981年1月25日，宣判的日子终于来临。那天，10名被告一起被押上法庭。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判决书，长达16000言，前半部由庭长江华宣读，后半部则由副庭长伍修权宣读。

判决书中这样提到陈伯达的罪行：

被告人陈伯达，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的主犯。陈伯达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

陈伯达控制宣传舆论工具，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1966年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口号，煽动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迫害镇压。

1967年7月，陈伯达伙同江青、康生决定对刘少奇进行人身迫害，从此

剥夺了他的行动自由。

1966年底至1968年，陈伯达多次诬陷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是“现行反革命”、“叛徒”、“内奸”，并决定对他进行人身摧残。

1967年12月，陈伯达在唐山说：中共冀东地区组织“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由于陈伯达的煽动，使冀东冤案造成严重的后果，大批干部和群众受到迫害。

被告人陈伯达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

判决书指出，陈伯达“供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判处被告人陈伯达有期徒刑十八年”。

判决书上还对刑期作了明确的注释：“以上判处有期徒刑的被告人的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因此，陈伯达的刑期，实际上是从1970年10月18日软禁之日起算。

在保外就医的日子里

过了一年多——1981年8月，陈伯达获准保外就医。

陈伯达获准保外就医，住在哪里呢？显然，他已无法回到米粮库胡同那四合院里。

北京市公安部门为他寻觅新居。征求他的意见，他说：“希望住平房。”

他向来住平房。不论他进京以后最初在中南海住的迎春堂，还是后来在新建胡同、米粮库胡同的住处，都是四合院，平房，或者是两层楼房。他不爱住高楼。尤其是他已上了年纪，上上下下诸多不便。

可是，在北京寻找独门独院的平房，并不容易。新盖的几乎都是楼房。

公安部门考虑到他的安全，几经研究，还是为他安排了一幢僻远的新楼的顶层的一套房间。公安人员住在他的隔壁，以防种种不测——因为他毕竟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另外，有公安人员作为他的邻居，可以挡掉一切未经许可的来访者。

谁来照料他呢？

他曾有过三次婚姻：

最初的妻子叫诸有仁，生过一个儿子，取名陈晓达。陈晓达已经死了。

他与诸有仁离婚之后，与余文菲结合，又生一个儿子，取名陈晓农。

他跟余文菲又离婚，与刘肃晏（后来改名刘叔晏）结婚，先生一女，取名陈岭梅；再生一子，取名陈晓云（小名小弟），另外，刘叔晏与前夫刘光曾生一女，叫刘海梅。

在“文革”中，他和刘叔晏不和，曾分居。他俩说过离婚，但又未办过正式离婚手续。

虽然诸有仁、余文菲、刘叔晏都健在，却又都无法与他再一起生活。

公安部门考虑到陈晓农与他的关系比较融洽，决定请陈晓农来照料他。

陈晓农原在石家庄一家工厂工作，1979年与同厂一位女工结婚，生一子。

征得陈晓农的同意，他的一家迁来北京，与父亲陈伯达住在一起。

于是，陈伯达在过了十来年孤独的囚禁生活之后，过着安定温暖的晚年，享受天伦之乐——这一切，外人莫知，还以为他囚居秦城呢。即便在秦城，他也受到特殊照顾，这也是外界从不知道的。

陈伯达的家有六七十平方米，有客厅、书房、他的卧室、儿子和儿媳的卧室、灶间、卫生间。

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陈晓农，为人随和、诚挚。妻子贤惠、朴实。他们细心地照料着陈伯达。

陈伯达的卧室大约十多平方米，整洁而简朴：一张三尺半宽的单人床，硬板，铺着蓝白方格床单，一个硕大的鸭绒枕头。床边是一个床头柜，两个玻璃书橱，窗边放着一个五斗柜。地上铺着地毯。

屋里的“常客”是他那7岁、上小学二年级的孙子。小孙子给他带来了欣慰。

他的视力不错，耳朵也可以。每天晚间的电视新闻节目，他是必看的。倘若电视台播京剧或者古装故事片，他喜欢看。现代剧目他不大看，尤其是那些年轻人谈恋爱之类的电视剧，他不看。

他最大的兴趣是看书读报，看《人民日报》，看《参考消息》，看《北京晚报》，很注意国内外的形势。他也很仔细读那些与“文革”有关的文章。他的邻居很好。倘若陈家无人下楼取报，邻居就把报带上来，插在他家门把手上。

他不断地要他儿子给他买书。他的阅读兴趣广泛，偏重于读那些学术性强的著作。他的书橱里的书排满了马克思著《资本论》、《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鲁迅杂文选》、《毛泽东选集》、《刘少奇选集》、《周恩来选集》、《朱德选集》、《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哲学史》、《隋唐演义》、《五代史演义》、《戊戌喋血记》、《柳宗元集》、《彭德怀自述》、《苏联经济史论文集》、《逻辑学》、《美学》、《罗马史》、《西方美术史话》、《哲学史讲演录》、曹聚仁著《我与我的世界》、《谭嗣同文选注》、《（红楼梦）诗词注释》、《史记》、《基度山恩仇记》……一本打开在那里、看了一半的书是《圣经故事》。

书如海，从书海中撷取的这些令他产生兴趣的书，反映了陈伯达晚年的精神世界。

他，依然秀才本色。读书看报是他最大的乐趣所在。他的思想机器还在不停地运转。

他在思索着。高楼清静，几乎没有什么杂音——只是偶尔听见住在这幢楼里的一位著名女歌唱家练唱时飘来的甜美的歌声。

他不断把自己的思绪凝成文字。所幸他的手不抖不颤，仍能握管著文。虽然正在服刑期间的他，无法发表他的文稿，他却还是在那里写作。

他的文稿，有些被人送上去，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排印出来，在一定的范围内分发。这些印出来的文章，除了标明作陈伯达的名字外，没有注明什么单位印的，也没注明印数和分发范围。不过，印刷所用的是上好的道林纸，十六开，大字仿宋体排印，可以看出不是一般的机关所印，是在相当高的政治层次中分发。

他的这些未曾公之于世的文稿，充分体现了他独处高楼时的思索：

1982年1月，《试论一下日本的“生产率运动”》；

1982年3月，《美日两国垄断资本的角逐和两国的“精神危机”》；
1982年5月22日，《求知难》；
1982年6月22日，《认识的渐变和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中的顿渐两派》；
1982年8月4日，《“黑格尔反对绝对……”》（读书笔记）；
1982年9月18日，《儒法两家“其实却是兄弟”（评四人帮杂记）》；
1982年9月25日，为上文写了《附记》；
1982年12月22日，《事物一分为二（读书笔记三则）》；
1983年3月23日，《“电子学革命”的公开战秘密战》；
1983年，《（石头记）里的一段公案——关于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姻缘问题》；
1983年9月，《试说社会主义农业的若干问题》；
1983年12月初，《同痛苦转变进行搏斗——电子学革命问题杂缀》；
1984年6月26日，《评美国人的两本书——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
1985年3月，《基督教东来记——利玛窦（中国札记）和史式微（江南传教史）二书述略》；
1985年6月17日，《读书四记》，即《辩证法和理性》，《略说“尺度”》，《关于唯意志论、反理性主义、直觉主义、实用主义等等》，《记黑格尔、恩格斯、列宁谈形式逻辑》；
1986年1月，《长思》；
1986年春，《关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点滴》；
1986年11月4日，《农业合作化的若干材料》；

……

他也写了一些历史事件的回忆。

他一般先写草稿。从他的草稿上可以看出勾勾划划，删删改改，画满各种修改记号。改定之后，他再整整齐齐抄写一遍。保持着以往的写作习惯。

他用蓝色圆珠笔，写在北京市场上供应的那种绿格400字稿纸上。文末签署的日期，一般指完成之日，并不意味着是这一天写的。有的文章几千字，也有不少文章上万字。他的字迹清楚，容易辨认，简体汉字中掺杂着许多繁体汉字。

陈伯达的这些新作，似乎缺乏他40年代作品的那股灵气，那种犀利的文锋，过多地引述经典著作，但是作为80老翁，思路还是颇为流畅的，观点颇有见地。以上披露的他的手稿，都是在他从最高法庭的被告席上退下之后写的。他的思想没有停留在不断的自我谴责或者颓废郁闷之中。他把目光从高楼投向远处。正因为这样，他连美国新著《大趋势》、《第三次浪潮》都加以研读，加以评论。

陈伯达之死

1989年9月17日傍晚开始，北京骤降暴雨，竟整整下了一夜。

翌日，气温剧降。

9月20日中午，在北京远郊一幢六层楼房的最高层，85岁的陈伯达正在吃饭，诚如当时在场的他的儿媳所述：“父亲突然头一歪，碰到墙上，食物

吐出……”

儿媳赶紧敲响隔壁房间的门。那里住着公安人员老萧。老萧马上拨电话到某医院。20分钟之内，医生就赶到了。

可是，陈伯达的心脏已停止跳动。抢救无效。经医生诊断，陈伯达因天气骤凉，死于心肌梗塞。

陈伯达是和他的儿子陈晓农生活在一起的。陈伯达突然发病之际，陈晓农却不在家，而在北京驶往河北某地的列车上——他的母亲余文菲住在河北某地，每隔一、两个月，他总要去看望、照料一下母亲，余文菲是陈伯达的第二个妻子，已经离婚多年。陈晓农是陈伯达和余文菲所生的孩子。

据陈晓农事后说：

“前几年父亲住院已检查出患有老年性冠心病，但因他心电图一向较好，又从未有过明显的心绞痛，仅是超声检查有冠脉硬化，所以医生和我们都缺乏足够的重视。9月20日那天，北京天气很冷，早上刚下过雨。我9时多临走时，看父亲睡得正香，不忍叫醒他，给他加了条毯子，又把毛裤放到床前椅上，我爱人说父亲起来后，即说天冷。现在想来，天气骤冷易使血管收缩，老人血管已脆，经受不住，这可能是发生心肌梗塞的原因……”

当天下午，陈伯达所在单位负责人徐主任等赶来，和陈伯达的亲属商议后事处理。亲属明确表示：“听从组织意见，而且父亲生前也一再说过，他去世后一切从简。”

根据领导意见，陈伯达以他原名陈建相，送往北京八宝山火化。

尽管八宝山不知举行过多少回遗体告别仪式，但是陈伯达的遗体告别仪式与众不同：没有讣告。没有悼词。前来与他作最后诀别的，都是闻讯而来的，没有接到任何正式的、以组织名义发出的通知。

9月28日上午10时20分，陈伯达的遗体出现在八宝山第一告别室。那里挂着他的遗像。这些年来他总是躲着照相机的镜头，连家中都找不到他现成的遗像。陈晓农记起去年冬天一位好友为他拍过一次照片，赶紧请摄影者找出底片放大，才算有了一张遗像。

在哀乐声中，40多人向他的遗体投注了最后一瞥。这些人有的是陈伯达的亲戚，有的是他的老朋友，有的是他的旧部下，有的是他的学生。

陈伯达的遗体告别仪式虽然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举行，但是很快惊动了那些竖着耳朵的新闻记者们。

9月29日，美国、英国等电台播出了陈伯达去世的消息，介绍了陈伯达的生平。

同日，香港《大公报》在第二版下部，刊载了两则报道，内中提及在北京八宝山举行的陈伯达遗体告别仪式。

9月30日，新华社从北京发出电讯，电文如下：

本社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陈伯达已于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岁的陈伯达于去年十月刑满释放。

从陈伯达刑满释放，到他猝然病逝，这一年间著名纪实文学作家叶永烈曾多次在北京访问了他。就在他去世的前一星期——9月13日，陈伯达还跟他谈了一下午。叶永烈曾这样叙述那次会见：

那天天气炎热，我穿着短袖衬衫，走上六楼已经出汗了。轻轻叩门。有人从门内窥视镜里看了看我，迅即开了门。那是他的儿媳。认得我。她和丈夫——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一起，照料着陈伯达的晚年生活。

进屋之后，我发觉所有的窗都紧闭着，很闷。可是，陈伯达内穿长袖衬衫、卫生裤，外穿藏青哔叽中山装、蓝长裤，草绿色袜子，圆口黑布鞋，甚至还戴一顶藏青哔叽帽。他跟我，仿佛差了一个季节！

我在他的书房里坐定。那里放着一对沙发，铺着墨绿色的地毯，宽大的书桌上堆满了翻开的书。这里通常是他会客的地方。对于他的家，我是熟悉的。有一次谈到夜深误了公共汽车末班车，我就住在他家。不过，这一回我发觉，书桌上放着砚台，一大把毛笔，一大堆宣纸。这是过去未曾有过的。

“你在练书法？”我问他。

“嗯，锻炼锻炼身体。”他用一口浓重的闽南话答道。说着，眉毛一扬。眉梢的一根眉毛，足有五厘米长，弯弯地垂了下来。

当时，他完全正常，毫无病态——正因为这样，他在一个星期后突然去世，使我颇为吃惊。

如果说病，他倒是有一种老年人的通病，即健忘症。不过，只是对近事健忘，而对年轻时的经历记得清清楚楚。他甚至连常来给他看病的医士也不认得。

“你还记得我是谁吗？”我问他。

“哦，上海的叶永烈。”他倒认出我来了，说道，“我的那篇小说《寒天》，是你帮我找到的！”

他提及的小说《寒天》，是他21岁时写的，发表于1925年1卷9期《现代评论》，是他一生中写的唯一的小说。他曾托我寻找，我在上海帮他查到了。大批因为午睡刚刚醒来，他的情绪很好。我请他回首往事，他一桩一桩地谈着，记得十分清晰。

他说自己的母亲是福建崇武县獭窟人（怕我听不清楚地名，特地写下“獭窟”两字）。他说：“小时候，我按我们当地的习惯，母亲叫娘，祖母叫阿妈。”说到这里，他大笑起来。他记得，郑成功当年收复台湾，是从崇武下海的。

他说年轻时喜欢写诗。曾写过一首长诗寄给郭沫若，郭沫若帮他作了修改。可惜那首长诗未发表，原稿已无从寻觅。

他向我讲述了1927年4月底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经过。

他回忆起自己的初恋，跟诸有仁的认识过程，赴苏留学的经过。

他谈了从苏联回国后，怎样在天津被捕。

他谈及怎样和黄敬一起前往延安。他跟江青第一次见面的经过。毛泽东怎样帮助他修改《评中国之命运》，《中国的四大家族》。

他谈到了田家英、孙维世，谈到了张贞、李大章、王若飞、张中府……

谈兴正浓，忽然听见一阵叩门声。他的儿媳领着三位客人进来。

为首的一位干部模样，穿一身浅灰色中山装，身材壮实，50多岁。他手里提着两盒北京“稻鲁春”月饼。

他的后面是一位穿连衫裙的青年妇女，秘书模样，手提一袋苹果。

最后一位是轿车司机，手提一只塑料桶，几条活鱼正在桶里甩着尾巴。

“陈老，明天是中秋节，给你送月饼！”领头的那一位，用一口地道的北京话说道。

“为什么给我送月饼？你是哪里的？是医院里的？”陈伯达觉得奇怪。陈伯达的奇怪，引起来访者的奇怪。

“陈老，我们来过好多回，你怎么不记得啦？”那位女的说道，“每个月，是我给你送工资。他是你的领导，也跟你见过好多回。”

“见过八九回了！”原来，来访者是陈伯达现在所在单位的主任，姓徐。他对陈伯达说，“去年十月，你刑满时，分配在我们单位里。当时，我还在你刑满仪式上发表了讲话，你不记得了吗？”

“真该死，真该死，我把‘顶头上司’都忘了。”陈伯达一说，大家都笑了。笑罢，他正色道，“我上了年纪，记性不好，请你们多多原谅。我是犯了大罪的人，活在世上是多余的人。你们为什么还给我这样的人送月饼？”

“你已经刑满，而且已经分配到我们单位里，我们就有责任关心你，帮助你。”徐主任说道。

“这么多年，第一次有人给我送月饼！”陈伯达的眼眶润湿了，话音显得激动，“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关心！”

“这月饼是软的，适合老人吃的，还有鱼、苹果，祝你过一个愉快的中秋节！”

“太谢谢了，我实在心中有愧！”

言谈之中，陈伯达完全正常。他说：“我过去归公安局管。他们常来，所以我认得他们。自从归你们管以后，你们一、两个月来一回，加上我记性又差，连自己的领导都不认得了，太对不起了。”

“最近身体好吗？”徐主任问。

“快完蛋啦！快完蛋啦！”陈伯达一边说着，一边大笑。

“最近在家里忙些什么？”徐主任又问。

“我在研究《本草纲目》、《易经》，也常看《诗经》。”陈伯达说，“我小时候念私塾，读四书五经。不过，老师教不了《易经》，就没有教。所以，现在我看《易经》。另外，还练练字。”

他朝书桌指了指。我走过去，把桌上的条幅拿出来，给大家观看。他写的，大都是《诗经》、《论语》上的句子。

他的字，写得端端正正。我忽然发觉一个奇怪的“规律”，说道：“你每一次写字，总是把第一个字写得很大，然后越写越小！”

他哈哈笑了，说道：“我上了年纪，写第一个字时，精力充足，所以写得大，写到后来，没有力气了，所以越写越小，‘虎头蛇尾’！”

他写的条幅，差不多都署“仲晦”两字，我问“仲晦”是什么意思。他答道：“这‘仲晦’，不算正式笔名，是我写字时用的，从50年代起，我给别人题字，落款总写‘仲晦’，‘仲’与‘伯’相对，‘晦’与‘达’相对。”

他说着，从书橱里拿出刻着“仲晦”两字的方章。那是在“文革”前，一位友人刻好送他的。

“陈老，你给我们单位也留点墨宝吧！”徐主任说。

“墨宝？我的字很蹩脚，算不上‘墨宝’。”陈伯达答道，“如果要写的话，我就用《诗经》中的一句话，表示我的心情——‘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我是犯了大罪的人。我一想到我在‘文革’中犯下的大罪，我的心情就会变得沉重，就会‘战战兢兢’。”

说到这里，陈伯达的神情，变得十分严肃。

当客人们告辞时，他站了起来，缓缓地移动着脚步，稍稍弯着腰，为客

人们送行。

徐主任说：“过些日子，再来看你！”

陈伯达送走客人，回过头来，又在沙发上坐下，继续跟我谈他的历史。我的录音机不断录下他的谈话。

我知道他是很不喜欢拍照的人。这一回，我拿出照相机给他拍照，他没有拒绝。这样，我很顺利地给他拍了十来张彩照。

他不分寒暑，总爱戴着帽子。上一回我给他拍照，他也一直戴着帽子。我曾请他摘下帽子，他不肯，并且说他过去拍照，都戴着帽子。这一回，我再三请他拿下帽子，他答应了。其实，他并非秃子，只是平常怕感冒，热天也戴帽子。

他居然戴好老花眼镜，拿起茶几上的《人民日报》，摆好姿势，让我拍照。我赶紧抓住机会拍照。

我请他题诗送我，他用《论语·述而》中的《楚狂接舆歌》相赠：“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这句诗，十分恰当、确切地表达了悔过自新的姿态。

一直谈到暮色降临高楼，我向他告辞。

临行，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办？他说，他在1937年3月，曾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过文集《真理的追求》。他已经没有这本书了。如能在上海查到此书，请把书中的《论谭嗣同》一文复印送他——因为他手头虽有1934年2月由上海人文印务社出版的《论谭嗣同》单行本，但是印错之处太多，何况此文收入文集时，他又作了相当多的修改。我答应了回上海之后查找《真理的追求》一书，尽快把复印件寄给他。

不料，一个星期之后，他的漫长的一生便画上了终止符。

我给他拍的那些彩照，成为他一生中最后的照片。他凝固在我的录音磁带上的声音，成为他留在人世的最后的声音。

他题写的《楚狂接舆歌》，成为他一生的绝笔。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成了他向世人的“告别辞”。

当他离世之后，我在录音机旁重听他的声音，思绪飞到了一年前的那些日子里……

服刑十八年终于期满

1988年10月17日，北京已是一片深秋气氛。这一天是陈伯达刑满之日。

这时的陈伯达已是耄耋老翁，体弱多病，在刑满前已经保外就医多年。

1988年9月26日，他因患急性前列腺肥大症，又一次住进医院。

于是，到1988年10月17日，他的获释仪式便在医院举行。

上午10时，医院里来了许多头戴大盖帽、身穿橄榄色警服的公安人员。陈伯达所住的单间病房里，顿时变得拥挤起来。负责拍照、录音、录像的公安人员在忙碌着。

公安部副部长郑重其事地向陈伯达宣布：“今天，是你服刑18年的期满之日……”

85岁的陈伯达坐在病床上面对录音话筒，只是低声地喃喃几句，似乎并未对刑期的结束表现出过分的高兴。

接着，宣布把陈伯达分配到北京市某单位工作。那个单位的领导人徐主

任也说了几句话。

简短的仪式，就这样结束了。

陈伯达，久经沧桑的历史老人，不论谁都无法回避——他是研究中国当代史必须涉及的人物。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 16 名主犯之一；在“文革”中，他是“中央文革”组长，经历过“文革”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他的；他还曾是毛泽东多年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的一支笔，《红旗》杂志主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Concis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中文版第二卷 262 页《陈伯达》条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5 年版）这样介绍说：

陈伯达

Chen Boda (CHENPO—TA)

（1904——）福建惠安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 年从苏联回国，在北平中国大学任教。1937 年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教书，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中央秘书处、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机构工作，在此期间写过《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政治论著，成为在党内有影响的理论宣传家之一。1945 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七届二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中共八大后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及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总编辑等职。著有《毛泽东论中国革命》等书，并协助毛泽东起草过一些党的文件。“文化大革命（1966—1970）期间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因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1976 年 9 月被捕。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1981 年 1 月 25 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

这一条目基本上是准确的，但有一处明显的错误：陈伯达被捕，不在“1976 年 9 月”而是 1970 年 10 月 18 日。或者严格地说，在 1970 年 10 月 18 日被拘押，直至 1976 年 9 月才补办了逮捕手续。

第十五章 周恩来带来特殊人物，毛泽东谈笑试晴雨。“联合舰队”覆灭

毛泽东秘晤熊向晖

一辆轿车驶出国宾馆，开往中南海。已经是午夜时分，街上静寂无人。后座上的周恩来默默沉思着。坐在他身旁的熊向晖则对此行的目的一无所知。

这是 1971 年 7 月 9 日，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

就在这天中午 12 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会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乘巴基斯坦的一架专机，秘密抵达北京。

基辛格在北京只能停留 48 小时。周恩来总理同他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第一轮会谈从下午 4 时持续到晚上 10 时。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尚未赴任的驻加拿大大使黄华，外交部欧美司司长章文晋、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和翻译冀朝铸、唐闻生。此外，还有一位颇难描述的人物，他就是本文所要叙述的事件中扮演了一个微妙角色的熊向晖。

熊向晖是以国务院总理助理的名义参加会谈的。他于 1962 年接替宦乡担任我驻英国代办（此时中英两国尚未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967 年 1 月和其他驻外使节一起奉召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挨批挨斗。由于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的保护，他才幸免于难。1970 年 11 月，出乎他的意外，他竟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部副部长，主管国际形势的研究。1972 年，又重新调回外交部工作。他这段军队履历虽然短暂，却和本文密切相关。

周恩来在同基辛格结束了第一轮会谈以后，带领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人员走到钓鱼台另一座楼。他立即让王海容打电话联系，问什么时间去毛泽东那里汇报。王海容问都有谁去，周恩来说让她和唐闻生同他自己三个人去。电话很快就打通了。王海容转告周恩来说：“主席让现在就去，还让熊向晖也会。周恩来吩咐王海容和唐闻生先走一步。”他收拾了一下公文包，服了药，便与熊向晖一起上了车。

此时，熊向晖则在大脑中迅速地筛选最近的国际大事，推断基辛格的秘密访问一旦公开，可能引起什么样的国际反响。他满有把握地以为，毛泽东找他去，是要了解国际形势。

对中南海，熊向晖并不陌生，早在 20 多年前，他就曾在这里轰动。那是 1949 年 11 月 6 日，周恩来在勤政殿招待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国民党当局原派的和谈代表的宴会上，指着刚走进来的熊向晖向在座的诸位客人说：“今天，我向大家‘公开’一秘密。他是 1936 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是我们派到胡宗南那里去的。”客人们顿时大为惊讶。因为他们原先大都认识熊向晖，知道他是胡宗南的随从副官和机要秘书。难怪张治中这天一看见他就惊讶地说：“这不是熊老弟么？你也起义了？”周恩来却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

熊向晖打入胡宗南的总部“服务”12 年。他和陈忠经、申健三人钻进敌人心脏协同战斗，可以同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打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的事迹相媲美。1949 年 7 月，周恩来在北京和刚从美国学成回来不久的熊向晖见面时，赞扬他和陈、申三人在“西安的情报工作做得很成功”。他说：“在我们党的情报工作中，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可以说是‘前三杰’，你

们三人，可以说是‘后三杰’。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都为保卫党中央做了贡献。”

熊向晖早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曾是清华大学“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负责人，1936年12月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1937年底，党组织指定他不暴露党员面目，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是周恩来在胡宗南身边布下的“闲棋冷子”。1939年3月，他开始担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和机要秘书。1941年夏，党中央从延安派王石坚到西安长住，建立秘密电台。周恩来两年半前下的闲棋、布的冷子，开始执行特殊任务。其后由陈忠经安排，王石坚接办西安《新秦日报》，建立“西北通讯社”，还在西大街开设“研究书店”，实现“社会化、职业化”，用新闻通讯社掩护情报工作。王石坚还购置了新华巷一号有三层院落的住宅。以后熊向晖和夫人也在这座住宅的后院安家，掩护王石坚的活动。其间，胡宗南从军长升任第十七军团长、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及西安绥靖主任，熊向晖一直在他身边“服务”，非常及时、准确地把国民党最机密的军事情报向党报告。1947年3月，他将胡宗南攻占延安、进攻陕北的作战意图、进攻路线。兵力部署等都事先报告了中央。就像周恩来说的“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看到了。”以后熊向晖随胡宗南到延安后，又将胡的一举一动及时作了报告，使中央对胡的动向了如指掌，使胡在陕北战场上连遭惨败……

轿车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门口停下。周恩来带着熊向晖快步走进毛泽东的会客室兼书房。毛泽东身穿浴衣，站在屋子当中，周恩来握了握毛泽东的手，说：“这样晚，主席还没休息啊。”毛泽东说：“我不困。”熊向晖跟着握住老人家伸出的手，说：“主席好！”毛泽东笑容满面地说：“马马虎虎。”

会客室中，七张单人沙发摆成一个半圆，每两张中间放着一个茶几。毛泽东在居中的一张沙发上坐下，周恩来和熊向晖分坐在他两旁。王海容坐到熊向晖旁边，唐闻生则坐在毛泽东沙发背后立灯下的一张椅子上。立灯关着，室内光线很柔和。

周恩来告诉毛泽东基辛格到了，准备汇报他提出的问题。

不想毛泽东却摆了摆手，说：“那个不忙。”

他转向熊向晖，开始了一场出人意料的谈话。

毛泽东从茶几上拿起一支深褐色的小雪茄，唐闻生帮他点燃。他深深吸了一口，仍然满面笑容地问：“你现在还讲不讲‘卫生’啊？”

王海容对熊向晖解释说，“主席是问你还抽不抽烟。”她又转向毛泽东说：“老熊是个‘烟鬼’。”

毛泽东轻松地说：“他怎么成了‘老熊’了？”听熊向晖说他已经52岁了，就说：“还不老嘛。”然后指指茶几上放着的小雪茄，说：“现在医生不让我抽香烟，只让我抽这个。他们都讲‘卫生’，你不讲，你就抽吧，我也不‘孤立’了。”

熊向晖点燃一支小雪茄，以为这样的寒暄可以结束了。然而，毛泽东却继续提出一些在他看来是“寒暄”性的问题：“你在总参×部当副部长？”他回答：“是。”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操着浓重的湖南乡音问：“那个‘参谋总长’姓甚名谁呀？”熊向晖一面回答：“黄永胜”，一面感到不可思议：怎

么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把“总参谋长”说成“参谋总长”？

毛泽东又问：“你同黄永胜熟悉不熟悉呀？”

答：“到总参以后，在会上认识了黄总长，没有单独接触过。黄总长提到过我。”

问：“他是怎么提到你的呀？”

答：“今年4月，黄总长在总参批陈（伯达）整风小结会上说，主席对他讲，总参有篇批陈发言有水平，但主席没有具体讲是哪一篇。黄总长估计，可能是江钟的，也可能是熊向晖的。”

毛泽东说：“我指的是你的那一篇。你读过一些马列的书。”

熊向晖以为谈到这里，毛泽东就该听周恩来的汇报了。不料老人家似乎忘记了这件事，抽着小雪茄，继续悠哉游哉地同他“漫谈”。

主席问：“在那个小结会上，黄永胜还讲了什么？”

熊向晖感到，说得过于简单，恐怕招致更多的问题。为了节省时间，以便周恩来及早汇报，他这次回答得比较详细：小结是王新亭副总长念的。吴法宪副总长作了补充，说总参批陈整风搞得很好，自从黄总长主持总参以来，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各方面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席和林副主席对黄总长是满意的，各大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对黄总长是尊敬的。黄总长很谦虚，说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还不够高，比林副主席差得远，在工作中还有些官僚主义。

听到这里，毛泽东“哦”了一声，又问：“他们没有讲庐山的问题？”

熊向晖回答：“讲了，是在批陈整风动员会上讲的。吴副总长说，总参同陈伯达没有来往。黄总长说，他是在庐山会议开始以后才到庐山，当时主席已经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揭露了陈伯达。黄总长说，他不认识陈伯达，原来只知道陈伯达是个理论家、秀才。如果不是主席、林副主席指出来，他也看不出陈伯达搞的‘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有什么问题，也可能上当受骗。以后要坚决按照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多读一点马列的书。”

毛泽东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又抽了一支雪茄，用缓慢的语调问：“庐山的事，他们就讲这些？”

熊向晖回答：“主要就是这些。”

1970年八九月间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当时是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伙同林彪的老婆叶群，以及掌握军队大权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四处煽风点火，为林彪当国家主席制造舆论。毛泽东气愤地说他们“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的一点意见》的及时发表，制止了林彪一伙向党夺权的这幕丑剧。庐山会议之后，中央开始在党内批判陈伯达，并责成黄、吴、叶、李、邱作出检讨。将近一年过去了，熊向晖只知道陈伯达被揪了出来，其余情况一概不知。所以，当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深深吸了一口雪茄，突然伸出左掌，用右手一个一个按下左手的手指，问熊向晖“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还有叶群，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时，熊向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都是当时几乎不可一世的人物呀！他怔了一下，回答：“没有听黄总长讲过。”

毛泽东又问他有没有看过黄永胜等人的检讨、听过这件事的传达，熊向晖都只能回答“没有”，因为他毫不知情。毛泽东意味深长地看着熊向晖，问：“你嗅出点什么没有？”

大半年来，熊向晖除了批陈，一直埋头于国际问题的研究。他虽然对那些趁“文革”之机扶摇直上的政治暴发户很反感，但由于黄永胜等人对庐山会议的情况严密封锁，他看不出任何他们地位动摇的迹象。因此，他对毛泽东这个问题的回答，依然是“没有”。

毛泽东转过身来，问周恩来：“那五个人的检讨，发给总参没有？”

周恩来说：“发了，总参和军委一共发了60多份。”

那是应该发到熊向晖这一级干部的。而他竟毫不知情。这说明了什么？

毛泽东又吸了口雪茄，沉思了片刻，用左手拍了一下茶几，突然提高了声调，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他们的后台”是谁？难道是指林彪？

过了一会，大概是想缓和一下气氛吧，周恩来委婉地说：“我过去也犯过错误，一经主席提醒、批评，总是努力改。这次黄永胜他们犯了错误，主席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们作了检讨，以后也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毛泽东摇摇头，说：“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他们是阴谋。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就要讲团结，就要光明正大。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

停了停，毛泽东的情绪松弛下来，又问熊向晖有秘书没有，写报告、起草文件是否亲自动手。听说他是自己动手时，毛泽东说：“那好。我这里的文件，就是一个秘书管。她的任务就是收收发发。文件来了，我自己挑选重要的看。需要提点意见的，我自己动手写，从来不让秘书代劳。共产党员一要动手，二要动口。动手动口，就是要动脑筋。现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动手，不动口，不动脑筋，什么事都靠秘书，听说连科长都有秘书，搞成‘秘书专政’。有的人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办公室主任，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是国民党的作风。”

熊向晖听了，心里又是一动：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的，不是林彪吗？

直到此刻，毛泽东才结束了同熊向晖的“寒暄”，听取周恩来关于同基辛格第一轮会谈的汇报。熊向晖看了看表，已是10日凌晨一点零五分了。毛泽东谈“题外话”，竟谈了将近一个钟头！待周恩来等人离开毛泽东住地时，已经两点多了。在回宾馆的路上，周恩来嘱咐熊向晖：今晚主席讲的话，绝对不能外传。10日晚，周恩来率熊向晖等人向毛泽东汇报同基辛格第二轮会谈的情况时，毛泽东谈笑风生，再没有涉及庐山会议的问题。

林彪集团的重要人物

为了弄清楚林彪事件，有必要先简要介绍林彪和林彪集团中的几个重要人物。

林彪原名林育蓉，湖北省黄冈县人，1906年生。他的履历，《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第一集已经写明，不再赘述。从他履历中看出，在革命战争年代他长期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工作，为毛泽东所赏识，晋升很快。24岁

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27 岁时任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31 岁时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氏。被授予元帅军衔时他才 49 岁。经毛泽东提名，1958 年 5 月 25 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增选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林彪在历史上是个战将，为党和人民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陈云在谈到《辽沈决战》一书时说过：

林彪作为四野的司令员，在当时正确的地方，我们也不必否定。

黄克诚在谈对大百科全书“林彪”条释文的意见时也说过：

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的作用。

据我了解，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中央根据地指挥中央红军作战时，他们手下有几个著名的战将，一个是彭德怀，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黄公略……红四军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创建的，成立红一军团后，红四军就是林彪指挥，他是红四军军长……在这三个军中，战斗力最强的是红四军，战功最大的是红四军。据我了解，林彪的确有指挥作战的能力。

在我们军队中，他可以说是一个战将。

在抗日战争初期，林彪指挥了平型关战斗。

他与陈云、罗荣桓、李富春等同志，共同领导了东北的解放战争，解放了整个东北。后来进关指挥平津战役，解放华北，以后又进军中南，直到中南地区全部解放，他才回来休息。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名，林彪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毛泽东之所以看中林彪，不是因为他在中央常委中年龄最轻（1966 年林彪 60 岁，邓小平 62 岁），而是因为他长期拥戴毛泽东，“突出政治”，而毛泽东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又需要军队的支持。

林彪在 1959 年 9 月取代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以后，半真情半假意地迎合与颂扬毛泽东。在毛泽东与中央第一线有严重分歧的时候，他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1959 年 8 月 1 日在讨论彭德怀问题的中央常委会上，1962 年初在许多人怀疑“三面红旗”的 7000 人大会上，林彪拥护毛泽东的主张，迎合毛泽东。在军队建设上，他揣摩毛泽东的心意，搞了“突出政治”的一整套。他不仅被毛泽东视为正确而加以器重，也在军队广大指战员中赢得很高的名声。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更是抱定宗旨“紧跟”毛泽东。他处理中央传阅文件的原则是“主席划圈我划圈”，亦即“毛泽东同意我同意”（林彪本人一般不亲自划圈，而由秘书代劳）。他在讲话中以竭尽思虑想出的各种各样“生动”的语言讴歌毛泽东，不仅充斥“高举”、“紧跟”、“突出”之类的词语，而且颇多“警句”。他的题词有：

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

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这些题词次次“突出主席”，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林彪上天安门参加大会，规定秘书严格掌握出发时间，必须比毛泽东早到一两分钟，在城墙下电梯旁等候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则紧随毛泽东。林彪从来 unread 《毛泽东语录》，也从来不“随身带”，规定秘书替他保管。林彪每次去参加群众性的集会，则由秘书交给他。当群众高呼口号时，林彪用右手举起《毛泽东语录》，一上一下地挥动。大会结束，“红宝书”又回到秘书手中。1966年，林彪批给毛泽东的文件都是写“请主席阅”、“送主席批示”之类的语句；从1967年年初开始，“请”，“送”则一律改为“呈”字。有一次他对一位秘书说：“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秘书不敢评论，无以答对。林彪口气平和地说。“可以评论。你说说看法，没有关系。”秘书说，“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有两条：一条是，首长对毛主席跟得紧；另一条，是首长讲话少而精。”林彪颇为得意，他说：“你谈的这两条特点，这第一条非常重要。要紧跟毛主席。其实我没有什么本事，我的本事都是从毛主席那里学来的。你们给我当秘书，记住这一条很要紧。”紧跟毛泽东，这就是林彪的政治态度。是真诚还是虚伪？恐怕二者兼而有之吧。如果不从个人角度来考察，可以说，这具有那个时代的特点。

与此相联系，林彪反对过于突出他自己。事例很多，这里举出四个：

例一，林彪规定，在送给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传阅件中，如有关于林彪的新提法，秘书要及时提醒。一次，在一份军内上送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文革的文件中有了新提法，秘书就向林彪报告。当秘书说到文件中称林彪为“副统帅”时，林彪立即表态：“划掉！”当秘书说到文件中提到林彪是“三忠于”的“光辉榜样”时，林彪断然命令：“一律划掉！”（叶群在旁说“这一条不能勾”，说明“理由”；林彪不耐烦地说：“好了，好了，不划掉这个提法就是了！”）

例二，1967年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讲话的末段是：“另外，我讲一个单独的零碎的问题。最近，我发现有什么林彪同志语录，是学生搞的，一个是一个中学校搞的，另一个是一个什么红卫兵组织搞的，我们就收到两种。另外，我们总政过去也搞了我的一个政治工作语录。我看，不要搞，你们看到的时候，请你们代为没收。总政，我是给他们讲了，我这个意见是雷打不动的，你们不要搞。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思想是全中国人民的思想财富，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的思想财富。毛主席的话，一句等于我们一万句。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帅全国，来指导我们一切的工作。”

例三，根据林彪的要求，中共中央印发了《林彪同志给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林彪在1967年6月16日夜写的这封信中说：“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只有突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符合于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和客观实际。今后一切演出、一切会议、一切文件、一切报刊以及其他各种宣传形式都应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并提。”

例四，1968年夏，林彪出去“转车”（坐在车上出去转悠），在大街上看到一些“纪念林副主席八·九讲话发表一周年”之类的大字标语，回家以后就下令连夜把这些标语揭去。下面立即执行。

这一些，能不能单纯看作故作姿态以沽名钓誉呢？殷鉴不远，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吧。

正如林彪自己讲的，他“身体不好”，他“神经不好”。他怕光、怕风、怕水、怕冷、怕出汗。他不洗澡，不吃水果。他对室温有严格的要求：21相差不能超过半度。他要求在室内的各个部位都放着温度计，以便随时查看。他不能读文件，需要秘书“讲”给他听，“文化大革命”中送到林彪那里的文件，每天少说也有几万字，最多时一天有30万字。经过秘书选择和概括，讲给林彪听，讲的时间限制在30分钟内。一天只许讲一次，有一段时间准许讲两次。讲文件的秘书，必须离他几米远，因为他害怕翻动文件时有风。

林彪的讲话，除了必须照念的之外，都有自己的特色。他对讲话的准备，方式独特。他是怎样准备的呢？请看他的秘书张云生的描绘：

在林彪即将出场讲话的那天早晨，……他守着一叠白纸，自己冥思苦想，想了一阵，就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几个别人弄不懂含义的大字，然后将这张白纸摊在地毯上；他接着再想，想好了又在另一张纸上写几个字，同样摊在地毯上……地毯上到处是林彪散扔着的白纸，最后由林彪命令内勤将它们拾起，并由他自己重新排列一下顺序。这就是他的讲话‘条子’（按即提纲），别人可能觉得他这种独特的工作方式好笑，但他自己倒是颇为得意的。

关于“五·一八”讲话，他的另一位秘书说：

首长（按指林彪）讲话不愿用稿子，向来是喜欢自己顺口讲……“五·一八”讲话时我赶上了。主任（按指林办主任叶群）叫我们几个秘书帮助拉条子，结果是白费劲。只有主任和作战部的雷英夫帮助搜集的那些古今中外政变资料，倒还用了。”

林彪在生活上、政治上有不少独特的习惯。他不吃鱼肉，不吃大米，喜欢喝麦片糊糊，喜欢吃炒了的黄豆。偶尔吃一点肉饼。食物不在乎味道，而注重热量和温度。林彪睡觉时从不盖棉被而盖毛巾被，视温度高低而决定盖几条；冬天从不穿棉衣而穿单衣，视温度高低而决定穿几件。他从不亲自接电话，他的卧室和办公室内也不安装电话。他同意“林办”的一个工作人员模仿他的字体，有些批示要这位工作人员代劳。他规定对他的重要批示、指示作“冷处理”，即停半日后发出，以免考虑不周。

林彪沉默寡言。他特别讨厌叶群的自作主张和讲话罗嗦，要工作人员写了一个条幅挂在叶群卧室内，条幅上写的是：“做事莫越权，说话莫罗嗦。”他几乎从不与别人闲聊，他与天天见面的讲文件的秘书四年多中只交谈了一次，时间也极短。他除“转车”外，常常坐着不动，有时在室内背手踱步。他冷漠而极少发脾气，喜怒不形之于色。他孤独、超脱、高傲，遇事置身事外。

勒大鹰在《“九一三”事件始末记》中说：“对于林彪这个人，人们直到今天了解得都太少了。”这是剜切之言。

叶群，原名叶宜敬，她是林彪办公室主任。聂荣臻说过：“林彪是个昏君，真正给他当家主事的是他老婆叶群。”邵一海在《“舰队”投入第一线》中说：“叶群就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林彪……林家王朝的实权，很大一部分

实际上掌握在叶群手中。”

叶群是个爱活动、爱热闹、爱虚荣、不甘寂寞的人，与林彪完全不同。林彪虽然对她相当不满，讨厌她说话颠三倒四、唠唠叨叨，对她常借他的名义在外面做一些他不知道的事愤慨，有一次因她越权行事而要打她；但是，因为林彪身体不好，许多事需要叶群出面，林彪很需要从她那里听到从钓鱼台等处得到的消息（这些消息是从报纸、文件上不可能得到的），有时她周旋于江青、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之间对林彪也很有益处，所以林彪离不开叶群。林彪因年龄较叶群大了许多而又体弱，甚至觉得在生活上有所亏于叶群，曾肉麻地当众写了“发不同青心同热，生不同衾死同穴”以“书赠爱妻叶群”。叶群与林彪在生活上的矛盾很深。1961年11月，叶群在家乡福州写了一篇不短的日记，通篇以最刻毒的语言描绘跟着林彪如同伴着僵尸，咒骂林彪毁灭了她的青春。又写道：林彪是“一个专门仇恨人，轻视（友情、子女、父兄——无意趣）人，把人想得最坏最无情，终日计算利害，专好推过于人，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人”。但是她必须靠着林彪，靠着林彪才能作威作福，去填那永远也填不满的私欲。她虽然官儿不大，只是师职干部，但是权力极大。林彪的意见、指示、批示要由她把关；这是林彪授予她的权力，因为她有时可以向林彪提出“更好”的意见。下面向林彪的请示必须通过她，她可以推延请示、婉言拒绝、自行处置，甚至假传“圣旨”。她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身分，吴法宪之流也就奉承她，巴结她。毛泽东1971年8月14日至9月12日在外地巡视时说过：“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按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可惜这话说晚了。

要了解叶群，不妨先请参观一下她的房间。如果说，走进林彪的房间，像是进了一座阴森的殿宇；而走进叶群的房间，你就像是到了一个暴发户的姨太太的家里：富丽、庸俗、杂乱。豪华的家具，五花八门的小摆设，各式各样的字画，把这间不算小的房间挤得满满的。墙壁上挂的画分上下两层，上层是人物，下层是花草，这些都是不花钱弄来的。林彪手书的条幅“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挂在显眼的地方。屏风上，挂着陈伯达的手笔“克己”二字。床头贴着上面已经讲到的林彪叫贴上的条幅。门上贴着一张白纸，上面是她自己吩咐工作人员写的三句话：“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充其量坏不到哪里去”，“少吃多餐”。这三条叶群自选的座右铭，活灵活现地暴露出这个有野心的女人的精神世界。同林彪房间比较，这里还有一个最大的差别：保持恒温18℃，比林彪那里低了三度。这是叶群想出的一条妙计。这么一来，林彪就怎么也不敢走进叶群的房间。

叶群贪婪，虚伪，权迷心窍，自以为是，酷爱背后捣鬼，以他人的痛苦为乐事。她是个空虚的女人。

林彪全家原来有五口人：林彪、叶群，三个孩子。大女儿林小琳是林彪前妻所生。“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参加了“保守组织”“八·八团”。叶群假借林彪的名义，写了一个声明，大意是：小琳一贯反对我（按即林彪），她在外的一切言论、行动并不代表我，我概不负责。从现在起，我与她脱离父女关系。这个声明在哈尔滨到处张贴。以后，叶群又指使吴法宪派人把她送到大西北沙漠中的一个基地。她跑了出来，叶群又设法把她送到西南地区的部队里。所以，这个大女儿实际上已不是这个家庭的一员了。林彪、叶群身边，只有女儿林立衡和儿子林立果，林立衡是

林立果的姐姐，小名豆豆，曾在空军工作，任《空军报》副师职副主编，林立果，小名老虎，1945年生。二人尊重父亲，有感情，还有些敬畏；对叶群没有感情，从懂事起没有叫过一声“妈妈”，林立衡有点怕叶群，林立果根本瞧不起叶群。林立果1966年时21岁，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1967年3月，任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1967年7月1日，林立果按照叶群指定的日子，由吴法宪、周宇驰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9年10月17日，吴法宪按照林彪的授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副师职）。10月18日，吴法宪把林立果、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同林立果一起被任命为办公室副主任的周宇驰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今后，空军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指挥。”周宇驰、王飞等人先后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和机关作了传达。一股吹捧林立果的旋风，在空军领导机关刮起。而在事实上，林立果在空军并不能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后来，林立果是法西斯秘密组织“联合舰队”的头子。

黄永胜，湖北省咸宁县人，1910年生。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团长、师长、军分区司令员、旅长、纵队司令员、军区司令员、兵团司令员、大军区司令员等职，在1968年3月22日任总参谋长以前，是广州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吴法宪，江西省永丰县人，1915年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历任团青年干事、师青年科科长、团政治委员、支队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任、军区副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空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空军政治委员和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李作鹏，江西省吉安县人，1914年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历任中央军委参谋、科长、抗大参训队长、师侦察科科长、师作战科科长、纵队参谋处处长、东北民主联军参谋处处长、纵队副司令兼参谋长、纵队司令员、军长、兵团参谋长、军政大学副校长、高级步兵学校校长、训练总监部陆军训练部部长、总参军训部部长、海军副司令员、海军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邱会作，江西省兴国县人，1914年生。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历任军团宣传队队长、军委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军委科长、粮秣处处长、军委供给部部长、师供给部政治委员、师组织部部长、军区政治部主任、纵队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这四人中，上将一人，中将三人。他们出身都很苦，有的是放牛娃。很早就投身革命，都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是老红军。无疑，他们在历史上为党和人民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历史条件下，林彪与黄、吴、李、邱结成林彪集团。林彪需要力量，黄、吴、李、邱需要支持，这个集团就以个人野心和宗派主义为基础，逐渐形成。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黄、吴、李、邱都受到程度不同的冲击，邱会作则多次被揪斗，这些冲击、揪斗为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所煽动和支持。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一概支持造反，倒并非特意支持打击黄、吴、李、邱。林彪保护他的老部下黄、吴、李、邱，黄、吴、李、邱则效忠于林彪，唯林彪之命是听。这与林彪是“副统帅”当然也有关系。

黄永胜在 1970 年 5 月说过：“在任何时候都要忠于林副主席。”吴法宪后来在供词中说：“是林彪把我提拔起来的，所以我脑子里就是一个林彪”，“林彪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是林彪的走狗”。李作鹏说过：“林副主席活着跟他干，生与林副主席同生，死与林副主席同死。”邱会作说林彪、叶群是“再生父母”，发誓“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海枯石烂不变心”。林彪集团就是一个以君臣、父子为信条，以忠于林彪一人为准则的集团。这个集团的开始形成，以 1967 年的“五·一三”事件为标志。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一方面，“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天下大乱、局势难以控制的情况不得不惜重林彪一伙的力量；另一方面，林彪一伙乘机打击异己，攫取权力，甚至诬陷、迫害他人，“五·一三”事件发生后，林彪立即表态支持吴、李、邱，并于 6 月 9 日观看了吴、李、邱率领的所谓“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文艺团体的演出，新华社为此专门发了消息，吴、李、邱等人就成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也就成了与林彪、叶群“同生死，共患难”的死党。吴、李、邱等人表示拥护江青，江青也就立即表示支持他们。8 月 17 日，成立了吴法宪（负责人）、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等人组成的“军委看守小组”（内部组织，未向外公布），接受中央文革的领导，列席中央文革碰头会，负责处理驻京军事机关、部队的“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从此，林彪、江青支持的“三军”在某些方面可以左右北京甚至外地的大局，大有“全国看北京，北京看三军”之势。当时全国局势混乱，“无产阶级司令部”支持吴、李、邱等人打击迫害空军、海军和总后勤部的领导干部，夺了这些重要军事单位的领导权。1968 年 3 月 22 日，黄永胜调京任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成为林彪集团一名重要成员。以后，吴、李、邱都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并分别兼任空军司令员、海军政治委员、总后勤部长。至于他们的罪行，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特法字第一号）。

林立果为头目的“联合舰队”，是林彪集团中与黄、吴、李、邱既有联系更有很大区别的反革命力量。“联合舰队”中以年轻人居多，也有少数老干部。都是空军的。年轻人有：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沛丰，空军党委办公室处长；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程洪珍，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许秀绪，空军司令部雷达兵部技勤处副处长；李伟信，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等等。中年人有：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维国，空四军政治委员；陈励耘，空五军政治委员；江腾蛟，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

值得说得详细一点的是江腾蛟。他是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19 年生。1930 年即 11 岁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7 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历任区儿童团大队长、县儿童局书记、团政治处主任、旅政治部主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师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军区防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军政治委员等职。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4 年，叶群、吴法宪在江苏省太仓县洪泾大队搞“四清”的时候，当时在上海任空四军政委的江腾蛟，就经常以看望吴法宪为名，借机接近叶群，给叶群送礼物。1965 年冬天，林彪、叶群把女儿林立衡送到上海，要江腾蛟照顾她治病。1966 年冬天，林彪、叶群托他照看林立衡、林立果。1967 年 2 月 8 日，江腾蛟完成了照看任务，亲自把林立衡、林立果送回北京。1967 年，江腾蛟升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1968 年，中央军委决定改组南京军区空军党委，免去了江腾蛟的职务。林彪、吴法宪要让江腾蛟担任空军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指出：此人

不能重用。林彪、叶群、林立果对他表示关怀，他在1968年以后给林彪一家先后写了20多封效忠信。他在信中一再表示：“我非常明白，是首长和主任救了我。”“没有首长，就没有我的一家，没有我的一切”，“不管什么时候，需要我干什么，下命令吧！我江腾蛟绝对不会说出一个难字。”多么卑鄙的灵魂！

“联合舰队”的形成

在林立果担任空司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之前，就经过吴法宪批准，在司令部办公室成立了一个以林立果为组长的“调研小组”，成员有周宇驰、王飞、刘沛丰、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原副主任）。名义上，“调研小组”的任务是给空军党委出点子，提建议；实际上，它成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搜集情报、秘密联系等进行阴谋活动的工具。林立果被非法授予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指挥一切”的特权之后，这个“调研小组”的活动范围更广泛，跟随林立果等出去“调查”的人不断增加。这样，在林立果周围便形成了一个极为特殊的小圈子。他们的活动，谁也不能干涉，谁也不能过问。他们干着种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形成了一个反革命组织。

到关键时候，林彪还会亲自出面。

1970年5月2日晚上，空军司令部的一小批人，连同家属小孩，被邀到林彪家里“作客”，叶群亲自招待大家看内部影片、吃糖，还送了“纪念品”。林彪亲自接见，又是谈话，又是照相。普通的“平民百姓”，哪能有如此的“荣耀”！

事实上，那些受到接见的人，也确实不是普通的“平民百姓”：周宇驰、王飞、刘沛丰等，都是林立果周围的亲信。而更重要的是，这次接见有着一一种极不寻常的、更深的含义。

在看电影之前，叶群说：“林立果在外边出差，好久没和大家见面了，很想念大家，今天和大家见见面。”

林立果到空军司令部工作已3年多，是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和大家见面？接见的是林立果的亲信，突出的是林立果。

老奸巨猾的林彪，则别有用心地问周宇驰：“是你领导立果，还是立果领导你？”

周宇驰和林立果都是空司办公室副主任，有什么谁领导谁的问题？但是，曾经当过林立果的“老师”的周宇驰，完全理解这句问话的含义：林彪在这里所讲的，不是一般的工作关系。他立即回答：“当然是立果领导我们喽！”

周宇驰、王飞等人，对于林彪、叶群导演的这场戏的含义，心领神会。第二天，5月3日晚上，他们召集一些受到林彪接见的人一起开会，向林彪表忠心，并按照林彪的授意，共推林立果为他们的“头”。周宇驰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九一三”事件后，在空司办公室查到了经过周宇驰亲笔修改的那次发言的记录：

我们要永远坚信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也就是忠于毛主席。

要知道，林副主席也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伟人，是一个可以和马、恩、列、斯并列的革命导师和领袖。

我们要一辈子永远同立果同志战斗在一起。立果同志也是一个天才，一个全才，我们没有哪个人能够和他比得上。他在各方面都把着手教我们，在政治上工作上直接领导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考虑过很久，觉得到提出来的时候了。就是一个单位，一个集体，总要有一个头。在我们这个战斗集体中，应该以立果同志为头，为核心。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觉悟。实际上，也只有他才能当得起这个头和核心。这是客观的需要，斗争的需要。这不是“多中心论”。而正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以毛泽东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领导核心。

这样，林彪通过这次接见，在组织上，进一步明确了在空军机关存在着一个独立的“战斗集体”，这个集体有它自己的头和核心——林立果；在政治上，进一步明确了这个反革命组织和林彪的特殊关系。

到了这年秋天，林立果看了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之后，便把这个反革命组织定名为“联合舰队”。而林立果则成了当然的“舰队司令官”。他并根据英语“司令官”的译音，为自己取代号为“康曼德”。

林立果为什么要把这个反革命组织定名为“联合舰队”，无从查考。但是我们知道，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的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的时候，“虎”这个字眼，曾经作为偷袭成功的信号。而今天，小名为“老虎”的“联合舰队”头子林立果，则是在领着这支反革命的“舰队”走着一条自取灭亡的航道。

反革命别动队的内幕

林彪反革命集团不仅在空军机关建立了“联合舰队”，还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他们反革命的组织。

江腾蛟根据林彪、叶群的授意，曾经指使 7341 部队原政委王维国组成了一个替林立果选“妃子”的“找人小组”。1970 年 3 月，林立果到上海，把“找人小组”改建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上海小组”。4 月 3 日，林立果给“小组”成员发了枪。这个“小组”的《入组须知》规定：“本小组的任务，是为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各项任务。”“尤其是小组的最高领导——林副部长（指林立果，下同）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小组的一切活动均是绝对秘密，未经请示和未得指示，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和了解情况。”

1971 年 3 月，广州民航局原政治委员米家农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广州组织了“战斗小分队”，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制定了联络密语、暗号。

1971 年 4 月，林立果指使王维国在上海成立了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

在这前后，林立果、周宇驰指使空军司令部原副参谋长胡萍及王维国、米家农、广州空军司令部原参谋长顾同舟等，在北京、上海、广州建立多处秘密据点。他们利用这些据点进行联络，私藏枪支、弹药、电台、窃听器以及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

通过查获的大量书证和许多当事人的陈述，能了解这些反革命组织的内

幕，从中不难看出日后林立果在这方面的“特殊才能”。为了让大家看一看，林立果怎样“天才地”在革命词藻的装饰下，把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融会贯通，把封建道会门和法西斯特务组织的手法结为一体，“创造性”地运用于他的反革命组织，不妨把广州“战斗小分队”的情况，作一番简单的介绍：

培养对林彪一家的“感情”，是这些反革命组织所特别强调的，他们组织队员反复学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把林立果的“指示”编成语录歌。他们有一首“队歌”，翻来复去也是唱的“忠于林副统帅”“紧跟副部长”。他们经常组织队员向林彪一家宣誓效忠，下面是他们用过的誓词：

1971年5月21日的誓词

我们在斗争中认识副部长，在斗争中选准副部长，在斗争中宣传副部长，在斗争中捍卫副部长，在斗争中紧跟副部长，永远紧跟副部长，革命到底志不移！

1971年5月22日的誓词：

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永远紧跟副部长，革命到底志不移，敬爱的党，把保卫副部长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决心用鲜血和生命来宣传副部长，捍卫副部长，紧跟副部长，将中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这里需要说明，在这些反革命组织里，有时也提到党，提到“忠于毛主席”等等，但这不过是幌子，是骗人的。例如“上海小组”的《入组须知》就讲到：“每个成员必须具有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敬爱的林副主席、忠于叶主任（指叶群，下同）、忠于林副部长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很明显，毛泽东是陪衬的，忠于林彪一家才是实质。这里还可以提一下，在查获的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原副处长、“联合舰队”主要成员）的工作日志上，查到了1971年4月23日晚上研究“教导队”问题时的原始记录。在“对教导队教育”这个项目下，记了这样的话：“培养对首长。立果感情，但提法上要策略，不要让人家做文章。”这就更清楚地暴露了他们的险恶用心。

“战斗小分队”和其它反革命组织一样，规定有严格的“纪律”。例如：不准向外泄露小分队情况；不准与原单位人员接触；在小分队期间不许探亲，不许家属来队，不准恋爱结婚；不准单独活动；不准随便接电话，电话由专人接；不准谈论“首长”的活动去向，生活习惯等等。

“战斗小分队”还规定了许多联络的密语，暗号，例如：战友——指林彪一条线上的人；扮阿庆嫂一指要见机行事；闷热——指有“外人”在场，不好讲话。

队员给支部书记打电话，不能直接找，要先找她的儿子，问“吃饭了没有？”如答“吃了”，表示在家可以去；如答“还没有时间”，表示现在没有时间；如答“没吃”表示不能去。队员给支部书记写信，不能直接寄到她家里，而是先寄给指定的小分队员，并在信封背面做上记号。

这一切说明，林彪一伙是多么阴险，而在本质上又是多么软弱。他们害怕人民，害怕群众。即使在他们的反革命组织内部，也不得不采取种种欺骗手段和法西斯统治，来控制那些由于上当而被他们利用的无知青年。

“舰队”投入第一线

1970年8月，林彪一伙在庐山抢班夺权的阴谋败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个主要成员陈伯达被揭露出来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1970年10月中旬，毛泽东先后对吴法宪、叶群的检讨作了批示。11月中旬，毛泽东对黄永胜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全党全军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12月20日，华北会议开始。1971年1月24日，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讲话，系统揭露了陈伯达的罪行……

一系列情况，使得林彪反革命集团十分惊慌，他们一方面销毁材料，订立攻守同盟，搞假检讨，企图掩盖事实真相，蒙混过关。另一方面，开始了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

“9·13”以后，从林立果的住房中，查获了林立果在庐山会议后亲笔写的一个谈话要点。这个谈话要点，反映了林彪一伙对庐山会议的估价，露骨地表达了他们的政治野心和反革命阴谋：

与歼7、w、C、讲

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演习，拉练。

双方的阵容都亮了相，陈是斗争中的英雄，吴是狗熊。

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三是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长。

这些老总们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还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了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歼7”是江腾蚊的代号，“w”是王维国的代号，“C”是7350部队原政治委员陈励耘的代号，“陈”指陈伯达，“吴”指吴法宪。

——编者注）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派遣林立果为头子的反革命“联合舰队”投入了第一线，更加紧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1970年10月，林立果把他们的反革命组织定名为“联合舰队”后，决定扩大“调查”范围，增加“调查人员”。

11月，林彪对林立果说：“要与军以上干部见见面，不见面就没有指挥权。”

12月1日，林立果布置对空军机关的“骨干队伍”进行整顿。林立果说：“人家搞清队整党，我们清理骨干队伍。要纯洁队伍，找薄弱环节，有无假左派、内奸。不要让坏人混进来。”在查获的刘沛丰1970年12月2日笔记本上，记载了“整顿机关‘骨干队伍’的初步意见”。

1971年2月8日下午，“联合舰队”召开了布置搜集情报的“舰队会议”，周宇驰在会上讲了情报的重要性，指出：上边与下边比，上边重要；死情况与活情况比，活情况重要；等情况与主动搜集情况，应主动挖掘新情况。并要求每个人每个时期都连续不断地掌握一两个问题。

2月12日，林彪、叶群、林立果一起到了苏州。21日，林彪指派林立果到达杭州，进行反革命串联。林立果、于新野多次同7350部队原政治委员陈励耘密谈。

林彪、叶群、林立果等经过一阵紧锣密鼓的紧张活动，由林立果出头，纠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等人，具体制订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计划。

《“571工程”纪要》出笼

3月的江南，正处在“杂花生树，群茸乱飞”的季节。但是，我们的祖国，却正在经受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成的浩劫。一小撮反革命的野心家、阴谋家错误地认为：人民的意愿可以长久被压抑，人民的手脚可以永久被捆绑。因此，他们竟敢于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上。

1971年3月18日，林立果带着于新野、许秀绪（空军司令部雷达兵部技勤处原副处长，“联合舰队”成员）从杭州到上海。当晚，又通知在北京的周宇驰立即来上海。他们并交待负责接待他们的李伟信（7341部队政治部秘书处原副处长，“联合舰队”重要成员）：“‘子爵号’（叶群代号）说，在上海要注意隐蔽、安全。”

3月20日，周宇驰到上海，第二天，林立果便纠集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进行密谋，他们分析“形势”说：“目前首长（指林彪，下同）的实力和权势占优势，但是正在起变化。”他们研究了林彪“接班”的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

一是林彪“和平接班”。周宇驰说，五六年就差不多了，可能更短。林立果说，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能否保得住。

二是林彪“被人抢班”。周宇驰认为一下不可能。林立果认为，毛主席威信高，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话，林彪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因此疯狂地要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

三是林彪“提前抢班”。也就是直接陷害毛主席。但是他们又害怕毛主席的影响大、威信高，政治上不好办。周宇驰则非常险恶地说：“当然一定要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如：把毛主席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把毛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他阴险地说：“反正那时首长掌权，可以由他出来说话”。最后他们商定：争取“和平过渡”，作好“武装起义”的准备。

他们研究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实施要点，策划了成立反革命武装组织“教导队”等。最后，林立果根据“武装起义”的谐音，把这个罪恶计划的代号定为《“571工程”纪要》。林立果对于新野说：“根据目前局势，首长叫先搞个计划。我看这个计划，就按在杭州商量的框框，由你来写。我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说了一下。”

3月22日至24日，他们把计划写成了文字。

“9·13”以后，从他们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查获了一份于新野手写的《“571工程”纪要》。全文分为九个部分：（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纪要》把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诬蔑为“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把“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B—52是他们对毛泽东主席的诬蔑性称呼），“推翻挂着

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作为他们的口号和纲领，提出要在“军事上先发制人”，阴谋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杀害毛主席，以“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建立林家王朝。《纪要》还十分阴险地提出了这样的“政策和策略”：“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按照这个反革命计划，林彪一伙立即行动起来了。

磨刀霍霍

《“571工程”纪要》出笼不到10天，3月31日深夜，上海岳阳路招待所楼上的客厅里，烟雾迷漫，瓜子壳和果皮丢得满地。面向阳台的沙发上，坐着林立果、王维国；背向阳台的沙发上，坐着3月中旬以“治病”为名从北京秘密来到上海的江腾蛟，当天下午由于新野专程从杭州接来的陈励耘，以及以“搬家”为名前一天从南京赶来的南京部队空军原副司令员周建平。这些人为什么坐到了一起？

原来，《“571工程”纪要》的“实施要点”中有这么一条：“指挥班子江、王、陈”。这就是为落实这一条而召开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三国”指上海、浙江、南京，“四方”指上述三方负责人和北京的江腾蛟）。

会上，他们分析了杭州，上海、南京等地的“形势”，研究了“组织武装力量”等问题，最后，林立果宣布：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负责拉总。

会议一直开到4月1日凌晨4点多，他们又围到了餐桌旁。这时，从餐厅里不断地传出嘈杂的碰杯声和祝酒声：“在林副部长领导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江腾蛟乘着酒兴狂叫道：“我们都是属羊，头上长角的！”林立果掀开衣服，拍着腰间的手枪说：“我总是带着它！”杯盘狼籍的酒宴桌上，杀气腾腾。“9·13”以后查获的程洪珍（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原秘书，“联合舰队”成员）的日记上，对这次会议作了这样的记载：

会谈是成功的，达到预期效果。

团结的气氛比较好，介（解）决了对当前东南形势的看法、认识。

（1）主要矛盾在上海……

（2）加速我们的准备

（3）组织上明确了：三点，每点的头都

上海——王

杭州——陈

南京——周

互相配合，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

4月15日，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开始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十分惊恐。当天下午，与林彪一起躲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黄永胜、吴法宪每天通报一次情况。4月19日，林彪、叶群坐飞机回到北京。20日中午，叶群打电话对吴法宪说，因为有人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揭发了吴法宪在庐山的活动，林彪在外地呆不住了，为了稳住阵脚，回来“坐镇”，必要时“说话”。

林彪回到北京后的第四天，4月23日晚，“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开了一次反革命黑会。从于新野记载的这次黑会的记录上可以看出，他们在会上讨论了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情况，研究了“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实行反革命政变的计划。

反革命别动队“联合舰队”，更加紧张地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5月23日，按照林彪、叶群的旨意，周宇驰开始秘密进行驾驶直升飞机训练。7月下旬，林立果、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一伙窜到广东深圳、沙头角进行反革命活动，在飞机上察看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到香港指挥、遥控。”8月8日上午，程洪珍、王琢（空军司令部管理局管理处原副处长兼汽车队长、“联合舰队”成员）乘安—12飞机，将两辆水陆两用汽车运到北戴河，供林立果学习驾驶。

与此同时，他们四出进行反革命煽动，为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制造舆论。6月7日，林立果向广州民航管理局大队以上干部讲话说：“那些庞然大物没有什么可怕。一开始气势汹汹，想一口把我们吃掉，公开点名唬我们。”“只要我们的政策策略对了，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没有什么可怕的。”6月中旬，刘世英向人交底说：“不仅空军内部，而且外部和上面对林副主席的态度、感情都有点问题，不仅有人反对林副主席，而且要警惕和防止有人抢班夺权。”“现在的问题是保卫林副主席的问题，争夺接班人的问题。”7月14日，林立果在广州对人说：当前路线斗争尖锐复杂；9月份，中央召开九届三中全会，10月召开四届人大，可能出现权力重新分配。要去斗争，要搞根据地。

7月17日，到北京“坐镇”了三个月的林彪，又带着叶群坐飞机去北戴河。行前，叶群“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对人表白：“首长说我们不能在北京啦。”“我们到北戴河避开这个嫌疑，防止人家说是我们指挥的。”可是，8月5日，叶群又回到北京。6日晚上，邱会作到叶群家密谈。8日下午，黄永胜到叶群家密谈近三个小时。晚上，吴法宪、邱会作又到叶群家密谈到深夜。据邱会作、吴法宪交代，他们“提到了九届三中全会对黄、吴、李、邱的问题，是否会拿出来批判？”“扯到人人过关问题。”

……

“山雨欲来风满楼”。林彪反革命集团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已经箭在弦上了。

“破釜沉舟”

1971年的夏天过去了。

林彪反革命集团紧张地进行着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迎接庐山会议后第二个秋天的到来。1971年8月中旬，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南方各地巡视。在武汉、长沙和南昌，分别同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江苏、福建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在这些谈话中，毛泽东不仅批评了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而且多次点名批评了林彪。毛泽东在谈到庐山会议的斗争时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并指出：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毛泽东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

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毛泽东不指名地点到了“联合舰队”的头子林立果：“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

一路上，毛泽东多次带领被接见的负责人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讲解这两首歌的歌词，毛泽东说：“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心怀鬼胎的林彪一伙，对毛泽东的出巡极为疑忌。他们紧张地研究形势，准备对策。

8月26日，毛泽东刚刚结束了南巡的第一站一对武汉的视察，“联合舰队”召开了一次会议。下面是千新野手记的这次黑会的记录：

会议 1971 . 8.26

成绩很大。

要看到不足，与形势不适应东西

由明争转入暗斗

相持、相对和平友好，酝酿新“战争”

不要麻痹，要有思想准备。

由对外斗争转为巩固阵地

“战争”的突然性很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也一样。

思想、组织、行动上加强“战备”……

从这个记录上，反映出了林彪一伙对当时形势的恐惧；同时，散发着他们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强烈的火药味。

在《“571工程”纪要》中，林彪一伙曾经这样规定了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时机”。

战略上两种时机：

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

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毛泽东离开北京后，林彪反革命集团为了掌握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时机，千方百计探听毛泽东南巡的行动路线，窃取毛泽东同各地负责人谈话的内容。

8月底和9月初，吴法宪连续给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把毛泽东到长沙、南昌，先后派飞机接一些负责人去谈话的情况，密报叶群。

9月3日，毛泽东到达杭州。

9月5日晚上，周宇驰通过电话从广空司令部原参谋长顾同舟那里了解到，广州部队负责人正在传达毛泽东接见时的谈话，便说：“你们听完后也给我们传传”。深夜11点半，于新野打电话给顾同舟，了解了毛泽东谈话内容，作了15页记录。9月6日，周宇驰带着电话记录稿，自己驾驶直升飞机从北京到北戴河，同林彪、叶群、林立果密谈。晚上，周宇驰又给顾同舟打电话表示感谢，并说：“你在关键时刻立了一大功，这说明你的路线觉悟高。”

“林副部长要你再整理一份文字的记录稿，派人送到北京来。”顾同舟整理

了一份长 50 页的文字稿，叫自己的老婆带着孩子，以“看病”为名坐飞机送到北京。

9 月 6 日凌晨，李作鹏在武汉得到武汉部队原政治委员刘丰关于毛泽东在武汉同一些负责人谈话内容的密报，当天返回北京，分别告诉了黄永胜、邱会作。黄永胜打电话告诉了叶群。

有关毛泽东谈话内容的情报，好似晴天霹雳，使林彪反革命集团惊恐万状，慌作一团。他们经过紧张策划，作出了乘毛泽东南巡的机会立即动手杀害毛泽东的罪恶决定。

9 月 7 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舰队”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

7 日下午，周宇驰驾驶直升飞机从北戴河回到北京。他匆忙跑到江腾蛟家里，让江腾蛟看了毛泽东谈话记录，对江腾蛟说：“现在看起来要对我们下手了。”然后恶狠狠地说：“我看还是先下手为强。他（指毛泽东）正在杭州，很快回北京过国庆，路过上海时可以动手。”接着，他又阴险地说：“我们不动手，将来别人上了台，我们这些人都完，你首先完。”江腾蛟说：“那就叫王维国干吧。”周宇驰说：“不行，王维国太粗。”沉默了一阵，江腾蛟露出一脸凶相说：“那就只有我去了。”周宇驰听了，高兴地把座椅挪得靠江腾蛟更近，压低声音说：“要去就快点去。”江腾蛟说：“不要急嘛！杭州现在是最好的时候，老头子 9 月 25 日前不会回来。”周宇驰说：“现在我们不干，今后很难遇到这样的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周宇驰、江腾蛟两人密谋后，7 日晚上和 8 日下午，江腾蛟分别同民航总局原政委刘锦平、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原部长鲁珉进行了反革命串联。

根据周宇驰的布置，于新野也在 8 日到达上海与王维国进行了密谈，并和 7341 部队军务处原处长蒋国璋一起察看了毛泽东专车预定在上海停车的地点，还打听了 7341 部队有无火焰喷射器。晚 8 时多，于新野到杭州，同陈励耘密谈，探听毛泽东到杭州以后的情况和行动安排。

9 月 8 日，林彪在北戴河下达了武装政变手令。晚上，林立果带着林彪亲笔书写的反革命手令，还带了叶群给黄永胜亲启的密封大信袋，同刘沛丰、陈伦和一起，潜回北京。

罪恶的谋杀

9 月 8 日晚上 9 时 40 分，林立果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机场上冷冷清清，通常那种热烈欢迎的场面不见了，前来迎候的只有周宇驰和胡萍。

林立果一下飞机、就对胡萍说，现在上面斗争情况很复杂，林彪为了安全要离开北戴河。说着，林立果便拿出了林彪的手令给胡萍看。在一张白纸上，胡萍看到了非常熟悉的林彪的手迹。

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林彪九月八日

林立果收起林彪的手令，命令胡萍为林彪准备两架飞机：一架三叉戟，一架伊尔—18。机组要挑对林彪“感情深的”，选好后报个名单，说完便匆匆离开了。

北京初秋的夜晚，空气清新凉爽，沁人心肺。市区的街道已经安静下来。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早已入睡。“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5年，各式各样的“阴谋诡计”，虚虚实实，听得多了，有的将信将疑，有的很不理解。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谁也不会去想，就在这个夜晚，那个唯一的“亲密战友”所策动的一个最最恶毒的杀害毛泽东的阴谋，正在紧张地进行。

林立果带着林彪的手令到达北京后，从8日深夜到9日凌晨，急如星火地进行了一系列谋害毛泽东的反革命部署。

晚上10点多，李伟信开车来到江腾蛟家，说是林立果马上要见他。江腾蛟坐上李伟信开的汽车，来到林立果设在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通常称为“工字房”的一座平房内。等了一会，林立果、周宇驰两人进来了。林立果一见江腾蛟，便说：

“哎呀！老政委，情况很严重啦！周宇驰同你谈了没有？”

江腾蛟说：“他昨天同我谈了几句。”

林立果拿出林彪的手令，对江腾蛟说：“先给你看个东西。”江腾蛟看完后，林立果问：“怎么样？”江腾蛟很“干脆”地表态说：“干吧！”

林立果拿出“司令官”的派头，传达命令说：“我们已经决定在上海动手，这个任务交给你，你是第一线指挥。要什么人，要什么东西，都满足你。你有把握吗？”

江腾蛟说：“那就看用什么办法。”

林立果说，已研究了三个办法：（1）用火焰喷射器和四火箭筒打毛泽东乘坐的火车；（2）用一高炮平射打火车，“‘教导队’以救毛泽东为名往上冲；（3）要王维国乘毛泽东接见时动手。

围绕着这几种办法，他们进行了具体研究，还提出了另外两个办法：一是把附近的油库烧着，以救火为名，趁混乱之机动手，江腾蛟并当场画了毛泽东专列预定停车地点和油库位置图，凶狠地说：“搞得不好，汽油流到火车附近，连人带车都报销了。”二是要陈励耘在杭州干。后来，他们决定等于新野从杭州回来后再研究。

也是在这个夜里，“联合舰队”的重要成员刘世英、程洪珍等人，正在另一个秘密据点——空军学院小楼等候林立果。

已经是9日凌晨了，林立果匆匆进来，气势汹汹地把军帽、军衣往沙发上一丢，腰里插着手枪，叫喊道：“把窗户关上！”然后，他有时手插腰站在房间中间，有时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向坐在两侧沙发上的刘世英、刘沛丰、李伟信、程洪珍等人说：现在有人反对林副主席！我们要誓死捍卫！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当前是要用我们的时候了。你们要全力以赴，一个人顶几个人、十几个人用。然后，他拿出林彪的手令让大家传阅，问道：“你们看怎么样？”

这时，周围几个人纷纷表态：“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保卫林副主席！”“保卫林副部长！”

林立果接着说：这次总的任务代号叫“571工程”，即“武装起义”。江腾蛟是前敌总指挥。搞成了论功行赏，王飞就是空军司令，刘世英就可以当副司令，李伟信可以当外贸部长。其他人都要重用。成败在此一举。程洪珍在中间插话说：“胜者王，败者寇。”林立果声嘶力竭地叫喊道：“败了也不是寇。搞成了一切都好了，失败了就打游击！”

这天夜里，在空军学院秘密据点里，林立果、周宇驰还同王飞进行了密

谈。他们让王飞看了林彪的手令，谈了谋害毛泽东的阴谋，要王飞和周宇驰共同负责北京方面。最后，林立果把叶群带给黄永胜的密封大信袋交给王飞，要王飞送给黄永胜。

9日和10日，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王飞等人，又先后多次在一起密谋，继续具体策划谋害毛泽东的办法。除了8日夜间提到的一些办法外，他们又提出了用“日本人对付张作霖的办法”，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在毛泽东乘坐的专列通过时，炸苏州附近硕放的铁路桥。江腾蛟说：要炸铁路，硕放那一段比较合适，附近没有陆军部队。周宇驰说，车一炸坏，就发动附近机场的部队以抢救毛泽东为名冲上去，在混乱中“解决问题”。并计划派鲁珉去干。他们还提出了让陈励耘派飞机轰炸火车等办法：“把列车打停后，欺骗战士说，上去抓凶手，看到还活着的都把他干掉。”

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时刻注视着林立果等在北京的策划和部署，并与黄永胜等进行着频繁的电话联系，9月10日上午，林立果派刘沛丰专程到北戴河送密件。中午，由王飞将林立果从北戴河带来的密封亲启信件送给黄永胜。这一天，黄永胜同叶群5次通电话，最长的两次分别达到90分钟和135分钟。下午4时，刘沛丰又从北戴河起飞回北京，并带回了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信的全文是：

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
敬礼

林彪

林彪为什么要给一天通了5次电话的黄永胜写这样一封亲笔信？黄永胜当时是总参谋长，而王飞不过是空军司令部的副参谋长。为什么林彪要黄永胜“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很明显，这不是一封普通的问候信，而是反革命集团内部的一封“接头”信，实际上是林彪发出的又一个手令。这封信上没有日期，就是为了便于林立果根据阴谋活动进展的情况，在必要时使用。

后来，林立果、周宇驰把这封信交给王飞，叫他在必要时送给黄永胜，并要他做黄永胜和林立果、周宇驰之间的联系人。

一个“抽鞭子”的电话

9月10日过去了。

林彪一伙要谋害的是毛泽东，但他们面对的却是整个人民。他们既要搞反革命武装政变，又不能让阴谋暴露，他们既要蒙骗一些人供他们驱使，又不能让这些人了解底细，这就给他们带来了无法克服的困难。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等人经过两天两夜的紧张策划，尽管他们诡计多端，机关算尽，还是没有商定一个大家认为有把握得逞的谋杀毛泽东的具体办法。

两天的时间不算长。但是，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沉不住气了。11日上午11点多，周宇驰给王飞打电话说：“叶主任给林立果打电话，发火了，你赶快来研究一下。”接着，林立果又打电话给王飞说：“主任刚才打电话给我们抽鞭子，她还要给你打电话，你要有个思想准备。”林立果还说：“现

在是势在必行，不能再犹豫了。你的代号就叫‘阿飞’，周宇驰的代号叫‘铜铃’。”王飞听了很紧张，便对林立果说：“我马上到你那里去。”

这个电话刚打完，还没放下耳机，总机说，不要放，叶群来电话。线路接通后。叶群先讲了几句客套话，就说到了“正题”。她假装“关切”地说：“我们对你们是很关心的。你们的每一点我们都为你们考虑，林副主席对你们很信任。托你们办的事应该抓紧办。”说到这里，叶群的语调变得严厉起来了。她说：“我们全家的身家性命都托给你们了。听说你有很大顾虑，总想‘抽梯子’。怕什么？就是死了也是烈士嘛！”

王飞连忙分辩说：“不是怕，我参加革命的时候还没有想到活到快 50 岁呢！是不好搞，怕搞不好把你们也连累了。”

叶群说：“林副主席历来说话一句算一句，不考虑成熟，不会要你们办的。办了不会亏待你们的，什么问题都好办。你们将来都是‘常’字号的。”在作了一番利诱以后，叶群又拿出了威胁的一手。她阴险地说：“你们忙活了这几天，现在就是不搞也好不了，人家也不会饶过你们的。你们也跑不了。现在是一根绳子把我们的命运拴到一块了。想脱也脱不了。只有同生死，共命运，不能把我们当‘省油灯’！”

王飞又连忙辩解说：“我考虑的是困难，怕连累你们，不是别的。”

叶群说：“有困难想法克服嘛！哪有不困难的事？你们想想办法嘛！江腾蛟那里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他（指毛泽东）到了我们根据地里了，不要坐失良机，要当机立断！”

王飞说：“我马上去找他们研究，尽力去办。”

这时，叶群又装出一副关怀的样子说：“你家里有什么困难吗？”“钱不够用？”“你的小孩多，带不过来，我帮助你们带。”最后，叶群要王飞在下午 6 点钟给她一个回话。

杀害毛泽东的阴谋破产

从北戴河抽来的一阵鞭子，把本来已经十分紧张的林立果等一伙反革命分子，打得四蹄腾空，开始了更紧张的阴谋活动。

王飞和叶群通话后，放下耳机，赶紧坐车到空军学院礼堂，在那里又另换一辆车，向西郊机场急驰而去。当他走进那所作为秘密据点的平房时，林立果、周宇驰和江腾蛟正在密谈，王飞听到他们在议论代号，他觉得把自己叫“阿飞”太露了，便插上去说：“我不叫‘阿飞’，我还叫原来的名字。”林立果说：“还是有一个代号方便。”王飞推托说：“你在普通电话上讲了，不能用了。”林立果说：“那就改叫‘黄翔’，老周叫‘金钟’。”（除周宇驰、王飞外，其他“舰队”成员也有代号。这些代号都报给了林彪、叶群，并通知了“舰队”成员。从林彪、叶群外逃时准备带走的一个本子中，查到了叶群亲笔记下的代号，在用红油笔写的“铜铃”、“阿飞”等代号旁，分别用铅笔写了“金钟”、“黄翔”等新改的代号。代号后面写有周宇驰、王飞等人的电话号码。）

商定了代号以后，林立果说：“林副主席决心已定，要坚决搞，就是研究如何执行的问题了。”于是，这一伙反革命分子又进行了更具体的策划。

他们商定了上海与北京之间的联络密语：“打响了”就叫“王维国病重”，“打成功了”就叫“王维国病愈”，“打坏了”就叫“王维国病危”。林立

果还叫李伟信来把这些暗语记录下来。

他们把专门从武汉地区叫来的一个师政委关光烈接到秘密据点，要他调火焰喷射器到上海交江腾蛟指挥，调部队到北京，供他们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使用。

晚上，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又把鲁珉叫来一起密谋，具体策划由鲁珉到硕放去炸毛泽东乘坐的专列。

林立果还不断地以封官许愿，给他的同伙打气。他宣布：“首长讲，谁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搞成了，我在北京开十万人大会欢迎你们，到那个时候，你们都是国家栋梁，有功之臣，要论功行赏。北京军区司令不是你江腾蛟干我还下放心。”江腾蛟得意忘形地说：“我当政委，老鲁（指鲁珉）当司令。”周宇驰说：“完成了任务，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由他挑选。”

可是，就在这天夜里，正当他们做着篡党篡国的黄粱美梦的时候，王维国从上海打电话向他们密报：毛泽东已经离开上海北上了！

在林彪一伙紧张地策划和部署谋害毛泽东的几天里，毛泽东停留在杭州。对于林彪一伙的阴谋，毛泽东是否有所察觉？我们无从猜测。但是，毛泽东的行动，却完全出乎林彪一伙的意料：

毛泽东在杭州停留的时间，远没有他们估计的那么久。9月10日下午，毛泽东离开杭州，心怀鬼胎的陈励耘匆匆赶到车站，竟不敢上前同毛泽东握手。

毛泽东在上海停留不到24小时，没下火车。11日上午接见一些负责人时，林彪一伙计划要在毛泽东接见时动手的王维国，没有被允许上车。

11日晚上，当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鲁珉正在策划炸硕放铁路桥时，毛泽东乘坐的列车已经离开上海，平稳地驶过硕放。

意外的消息，如一声惊雷，对林彪反革命集团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们暗害毛泽东的种种阴谋破产了！当时在场的李伟信，在他写的亲笔供词中，描述了林立果等听到消息时的沮丧情景：

我发现他们开会的房门打开着，走到门口一看，鲁珉不知何时已走，里边还有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四人，室内气氛异样，刚才那种嚣张气焰已为神色茫然所代替，众人目光滞呆，低头不语，原来伟大领袖毛泽东已北上返京，企图谋害主席的阴谋破产了。林（立果）流着泪说：“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首长’连生命都交给我了。我拿什么去见‘首长’”。沉默了一阵，周宇驰歇斯底里地说：现在难过也没用，也没有其他办法，只有等到国庆节那天，“首长”托病不去，我驾直升飞机去撞天安门！过一会又说：直升飞机要两个人，你们谁能跟我一块去。当时没人敢说，可能也都知道这是一个极不现实的恶念。等了一阵，在周宇驰催促下，于新野说，我可以去。刘沛丰后来也表示可以去。最后我也表示可以去。林立果此时假惺惺地说，这样不行，我不允许你们这样做。至此，这场骇人听闻的密谋才告结束。

但是，阴谋并没有结束。

反革命的“两手”

林彪反革命集团在《“571工程”纪要》中，对于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后果，按照他们自己的愿望，曾作了这样的设想：

两种可能性：
夺取全国政权，
割据局面

可能是出于反革命阴谋活动的特殊需要，在林彪身上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个是反革命两面派：表面上一套，背地里一套；说的一套，做的一套；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一个是反革命的两手：在进行着一个阴谋活动时，就准备着另一个或几个阴谋。所以，他们在策划谋害毛泽东的同时，就布置吴法宪等安排飞机，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和叛国外逃作准备：

9月8日晚，叶群就给吴法宪打电话，要他给林彪准备5架飞机，并坚持要吴法宪把任务交给当时住院治病的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萍。第二天，吴法宪便告诉了胡萍。

9月8日晚上9点多，林立果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在机场候机室命令胡萍为林彪准备两架飞机。胡萍当晚找空军某师原副政委潘景寅等人，研究了使用的飞机和机组人员，并要潘景寅把名单报给周宇驰。

9月11日晚11点多，叶群给胡萍打电话说：“那位小将（指林立果）都给你谈了吧，谈得好吧？”胡萍说：“谈得很好。”叶群说：“要你准备飞机是不是有难处？”叶群接着又说：“这件事我和胖司令（指吴法宪）也都作了安排，你要抓紧准备。”几天来，胡萍也不去医院治病了。他按照叶群等人的布置，加紧督促和检查飞机的准备情况。

9月12日，林彪一伙得到毛泽东离开上海的密报，经过紧急策划，作出了立即南逃广州的决定，企图另立中央，造成“割据局面”。下午四点半左右，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周宇驰对胡萍说，“毛主席最近找了很多负责同志谈了话，首长看这形势很不好，决定13日离开北戴河去广州。”据胡萍供述，周宇驰具体交待他说：

三叉戟飞机256号，今天送林立果回山海关，“首长”走时就用这架飞机。

准备一架伊尔—18，13日7时飞山海关，拉上部队，再到上海落个地，飞往广州沙堤机场。

另派一架多座的三叉戟飞机，拉上“机关”的人，13日8时直飞广州。告诉机长，这架飞机听王飞指挥。

再用一架安—12飞机，拉上二架云雀直升机，也飞广州去。

另外，派一架安—24飞机，先“训练”去上海，再到广州，好给林彪到小机场时使用。

下午5时左右，胡萍把派256号飞机送林立果去山海关的任务交给了潘景寅。然后，他电话通知空司航行局局长，252号（为了保密，他把256号说成252号）晚7时飞山海关，发训练预报，要他亲自掌握。并说：“值班的就不要讲了。”

晚上，胡萍又按照周宇驰的要求，准备了其余的飞机，配备了机组名单，并假借训练名义，申请了假航线和起飞时间。

部署南逃

9月12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早已跨过长江，呼啸着飞驰在华北的原野上，往北，往北……

如果说，几天来，“联合舰队”的秘密据点里，笼罩着一种诡秘、紧张的气氛；现在，这里却显现出慌乱的景象。那北上列车的隆隆声，仿佛在这里震荡。

空军学院小楼里，林立果在一些人的帮助下，匆忙地收拾行装，准备去北戴河。他把在北京部署南逃的事，交给了周宇驰。

傍晚，江腾蛟、王飞先后来到了小楼。在场的还有于新野、李伟信等人。周宇驰向他们宣布了南逃的决定：“毛主席回来以后，就要开三中全会，就要动手了。林副主席决定立即转移去广州，要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明天到广州。要保证他们安全地上飞机。”周宇驰接着说：去了以后，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进行动员，宣布另立中央，实行割据，形成南北朝的形势。并利用广州的广播电台发表广播。周宇驰还说：“我们还可以争取外援，林彪在苏联是有威望的。”

周宇驰宣布了南逃飞机起飞的时间和路线，接着交待任务说：明日早上6点，江腾蛟、王飞、于新野三人到西郊机场平房，由王飞打电话通知黄永胜来，由江腾蛟负责机上警卫工作。

散会的时候，周宇驰叫王飞、于新野赶快去组织“机关”南逃的人员。

周宇驰又交待李伟信，要他在13日乘去上海的那架伊尔—18飞机，到上海后，设法让飞机上的80到90名警卫部队下来，给他们找好住的地方，换上“上海小组”和上海“教导队”的人一起去广州。并叫李伟信把上述情况通知“上海小组”的蒋国璋，并要蒋国璋立即报告王维国。

“康曼德”潜回北戴河

9月12日傍晚，毛泽东乘坐的列车，平稳地徐徐驶进北京站。

差不多在这同时，“联合舰队”的“司令官”林立果却带着刘沛丰、程洪珍，一大堆行李，乘坐三叉戟256号专机，十分诡秘地离开北京去北戴河。他自己开汽车到机场，在机坪上飞机，除了准备把汽车开回的陈伦和以外，没有任何送行的人。

晚上7点40分，三叉戟256号飞机由潘景寅等驾驶，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了。升到空中，林立果拉下前舱的小盖板，向外张望。天空，繁星闪耀；地面，灯火辉映。大自然的景色依旧是那么壮丽，但是，这时的林立果却像一个窃贼贪婪地看着自己无法到手的宝物，长叹一声，狠狠地说：“北京啊，暂时分别了，看来可能要割据一段时间了。”

在飞机上，也许是为了自我安慰，也许是为了给同伙打气，林立果绘声绘色地向刘沛丰、程洪珍等讲述南逃广州的计划，描述着他们的“光辉前景”。

快到山海关机场了。林立果对程洪珍说：“下飞机后，你要把电话保密机换到直通北京的那条线上。明天7点钟，首长要和协和号（黄永胜的代号）

通电话。电话保证不好，你要负责！”林立果还交待程洪珍，要注意飞机的维护、加油、警卫等情况。

晚上8点15分，飞机在山海关机场落地。林立果到驾驶舱里，对机组人员说：“明天林副主席也要坐这架飞机。人民解放军战士要听林副主席的指挥，关键时刻要起作用。我代表林副主席谢谢大家。”下飞机后，林立果把程洪珍等人留在机场，他自己带着刘沛丰，开着机场的吉普车，往北戴河急驰而去。

在“婚礼”的掩护下

北戴河，林彪、叶群住宿的莲花石96号楼，从来没有这样忙乱过。

自从9月6日，林彪、叶群接到毛泽东与各地负责人谈话的情报后，到9月12日，这是林彪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大概也是他一生中最紧张的一个星期。

在这7天里，林彪、叶群直接策划和指挥了杀害毛泽东以及南逃广州的阴谋。

在这7天里，林彪、叶群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进行了频繁的秘密联系。根据军委电话总机话务员的通话记录单记载，7天中，他们之间通过军委电话总机接转的电话有51次（不包括自动电话）。其中，叶群在北戴河用保密机与黄永胜通话16次，与吴法宪通话5次，与邱会作通话10次。仅这31次电话，通话时间合计948分钟，即将近16小时，相当于两个工作日。其中，通话时间超过50分钟的有8次，最长的一次135分钟。

在这7天中，林彪、叶群在策划和指挥杀害毛泽东、南逃广州的同时，还紧张地进行了叛逃的准备：

9月7日上午9时50分左右，叶群叫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俄华字典、英华字典、俄语和英语会话，让飞机（准备送女儿到北戴河的飞机）带来。为此，飞机起飞时间推迟了近一小时。

9月7日晚约9点30分，总参二部的一位参谋照例给叶群“讲课”，原来应该讲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或美国电影《巴顿将军》，可是，叶群却突然拿着《世界地图集》，问蒙古有哪些大城市，哪些地方有苏联军队，中苏、中蒙边境地区有多少苏联军队。

9月8日上午，周宇驰在北京找尚登峨（空军司令部航行局原局长），要他搞一本苏联航班地图。

9月9日上午11点30分左右，叶群要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有关中美关系的文件送来。

9月9日下午，周宇驰布置许秀绪（空军司令部雷达兵部技术处原副处长、“联合舰队”成员）搞一份东北、华北、西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

9月9日晚9时，周宇驰布置王永奎（空军司令部情报部技侦处原副处长、“联合舰队”成员）搞一份可作导航用的周围国家广播电台频率表。

9月10日上午，周宇驰要鲁珉把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的一、二、三级机场的位置、长度、宽度“拉个单子”给他。

9月11日上午11时左右，叶群要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全军副军以上干部名册、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以及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的全套文件送来。

在这期间，林彪、叶群为了掩护他们的阴谋活动，一方面不断地放出空气，林彪要“动一动”，“利用坐飞机运动运动”，“准备去大连”，“国庆前回北京”等等。另一方面，还在北戴河导演了为女儿订婚的活动。9月7日，叶群把女儿接到北戴河，制造出女儿即将结婚的气氛，从北京到广州，都开始有人送礼。9月12日下午约3时30分，林彪一伙在紧张地准备南逃广州的同时，在北戴河为女儿举行了“订婚”仪式。又是送礼，又是照相，叶群还装扮成送女出嫁的慈母模样，抱着女婿哭了一场。同时，叶群又放出空气，在走廊里对女儿说：“立果知道你们订婚，来电话说，今晚一定要赶回来祝贺。”

12日晚上，为了庆贺“订婚”，96号楼里正在放映电影《甜甜蜜蜜》。不到9点，林立果突然进来了。这位专门“赶回来祝贺”的弟弟，见了姐姐只说了一句：“祝贺你们！我马上要到首长那里去！”就急忙和叶群一起，钻进林彪的客室进行密谋去了。

但是，尽管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怎样保密，在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中，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同程度地感觉到了气氛的反常。他们互相猜测着，探听着，议论着，想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有个别的内勤工作人员，听到了林彪、叶群、林立果密谋逃跑的片言只语。

在这种情况下，警卫部队的一些同志了解到发生在96号楼里的不正常情况，立即报告了中央。

阴谋败露

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灯光明亮。周恩来正在主持讨论将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

10点30分左右，周恩来获悉来自北戴河的报告，立即向吴法宪查问三叉戟飞机秘密调到山海关机场的情况。

吴法宪接到周恩来追查飞机的电话，十分惊恐。他给胡萍打电话说：“今晚在山海关的飞机是怎么回事，总理查来了，事情闹大了。你们怎么搞的，你知道不知道？”胡萍撒谎说：“不知道，只听他们说进行训练。”吴法宪说：“训练为什么不回来？”胡萍推托说：“我查一查。”

胡萍接到吴法宪的电话后，立即打电话给周宇驰通风报信，向周宇驰密报了周恩来追查256号专机的情报。胡萍说：“看来事情麻烦了。”并要周宇驰“早打主意”。

胡萍又给驾驶256号飞机到山海关的潘景寅打电话，把周恩来追查飞机以及自己撒谎欺骗中央的情况，告诉了潘景寅，并且与潘景寅密谋对策说：“如果吴法宪查问你256号飞机的事。你说我根本不知道，是你们自己安排训练的。如果问训练为什么没有回来，就说飞机有点毛病。”

没有多久，吴法宪第二次打电话告诉胡萍，总理有两条指示：一、没有命令，这架飞机任何人都不准动；二、这架飞机今天晚上准备飞回来，但不准带任何人回北京。并要胡萍马上把总理的指示通知潘景寅。胡萍在把周恩来的指示告诉了潘景寅后，又交待潘景寅：如果查问你飞机是什么毛病，你就说发动机故障。

胡萍一方面继续谎报情况，欺骗周恩来，来对抗周恩来要256号专机返京的指示。另一方面，再次派人给周宇驰报信。他对专机服务队的一名副队

长说：“你赶紧去周宇驰那里，告诉周宇驰，事情很复杂，告诉他们赶紧行动，候机室这边有我应付。”这个副队长立即到了设在工字房的秘密据点，把胡萍的话转告了周宇驰。周宇驰说了一声“好吧”，就赶紧回到屋里打电话去

一次没有开完的黑会

当周恩来追查 256 号专机的秘密行动的时候，空军办公大楼西三楼南侧最西头的办公室里，一个黑会正在进行。王飞、于新野按照周宇驰的布置，召集刘世英、鲁珉、贺德全、朱铁铮（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原处长），郑兴和（空军司令部军务部装备处原处长）等，研究确定“机关”南逃人员名单和行动计划。他们先研究了总的名单，然后研究了分别随同黄、吴、李、邱上飞机的分组名单，研究了通知南逃人员的方法，去机场车辆的安排，集中的地点，还确定了分别给黄、吴、李、邱的秘书和司机“做工作”的人。

在这中间，王飞叫郑兴和以“首长打靶”为名，到警卫营取手枪 30 支，子弹 2000 多发；冲锋枪 2 支，子弹 200 发，装到汽车上。

王飞还提出，会议结束后，他要带几个人去西郊机场，实地察看一下人员集中的地点和上飞机的位置。并计划在第二天凌晨人员集中后，由他进行简单“动员”，由郑兴和发枪。

可是，晚上 11 点，他们的黑会还没结束，周宇驰给王飞来电话说：“暴露了，不搞了。”

会场一片慌乱，王飞宣布：“以上一切，统统作废。”他要大家“就当没有这回事”，马上解散，注意保密。并叫把会议记录和几份名单拿到厕所销毁。叫郑兴和把枪还给警卫营。

但是，于新野拿着的一份名单，当时却没有销毁，从而为这次黑会留下了有力的物证。

仓皇叛逃

还是 9 月 12 日晚上。北戴河 96 号楼过厅里，为庆祝“订婚”而放映的第二部影片《假少爷》也快结束了。

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在“去大连”的幌子下，紧张地进行着南逃广州的最后准备。

这时，胡萍密报的周恩来追查 256 号专机的情报传到北戴河，好比在乱哄哄的蜂窝里，又燃起了一团火。

深夜约 11 时 40 分，叶群神色紧张地把林彪的警卫秘书叫到林彪那里。她让警卫秘书先在门口等着，自己到林彪的客室里，悄声说了几句话，然后把警卫秘书叫了进去。林彪坐在沙发里，那张蜡白的脸变得更白了。他对警卫秘书说：“今晚反正也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东西，马上就走。”

顿时，96 号楼里像开了的锅。叶群披头散发，发疯似地在走廊里跑来跑去，不住地喊叫：电影别演了！快调车，快调车，越快越好。她又把警卫秘书叫到卫生间里说：快点吧！什么东西都不能带了，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警卫秘书叫人去通知林彪的司机快把车开上来，然后来到值班室。他想

弄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便要了北京胡萍的电话，他问胡萍：“首长要马上走，什么也不带，我觉着方向不明确，林立果跟你讲过到哪儿去吗？”胡萍紧张地说：“你不要问了，不要问了，你不要往北京打电话了。要走你就赶快收拾收拾准备走吧！”说着，就把话筒放下了。

林立果也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乱窜。这时他跑进来，把警卫秘书拉出去说：“快点吧！有人要来抓首长。我给周宇驰打个电话，你在这里看一下。”林立果打电话时，警卫秘书听到他在电话里说：“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

林立果打完电话出来，又催警卫秘书调车。接着叶群也来催促。警卫秘书提着两个皮包，向外走去，边走边喊，“把车开上来，把车开上来！”

林彪的司机把车开进了 96 号楼车库。警卫秘书从外面走进车库。在里面，刘沛丰手里提着三、四个提包，首先上了车，接着叶群、林立果上了车，最怕着凉的林彪一反常态，没穿大衣，也没戴帽子，最后一个上了车。

这时，已经接近午夜 12 点，林彪的汽车开动后，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次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了。”

林彪的汽车一开动，警卫部队知道了。他们来到 58 楼附近的马路上，向急驰而来的汽车扬手示意，要司机停车，汽车里，叶群对司机说：“8341 部队对首长不忠，冲！”司机便按着喇叭，加快车速，冲了过去。

坐在林彪汽车里的警卫秘书，思想上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车子开过 58 号楼不远，他突然喊了一声“停车”！司机对他没有戒备，把车停了下来。警卫秘书立即跳出汽车。汽车里响起了枪声。警卫秘书也开枪射击。警卫部队迅速赶来。林彪的汽车立即逃跑了。它以飞快的速度，超过了在这之前警卫部队派去机场报信的吉普车，向停在山海关机场的 256 号专机驰去。

海军山海关机场，这时的气氛也很紧张。

周恩来在通过吴法宪追查 256 号飞机的同时，又通过李作鹏向山海关机场了解情况，并下达指示：256 号专机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可是，李作鹏在给海军山海关机场场站下达命令时，却篡改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并说：“谁来指示要报告我。要负责任。”

9 月 13 日零点 20 分，林彪的汽车已接近飞机，256 号飞机尚未发动。山海关机场场站负责人打电话请求李作鹏，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不采取任何阻止起飞的措施，竟推托说：“可直接报告请示总理。”用谗话搪塞，拖延时间。

13 日零点 22 分，林彪、叶群、林立果和刘沛丰仓皇登上飞机。他们不仅来不及通知等候在机场的程洪珍等人，连机组人员也没上齐，就命令飞机起动滑行，强行起飞。这时，场站负责人又向李作鹏报告：“飞机已强行滑出。”李作鹏问：“飞机到哪里了？”答：“快到跑道口了。”李作鹏说：“就这样吧！”就这样，256 号飞机向着漆黑的夜空，逃窜而去。

山海关机场场站副站长赵雅辉等五位同志，目击了林彪等人叛逃投敌时的狼狈相，下面是他们写的《目击记》：

我们在现场亲眼看到叛党叛国分子林彪、叶群、林立果及其死党刘沛丰等人仓皇逃命，狼狈投敌的情形。1971 年 9 月 13 日零点 22 分，林彪一伙乘坐红旗轿车，极高的速度开到停在机场的三叉戟飞机附近。车还未停稳，林

彪一伙就急忙下车。叶群、林立果、刘沛车等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快！快！快！快！快！飞机快起动！飞机快起动！叶群披头散发，林彪光着秃头，慌慌张张地跑到飞机驾驶舱门底下，在没有客机梯子的情况下，这伙叛徒卖国贼慌忙顺着驾驶舱的小梯子，一个一个往上爬。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叶群往上爬的时候，林彪紧跟着往上爬，林彪的秃头都顶着了叶群脚。他们没等机组人员上齐，连副驾驶员、领航员、通讯报务员都没上机，飞机滑行灯也没敢开，机舱门还未关上，飞机就急促起动，强行滑出。在滑行中，右机翼撞坏了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罐口盖，刮掉了机翼上的铝皮，撞碎了机翼上的绿色玻璃灯罩和有机玻璃等。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信保障的情况下，便在一片漆黑中，于零点32分，强行起飞，仓惶逃命。

请看，一个依靠骗术曾经窃得人民的一时信任，因而气壮如牛的人，当他一旦感觉到将要在人民面前暴露自己的真面目时，是何等的胆小如鼠啊！

9月1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林彪等人乘坐的256号飞机，在外逃叛国的途中坠落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两条“尾巴”

林彪自我爆炸，他们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彻底完蛋了。

但是，他们的阴谋活动还留下了两条“尾巴”。

13日凌晨一点左右，在北京的周宇驰接到林立果决定叛逃的电话后，来到空军学院小楼秘密据点，同于新野、李伟信密谋外逃。他们利用林彪的手令，编造谎言蒙骗了飞行中队长陈修文。3点15分，在北京沙河机场劫持3685号直升飞机外逃，妄图继续追随当时已经毙命的主子林彪。

外逃途中，驾驶员陈修文发觉了他们的阴谋，与这伙叛徒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采取措施回飞北京。6时47分，直升飞机在北京市怀柔县境内降落。陈修文被周宇驰杀害，周宇驰、于新野自杀身亡，李伟信被逮捕。从直升飞机上，缴获了他们所窃取的大批国家机密文件和大量美钞。

在另一个地方——空军第二高级专科学校的秘密据点里，这时还隐藏着“联合舰队”的成员王永奎、许秀绪、王琢、陈伦和等人。他们在12日下午得到了林立果、周宇驰要他们南逃广州的命令，12日深夜，奉命转移到“二高专”据点待命。可是，焦急地等了一夜，却杳无信息。他们分析，认为林立果已到广州，便决定火速坐火车去广州。9月13日下午，王永奎搞来了通行证，一起到了火车站。为了防备暴露，分散上了去广州的火车，15日早上到达广州。

但是，他们在广州到处打听，不但没有找到林彪一伙在广州另立的“中央”，也找不到林立果等人的下落，知道情况不妙。几个人商量，决定逃往上海。16日，他们弄到了空白介绍信，伪造了姓名和身分，开了假证明，上了火车。当晚在广东源潭车站被捕。

“联合舰队”覆没了！它覆没在人民的怒涛里！

翻开浩瀚的史书，追溯漫长的历史，所有的事实都证明，一切与人民为敌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9·13”事件将作为又一个重要的例证，留在祖国的史册上。

林彪折戟沉沙、暴尸于异国荒野的结局，真是历史的巧妙安排；而林彪

反革命集团的失败，却是历史的必然。不管是怎样的野心家、阴谋家，他们可以把谬论吹嘘为真理，却无法抗拒历史的法则；他们可以谋害任何个人，却永远无法谋害作为整体的人民！

但是，那些反革命分子不会接受历史的教训。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残兵败将，又投到江青的“麾下”，继续与人民为敌。

等待他们的，同样是可耻的下场！

第十六章 尼克松访华，中美解怨中南海。毛泽东说：何必那么僵着呢？ 一定要谈成。

尼克松率先与周恩来握手

1972年的春天即将来临的时候，冻结了22年的中美关系，随着第一位美国总统的来访而解冻了。

2月21日，北京的气候同美国一样阴冷。当尼克松乘坐的“76精神号”专机飞越太平洋出现在人民共和国首都上空时，正巧太阳冲出了厚积的云层照射到大地上。尼克松从舷窗向外眺望，田野是一片灰黄，小村镇就像他看过的图画里中世纪的村镇一样。

上午11时10分，尼克松总统的专机到京，美国人做事相当认真，元月3日，总统国家安全副助理黑格就带了一个庞大的先遣技术小组到北京。他们在首都机场建立起一个电视转播台，并进行其它准备工作。先遣组为总统座机确定将要滑行的路线、停放的位置。机门朝哪个方向打开？总统从哪个点下飞机？舷梯放在哪个角度？这一切，都用皮尺量好，然后划上标志，固定下来。就连飞机的前轮将停在哪儿块地板上，主轮压在哪个点上，都测量后做上记号。

间隔20分钟以后，总统专机平稳地停定在候机楼前。舱门开了，穿大衣的尼克松与其穿红大衣的夫人帕特两人走出舱门。出乎这位美国总统的意料，机场的欢迎是冷调子的，没有欢呼雀跃的群众，没有迎接国家元首的红地毯，没有礼炮。只有一面美国国旗，和一面五星红旗并排在机场上空飘扬。

由于当时中美尚未建交，中国只能以符合这种情况的礼遇接待这位第一次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盖不住他的瘦弱。紧随他身后的是李先念、叶剑英等领导人和包括各界代表的百余人，没有外国驻华使节。

当尼克松下到舷梯快一半时，周恩来带头开始鼓掌。尼克松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当尼克松走完梯级，离地面还有三、四级台阶时，便微笑着伸出他的手，周恩来那只手也伸了出来。两人紧紧地握着手，轻轻地摇晃着，足足有一分多钟。周恩来说：

“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呵。”

尼克松日后回忆：“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待尼克松和周恩来的历史性握手圆满结束，随着通讯卫星向全世界实况播出，这时，罗杰斯、基辛格、霍尔德曼等代表团成员，才获准涌出机舱，走下舷梯。

原来，特别重视电视的神奇作用的尼克松已经下令对电视转播作了精心的计划安排。中美两国隔着太平洋遥遥相望，在时差上，中国的北京时间比华盛顿时间早13个小时。中国每天上午的活动可以在晚上电视的黄金时间传到美国，晚上的活动又可以在早晨的电视上作实况转播。因而，尼克松特意安排他到达北京的时间是21日上午11点30分，也即是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星期日晚上10点30分，正是电视观众最多的时刻。

为了突出美国总统到达北京这一历史性镜头，尼克松和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早已决定：当电视摄像机拍摄尼克松走下舷梯第一次和周恩来见面与握手时，镜头里美方应该只有总统单独一个人。他要纠正传闻中1954年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的失礼行为；此时，不能有其他美国人在电视镜头中出现而分散观众的注意力。就连罗杰斯和基辛格这样的人物，也被告知要留在飞机上，直到总统与周恩来握手结束。但是，霍尔德曼还是不放心，还特别委派一名强壮高大的副官待总统一走出机舱就挡住飞机的通道。于是，当尼克松走下舷梯时，身后不再有人跟随出来，不像往常国家首脑来访时常见的，代表团成员及随员们会尾随着元首沿舷梯鱼贯而下。长长的舷梯只有尼克松与夫人两人迈步走下来，仿佛偌大的“76精神号”专机只载着他们两人。

尼克松被介绍给所有中国官员，然后站在周恩来的左边，这时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

周恩来陪同尼克松检阅仪仗队。仪仗队的士兵一个个身材高大健壮，衣着笔挺，精神抖擞。周恩来和尼克松在长长的威武的队列踏着节奏鲜明的步伐走过时，每个士兵都神态昂扬地微微转动着头，行着注目礼，使人觉得庄严、肃穆、兴奋。

周恩来和尼克松同乘一辆防弹红旗高级轿车进城。当车队驶至长安大街时，尼克松心里还满以为真正的欢迎仪式可能在天安门广场等待着举行。尼克松在白宫作访华准备时，观看过天安门前人山人海向毛泽东欢呼的纪录片镜头，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他在飞机上曾经想过，要是他受到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的欢迎，那么，盛况将不亚于他在贝尔格莱德和布加勒斯特受到的接待。可是，车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时，广阔的广场空无一人，据说许多行人被挡在横街小巷里。尼克松的希望落了空。他的心情有点黯然。他注意到连大街也是空的。

这时，周恩来一一将天安门广场的主要建筑指给尼克松看：“这是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在这里会见群众。那是人民大会堂，人民代表开会的地方……”

尼克松“哦、哦”应着，看着窗外。他是觉得有点冷淡；但是，外表没有明显地流露出他内心的感觉。

尼克松住入 18 号楼

汽车很快驰入钓鱼台国宾馆。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在尼克松与基辛格及白宫来的工作人员下榻的 18 号楼等候。

18 号楼被人戏称为“元首楼”。它是一座二层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建筑物，建筑面积约 4000 平方米，楼身洁白，飞檐绿瓦，门前悬挂着盏盏大红纱灯，有一种非凡的气派。

元首楼一楼有一处 328 平方米、布置精美的室内花园，厅内铺着绒毯般的塑料草坪。花园的东南、西北角分布着造型优美又形态各异的山石和水池，水池中喷泉飞花，金鱼攒动。池边围种着四季花木，有山茶、棕竹、散尾葵、兰草、杜鹃、梅花、玉兰、芭蕉等。由于这里无论是哪个季节都显得妩媚可爱，生气勃勃，所以被称为“四季厅”。

步入宾馆后，大家在会客厅摆成大圆圈的沙发上就座，周恩来在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等官员的陪同下，一一招呼了美国代表团的每一个成员，他

在寒暄中还经常开几个玩笑，显出自信与轻松。让尼克松第一次亲自领略了周恩来的风度。

午宴结束后，尼克松一行人各自回住房去盥洗。

罗杰斯和国务院的人员住在不远处的一幢稍小的6号楼，基辛格前两次来访时在这幢楼里住过。

从住处的安排上能体察出周恩来很熟悉美国的国情，知道美国行政机构内部奇怪的相互制约和平衡。

刚一会儿，周恩来来找基辛格。他俩在会客室刚见面，周恩来不像往常一样先开开玩笑，直接说：“毛主席想会见总统，请你也一同去。”

尽管毛泽东要会见尼克松，这是有所准备的；基辛格却没有料到安排得那么快，他内心还是很高兴，却控制住没有明显流露出来。他想到周恩来没有提到请罗杰斯国务卿一块去，他也不打算问，他想到的是自己能干的助手洛德，便问：“我能否带助手洛德去作记录？”

周恩来点头同意了，语气有点急：“主席已经请了总统，主席想很快就和总统见面。”

基辛格知道毛泽东和他所蔑视的历代皇帝一样深居简出，神秘莫测。据说，没有人能事先和他约定见面的时间，他的召见都是突如其来的。因而，基辛格马上去请尼克松。那里，尼克松正想洗一个淋浴，饶有兴趣地欣赏着卫生间。他听说当年赫鲁晓夫作为第一名客人住进了总统套间时，曾抱怨卫生间的浴池太小了，难以容下他自由的想象。细心的周恩来知道之后，马上请人重新设计，着实改造了一番，才成今天这种样式。

毛泽东驾驭整个会晤

打开中美关系的决策是毛泽东主席作出的。他对尼克松的来访很重视。尼克松刚吃完午饭，毛泽东就决定会见尼克松。

高级红旗轿车穿过西长安街，驶进有两个解放军士兵站岗的新华门，绕过红墙，经过安静无人的甬道，驶至“游泳池”。

14时40分尼克松与基辛格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走进这个四合院，穿过一条宽过道，绕过一张乒乓球桌，进入了毛泽东的书房。

基辛格后来对毛泽东的书房作了如下的描述：

……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有一张简易的木床。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俭省的中产阶级家庭风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沙发的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在毛泽东座位的右前方是一个痰盂。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我最后两次见他时，他需要两个护理人员搀扶，但他总是要站起来欢迎客人的。

毛泽东站起来，微笑着望着尼克松。他虽然大病初愈，但眼光锐利，神

态略带嘲讽。他说话已经有点困难,但他并不避讳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

他患了支气管炎与肺气肿,经常喘息,咳嗽,吐痰,所以他的脚边摆着大痰盂。他的病是他长期大量吸烟所致。他曾经遵医嘱努力戒烟,但是戒不掉。

他朝尼克松伸出手,尼克松也朝他伸出手。来自两个世界的头面人物紧紧地握手了。尼克松将左手也搭了上去握着,毛泽东也将左手搭上去握着。两人都笑了,两个人的四只手相叠在一起握了好一会,大大超过了正常礼节的握手时间。是不是他俩都想将20多年由于相互敌视而失去的握手机会都弥补回来呢?

毛泽东也和基辛格握手,上下打量着基辛格,还用下颏点了点头,说:“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

基辛格笑着说:“我很高兴见到主席。”

基辛格感觉到,除了戴高乐以外,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这个身旁有一名女护士协助他站稳的高大魁梧的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力量和权力的巨大作用的见证。

毛泽东很随便地谈起话来。他对尼克松说:

“你认为我是可以同你谈哲学的人么?哲学可是个难题呀。”他开玩笑地摆了摆手,把脸转向基辛格,“对这个难题,我没有什么意思的话可讲,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

当尼克松在列举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家和地区就国际问题谈论具体细节时,毛泽东又摆了摆手,指着周恩来说道:

“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谈哲学问题。”

毛泽东接着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我们两个国家不存在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所以我们两家怪得很,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打乒乓球起不到10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算起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来往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死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

毛泽东说:“你们下午还有事,吹到这里差不多了吧。”尼克松表示,他这次来访是冒很大的风险的,作出这次决定实属不易,他懂得“只争朝夕”。毛泽东说:“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然后握手告别。

半个多月以后,当基辛格在白宫他那安静的办公室里,细心琢磨毛泽东和尼克松谈话的记录时,他发现毛泽东谈话中实际上已经勾划出了上海公报的内容。他注意到,公报里的每一个段落,在毛泽东和尼克松的谈话里都有相应的一句話。怪不得在那以后的一个星期的谈判中,所有的中方人员,特别是周恩来总理,都反复地引述毛泽东谈话中的主要内容。

在毛泽东会晤尼克松后的几小时之内,中国就向外国新闻界提供了面带微笑的毛泽东和咧着嘴笑的尼克松会见的新闻照片和电影。这种作法表明,毛泽东本人很快赞扬了尼克松的访问。

周恩来的即席表演

2月21日晚，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宾主云集。尼克松及夫人、基辛格等由周恩来陪同坐在可以容纳20人的主宾席的大圆桌旁。

在中国人的宴会上，无休止的祝酒是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内容，招待尼克松、基辛格这样的贵宾用的茅台酒据说已贮存30年以上。当服务员将那古雅的小口白陶瓷酒罐打开，一股特殊的芳香悠悠溢出，沁向四周。

“这就是驰名中外的茅台酒，酒精含量在50度以上。”周恩来举起面前的一个小酒杯向尼克松介绍。当时的国宴，每个客人面前至少摆上大、中、小三个酒杯，每个酒杯都斟得满满的，其中必有国酒“茅台”，其余的是各种名牌葡萄酒，另外还要上桔子水、矿泉水。

“我听说过您讲的笑话。说一个人喝多了，饭后想吸一支烟，可是点火时，烟还没有吸燃，他自己先爆炸了。”尼克松讲到这里，不等翻译译出，自己先笑了。

周恩来也开怀大笑。他当真拿来火柴，划着之后，认真点燃自己杯中的茅台酒，用愉快的声音说：“尼克松先生，请看，它确实可以燃烧。”

蔚蓝色的火苗闪烁着，周恩来的目光也在闪烁。酒杯里的火苗越燃越小，终于渐渐燃尽。周恩来的目光也出现了瞬间的迷茫，一副怅然若失的淡淡的伤怀鲜明地浮现在脸上，却稍瞬即隐地逝去，眼睛重新一亮，显示出内心的火焰还不曾熄，他带着若有所思的神情望了尼克松一眼，含义无穷地点了点头。

周恩来的表演将尼克松总统迷住了。尼克松回到华盛顿以后，曾得意地向他的女儿特里西虹表演茅台酒的厉害，当他把一瓶茅台倒在碗里，点着了火。岂知蓝色的火焰跳跃着，竟不熄灭，他大为骇然；碗炸开了，吐着火苗的茅台酒流满了桌面。基辛格曾经幽默地提到此事，“美国第一家庭的成员奋勇协力，慌忙救火，才把火扑灭，防止了一场国家的悲剧。否则的话，尼克松政府会自作自受地提前收场，比实际发生的会更早些。”

做完茅台酒的表演后，周恩来端起了服务员新换上的酒杯，茅台酒早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已扬名四海了，但是，1972年2月21日，星期一的晚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上，电视摄像机拍下了周恩来与尼克松满脸喜悦地用茅台干杯的镜头，并向全世界播送，更使茅台酒伴随着这个历史性的“干杯”而名震世界。尼克松对于这种干杯的动作不是十分熟练，在举着酒杯与周恩来碰杯的一刹那，举杯的那只胳膊还要往上一耸。

宴会中，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尼克松使用筷子的熟练技巧。周恩来对尼克松夫人帕特称赞：“总统和你都能熟练地用筷子。”

帕特笑着说：“为了来中国，我们在白宫都学着用筷子呐。”

据说，早在半年前，尼克松就把他餐桌上的刀子、叉子换成了中国的筷子。

双方祝酒后，周恩来举着杯到每一宴席去绕圈子，向美国官方代表人员逐一敬酒。清脆的碰杯声在餐厅里响个不停，像轻风吹拂下的巨大的枝形吊灯上的那些流苏和水晶坠儿的叮咚之声一般悦耳。

可是，只要有人稍一留意便会发现，周恩来祝酒时，说着“干杯”，却一次也不像过去那样痛快豪爽地喝干杯中酒。他只是“舔酒”，用嘴唇轻轻

沾一下杯沿，然后礼貌热情地向对方致意，用一个微笑和注目的眼光替代了干杯的动作。

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时，酒杯仍然是满的。

尼克松一次又一次朝周恩来的酒杯投去目光，终于问了一句：“我听说您的酒量很大？”

周恩来笑了笑，带着回忆的神情：“过去能喝。红军长征时，我曾经一次喝过25杯茅台。”周恩来把酒杯捏在手指间，注目着转动酒杯，“比这个杯子大。”

尼克松吃了一惊，继而疑惑地问：“可是今天你没喝？”

周恩来点头：“年龄大了。医生限制我喝酒，不能超过两杯，最多三杯。”

尼克松说：“我在书里曾经读过这样一段故事，说红军长征途中攻占生产茅台酒的茅台镇，把镇里的酒全都喝光了。”

周恩来眨动双眼，目光里流露出对往昔的眷恋，说：“长征路上，茅台酒是被我们看作包治百病的良药，洗伤、镇痛、解毒、治伤风感冒……”

“让我们用这个‘万应良药’干杯。”尼克松举杯。

周恩来举杯。这一次他干了杯，因为客人先干了杯。

席间，周恩来指着摆放在桌上的熊猫牌香烟盒对帕特说：“我想送给你这个。”

帕特大为吃惊：“你说……烟么？”

周恩来笑了，向帕特解释说：

“不，不是烟，我说的是熊猫。我们要送给你们两只熊猫。”

“哦！”帕特惊喜地对尼克松说，“理查德，周恩来总理说送给我们两只熊猫！真的熊猫！”

这个镜头通过通讯卫星传到美国，正好是在早晨的新闻节目中播出。这天，在美国的街头，家庭里，办公楼内，企业里，人们都在议论着周恩来送熊猫。《纽约时报》评论说，“周恩来真是摸透了美国人的心思。”《华盛顿邮报》评论，“周恩来通过可爱的熊猫一下子就把美国人的心征服了。”

后来，尼克松也决定送两只北部寒冷地区生长的麝香牛给中国。

艰难的“基乔会谈”

基辛格这次随尼克松访华，没有参加任何参观游览活动。他在上两次访华时已经看过这些名胜了。他曾风趣地开玩笑说，他是被细心的中国人用作试验的豚鼠，来试验时间安排和保卫措施，并看看这些外行的美国人在中国历史古迹面前作一些什么反应。这些时间，他主要是同乔冠华一块，躲在钓鱼台的宾馆里，逐字逐句地研究公报。

尼克松访华的会谈分三个层次进行。罗杰斯国务卿和姬鹏飞外长是一个层次，具体商讨促进双边贸易和人员往来，也就是华沙会谈多年来的问题。尼克松和周恩来之间的会谈又是一个层次，这是两国首脑的总会谈。第三个层次是基辛格与中国副外长乔冠华起草公报的会谈。这第三个层次的会谈是最为艰难的。

而台湾问题又是第三个层次会谈中最棘手的问题。尽管不少有争议的问题的措词大部分在十月份的会谈中已经基本解决，而且公报的构思已经肯定了；但是，关于台湾问题的双方措辞，分歧还是巨大的，针锋相对的。分歧

虽然很大，解决台湾问题的基调却是两方同意的，那就是把最终解决留待未来，而这种未来将由公报建立的关系以及公报谈判的方式加以开拓。他们两人的会谈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基乔会谈”。

基乔会谈的第一天，2月22日，两人逐行审查公报现存草案，肯定已经达成协议的部分；然后，两方各自阐述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第二天，主要由基辛格介绍美国准备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中达成的协议。

第三天，2月24日，基乔之间开始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实质性谈判。两人针锋相对，争吵激烈；两人都有学者风度，谈判风格又各不相同，基辛格辩辞逻辑性强，富于哲理，一腔带德国口音的英语很难翻译；而乔冠华在雄辩之中思路清晰，思辩性强，原则当中豪爽豁达。

乔冠华提出的中国方案，美国观点是“美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将逐步减少并最终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基辛格拒绝了这个方案，说：“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把撤军说成是一个目标。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坚持撤军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和缓和整个亚洲紧张局势联系起来。”

“但是，这个前提，必须是美国无条件的撤军。”乔冠华坚持说。

“这样做会破坏整个关系，美国公众舆论决不会答应的。”基辛格当然也不相让。

每到这个时刻，双方相持不下，都会把扯紧的弦放松，开一两句玩笑来冲淡紧张气氛，用友好的态度把巨大的决心掩盖起来，不致使个人关系过分紧张。两人的谈判艺术接近炉火纯青。

这时，乔冠华果然松了弦，说：

“博士，你是出生在德国，我是在德国获得的学位。从这点上，我们应该有共同的地方。可是，在哲学上，我喜欢黑格尔，你喜欢康德；这也许是我们不能取得一致的原因吧——”

乔冠华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四十年代跟美国人打过交道，朝鲜战争期间也参加过与美国人交锋的板门店停战谈判，他倍熟谈判艺术，善于掌握节奏；该犀利时，锋锐芒利，寸土不让；该徐缓时，和风细雨，开朗豪爽。数月以前，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二十六届联合国代表大会，风度迷人地坐进刚刚恢复的中国席位时，在各国代表的注目下，敞怀朗声大笑，表现了新中国进入国际讲坛的豪情。纽约某大报为此专门写了篇评论，题为《乔的笑》。基辛格与乔冠华在谈判桌上相互交锋论战，也相互洞察了解，两个竟成了好友，经常往来。

会谈取得突破

第四天，2月25日，这天上午尼克松参观故宫，当他看到两千年前死去的一位王爷穿的金缕玉衣时，说：“穿上这玩意儿就不好到处走动了。”当他看到一个皇帝为避免听到谏言而戴的耳塞时，开玩笑他说：“给我搞一副吧。”

这时基乔谈判，两人还是不着急，随随便便漫谈着交换意见，仍是各执己见。好像谈判根本没有最后时限，好像明天不必飞去杭州，后天也无须在上海发表公报。其实，这都是在用共同的办法向对方施加压力。到了下午，

在乔冠华向周恩来汇报、基辛格向尼克松汇报之后，两人再碰头，双方都提出了新方案，作了让步。乔冠华提出，只要提到全部撤出驻台的美军，中国就不再反对美方表示关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基辛格提出，把全部撤军这个最终目标和美方在此期间逐步撤出军队这两个问题分开，以前是两点包括在一个句子里的。

乔冠华表示出了兴趣，提出修改个别词汇。他说，最好提和平解决的“前景”，而不要用“前提”。他说：“用‘前景’，含义更积极些，显示出是双方的意见；而用‘前提’听上去是华盛顿单方面强加的东西。”

基辛格也同意了，开玩笑说，“我看台湾命运不会取决于如此微妙的意思上的差别。”

基乔会谈在这时已经取得了突破，周恩来进来参加了半小时谈判。尼克松了解到中国人不喜欢搞小动作，喜欢诚挚坦率，他就坦率地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摆出了自己的难处。他说：“如果公报在台湾问题上措词过于强硬，势必会在美国国内造成困难。我将受到国内各种各样亲台湾、反尼克松、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院外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交叉火力的反革命攻击。整个的对华主动行动就有可能成为两党之间的争议问题。到时候，如果我不论是否由于这个具体问题而落选，我的继任就可能无法继续发展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

周恩来了解了基乔会谈的突破以后，表示可以考虑美方经过修正的论点。周恩来请示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尼克松也同意接受中方经过修正的论点。

公报文本最终落实

基乔在当晚尼克松的答谢宴会后，于 10 点半再次会晤。这次谈判十分顺利，只花了 15 分钟就解决台湾问题的措词问题，行文如下——

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台一中”、“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午夜，毛泽东批准了关于台湾问题的这一段。尼克松也批准了这一段。

接着，基乔两人继续会晤，把关于贸易和交流的部分加以扩充，把公报重新逐行研究了一遍，至深夜两点，也就是第五天的凌晨两点，公报文本落实了，大功终于告成。这几天以来，基辛格、乔冠华几乎没有睡觉。他俩都觉得如释重负，压力一消失，这才突然意识到疲倦、劳累和瞌睡，可是心情

格外轻松和愉快。

第五天，2月26日，在飞往杭州以前，尼克松与周恩来在机场审阅了公报。尼克松是乘坐中国的“伊尔—18”涡轮螺旋桨飞机飞往杭州的。总统自己的“波音七—七”专机也跟着起飞。在起飞之前，公报的打印工作刚结束。

想不到因为公报问题，美国方面又横生波澜，把尼克松都几乎气疯了。

美国方面节外生枝

原来在去杭州的飞机上，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拿到了公报。他们看后，一路上嘀咕这份公报不理想。他们的不满是大有原因的。这次由罗杰斯国务卿带来中国的专家，都是一些职业外交家；在草拟公报的过程中，他们一点都没有参加，对此难免会有看法。此外，没有参加谈判的人不熟悉谈判所经历的艰难，往往在自己的心中设立了一个理想的公报文本，并拿它同手头的打印文本进行对比；那样一来，意见就多了。到达杭州以后，罗杰斯对尼克松说公报不够圆满而交给总统一份材料，材料中列举了国务院的专家们对公报的一大堆意见，要求进行修改。例如，对“在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句话提出了异议。说这话太绝对了，或许有一些中国人不这样认为呢。建议将“所有中国人”改力“中国人”。另一条建议是要去掉“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句中的“立场”二字。诸如此类的重要修改处，竟达15处之多。

在刘庄宾馆尼克松套房的客厅，尼克松穿着睡衣，走来走去，气得脸色都变了。他认识到自己在政治上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他要有所作为而采取了对华主动的行动，但那些保守派支持者对访华的反应已经搞得他够紧张的了。他害怕这些右派会攻击公报。他预见到，关于国务院对美国所作的让步不满的传闻，很可能成为导火线。他也知道，在已经通知中国人说他同意公报之后，又要求重新讨论，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中国人将怎么看待他这个总统。他除了气愤之外，感到特别痛苦的是，要解释这些修改建议的重要性简直是不可能的。

晚宴开始之前，他把基辛格叫来商量。

基辛格也心情阴郁，坐在沙发上沉着脸说话：“罗杰斯他们提出修改的地方那么多，几乎等于推翻了重搞。他们讲你向中国让了步……”

“我批准了，毛泽东的政治局也批准了，我们又单方面提出修改，我们还有没有脸？！”尼克松近乎在吼叫。

“你也知道，全世界都已经等着明天在上海发公报。”基辛格忿忿他说。

“看我不回去把国务院那帮家伙都收拾了！”尼克松火极了，“我哪能带一个分裂的代表团回国？天呐！”

“总统，要紧的是明天发布公报。”基辛格说。

尼克松沉默了好一会，铁青着脸来回走动。突然，他转身对基辛格说：“亨利，宴会之后你再找乔谈一谈。”

“真难启齿呵！”基辛格脸有难色，还是应允了。

当晚，杭州宴会的南方菜特别精美，嗜好美食的基辛格却没能好好品味，他在心里嘀咕着宴会之后怎么跟乔冠华谈话。

晚上10点20分，乔冠华和基辛格举行会晤。乔冠华因为辛苦几天搞完了公报，心情也很好，宴会上喝得很痛快，脸上泛着红光，脸带笑容地坐下

来谈话。

基辛格将精心琢磨了好一会的话说了出来：

“乔先生，在正常情况下，总统一拍板，公报就算妥了。但是这一次，如果我们仅仅宣布一些正式的主张，还未达到我们的全部目的；我们需要动员公众舆论来支持我们的方针……”乔冠华用点挖苦的口气开玩笑说：“博士这个‘公众舆论’成了你们的法宝了，动不动都拿出来用。”

基辛格委婉地说：“如果乔先生能够进行合作使我们的国务院觉得自己也作了贡献，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你拐了一个大弯子，是想说贵国国务院对已经通过的公报文本有意见，要修改，是吗？”乔冠华爽脆地说。

“是的，是这个意思。”基辛格坦率地说。

乔冠华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尖锐地回答说：

“双方已经走得够远了，而且中国为了照顾美国的愿望已经作出了很多让步，听说尼克松总统接受了公报，昨晚，我们政治局已经批准了公报。现在离预定发表公报的时间不到24小时了，怎么来得及重新讨论呢？”

“我们总统确有为难的地方，乔先生，”基辛格知道中国人注重实际，他唯一的希望在于坦率，于是，将尼克松的为难境地简述了一番，诚恳地说，“希望你们能认真考虑。”

乔冠华暂停了晤谈，去找周恩来总理请示。

周恩来正在给上海方面打电话，询问上海方面接待工作的情况。周恩来放下电话后，乔冠华立即作了汇报。

周恩来太累了。尼克松访华期间，最忙的人就是周恩来总理，尼克松访华的一切活动安排，都是周恩来亲自掌管，所有的会谈讨论都由他亲自过问，还每天安排随时向毛泽东请示、汇报。他几乎没有睡过觉。顶多能够合眼皮休息个把钟头。

听着乔冠华的汇报，他瘦削的脸在柔和的灯光下棱角显得更为分明，只是眼睛还很灵，很亮。他很不在行地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就摆在烟灰缸沿。

乔冠华汇报完关切地说：“总理，你太困了。”

“你说说你的看法。”周恩来轻轻地将烟喷吐出嘴唇。

“他们内部不统一，又要我们作让步，我们已经作了很多让步了。他们美国人自己的矛盾，让他们自己消化吧。”乔冠华说。

周恩来的眼睛望了一下窗外，西湖岸边的灯光闪烁。今天晚宴之前，给罗杰斯那一班人当翻译的章含之找他作了汇报，说她了解到国务卿罗杰斯及其手下的专家们对已经达成协议的公报大发牢骚，还听说到上海后他们要闹一番。周恩来一直在考虑这件事。他对美国国情作过研究，对尼克松执政以来白宫与国务院的矛盾是有所了解的；他由此联想到，按职务，罗杰斯该排在基辛格前面，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时，罗杰斯没能去，难怪人家有意见。他还考虑，明天到了上海，要特地去看望罗杰斯，补一下课。

周恩来望着乔冠华，说：

“冠华，公报的意义不仅仅在它的文字，而在于它背后无可估量的含义。你想想，公报把两个曾经极端敌对的国家带到一起来了。两国之间有些问题推迟一个时期解决也无妨。公报将使我们国家，使世界产生多大的变化，是你和我在今天都无法估量的。”

乔冠华顿时领会了周恩来的含义，微笑说：

“总理，我明白了。”

周恩来又说：“我们也不能放弃应该坚持的原则，这件事，要请示主席。”

周恩来当即拿起了红色的直通电话。

毛泽东听了汇报，想了片刻，口气十分坚决地回答说：“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它部分可以商量。”毛泽东停顿了一会，又严厉地加上一句话，“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于是，基辛格与乔冠华在刘庄宾馆又开了一次夜车。他们根据毛泽东所定的原则，对美国国务院专家们所提的意见，进行反复的推敲。直至凌晨二时，另一个“最后”草案终于完成了，当然，吸收了罗杰斯的专家们的一部分意见。草案再次提交双方首脑正式批准。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上海公报。

然而，天亮之后公报的命运又将是如何呢？基、乔两人很是担心。

尼克松乘坐中国专机

尼克松在北京度过5天，经历了紧张的秘密谈判、游览和出席公众活动。第五天，2月26日，按预定日程，到西子湖畔的杭州参观游览。

这次尼克松乘坐的是中国“伊尔——18”型涡轮螺旋桨飞机。

这是周恩来总理为尼克松访华所做的特殊安排，就在尼克松为了这次历史性的北京之行，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桌前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北京的毛泽东、周恩来也没有等闲视之。早在1972年2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周恩来听完各小组汇报准备工作后，专门讲了尼克松访问杭州、上海时要让他坐中国民航的飞机。因为以前尼克松在国外访问，从不乘坐东道国飞机。

“尼克松到了中国的土地上，就要听我们的安排喽。”周恩来的表情和语气都饱含着民族的尊严和自信。

他给民航下了死命令：“马仁辉同志、张瑞蔼同志，这次专机任务可不同往常，你们一定要保证搞好呀！”周恩来十分清楚，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依靠周密细致的工作作风保障的。“你们从现在起，就要组织执行专机任务的机组试航。另外，除尼克松去杭州、上海的当天要试飞外，头天下午还要先试飞一次，要确保万无一失！”

此外，周恩来又对机务和警卫工作作了具体指示：“要对机务人员讲清楚，专机必须进行全面认真的检查，待试飞后进行铅封。对警卫部队进行教育，告诉他们严加看守飞机，无关人员不得接近……”以后的几次开会，周恩来对接待工作的细节问题，都作了详细的指示，会上，有人提出，接待方针不冷不热，不卑不亢，不好掌握分寸，周恩来扑哧笑了：

“这有什么难呢？人家伸手，你就伸手过去，不要傲慢，也不要嘻嘻哈哈的嘛。”

运载美国总统的中国专机就要起飞了。机场上好不热闹：民航和空军出动了伊尔—18型、子爵号和云雀直升飞机3个机种、12架飞机。组织这样一个多机种、大机群的参观访问团，在中国还是第一次。

伊尔—18总理专机临时定为总统专机。为了保密起见，机号由216改为218。尼克松由周恩来总理陪同，坐中客舱。

总统自己的“76精神号”专机也跟着起飞。

周恩来巧喻“13”

由周恩来专机机长张端霭驾驶的伊尔—18型飞机，26日从北京到杭州。27日从杭州到上海。

当飞机降落在虹桥机场时，尼克松翘着的拇指对周恩来说：“飞得很好。”周恩来面带自信地微笑，不卑不亢地回答：“这是我们自己培养的飞行员，我很信任他们。”

基辛格接过话头：“总统还是第一次乘外国飞机，因为中国最安全。”基辛格说话的神色，不无自豪，因为这其中也有他的一份功劳。中方当初作出这项安排时，美方曾有异议，基辛格深知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积极斡旋，说服美国方面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

上海是尼克松访华的最后一站。

尼克松总统一行下榻于著名的锦江饭店里。在上海这幢最现代化的宾馆楼里，尼克松夫妇被安排住在15层，基辛格住在14层，罗杰斯、格林和其他国务院官员住在13层。

2月27日，到达上海不久，周恩来总理特地去看望罗杰斯国务卿及其助手们。他走进大厅，走进电梯。电梯迅疾往上升。头顶的电梯标志牌上，“13”处亮着红灯。

周恩来望着标志灯，恍然大悟似地说：“怎么能安排他们住第13层？13呀！西方人最忌讳13……”

标志灯熄灭了，电梯门开了。

周恩来带着翻译走进罗杰斯的套间，听见谈“13”的声音嘎然而止。罗杰斯手下的官员们正在房间里说话，大约是在发牢骚生气，一个个面有愠色。见周总理来了，罗杰斯朝他们示意，他们一个个只好客气地装出笑，极不自然。

周恩来伸出手，说：“罗杰斯先生，你好！”

“总理先生，你好。”罗杰斯跟周总理握手。

周恩来逐一地与国务院的官员握手之后，在罗杰斯身旁的沙发上泰然自若地坐了下来，说：“国务卿先生，我受毛泽东主席委托，来看望你和各位先生。这次中美两国打开大门，是得到罗杰斯先生主持的国务院大力支持的。这几年来，国务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尤其记得，当我们邀请贵国乒乓球队访华时，贵国驻日本使馆就英明地开了绿灯，说明你们的外交官很有见地……”

周恩来的话缓和了室内的紧张气氛。

“总理先生也是很英明的。我真佩服你想出邀请我国乒乓球队的招，太漂亮了！一下子就将两国疏远的距离拉近了。”罗杰斯笑着说。

“有个很抱歉的事，我们疏忽了，没有想到西方风俗对‘13’的忌讳。”周恩来转而风趣地说，“我们中国有个寓言，一个人怕鬼的时候，越想越可怕；等他心里不怕鬼了，到处上门找鬼，鬼也就不见了……西方‘13’就像中国的‘鬼’。”

众人哈哈大笑，周恩来也跟着笑。

周恩来走后，罗杰斯手下的官员们的气也消了大半。中国有句俗话，不看僧面看佛面。他们主要是对基辛格有意见，对尼克松的某些做法有意见。

如今周恩来代表毛泽东来看望，他们不但不便发作，而且对周恩来这个人，十分倾倒。后来，罗杰斯成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多次来中国访问。至今还对我国人民抱着友好的感情，这些都是从对周恩来的钦佩开始的。

当天下午，尼克松趁着基辛格为举行一次特别的记者招待会而在作准备的时候，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会。走进展览馆大厅，他的眼睛盯着几位共产主义领袖的大幅画像时，嘴里念道：“这是马克思，这是恩格斯，这是列宁，这是斯大林。”

“对，你都认识。”周恩来说。

“一共四个。”

“对。”

“那个恩格斯，我们在美国不大见到他的照片。”

尼克松在参观各种工业设备，他还伸手去按电钮，新式机床运转起来。他对周恩来说：

“我们按电钮，必须是为了建设，而不是为了毁灭。”

周恩来哈哈大笑。四周的气氛十分热烈。

尼克松兴致来了，又对周恩来说：“1959年夏天，我作为副总统在莫斯科陪同赫鲁晓夫参观美国展览会，在洗衣机前，他同我争吵谁的火箭厉害些，我讲比火箭没有意义，战争爆发谁都当不了赢家。”

周恩来笑得更大声，笑罢说：“我知道，这就是有名的‘厨房辩论’，它使你出了名。”

尼克松笑了，说：“我想不是坏名声。”他想了想，又半开玩笑地说，“总理先生，你不应该全信报纸上说我的坏话，我也不会全信报纸上说你的坏话。”

周恩来收住笑，对尼克松说：“我信奉毛主席说的一句有名的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下午5时，向新闻界公布了中美两国的《联合公报》，因为在上海发布，当时两国还没有外交关系，大家就称它为“上海公报”。

此后，下午5点50分，基辛格和助理国务卿格林在上海展览馆的宴会厅举行记者招待会。为给台湾方面及美国国内的反对派以“安慰”，基辛格煞有介事地在会上申明美国同台湾的防御条约并不变动，以表示“没有抛弃老朋友”。可是，这种形式主义的说明并没有引起记者们的兴趣；上海公报对世界的震动与冲击，使基辛格的解释黯然失色。

第十七章 周恩来突然造访，田中角荣光临“游泳池”。“不打不成交”，毛泽东赠送《楚辞集注》

尼克松把日本撇一边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27分。尼克松乘坐的美国总统专机终于在北京机场停稳。片刻，尼克松从舷梯上走下来，这时周总理走上前去，紧紧握住尼克松的手。两位要人的握手，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美两国首脑的第一次和解。

尼克松访华实况，通过电视卫星向世界各地进行了转播，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在自己的官邸观看电视，他要看一看尼克松是怎样对待中国人的。

尼克松从飞机上走下来，和迎接他的周恩来握手，说：“Iamveryhappy。（我非常高兴）”

接下来就是检阅仪仗队……

佐藤站起了身子，失落得狠狠地关掉了电视。他一言不发地靠在沙发上，7个月前那件令人扫兴的事情又呈现在眼前。1971年7月16日上午，首相秘书递给首相一份美国送来的备忘录，上面写着：“尼克松总统将于明年5月以前访华”，发表时间为日本时间11时半。佐藤看看手表，指针已指在11时27分。佐藤首相认为尼克松把日本撇在一边，显然是一种不考虑友好国家立场出卖朋友的行为。佐藤首相心中暗暗叫唤“上当了”。

尼克松访华的消息使日本全国上下为之哗然。在收到《上海公报》后，外务省开始秘密地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做法律上的准备。

准知一群记者却紧追不舍，非要他谈谈对尼克松访华的看法。

佐藤一边往外走，一边说：“他自己不是已经说了吗？这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事业。他自己说了，别人还说什么？”

“他”，自然是指尼克松。

佐藤的态度自然是恼怒的。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田中角荣竞选自民党总裁的。中日关系已成了自民党总裁能否当选的一个问题。

田中角荣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他当选了，并很快组成了新的日本政府。

田中竟说添了“麻烦”

1972年7月7日，田中内阁成立。经过一系列外交活动后，终于实现了访华。

田中首相于9月25日启程前往北京。他乘坐的专机直飞北京，上午11时30分（日本时间下午零时30分）抵达北京机场。

田中和周恩来的第一轮首脑会谈，从9月25日下午1时半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开始。会谈结束时，周恩来对田中说：“总之，要求大同，存小异。”“那当然。这次谈判无论如何要谈出结果来。”田中回答。

由此可见，谈判有了一个好的开端。

当天下午7时半，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主持欢迎宴会。出席宴会的共600多人，超过了尼克松访华时的人数。宴会进行一半，在田中致答同时，他提到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他说：“两国……有着长达两千多年

丰富多采的交往的历史。”接着他说：“然而，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讲到这里，刚才还在鼓掌的中方人员听到了“添了麻烦”这句话，一下子静了下来。会场上热烈的欢迎气氛突然变了样。

周恩来口气突变

第二天，周恩来见了田中，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说：“在昨天的晚宴上，田中首相讲‘添了麻烦’这句话好像是弄湿了过路女人的裙子，向人家道歉似的。”中国方面觉得日本为了侵略大陆，发动了满洲事变、日华事变和太平洋战争，用这样一句话表示道歉大轻描淡写，不过田中致词结束的时候，中国方面还是报以热烈的掌声，给他圆了场。

下午2时。田中和周恩来举行第二轮会谈。周恩来与前一天判若两人，以严厉的口气谴责了日本的态度。他说：“听了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汇报。高岛条约局长是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棍那一套嘛！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

看到周恩来如此气势逼人，田中也豁出去了：“不。这不是高岛个人的意见，是日本政府的意见。”周恩来未加理睬，话锋一转谈到头天晚宴上田中的致词，对“添了麻烦”的说法进行批评。田中不买账，说：“日本可不是这样。你说没关系，我给你深深鞠个躬，说声‘实在给您添了麻烦，以后我注意’，就完了。”接着，双方展开舌战，你来我往足足谈了两个半小时。

对日方说来还有一件事很棘手，10月1日是中国的国庆节。田中首相一行无论如何要在这之前离开北京。就是说，谈判不能拖。从自民党党内的情况讲，田中访华，说什么也不能让谈判告吹，空着两只手回国；如果谈判破裂，很可能在党内受到追究，导致内阁总辞职。从中方态度严厉的情况看，要想完全按日方的主张办似乎很难。第一轮首脑会谈结束后，日本代表团回到迎宾馆，人人显得心情沉重。

这时，田中开了口：“怎么啦？总得吃饭嘛。”大平、二阶堂、桥本中国课长等人紧跟田中身后，走进与首相卧室只隔着一问房的食堂。由于谈判触了礁，所以谁也不说话。为了给大家打气，田中又开了腔：“你们用不着担心。成就成，不成就不成，到时候我负责。党内，你们不必担心，我有办法。这行了吧？”

不论是大平还是高岛，都没有心思拿筷子。只有田中一人往嘴里夹菜，哧巴哧巴吃得挺香。还不时呷上一口茅台。

田中为了活跃气氛，又开口了：“咳，这好吃。”但还是谁都不下筷。田中有点火了：“我就说你们这帮大学生不行嘛。用得着这样愁眉苦脸吗？”

“那，你说怎么办？”大平问。

“这些事让那帮大学毕业的家伙去考虑。”田中回答。坐在一旁听他们说话的外交官们，都不由得笑了起来。田中一会儿说“大学生不行”，一会又说“让大学生去考虑”。田中这套安抚人心的办法真灵，笼罩在大家心头的愁云消失了。怎么办？等吃完了饭再考虑也不迟。

吃完饭，大家把田中送回卧室。随后又到大平卧室开会研究，逐条对联台声明的初稿进行仔细推敲。起草妥协方案的工作，直到当天深夜才完成。

高岛把妥协方案的基本内容整理成若干条，于次日上午交给了大平。

9月27日。从清早起天空就布满了厚厚的云层，而且刮着阵阵狂风，似乎预示着谈判的前途严峻。但是田中首相一行还是按照中方安排的日程，于上午8时许离开宾馆，由姬鹏飞陪同前往万里长城游览。

下午4时10分，田中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始第三轮会谈。事先，日本的妥协方案已通过姬鹏飞送到周恩来手里。周恩来对妥协方案点点头，将是田中访华成败的关键。田中也好，大平也好，都想从周恩来的表情猜测会谈的命运，但很难从他的脸上看出谈判的前途是凶是吉。田中又一次感到“周恩来实在高明”。

在田中到达中国当天的晚上，周恩来一再给田中的盘里夹菜，脸上总是笑嘻嘻的。第二天举行第二轮会谈时，却和前一天判若两人，以严厉的语气批驳了高岛条约局长的说明，浑身充满了中国寸步不让的气概。今天，周恩来笑容可掬，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的眼睛没有笑。从他的眼神可以看见他像在思考着什么，使人感到几分畏惧。周恩来一句不提日本的妥协方案。会谈结束后，日方参加会谈的人员终于恍然大悟：“周恩来是在等什么最后拍板。”周恩来请示的不是别人，肯定是毛泽东。毛泽东会作出什么反应，大家非常担心。

毛泽东大度表示：“不打不成交嘛！”

田中、周恩来第三轮会谈结束，日方代表在迎宾馆用餐，礼宾司长韩叙前来通知中国课长桥本：“下午8时或9时，毛泽东主席准备会见田中首相。”

田中等人正准备前往，周恩来未经预告突然来到迎宾馆，亲自陪同田中他们前往中南海毛泽东住处。

8点30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了日本客人，乍看起来，毛泽东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些，歇顶，后脑勺上白发很密。

见面时，毛泽东幽默地说：“上帝快要我去报到罗。”但是田中丝毫没有看出毛泽东身体不好。

接着毛泽东又说：“打架打完啦？不打不行啊。”“不，我和周总理谈得很好。”田中解释。

“不打不成交嘛！”

“是的。”

（田中回国后，9月30日在自民党参众两院大会上介绍北京谈判的经过时说：“我在欢迎宴会上讲，‘添了麻烦深表反省’。这句话在第二轮会谈中成了话题。”）

毛泽东十分健谈，一会儿话题又转到书斋里的藏书。他从书架上取下一套《楚辞集注》六卷，作为礼物送给田中。他说：“我喜欢读书，知道对身体不好。不读，睡不着觉。”

会见用了一个小时，谈了不少题外话。田中回国后，10月1日在东京小平市的高尔夫球场（小金井国家俱乐部）打高尔夫球，中间吃午饭的时候对记者们披露了当时的一段插曲。

会见结束时，田中站起身来，田中一再谦让，毛泽东还是把田中等人送到门口。会见时毛泽东开头讲“不打不成交”，不时浮现在田中等人的脑海里。

毛泽东会见田中这件事本身，以及毛泽东对田中的友好态度，清楚说明毛泽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开了“绿灯”。3人回到迎宾馆后，日本代表团其他成员听说了与毛泽东会见的情况，一个个情不自禁地高兴起来。他们认为，此刻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肯定也因为把日本拉了过去而在举杯祝贺吧。9月29日，日中就邦交正常化问题发表联合声明。

第十八章 毛泽东的书桌上送来了一封信，一看那熟悉的字迹，他激动了。不久，国宴上兴起一颗“明星”

邓小平二进中南海

1971年11月的一个上午，邓小平和卓琳这两个老钳工下班了。回家吃饭的时间，也有监管人员在身边，但卓琳却再也无法压抑内心的激动心情。收拾碗筷时，卓琳把女儿拉进厨房，用食指在手上写了几个字“林彪死了”，监管人员远去之后，她才简短地又述说了一遍，“林彪想推翻毛主席，发动政变。”此时邓小平坐在桌旁一言不发，许久，他只说了一句话“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不久，毛泽东主席书桌上摆上了一封信，一看那老朋友熟悉的字迹，毛泽东有些激动，这封信是写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

我同林彪不很熟悉，但尽管如此都随时准备参加批判他的运动。以前我也执行过修正主义路线，犯过错误。……现在，我身体健康，希望党给我一个普通职位，以便我有生之年能为党和人民服务。

毛泽东看过这封署名“邓小平”的信后，大笔一挥，作了如下批示：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
七二年八月十四日

其实，用不着毛泽东讲多少遍，只要做出决断，是一句话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在那个非常年代，毛泽东有足够的权威决定他周围的高级领导人的政治前途。这段不足200字的批语对邓小平作出了肯定的评价，尽管这种肯定是以邓所谓“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为前提，而且实在说还远远说不上是充分的肯定，但它毕竟“解放”了这位68岁的党的前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国二号走资派”。

这是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作出的一项重大决断。

1973年2月20日，邓小平结束了江西的老钳工生涯，又回到中南海，重操职业革命家的本行，尽管两种工作他都能胜任，但毕竟后一种工作更令他心醉神驰。这次他没搬进中南海居住。

重返北京后的这天深夜，邓小平久久难以入睡，往事犹如银幕上的镜头，一桩桩、一件件从脑际里一一闪过……

1952年冬天，邓小平离开家乡四川，他一家子住进中南海一个宽敞的小院里。此后不久，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

党取消了党的主席这一位置后，总书记成了党的最高领导者。但当时还不是，当时邓小平在中国高级领导者中排在第六位。当他尚未取得发言权时，他总是十分得体地保持沉默，直到他 74 岁后方大显身手。

德国传记作家乌利·弗兰茨说：“不管东方还是西方，我不知道本世纪哪一位政治家能像邓一样走过那样错综复杂、崎岖不平、然而又是成绩卓著的历程。”

有人奇怪，为什么邓小平如此坚韧不拔，他们忍不住到邓小平的家乡去寻找答案。

从成都乘汽车东行，经遂宁、南充，行程 400 多公里，到达位于四川省东北部的广安县，这里是邓小平的家乡。

广安县位于华蓥山中段的丘陵地带，渠江流经县境，襄渝铁路纵贯东部。邓小平出生在距县城 3.5 公里的牌坊村。据说，邓小平的祖先曾有人作过乾隆皇帝的老师，为此，乾隆皇帝给邓家题过一块翰林牌，“牌坊村”由此得名。村名随着邓小平的沉浮，曾几易其名。“文革”中改为“反修”大队，1977 年才恢复原名。

邓小平出生的院落，当地人称之为“邓家老院子”。旧居是川东北农村中常见的木结构的普通三合院，灰瓦土墙泥地，掩映在竹林之中。据说，这三幢房子分别是他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三代人所建，院子里是一块小平坝，约 200 多平方米，主要用来晾晒粮食。邓小平的祖先也同许多四川人一样，是从外地迁入的。大约在明洪武年间，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等地往这里移民，据说邓姓是从湖北麻城移来的客家人，几百年来，邓家一直是这里的旺族。

1904 年 8 月 22 日，邓小平就出生在这个风景秀丽的乡村里。至今在他出生的房屋内还保存着当年他出生时的雕花木床。屈指算来，这张床已有 90 多年的历史了。

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清末曾就学于成都法政学校，他刚毅过人，做过本县团练局局长，以后长期在外谋事。其母谈氏，早年去世，继母夏氏是嘉陵江船工的女儿。邓小平是长子，他还有三个弟弟，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

童年时邓小平名为邓先圣，学名邓希贤，5 岁时进私塾发蒙，7 岁转入新式小学，他就在这座院落里度过了 15 载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据一些老人回忆，他小时很聪慧，书读三遍即可背诵。

邓小平的旧居是一所典型的南方农舍，三排房屋组成一个凹字，四周翠竹环绕。如今这所农舍，除了正堂屋挂满了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几十张照片外，其他房间仍是原样，这里地处比较偏僻，交通不便，但每天都有众多的人来参观、瞻仰。他们默默地观看，静静地思考，在厚厚的留言簿里，有这样两条：

伟大生于平凡。人们将永远记住您给人民的实惠！

四川省文联主席、老作家马识途为邓小平故居写的一副楹联，代表了人民的心意：

扶大厦之将倾，此处地灵生人杰，解危济困，安邦柱国，万民额手寿巨掌；挽狂澜于既倒，斯郡天宝蕴物华，治水秀山，兴工助农，千载接踵颂广

安。

1920年，16岁的邓小平离开这里，顺长江东流而下，抱着“工业救国”的思想赴法勤工俭学，开始了革命的一生。70多年过去了，邓小平再也没有回过故乡，但家乡的人们却忘不了他，他们把广安两株平时难得开花，而自1979年却连续9年开花的铁树，看作是邓小平上台后国运开始昌盛的象征；认为邓小平旧居对面那座三起三伏的笔架山预示了邓小平一生的三起三落，而最后的起势最为高峻，表明是邓小平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人们按传统的习惯，赋予他们爱戴的领袖以美丽的神话色彩。

神秘的“老钳工”

新建县农机厂在全国乃至在江西省都是个不起眼的小厂，但这里广为流传着一个关于神秘的老钳工的传说。

那是一个夏天的上午，酷热笼罩着大地，任劳任怨的中国人吃过以稀饭、腌“萝卜干”为主的早饭，就赶到工厂去上班。

这是一家非常普通的工厂，厂房是用青砖盖成，高大、宽敞，设备来自50年代的苏联工厂，工人只是在车床上埋着头干活，至于产品的销路，那是工人们管不着也不想管的事情。

学徒工小王是个活泼的年轻人，爱唱样板戏，晚上总是喜欢把车间里的好人好事写成表扬稿，投稿到厂党委宣传部，一年多过去，厂党委宣传部已经采用了他15篇稿子，昨天又采用了一篇，现在他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他一边哼着样板戏，一边干活儿，忽然感到有些不对劲儿，身边来了两个老工人，一男一女。看上去，那男的快70岁了，女的已60多岁，不是男60岁、女55岁就可以退休了吗？这两位唱的是哪一出戏？再细看，那男的身材不高，却肩宽得很，脖子有些短，脸上是平静的目光，那脸庞是那样熟悉，小王的心跳出奇地快了起来，他，他不是那个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第二号人物，大坏蛋邓小平么？

他再也不能平静地干活了，他总是偷偷地看身边新来的“伙伴”，他发现这个共产党的前总书记站在一台机床旁铣螺纹，干得十分娴熟，显得颇像个老工人，而老工人身边的女人——显然是邓小平的妻子卓琳也在拆洗、装配线圈。

神了！小王在心里感叹，不知他是感叹这样一位“大人物”竟自天而降至他身边，还是感叹这位老人竟是一位称职的钳工，他不知道邓小平早年在克娄梭、在雷诺学习过钳工。邓小平本人也不曾料到，早年赴法勤工俭学时学下的手艺到70岁左右时又派上了用场。人生真叫丰富、复杂呀！

1920年秋，抱着“一面做工、一面求学，学点本事回国”的满腔热望，邓小平和八九十位年轻的同胞一起，坐在“盎特莱蓬”号轮船的货舱里，在海上航行了40多天后，抵达法国的马赛港。

那时，邓小平刚满16岁，在同船的中国青年中，是最年轻的。

邓小平到法国后，那里的实际情况同他的愿望相反，大部分时间只能用来寻找工作，挣钱糊口，而且所做的都是学不到多少技艺的劳力工。他首先去克娄梭钢铁厂做杂工，以后又去巴黎比扬古雷诺工厂当钳工，还到饭馆里干过活，在火车头上做过司炉，收入极其微薄。他只有短时间在当地的语言

学校学习。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法国的经济十分萧条，就业格外困难，中国人即使是到那些较好的大工厂去的，工资也只有普通法国工人的一半。邓小平家中也已无力再寄钱给他，这使他度日更加艰难。

60多年以后，他在回忆中说：“（那个时期，）每当我能买得起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时，我总是感到很高兴。”

冷酷的现实，使邓小平原有的出国留学的愿望顿时化为泡影。

然而，一种新的理想却越来越强烈地吸引了这位年轻人。当时的法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广为流行，一批先进的中国留学生相继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走上革命的道路。

在同各国工人同甘共苦的日子里，邓小平深刻地了解了无产阶级；在较年长的中国革命家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的影响下，他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始从事各种共产主义的政治宣传活动。

1922年，邓小平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两年后，他又转为中共党员，不久便被委以重任，在里昂领导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

从16岁到21岁，邓小平在法国生活了5年多，由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由一个留学生成长为一个职业革命家。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近50年后，邓小平又由一个职业革命家成为一个早过了退休年龄的老钳工。

这是1970年的夏天，邓小平已离开中南海一年半不到。当“文化大革命”的烽火燃遍中国大地时，邓小平作为仅次于刘少奇的全国人民第二号敌人也和刘少奇一样被与妻子、家人隔离开来，软禁在中南海他自己的住处。

与刘少奇不同，邓小平安然渡过了这一难关，身体丝毫没有损伤，以至于十年后，关在秦城监狱的江青通过电视看到作为中国军队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阅兵时，她惊呼：“他这么年轻！”

1969年3月2日，苏联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向我边防军挑衅并开枪射击，引起中苏双方的敌对。据后来美国中央情报局证实，苏联想用有限的核技术和核武器储备攻击侵略中国。当时，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第二号人物的林彪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他的紧急计划还包括，党的首脑必须在24小时之内离开北京，关在住处，已奄奄一息的刘少奇躺在担架上飞去了开封，“红军之父”朱德去了广东，叶剑英元帅去了长沙，邓小平和卓琳同一队武装警卫登上飞机去了南昌，一到南昌，邓小平就明白了，这里是林彪势力最强大的地方，“林副主席”是想让他跟刘少奇一样生病、郁闷而死，自生自灭。

“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邓小平默默地想，“中国还需要我，我必须活下去，必须耐心等待。”

就这样，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邓小平和卓琳，被移居到南昌郊区的一所小孤院。房子四周圈上一人多高的竹篱笆，活动的天地很小。但是，环境条件的限制，只能围住人身，却压抑不住老一辈革命家的心。邓小平是闲不住的，他们住在二层楼自来水常常上不去，楼上用水困难，已经60多岁的邓小平常常自己提水上楼，他除了每天坚持在院子里散步40圈外，还同卓琳动手在院子里垦出一片菜地，养了一群活蹦乱跳的鸡。邓小平打水、提桶、浇粪什么都干。辛勤的劳动，迎来了一片喜人的绿茵，油菜、菠菜、

大葱、青蒜等蔬菜，长满地拔。

南昌郊区僻居时期，上面规定邓小平每天去附近一个工厂劳动。半小时左右的路程，他坚持步行往返。开初，让他干些轻活，但他却主动提出来要干重活。后来，他便承担了挫螺丝的力气活，而且给自己定了每天的劳动定额。

复出后，他的全家又团聚了，但每个人都带着“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创伤。

邓家生有两男三女，长子朴方、次子质方，三位千金的单名是林、楠、榕。

长子生于刘邓大军的军营中。邓小平谦逊，求刘怕承赐名。刘也不谦让，说中国有句吉祥话为“纯朴方正”，叫“朴方”如何？邓称善。既有朴方之名为先，后来次子问世，小平以“质朴”配对，也就不求人，定名为“质方”。

邓小平是讲男女平等的，既然男孩由自己作主起名，女孩命名就全权交给夫人卓琳了。

大凡名人的一切都是人所关注的。邓小平的长女叫邓林，就有考据家断言此名出典《山海经》，因为“夸父逐日”中有“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句。但卓琳说他未读过《山海经》。此女生于抗战困难时期，出世后卓琳仅供了她7天奶水，就交抗日根据地的乡亲哺育，一时想不到别的名字，就用了自己名字中的琳字，也为了日后方便寻找。谁知这小邓琳嫌麻烦，去掉“王”旁而成“林”。后来又生二女，卓琳干脆起名从“木”不从“王”，一曰“楠”，一曰“榕”。楠、榕皆为中华大地普通林木，要猜其意义，可能是望子女成材吧。

这次团聚的长子邓朴方已成为下肢瘫痪的残废人，生活无法料理。而二女儿邓楠则已“下嫁”给江苏农民张靖的上大学的儿子。

在江苏省泰州一带，这段意味深长的婚姻故事广为流传——

江苏省泰州城外有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子，名叫麒麟村。这里住着一户“特殊”的人家——户主就是邓小平的亲家！人们望着那个瘦瘦、斯文、说一口泰州土话的老人张靖，心里总不免问道：他是邓小平的亲家吗？没错，邓小平的女儿邓楠就嫁给他的次子张宏。

张靖是个普普通通的老人，他没有因为成了邓小平的亲家而顿时身价百倍，他仍默默无闻地生活在乡亲中间。

张靖虽然家里穷，但懂得学问的意义，总是督促孩子勤奋学习。大儿子高中毕业考取了天津大学，体检没过关，给退了回来；二儿子张宏高中毕业考取了北京大学。

张宏上了物理系，与邓楠是同班同学。当时，张宏在班上担任团支部委员，而邓楠是团支部书记，是不是由于工作上的联系或学习的切磋，使得邓楠从那么多“骄子”中偏偏看中张宏这个“乡里小伙”呢？张靖老人能提供的情报仅两点：一是张宏当时在班上讲泰州话，别的同学听不懂，唯独邓楠能听懂，于是成了他的“义务翻译”；二是张宏学习用功，成绩也冒尖，可就是没钱买书，邓楠经常买些书“借”给他看……

“文革”“复课闹革命”后的一天，邓楠正式把张宏带到她家介绍给家里人，他们关系就这么确定了。毕业时，他俩被分配到陕西林强县一个小山村高寨村。当时，邓小平被软禁在江西南昌某农机厂。一年后，张宏和邓楠终于调到了他身边。在老人身边，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没有办一桌酒。

当时他们都是 26 岁。听说新婚夫妇要来老家度蜜月，张靖和老伴发愁了：这草房、这板床、这饭菜……接得了这么尊贵的媳妇吗？初见面时，婆婆见邓楠拎着那么一大包东西，就去抢着拎。邓楠说：“我们在山里锻炼过，挑百把斤的担子翻山越岭，弄惯了。我有劲！”

进门时，婆婆不好意思地说：“我们乡下，这间草屋子，委屈你了，不晓得你过得惯不……”邓楠说：“比我们下乡插队时住的好多了。”

婆婆烧饭，邓楠就帮着烧灶。吃完就抢着洗锅抹碗，洗衣裳。在她身上，找不到一点“特殊”的地方。1971 年底，邓楠怀孕即将临产，她准备去江西父亲身边生养，希望婆婆跟她一起去。一听这话，老太太心里嘀咕开了：只是我一个乡下老太婆，一字不识，到你家……邓楠一听这话，委屈得要哭：“我们都是一家人了，还分什么你家我家……”婆婆听了很感动，这才决定去了。

回忆起那段不平常的日子，张老太总要提起这几件事，刚见到邓小平的时候，我看他很和气，对我说：“我们是革命家庭，没有什么规矩，你随便些，想吃什么就请随便做好了……”

“有一次我烧了两条鱼，邓小平吃了以后夸味道好，说比卓琳烧的好，说以后还要请我来烧……”

如今，张靖老两口迁到了泰州一个普通的居民区，有一套半旧的 30 平方米的住房，张靖已退休，可还在一家百货商店上班，一个月 30 元的津贴。老伴没有工作，张宏每月寄 50 元给她作为生活费。

张靖的四个子女，除了二儿子张宏现在是中国科学院物理技术部副主任、学部委员外，大儿子张和在农村中学教书，小儿子张良的户口也在农村，本人在泰州纺织厂做合同工。女儿张珍，现在泰州卫校工作。

他们一家就这样普普通通，默默无闻地生活着……也许因为有这么一房亲家，邓小平与中国人民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国宴上升起一颗“明星”

“这是……不，决不可能！”

1973 年 4 月 12 日，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在重要场合公开露面。

这一天，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招待会。中国领导人宴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

宴会尚未正式开始，赴宴者还未各就其位，人们正在等待着笑容可掬的西哈努克亲王入座。这时，邓小平出现了。应邀前来参加宴会的匈牙利人巴拉奇·代内什注视着眼前发生的戏剧性场面。他用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特有的敏锐目光，迅速把这重要的镜头摄入大脑。14 年后，他的《邓小平》一书问世（中文版由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出版），书中有如下描述：

他（指邓小平——编者注）孤独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袜子是白色的。此刻，他当然知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被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在那些七年前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地震压倒在地，尔后又恢复名誉、重新出台的人中间，他是地位最高的一个。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等待着宴会开始的中国领导人，正在三五成群地寒暄交谈，而他却只身孤影，缄默无声。然而，他那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不安，相反他正察看地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力；那边是政治牺牲者，但他现在又站在权力的大厅里，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他们能互相揣度些什么呢？

是的，“这一边”的曾被打翻在地的“中国二号走资派”和“那一边”的“文化大革命”的英雄们，此时此刻能互相揣度些什么呢？巴拉奇·代内什没有过深地猜测。也许，在这样一个高雅隆重的场合，谁都不会失态地死死盯着对方估量对方——邓小平一定泰然自若，他没有去想今后可能遇到的新麻烦；即使他预感到复出以后新的较量不可避免，即使他知道自己不平坦的政治生涯还要增加一段新的曲折，他也不会胆怯和失措的。他是“钢铁公司”。

在恢复组织生活 5 个月后，邓小平进入中央委员会，他是在 1973 年 8 月召开的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的。从“二号走资派”又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委员，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转折，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事情仍未到此为止，毛泽东还要委以邓小平更重大的责任。

第十九章 毛泽东拍案而起，周恩来组织突破，175位将军终获“解放”。 政治局会议齐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为老战友“送行”

1972年、月6日，陈毅元帅逝世了，毛泽东是在1月8日签发中央送审的有关陈毅追悼会文件时获悉这一不幸消息的。这份报告中关于追悼会的规格安排是按军队元老一级安排的。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不参加。毛泽东看了报告，将悼词中“有功有过”四个字划掉后便签发了。

1月10日午饭后，照例，他要睡一会，但这一天他却没有睡意。秘书张玉凤劝他休息一会，他说到沙发上坐坐，坐下以后便随手抓起一本书看，他显得那么烦躁。张玉凤和其他工作人员不敢多问什么，做完事就离开了他的房间。过了一阵，他突然问张玉凤，现在是什么时间？张玉凤告诉他：“现在是一点半。”他马上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毛泽东这个突然决定张玉凤一点都没想到，她也不知道今天中午中央有什么安排。听毛泽东说要去参加追悼会，她就赶紧通知调车，又通知了汪东兴等领导同志。

这时，毛泽东还穿着睡衣，下身是一条薄毛裤。工作人员拿着他平时出门见客时总要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装要给他换上，他说：“不要换了。我套在睡袍外面就行了。”他们给他穿好上衣，再穿制服裤子时，他便不让穿了，弄得工作人员都感到无所适从。

毛泽东只穿着薄毛裤出门，怎么行呢？可是，他的脾气他们是很了解的，有时候他要做的事谁都别想阻拦，他不想做的事你动员他做也不那么容易，所以，工作人员只好在外面给他穿了件大衣。毛泽东乘坐50年代苏联政府送给他的那辆吉斯牌轿车，沿长安街径直向西驶去……

八宝山公墓礼堂根本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来。尽管周恩来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了有关领导同志，毛泽东要来参加追悼会，工作人员仍然来不及准备。当毛泽东的汽车到了八宝山时，连个出来接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更来不及提前赶到了。就连张茜及其子女也没料到毛泽东会来的这么快。

毛泽东下汽车后没看到张茜及其子女，他边走边对张玉凤说：“去问问张茜和她的孩子来了没有，来了就请她们来。”

当张玉凤把张茜引到大厅时，毛泽东这里已经围坐了许多的领导同志了。有周恩来、朱德、康克清、宋庆龄、叶剑英、李先念等。毛泽东见张茜进来，欠身并站起来迎接，却被快步走过来的张茜阻止了。张茜满脸泪痕哽咽着问：“毛主席，您怎么也来了？”毛泽东看到张茜悲咽，也凄然泪下。他握着张茜的手，请她坐在自己身边。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张茜看到毛泽东能来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心情特别激动。她对毛泽东有多少话要说呀，却不知从何说起。只是喃喃地说：“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毛主席。”毛泽东打断张茜的话，不让她讲下去，毛泽东说：“不能这么说，也不全怪他，他是个好人。”

说完之后毛泽东又一一问及4个孩子的名字及近况。周恩来在旁边逐一作了介绍。毛泽东听后勉励他们：“要努力奋斗，陈毅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

命是作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

谈话快结束时，张茜关切地说：“毛主席，您坐一下就回去吧。”

毛泽东摇头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

于是，工作人员把一块宽宽的黑纱戴在毛泽东的大衣袖子上。

追悼会开始后，周恩来站在陈毅遗像前致悼词。

毛泽东站在队伍的前面，高大的身躯略略前倾，静静地听着。最后，毛泽东向鲜红的党旗覆盖下的陈毅的骨灰盒深深地三鞠躬。

追悼会结束后，毛泽东再一次握着张茜的手告别，久久没有松开。张茜以及其他老同志一直把毛泽东送到汽车前。

送毛泽东上车的队伍中有一位医生，他发现老人上汽车时，腿明显无力，因为几次用力迈步都登不上汽车，在张玉凤的搀扶下他才上了汽车。事后这位医生说，他注意到这一年毛泽东身体的变化太大了。

这次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参加他的同志、战友和朋友的追悼会。

“反革命集团头子”“就是我”

人总是要老的。过度劳累和生活的无规律，饮食的随意性，这一切都使毛泽东一天天衰老下去。

1965年，外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在毛泽东接见后，非常冷静客观地写道：

自从谈话开始以来，毛只是把烟送到嘴上或效在烟缸上，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动作。等会谈结束，毛慵懒地挥挥手，然后两手支着椅子扶手站起来。他的身体比我们所有人都直，犹如一块巨石。他身后跟着女护士，一步一步地走着，僵硬得似乎没有曲膝。

这不是疾病，却是比疾病更难缠的衰老。

1972年，毛泽东患了一场大病，是在尼克松总统来华访问前夕，是一月份的一天。由于过度劳累，毛泽东犯病。由于病来得突然，一直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医护人员都没料到。

由于肺心病以及严重缺氧，毛泽东休克了。正在值班的吴旭君发现后，立即推开从来不开的一扇玻璃大门，用一种异样的声音急切地呼叫“快来”。

此时女秘书张玉凤正在警卫干部值班室，听到她的呼叫，几个人一起跑到毛泽东会客厅（当时已成为卧室和治疗室），始毛泽东看病的医生也飞快地赶到了。

毛泽东侧身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吴旭君赶紧给毛泽东摸脉。说不清楚是心急，还是紧张的关系，吴旭君对在场的医生说：“摸不到脉。”

这是张玉凤平生第一次看到抢救危重病人。在场的主治医生立即采取急救措施，口述需要注射和应用的药物。吴护士长又重述一遍药物的名称，再往针管里抽药，然后再注入到毛泽东的体内，一次又一次地打针，用药……

此时，毛泽东已完全昏迷了。现场的紧张气氛他是毫不知晓的，抢救时，在场的心脏科专家胡旭军扶起毛泽东，有节奏地捶他背部，不停的呼叫着：“毛主席、毛主席。”张玉凤也帮他叫着：“主席、主席”……

毛泽东的生命力也真是顽强，经紧张抢救，他老人家慢慢地睁开了双眼。看到眼前这一切，他有些愕然和不解，像是在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因为刚

才发生的事，他一点都不知道。

当时在场的人，对于毛泽东的安然醒来，无不惊喜万分，一个个像孩子似地乐了，好像刚才什么都不曾发生。其实，大家是有意识表现出轻松的样子，怕他紧张。当毛泽东知道自己刚才已经休克时，神态安详地说：“我好像睡了一觉。”

毛泽东大病一场，周恩来的心情比谁都沉重，都着急。警卫人员后来讲，总理得知毛泽东病危的消息后，坐车从他的住所西花厅赶到游泳池时，许久下不来车。当他来到抢救现场时，人们也从他的表情上看出，他肩负的担子沉重，责任重大。虽然他曾带领毛泽东这边的医护人员对毛泽东的病做了全力以赴的治疗，但是，在一片“万寿无疆”的声浪中，从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到各级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病情、身体状况一点都不知道，也没有丝毫思想准备，如果毛泽东万一有个“闪失”，他该如何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世界交待呢……

毛泽东这次重病之后，中央决定由4位领导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负责毛泽东的医疗工作。

然而，抢救之后，江青却不满意结果，把参加会诊的医生扣上反革命特务集团的帽子，并且吓人地举出苏联“白衫阴谋”为例，那件公案曾登在1953年：月13日的《真理报》上：

不久前，国家安全部门发现一个由医生组成的恐怖集团，他们想通过有害的疗法达到缩短某些苏联领导人生命的目的。

当时有5位医生被捕。

此时与毛泽东分居多年的夫人江青已经是站在国家政治领导顶峰上的“大人物”，这一句话足以让医生们人头落地。

幸亏这件事让毛泽东自己知道了。他以虚弱之身，抬手指着江青问：“你说这些医生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

江青张张嘴，没敢贸然回答。

“我知道。”毛泽东忽然以手指鼻子，“就是我！”

一句话救了这些会诊医生，使苏联医生的悲剧不曾在我国重演。

“解放”175位将军

风云变幻的北京，1972年12月。清查林彪集团尘埃落定，纠正“文革”初期造成的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

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一次关系着千百万人命运的重要谈话正在进行。

毛泽东拍案而起：看来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我也无意把他们都打倒嘛！

周恩来抓住机会向毛泽东建议：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

毛泽东点点头，下了决心：对，这个问题就由你组织落实吧！

周恩来宣布，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中央由中组部负责落实省委常委以上干部政策；国务院由总理办公室负责，落实副部长以上干部政策；军队由总政治部负责，落实正军级以上干部政策。

周恩来还规定，“解放”干部的审查报告都必须送政治局最后讨论决定。

“文革”初期，军内被打倒被关押的军以上干部多达数百人。级别最高的是两位元帅：彭德怀和贺龙。总政治部考虑到毛泽东说过，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于是，派保卫部部长蒋润观持介绍信前往中央专案组一办索取贺龙元帅的材料。

一办的负责人回答：“贺龙同志是要平反的。但是，毛主席和总理没有说贺龙同志的案子让你们总政治部去平反。”

蒋润观解释：“我们考虑贺龙同志是元帅、军委副主席，贺帅的事我们总政应该办。”

那位负责人又说：“贺龙同志不光是元帅，他还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没有说贺龙的案子让你们平反，材料不能给你们。”

保卫部部长乘兴而去，失望而回。落实干部政策从什么地方下手呢？

正当总政治部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班子不知从何入手之时，周恩来亲自为他们选定了突破口。

1973年初的一天，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将军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一个大会，接到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总理有事找他。田维新急忙赶到人民大会堂。

周恩来说：“我今天找你来谈干部问题，光给你一个人说不好，你再找一个人来好。”

当时，田维新立即用电话通知总政干部部部长魏伯亭马上赶来。

周恩来对他们说：“找你们来，是谈陈再道同志和钟汉华同志的问题。”

陈再道上将和钟汉华中将是在武汉军区司令员和第二政委的任上，因1967年的所谓“七二事件”而被打倒的，已蒙冤6年之久。

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田维新与魏伯亭回到总政以后，经过调查甄别，写出报告，送政治局讨论。在讨论时争论十分激烈，虽然江青等人扣了一大堆帽子，却没有事实根据。

陈再道上将“解放”后，再回武汉军区任司令员比较困难。考虑给他安排一个与原职级相当的职位，可是当时大军区一级的正职都各有其人，这可遇上了难题。田维新将军便去请示周恩来，结果决定：先委曲一下陈再道将军，安排一个大军区副司令的职位。

田维新将军给一位大军区司令员打电话，考虑让陈再道到那个军区任副司令员。司令员回答说：“他是我的老上级啊！”话虽只有一句，意思是很明白的。让老上级去当副手，这工作确实不太好开展。可是，别的地方也不好安排呀。田维新再次给这位司令员打电话，司令员干脆直说了：“老田，千万别让他来。”就这样，找来找去，最后找到了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

韩先楚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难得他爽朗表态：欢迎陈再道来福州。这才算解决了一个难题。

陈再道上将后来还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顾问、铁道兵司令员。

钟汉华“解放”后，先后出任广州军区副政委、装甲兵政委和成都军区政委。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有57位将军获上将军衔。上将是继十大元帅十位大将之后的第三级军衔。能晋身上将之列的将军，都是勇冠三军、可以独当一面的将才。

到70年代初，已经有几位中将出任大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却汇聚了4

位上将。福州军区乃一块福地。

那是陈再道上将到福州军区任副司令员不久，王建安上将也得到“解放”，面临一个工作安排问题。与陈再道将军一样，王建安的资格也很老。他是在济南军区副司令的任上，因所谓“搞修正主义”被打倒。现任大军区司令有很多原是他的下级。遇到了这样的难题，田维新将军只好又去请求周恩来总理。周恩来说：“你找韩先楚再谈一谈。”

田维新再次找韩先楚商量，韩先楚说：“我这里已经有一位老同志了，别的军区也可以安排嘛！”

碰了一个软钉子，田维新半开玩笑他说：“韩司令，我是征求你的意见，可这是总理让我征求你的意见。”

韩先楚还是不松口。

田维新深感棘手，又把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略一沉吟：“还是放韩先楚那里，开会时我与他谈。”几天后，韩先楚奉命进京，田维新一见韩先楚便招呼：“老韩，这次总理找你谈了，你不能不给总理面子吧？”

“见了总理，我也还是有困难啊。”韩先楚说，“王建安是我的老上级！老同志多了，我也不好工作哪。”

韩先楚说的也是实话。王建安在红军时代就是军政委，而韩先楚那个时候还是师长，谁知周恩来找韩先楚一谈，韩先楚就心悦诚服地同意了。于是，福州军区又多了一位上将副司令。

红军时代就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李志民上将重新出来工作以后，也到了福州，出任福州军区政委。

4位上将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当时，在微妙的政治形势下，军队高级将领的“解放”工作，基本上是周恩来点一个解决一个。周恩来点的方式又总是十分巧妙。

一次，政治局开会，周恩来突然向李德生和田维新提了一个问题：“杨勇、廖汉生是怎么打倒的？”

李德生和田维新面面相觑，他俩也不知底细，只好如实回答，“不知道。”

“你们去调查一下。”周恩来说，这就是周恩来的领导艺术，点到为止，从不划框框，结论由做具体工作的同志通过调查研究去下。

总政治部立即派人调查。

杨勇上将和廖汉生中将在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任上，于“文革”初期被莫名其妙打倒的。有周恩来点将，两位将军的“解放”工程虽然也费了一番周折，但最终都解决了。

廖汉生将军复出后，先后担任过军事科学院政委、南京军区第一政委、沈阳军区第一政委。目前他还担任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

杨勇将军复出后，也担任了大军区的领导职务，由于他的大度，使他的结论经历了一番反复，从而体现出周恩来对干部的一片爱心。

杨勇将军被打倒时，林彪一伙无限上纲，甚至把杨勇部下的参谋、科长的事，一股脑儿地算到杨勇的账上。

总政治部重新审查杨勇将军的结论出来后，周恩来总理批示：“请田维新同志找杨勇同志谈一下，征求一下杨勇同志本人对结论的意见。”

田维新亲自跑到杨勇的住处，征求杨勇对审查结论的意见。杨勇很大度他说：“总政作的结论我没意见。”

田维新说：“结论是我们作的，但是我们对你的问题不是很清楚。总理

让我跟你谈一谈，你有什么意见，总理会重视的。”杨勇还是说：“我对总政的结论没有意见。”

结论作出后，杨勇将军等了半年，才被分配到沈阳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过了不久，中央调杨勇出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上任之后，周恩来在杨勇的结论上再次批示：“田维新同志，我们给杨勇作的结论似乎口径严了一些，请你再征求杨勇同志一次意见。”

尽管周恩来的批示口气很和缓，田维新将军深知其中分量。他再次带着总政干部部的一位处长去京西宾馆拜访杨勇。不料杨勇还是说对结论没有意见。田维新又做了半天工作，杨勇才说，结论中提到的一个问题，是一个科长干的，但是自己负有领导责任，“把这件事写在我的头上也是可以的。”

吴克华中将是1929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文革”初期，他在炮兵司令员的任上被打倒后，便失踪了。

“吴克华哪里去了？”周恩来在政治局讨论落实干部政策会议上发问。

总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立即展开调查。可是炮兵司令部的干部和一些造反派都说不知道吴克华在什么地方。后来从一位干事口中获悉：吴克华被秘密关押在地下室里。

得知了吴克华将军的下落，下一个难题是怎么把他安全地接出来？因为总政治部并没有掌握直接的证据，万一关押吴克华的那伙人闻讯拒交或把将军转移，将使问题复杂化。

李德生主任听了汇报以后，灵机一动，写下了一纸手令：“提审吴克华”，令总政保卫部当晚派人前去提人。关押吴克华将军的那伙人，一看李德生的亲笔手令，以为总政与他们持同样观点，爽快地将吴克华交了出来。

人是找到了，却引来了一场误会。

保卫战士把吴克华将军带到京西宾馆的一个会客室，向坐在那里的李德生主任和田维新副主任报告说：“报告首长，吴克华带到。”

李德生挥了挥手：“知道了！”小战士便退了出去。李德生在沙发上欠了欠身说：“吴克华同志，请坐。”

吴克华将军听说又要“提审”，以为自己又要挨整了。他对李德生主任说话口气和用词的变化毫无觉察，不敢入座。

李德生知道吴克华误会了，便解释说：“吴克华同志，我们是奉周总理之命来找你谈话的。”

吴克华将军仍不敢相信这戏剧性的重大变化——从“提审”一变而为同志间的谈话。“文革”这几年，挨斗挨批，受骗多了。他却一时反应不过来。

眼见时过半夜，而吴克华将军显然难以在短时间内适应这一反差巨大的突变。李德生只好顺其自然，请吴克华吃夜宵，先休息一下，然后找他再谈……几经周折；吴克华终于得到了“解放”。

吴克华将军解放后，出任过铁道兵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和广州军区司令员。

又是一次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提出：“秦基伟。李成芳到哪军委了？”

秦基伟和李成芳都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都在刘邓大军和志愿军部队担任过军长，都于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文革”开始时，秦基伟是昆明军区司令员，李成芳是政委。

贺龙元帅受诬陷后，秦基伟和李成芳立即被关押了起来。

秦基伟是一员战功卓著的虎将。抗美援朝时的上甘岭战役就是他指挥

的。

为了打倒秦基伟这员虎将，林彪一伙到处散布说，秦基伟是贺龙的人。

如果在贺龙元帅与秦基伟将军之间一定要扯上一点什么关系的话，那是志愿军回国之后，秦基伟先后出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而昆明军区是建国初期的西南军区撤销后组建的两大军区之一（另一个是成都军区）。贺帅是西南军区的司令员。

田维新把调查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当说到秦基伟、李成芳被打倒的情况时，周恩来指出：“他那儿是一锅端，军区6位主要领导全部被免职。”

田维新汇报说：“根据我们调查掌握的情况，秦基伟被关押在湖南，由广州军区负责，具体情况还不很清楚。”

周恩来当即指示：“把他调回来嘛！”

秦基伟到北京以后，住在京东海运仓第一招待所。当时这家招待所的后楼成了即将“解放”的将军们的驻地。将军们在这里就恢复了自由，可以外出逛街散步，探亲访友。

一天，周恩来通知田维新说，他要见见秦基伟。这个时候，总政尚未给秦基伟作结论。秦基伟的工作安排还没有定下来。在田维新的印象中，周恩来召见尚未作结论的将军，仅秦基伟一人。

接到周恩来指示后，田维新立即打电话到招待所，后楼服务员回答说，秦基伟将军散步去了，田维新告诉服务员：“你马上去找一下秦司令，让他马上给我回一个电话，总理要见他。”

不一会儿，秦基伟的电话便过来了。他听说周恩来总理要见他，很激动，在电话中间道：“总理要见我，我穿什么衣服去？”田维新说：“穿军装。”秦基伟问：“那我还戴领章吗？”田维新说：“当然戴。”

军装，尤其是领章，是军人的标志。但是秦基伟在“文革”中受迫害7年，被剥夺了戴领章的权利7年。此刻他刚刚恢复自由，尚未恢复工作。因此他不能不有此一问。

田维新把秦基伟领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后便走了，周恩来与秦基伟作了一次单独长谈。

落实政策后，李成芳任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秦基伟先后出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司令员，后来是国防部长。

“解放”老将军的工作，大体上有个工作程序。

第一步是由总政治部审查鉴别原先把老将军打倒时所作的结论，确认哪些是无中生有的、哪些是颠倒黑白的、哪些是无限上纲的。

然后，总政治部拿出来的审查结论，还必须与把老将军打倒的原单位取得大体一致的意见。

最难的一关是政治局。按照规定，每个被“解放”的将军最后都要经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

政治局会议一般在下午7时半召开，一次会议通常讨论4位将军的审查结论，每位将军都有一份材料，包括本人的经历、被打倒的情况、甄别情况、总政的审查结论。个别的还要附上必要的证明材料。这些材料，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讨论之前先例览一遍。所以，每次政治局讨论老将军的“解放”，田维新都要提一大包材料进会场。

当时的政治局会议都是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

材料发完，周恩来便宣布：“大家先把材料看一看。”

到了田维新讲材料时，发难的就是“四人帮”，尤其江青和张春桥为最甚。

这样，从下午7时半开始的会议，往往到半夜12时也结束不了，通常吃过夜宵后一直讨论到凌晨3时才结束。

田维新回忆说：“在讨论老将军‘解放’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争论之激烈、时间之漫长，真令人难以忍受。后来与江青争辩得多了，也就习惯了，不怕了，无非是多几顶帽子就是了。”

在老将军的记忆中，周恩来主持这样的政治局会议，说话下多，只在要害处说一两句。不过常常是他的一两句话一出口，江青一伙就争不起来了，事情也就定了。

周恩来虽然说话不多，但是对每个人的态度都了如指掌。某个问题，他感到需要谁支持一下，便会及时点将：“剑英你说呢？”

周恩来从不在会上与江青公开争论。但是如果江青诬人太甚，帽子扣得太大太多，周恩来就会及时地出来说话。他常用很简洁的语言，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一遍，然后反问一句：“这个事能扣这个帽子吗？”经周恩来这么一反问，江青常常就哑口无言了。

如果被“解放”的某个干部确实有缺点失误，江青一伙就会趁机无限上纲。这种时候，周恩来常常会说出几句：“这不算个什么错误么，这是工作中的问题，谁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轻轻几句话，便将江青一伙扣的大帽子不动声色地顶了回去。

到大家的意见都说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周恩来还会问一句：“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人发言了，周恩来才宣布：“这事就这样了。”然后转入下一个将军“解放”问题的讨论。

由于江青一伙的发难，175位将军的“解放”在政治局讨论时，没有几个是很顺利的。在田维新的记忆中，颜金生将军是比较顺利的一个，但也连闯了江青设置的三道关。

颜金生少将是湖南茶陵县人，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建国后先后担任过西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委，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文革”开始前不久，他转业调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

文化部的副部长怎么由总政来审查“解放”呢？

田维新在政治局会议上介绍说：“颜金生是军队转业干部，到文化部工作时间不长，没有什么错误。”

理由只有一句话，到文化部工作时间不长。其实呢，当时文化部系统控制在江青一伙手里。把颜金生从文化部系统调出来，由军队去安排，这就跳出了江青一伙的魔爪。这是周恩来的“解放”将军的一着巧棋。

江青一听又发难了：“颜金生有错误，他推行了资产阶级文艺路线。”

田维新说：“颜金生是工农干部，识字不多，不可能提出什么文艺路线。”

这话是有根有据的。发给政治局成员的材料上明明白白地写着：颜金生，1918年出生，1932年14岁就加入人民军队，他能读过多少年书？！

朱德元帅一听江青又要无理取闹，一板一眼他说：“颜金生他就不识几个大字，”总司令为将军说话，一言九鼎，江青顿时哑了。

眼见这一关过去了，田维新又介绍说：“准备把颜金生同志派到陕西……”

话音未落，江青又反对了：“你是让颜金生到陕西给二方面军垒山头。”

他不应该分配西北，应该分配到东南。”

江青自己拉帮结伙，故以“山头”度人。

针对这种猜忌之心，田维新说：“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是从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任上调过去的。”

李德生说：“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二方面军的同志在陕西已经差不多了。”

经过这么一番解释，颜金生将军去西北才获通过。田维新继续说：“我们考虑让颜金生到陕西当政委。”

江青再次反对说：“他犯那么大的错误，当正职不合适。”这是江青第三次发难。

田维新说明：“陕西省军区原来有一个政委。派颜金生同志去陕西，是考虑让他去管军工企业。现在备战，陕西军区企业很多。”

叶剑英元帅也出来说话：“现在备战，炮弹子弹很不足，急需抓一抓。”

最后周恩来表态，“我看颜金生同志调出文化部，到陕西当政委管军工是合适的。”

周恩来一锤定音，颜金生总算过了关。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开始后，解放军报社迟迟未见行动。这也难怪。解放军报在“文革”初期最严重的一个案子是所谓的“绑架”萧力案。萧力就是李纳，江青的女儿。定案的结论上写着：绑架萧力就是反江青、反毛主席。

在1973年的形势下，这样的案子谁敢动！

迟浩田到解放军报任副总编后，分管政治工作。他经过长时间的深入调查了解，认定军报的三大事件，包括所谓的“绑架”萧力案，都是假的。但是这三个事件都是江青直接定的，不好办。迟浩田便把情况向军报主要负责人张志作了汇报。

涉及到江青的事。张志哪敢作主。他到总政治部向田维新汇报说：“田副主任，我向你反映一个情况，我们军报的三个事件，迟浩田同志经过了解，认定都是假的。但是这三个事件都是江青定的，一动就会反映到江青那里去。所以，我们落实干部政策很难。”

不是江青直接打倒的干部，江青尚且要多方阻挠，胡搅蛮缠，若把她自己直接定的案子否定了，她还不搅个天翻地覆？！田维新想了想说：“能不能想个办法，不惹江青。”

“怎么能惹江青呢？”张志问。

田维新说：“你们把事件撇开，就说这些干部没有犯什么错误，先把他们‘解放’出来，让他们恢复工作。”

张志说：“这办法行倒是行，不过风险也很大。”

田维新嘱咐说：“这件事你先别办，等我与李主任商量一下再说。”

第二天，田维新就与李德生商量。李德生认为也只能这么办了。如果不落实干部政策，干部受委屈，军报也没法办好。

解放军报社按照这个办法，“解放”了一批干部。有人立即向上告了黑状，送了一大堆材料给江青。江青还真看了这些材料，在这里批一个“这是一个反革命”，在那里批一个“这是个坏人”，最后要“德生同志查处”。

李德生正坐在沙发上看江青批转的这份材料，田维新进去了。“你看吧！”李德生顺手把材料往茶几上一摔，没好气他说。

田维新一看，是解放军报的事，就说：“这是意料之中的。”

“怎么办？”李德生问。

“有两条办法。”田维新说。

“哪两条？”李德生紧追着问。

“第一条，再把他们都关起来。”田维新说。

“那不行，哪能这样干。”李德生未加思索，立即否定了这一个办法。

田维新了解李德生的想法，他不慌不忙他说出了第二条办法：“那就拖。”

“拖得了吗？”李德生不放心。

“拖不了，还能再把他们关起来吗？只有拖。”田维新说。

“那能拖多久？”李德生问。

“能拖个半年。”田维新说，“江青第一次问，你可以说，材料收到了，还没来得及看。第二次问，说刚看，还没有看完。第三次问，说刚看完，还没查，如果再问，说刚查一两个，还真没问题，其他的还没有查。”

“能那么者拖着？”李德生又问了一句。

“起码可以拖半年，”田维新蛮有把握他说：“她还有那么多精力问哪！”

这件事固然拖了下来，不了了之。总政治部对迟浩田却有了一个好印象，认为这个干部能够实事求是，敢讲真话，事件过去以后，迟浩田从军报副总编（副军级）直接走上了北京军区副政委的领导岗位。后来他又先后出任副总参谋长、济南军区政委，总参谋长、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

经过一年多时间紧张艰难的工作，全军 175 位被打倒的高级将领终于全部得到了“解放”，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这里倾注着周恩来总理的一片心血。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1973 年 12 月 12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在毛泽东的书房兼会客室进行。

看上去毛泽东很虚弱。1 年前，他曾患心肌梗塞，一度垂危。经全力救治，终未发生不幸。不过，这次病重后，他的身体始终未完全恢复。

政治局委员们用心地聆听毛泽东的发言。对他们其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与其说是来参加党的会议，不如说是来接受长者的训导和教诲。

毛泽东批评政治局和军委。

“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早在这年初，毛泽东就曾批评“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

毛泽东说：“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政治局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

接着，毛泽东又换了一个话题：

“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

他面朝叶剑英：

“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

毛泽东建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于是，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便一起唱“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

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从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已不只一次地在开会或接见下级时，让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希望全党步调一致，首先政治局要一致，其实，在那个动乱时期。不要说全党步调一致，政治局的步调就难以一致，尽管在毛泽东面前一起唱唱歌，仅仅是歌词一致而已。

唱完歌，毛泽东又谈。

“牛长角干什么？无非是斗嘛！”毛泽东主张斗争哲学。

“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这是讲各大军区司令员。他认为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坐镇，一呆就是20年，就会出现消极因素。

稍顷，毛泽东宣布重要决定。他指着刚刚复出的邓小平说：

“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在座的政治局委员静静地听着，从他们的面部表情看。似乎看不出对毛泽东宣布的这个决定有什么不同的反映，但在他们的内心是有的要拍手叫好有的要气得跺脚的。

“我们现在请了一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毛泽东又转身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

这话，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赞许。

毛泽东讲话常常是漫谈，话题很广，但始终贯穿他要阐明的观点和思想。现在，他又换了一个话题。

“现在这么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毛泽东一边说，一边环顾在座诸位，“你们那个青年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信。”他强调不要看不起年轻人。

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中央召开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12月20日，毛泽东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高级将领。

毛泽东坐在书房的中央，左首坐着朱德总司令，右首坐着刚参加军委工作的邓小平，周恩来、江青等几位政治局委员依次站立在毛泽东的右后侧。王海容站在毛泽东的左后侧，她是给毛泽东当“翻译”的：把方言译成普通话。

接见开始，毛泽东拍拍朱老总的肩膀：“这是好司令啊，是我们的红司令啊，不是黑司令。”

毛泽东简单他讲了几句之后，便与站立在一侧的萧劲光、陈士榘、田维新和马宁4位高级将领握手谈话。

第一位是萧劲光大将，海军司令员。毛泽东握着萧劲光的手问道：“身体好吗？”

与陈士榘上将握手时，毛泽东问：“身体怎么样？”陈士榘立正回答说：“托主席的福，身体还好。”

“井冈山下来的人不多了。”毛泽东感叹了一句。

第三位与毛泽东握手的是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少将。毛泽东问：“田维新同志，你是哪儿人？”

“山东东阿人。”田维新答。

“曹植埋在什么地方啊？”毛泽东又问。

“鱼山。”田维新一面回答，一面想，主席是有准备的！

毛泽东又问：“左边有个湖，是什么湖？”

田想了一下说：“嗯，要说湖，那离鱼山还远，是东平湖。”

“噢，那就对罗！”毛泽东考问完毕，话锋一转，说：“总政治部就交你负责了！”

听到毛泽东的话，田维新毫无准备，感到很突然。不过他还是很快作出了反应：“德生同志走了，总政就我一个副主任了。让我继续留在总政工作是需要的。请主席委派主任。”

“不，就是你负责了！”毛泽东以十分明确的语气说。

田维新说：“我资历、经验都不够，还请主席派个主任吧！”

毛泽东不再回答，开始与第四位将军，空军司令员马宁握手谈话。

与马宁作了一番风趣幽默的谈话之后，毛泽东再次开始向全体人员讲话。讲着讲着，他向坐在前排的许世友问道：“我要你读《红楼梦》，你读了没有？”

“读了。”许世友回答得很干脆。

“读了几遍？”

“一遍。”

“一遍不够，要读三遍。”毛泽东随口背了《红楼梦》第一章中的一大篇文字。

自从毛泽东要求许世友读《红楼梦》以后，在座的高级将领几乎都认真读过这部古典文学名著，但是，无论是做军事工作的，还是做政治工作的，没有谁能大段大段地背诵《红楼梦》。80高龄的毛泽东的这一番即席背诵，令在座的高级将领人人敬服不已。

背完《红楼梦》，毛泽东还要许世友学周勃。周勃是西汉初年刘邦手下的名将，“重厚少文”，是刘邦去世后安刘灭吕的柱石。

第二天上午，会议分组讨论。田维新分在周恩来所在的那个小组。参加这个小组讨论的有纪登奎与北京、南京、沈阳3个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以及唐闻生、王海容和毛远新等。

讨论结束时，当时主管组织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问周恩来：“命令怎么写？”周恩来指指田维新：“你问田维新。”说完就走了。

田维新说，“我也没有经历过调动八大军区司令员的事。”

“那，明天上午，河北厅议。”纪登奎说。

次日上午，纪登奎、郭玉锋（中央组织部部长）、田维新等人来到人民大会堂河北厅，草拟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

这天下午，政治局开会讨论任免事项。尽管毛泽东事先已经表示了态，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和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元帅都在会上一度支持田维新出任总政治部主任，江青一伙却坚决反对，并推出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为总政主任人选，此事只好搁置了起来。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1975）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

第二十章患绝症，西花厅老人拒绝住院。争“相”印，“四人帮”频频发难

西花厅主人身患绝症

太阳悄然无声地把温暖的光芒洒向中南海西花厅那安静而又显得陈旧的院落里。风早就停了，云也不再飘动。似乎那无生命的万物都有了灵性，生怕惊扰了那位从不知疲倦而已经十分疲倦了的西花厅主人。

他老了，消瘦了，憔悴了。他的两鬓已经斑白，脸上、手上生出了许多老人斑。旷日持久的“文化大革命”把他的心血耗干了，使他心力交瘁。他的生命的旋律已接近尾声——他患了癌症。

1972年初，也许更早些，周恩来就便血。从那时起，周恩来更没日没夜地工作，每天睡眠多则三四小时、少则一二小时，甚至几十小时不合眼。

医生劝他做全面检查，他不干。他望着医生时，目光阴郁、镇定，带着沉思和一种淡淡的哀凉，低声恳求：“你们先不要忙，先让我忙过这一段，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大岁数了，能多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就可以了。”

“先让我忙过这一段”——那是怎样的“先让我忙”。又是怎样的一段时间呵……

那天，周恩来已是30多个小时没合眼。究竟处理了多少文件，接待了多少人？恐怕秘书也算不清楚。夜里一点多，似乎他老人家该歇口气了，秘书却看着手表提醒：“总理，还有14分钟。”

“唔，你们做准备，我刮个胡子。”周恩来身体微微一晃，迅速又恢复了惯常那种快速敏捷的步伐。新上任的卫士初到周恩来身边工作时，邓颖超总要关照一句：“恩来走路快，你们要注意，别跟丢了。”事实正是这样，他的走路常常使人联想到紧急军事行动。这首先是因为他每天的活动安排，都是严密紧凑，以分秒计算时间。在一件事上误了时，就会牵连几件事甚至十几件事。现在周恩来要刮胡子，说明又是外事活动，他注重仪表整洁，说这是一种礼貌。时间所剩不多，看来又顾不上吃饭了。工作人员便给负责招待工作的李维信打电话。

以往，周恩来一旦顾不上吃饭，工作人员就给李维信打电话，请他准备一杯玉米面糊糊或是几个素馅包子，拿在路上吃。这次考虑周恩来的身体状况，他们请李维信准备一碗面条。当然，周恩来在外吃饭喝茶都是交钱的。建国后，在中南海里居住的中央领导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曾多次就这方面问题做过检查，周恩来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没有任何违纪现象。

打完电话回来，屋里屋外乱纷纷：“周总理‘失踪’了！”大家紧张寻找，忽然有人说：“哎呀，总理不是说要刮胡子吧？”

大家立刻找到卫生间，进门的一刹那，所有人都怔住了：他垂落的左手下，有一条面巾；他微屈的右臂，手里仍虚握了沾有肥皂沫和胡子茬的刮脸刀；他没有说，没有动，仿佛停止了呼吸——他歪在镜子前边睡着了！

他英俊的面孔曾使所有的中国人为之骄傲，现在却变得那么瘦削灰黄；他的眉毛依然威武，双唇仍然露出善良慈爱，可是他的眼窝却是深深地，深深地凹陷下去……

别出声，都不要出声，工作人员用颤抖的目光互相提醒。但心血翻呀翻，

翻上窒塞的喉咙，他们只能让泪水在眼圈里悄悄地，悄悄地旋转。

片刻，周恩来双肩一震，眼皮忽然掀起，便听到“哎呀”一声轻唤，周恩来站起身抹抹脸朝外急走，一边抬手看腕上的表，一边喃喃：“糟糕，我怎么睡着了呢，迟到了，迟到了，这次怪我……”

“总理！”卫士小声叫着追上去，又不敢追到他面前，尾巴一样跟在他身后。因为卫士在流泪。

来到新六所，韩念龙等人已经等候在那里，迎上周恩来汇报情况。这时，周恩来那灰黄的脸便奇迹般地恢复了片刻青春的红晕和光彩。工作人员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只有工作能够使周恩来显出年轻。

李维信轻轻走到周恩来身边：“总理，吃碗面条吧？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不吃了。”周恩来这一声又显出疲倦。他那威武的眉毛耸了耸，小声说：“你帮我想想法子，看能不能买两块咖啡糖？”

“是，总理。”李维信匆匆走开，很快便取来两块咖啡糖。周恩来剥糖纸时，手指微微颤抖。他从来不曾吃什么糖块。这次连吃两块，大家都明白，咖啡可以提神。

会谈开始了，是与越南总理范文同，越方不停地提条件，不时又在出尔反尔，好像中国援助他们只能是无条件无限制地满足一切。

会谈十分艰难，周恩来不停地喝茶，但他越来越掩饰不住耗尽血汗之后的极度疲惫，借李维信上水的机会，他小声吩咐：“给我送条湿毛巾。”

女服务员很快就用托盘送来了湿毛巾。周恩来拿过毛巾，轻轻抖开，垫在右手上，用力擦脸，在额头和眼窝的部位反复擦拭按摩，然后放回托盘上，哑声说：“谢谢。”

女服务员的目光从周恩来的脸孔上一掠而过，她不敢多看啊！周恩来刚刚擦拭过的脸孔又恢复了光彩，但那湿漉漉的光彩有多少是水，又有多少是汗？当他用力按摩额头时，他是怎样艰难地从全身每一个细胞里挤压搜索聚集残剩的最后一些血液和热力啊！女服务员嘴角一抿，迅速垂下眼帘退出了，她是在强忍住自己的泪水。

不到十分钟，周恩来又用眼色讨毛巾。他常常用眼色指挥调动工作人员，早已形成默契。女服务员上毛巾时，他小声请求：“要热的，热一点。”

第三次上来了热毛巾。周恩来一边倾听范文同的喋喋不休，一边将热毛巾用力按在额头上，片刻，迅速而有力地在脸上搓几下，将毛巾还给服务员，小声嘱咐：“再热些，要烫的。”女服务员退下不远，便听到了周恩来的声音。他与范文同会谈的声音始终那么清朗流利，句句反应敏捷，字字切中问题实质。

女服务员来到李维信面前，小声报告：“总理要烫毛巾。”

李维信牙齿咬一咬下唇，山东大汉那种铜钟般的嗓门竟变得像姑娘的声音一样温柔：“那就用开水……用开水涮毛巾吧。”

女服务员始终不曾抬头，望着自己的鞋尖喃喃：“再、再找一个人上毛巾吧。”

“怎么了？”

“我，受不了……”女服务员哽住了。

李维信拼命眨动眼睛，驱散泪水，终于用一种极温和极富感情的口气说：“再说，再说我打你。快去吧。”

服务室里，两名服务员用滚开的水为周恩来涮毛巾，腾腾的蒸汽凝聚在

睫毛上，眼圈里又有珠泪，端了毛巾望会议室，灯光下便显得五彩斑斓。周恩来在倾听范文同讲话时，将热气逼人的毛巾抖开，灼自己的额头、眼窝、脸颊、脖颈……放下毛巾后，便又开始回答问题，阐明道理。

会谈从夜里两点，一直进行到旭日东升。其间，每隔 10 分钟服务员便送上一次开水涮过的毛巾。

“好了，不要涮了。”李维信赶到服务室，“总理要走了……怎么了，你们，怎么了？”

两位女服务员没有像往常那样丢下手里的活儿，追出去送周恩来。她们俩丢下毛巾，放下开水瓶，面对面垂了头站立，各自捧了手怔怔地出神。

“什么毛病，你们这是……”李维信走近两步，突然住了嘴。两位年轻姑娘笋一般嫩的手，如今红得像他家乡出产的那种水萝卜，手指和掌缘烫起一串晶明秀亮的小水泡，并且闪闪地泛出光泽。

“哎呀，烫这么多泡，”李维信皱一皱眉，他不善于跟女孩子讲什么体贴话，有些结巴：“你，你们辛苦了，也，也是为工作么……”

就这样，周恩来用极平静的心情迎接死亡的到来。实在说，也许死亡对他是一种解脱。几十年的无休止的工作，在这年复一年的动乱中所处的不能稍微舒展一下自己身躯的复杂险境，来自最高领导层内部的明枪暗箭和最高领导人并非恶意但又令人难以接受的批评，只能忍辱负重而无处可以宣泄自己的痛苦心情的精神上的重压……这一切，都将随着生命航船驶向彼岸而化为乌有，到那时他就可以安安静静地休息了。他大需要休息了，他拖欠了自己的生命大多多的休息。但是，他又无限地热爱着、留恋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他舍不得离开。更使他不能放心而去和忧心如焚的是，国家正一步步被拖向崩溃。他竭尽全力支撑着自己的身体，支撑着这个动乱的国家。稍感宽慰的是：毛泽东重新起用了邓小平，并有意让邓将来接替他。他寄希望邓小平。然而，后来的事态的发展，并不像他预料的那样简单。

特殊召见

林彪这个政治集团虽然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可是毛泽东在进行着“文化大革命”，加上江青集团的倒行逆施，整个国家形势没有根本好转。

1973 年 7 月 4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召见王洪文、张春桥。

半年多以前，王洪文被从上海调到中央，在 5 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示：华国锋、王洪文列席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工作。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委托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负责准备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

王洪文、张春桥恭敬地坐在毛泽东身边。

王洪文时年 39 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将在 8 月召开的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出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王洪文年轻，相貌不错，到中央工作以后，更加注意修饰，看上去仪表堂堂，颇有风度。张春桥比王洪文年长 17 岁，鼻梁上架一副深度眼镜，似乎显得精神不足，实际上他是一个善于思考、老谋深算的人。张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大”之后，他将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你们两位是负责搞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大概你们也知道吧？”

对外交部的工作不满意，不找周恩来而找王、张二人，这其中的含义是十分明了的。毛泽东这次对外交部的批评是由外交部的一期情况简报引起的。毛泽东不同意这期简报对美苏关系的分析。

“大家说好，都说此文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

毛泽东说的“此文”即指外交部的这期简报，他批评了简报中的观点，然后对王、张二人说：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毛泽东的言词开始激烈起来。他有些火气。他继续说：

“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个屁也是香的！奉为圣旨啊！你奈何得了我吗？鄙人是右倾机会主义。‘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用这样的措词批评周恩来已经不是第一次，早在50年代批“反冒进”的时候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话：不胜其看，照例不看。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

“二部认为田中上不了台，外交部认为田中要上台，但中日关系不会很快改变。”在座的工作人员插话。

“以五十步笑百步，弃甲曳兵而走，逃到五十步的笑一百步的。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

毛泽东借用这个典故批评外交部对日本政局和中日关系的分析错了。

“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者又说孔子是奴隶主义的圣人。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每孔，而且还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

王洪文、张春桥用心地听着毛泽东的谈话，尤其是张春桥更仔细地捕捉着毛泽东每句话的意思。毛泽东要他们学点外语、读点书，免得上那些“老爷们”和“知识分子”的当。

毛泽东继续说：

“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他乱得很。”

他是说郭沫若的观点有对有错。

“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

毛泽东停顿一下，提高话音：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尽想做官。《梁甫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伶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人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油锅了。”

毛泽东的这一通议论妙趣横生。

毛泽东又讲美国问题：

“她们两个从映合国回来都说美国的肉、菜不好吃呢。尼克松本人也承认中间有夹肉，有三块肉咬不动，中国、欧洲、日本。这还不讲其他，第三世界。”

毛泽东说的“她们两个”是指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

接着，他又讲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说历来是一股风来都跟着跑。“比如说王明路线吧，各根据地、各白区，主要领导权都拿走。不到4整年，呜呼哀哉！……一股风一来，随风转，多啊，不是少数人。硬着头皮顶住的是少数。幸得滕代远还没有死，剩下鄙人一票。就是怕孤立，为什么随风转呢？”

毛泽东又讲革命的策略问题，讲革命不可能没有妥协，并以列宁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为例，讲列宁主张完全败北，主张在中国与日本作战的俄国军队完全打败，越彻底越好，这样革命就会起来了。

“这类例子多得很，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威廉几世？”

“威廉二世。”有人插话。

“姑且说是威廉X世吧，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东西进攻，结果皇帝也不知道哪里去了。杀掉了，死掉了，跑掉了，我没有查清楚。军队全军覆没。”

毛泽东谈兴很浓，他继续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位希特勒更凶，越凶越好，你信不信？越杀人就越要革命。其办法很简单，你杀得人，我就杀不得人？鲁迅在《阿Q正传》上写，‘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毛泽东的这些话可以说是一种即兴发挥，话题广泛，有些与对外交部的批评已没有直接关系。最后，他言归正传：

“结论是4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

王洪文、张春桥从毛泽东的住所出来时，已是满天繁星闪烁。他们的红旗车离开毛泽东住处，沿着中南海湖边的水泥路缓缓驶去。

毛泽东批评的是周恩来，这再明显不过了。“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这几句是整篇谈话的结论，也是最要害的地方。这批评自然是相当重的了。

其实，毛泽东对周恩来不能说不信任和倚重，但毛对周的某些不满也确实由来已久。这种不满，客观上为王、张、江、姚屡屡向周恩来发动进攻提供了足够的勇气。

中南海湖面波光粼粼，岸边柳枝轻摇。

张春桥、王洪文很得意：希望就要变成现实，革命可以改变一切。

周恩来喝下一口苦茶

1973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这次会议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召开的。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会谈中犯了右的错误。

周恩来、叶剑英与基辛格的会谈结束不久，翻译即向毛泽东汇报会谈情况，其间谈到：周总理有的问题不请示主席、不报告主席，周、叶被美国的

原子弹吓破了胆。

毛泽东相信了翻译的话，认为周、叶对美右倾投降。

针对这件事，毛泽东于 11 月 17 日对少数人这样说：

“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它就不投降。”

“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放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在 11 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表现得特别激愤。

“这是第 11 次路线斗争！”

姚文元也跟着这样说。

按当时的说法，党的历史上有过 10 次路线斗争，代表人物分别是陈独秀、翟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党内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就其性质来说是你死我活的。

江青还当面指责周恩来“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她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最能伤害周恩来。她知道周恩来已是重病在身。

周恩来不动声色，他平静地坐在座椅上，听着江青的发言。

但是，周恩来内心不安。

与基辛格的会谈完全是根据毛泽东的意图进行的，难道对毛泽东意图理解错了？难道在会谈中真的出现了右的偏差？说不请示、不报告，这不是事实。在请示报告问题上，周恩来一向非常注意，谨而慎之，不允许稍有疏忽。

“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哪些大事应该讨论（这里的“讨论”应作“报告”理解）而没有讨论（报告）？哪些是不应打扰主席而天天送去打扰了主席的小事？翻译可以抢先直接向主席汇报情况和个人的看法，在这种环境中工作究竟如何进行呢？周恩来端起茶杯，慢慢地喝了一口。

这茶是苦的。

不过，江青并没有得到毛泽东无条件的支持。

1973 年 12 月 9 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雅。会见结束，毛泽东送走来自喜马拉雅山麓的国王和王后，分三批与周恩来、王洪文和王海容、唐闻生谈话。

毛泽东对王海容、唐闻生说：

“这次会开得好，很好。”

这是指 11 月批评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

“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 11 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第一个“他”是指周恩来，第二个“她”是指江青。

毛泽东的这个看法也分别对周恩来和王洪文讲了。

毛泽东在某些方面不满意周恩来，这是事实，但他从不认为周会“迫不及待”。毛泽东了解周恩来，也了解江青，只有江青才会“迫不及待”。

对周恩来的这次攻击暂时平息了下来。当然，事情并没有也不可能就此结束。

批林批孔意在“周公”

忧国忧民、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又看见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政治漩涡，一个滚滚而来的惊涛骇浪。

江青举起了批林批孔的旗帜。

不可思议。

批林彪怎么与批孔丘搞成一个政治运动呢？当然，当了解了它的来龙去脉后，就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了。

1973年夏，毛泽东召见张春桥、王洪文批评外交部，实际上是批评周恩来之后不久，又接见了江青。在与江青谈话中，毛泽东说要批判郭沫若的《十批判书》。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贤。”毛泽东念了自己的一首诗。

毛泽东还谈了历史上的儒法斗争。

他说：历代有作为的政治家都是法家，法家主张中央集权、郡县制，在历史上一般说是前进的，是厚今薄古的。而儒家呢？它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它是厚古薄今的，开倒车的。”

对秦始皇，毛泽东评价很高，他历来对这位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帝王表示推崇。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兴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毛泽东又念了自己的另一首诗。

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

“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毛泽东对来自另一个四大文明古国的领导人谈了自己的看法。

从秦始皇东行巡视病死沙丘，到中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间经过了二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能不能说，对待秦始皇的态度是两千多年来“革命派”和“反动派”的分水岭呢？能不能说中国历史上凡是革命的阶级、政党、“党内正确路线”都与秦始皇一脉相承呢？能不能说林彪说秦始皇坏秦始皇就必定不坏、林彪骂谁是秦始皇谁就应当以自己是秦始皇而为荣呢？

当然，沙菲并没有向毛泽东提出这些问题。

“9·13”事件后，查抄了林彪的住处，发现林彪、叶群书写了不少孔孟的警句格言。诸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等等。于是，便认为林彪是孔孟之道的信徒……

批林批孔，顾名思义，本来是批林彪的，可是，江青一伙只向林彪虚晃一枪，即向周恩来猛杀一个回马枪。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1月25日上午，小轿车、吉普车、面包车，一辆接一辆地来到首都体育馆前的广场上。人们像潮水般地涌进会场。参加会议的，几乎是清一色的造反派头目、各单位当权的领导。

江青昂首阔步，一些人像众星捧月似的，围在她的身边，连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都是她的部下一样，尾随在她的身后。江青端着架，摆出一副至高无上的领袖的派头，顿时，会场一阵疯狂的欢呼。面无表情坐在主席台上的周恩来，他不知道今天这个会的内容。他是临时接到“江办”的电话通知，匆匆忙忙地赶来的。他眉头紧皱，不动声色，泰然自若地看着材料。

“革命的同志们！”江青故意拉着长腔，摆着不可一世的架式，声嘶力竭地大声喊叫，“今天是动员批林批孔的大会，要全国动员起来。这场批判运动，不是放空炮，要有的放矢，要紧密地联系实际！”说到这里，她用力地一挥拳头，嗓门提高了八度，像示威似的喊道：“我们有没有代表孔者二式的人物呢？”她一挥手，“有这个问题，大家要动动脑子，想一想。”她停顿了一下，道：“现在，先由谢静宜同志讲。”她带头鼓掌。

谢静宜原来是 8341 警卫部队的一位搞机要的工作人员。后来到北大支左留下来当党委书记，一下成为风云人物。她坐镇清华、北大，她和迟群成为清华、北大两所大学的“太上皇”。此刻，全国造反派头目都明白，他们是江青的心腹，他们的言行举动，都是代表江青的。

她 30 岁左右，穿着一身草绿色的军装，踌躇满志地走到麦克风前，扭动了一下身子，清了清嗓子，发出刺人神经的尖声：“今天，我是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讲讲批林批孔问题。孔夫子是个儒家，不是法家。长期以来，他是保守势力的代表，”她激动地一挥拳头，“这种保守的反动的思想，阻碍着革命的发展。不批臭它，中华民族就不能前进。”说到这里，她用一种像锥子似的目光，狠狠地扫了一下正在看材料的周恩来总理，指桑骂槐他说：“代表保守的反动的孔老二的思想，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我们要坚决批臭这种妨碍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想。不管这种代表孔老二反动思想的人，地位多高，威望多大，都要把他坚决拉下马……”接着迟群登上讲台，他含沙射影，杀气腾腾。

“总理讲讲吧？”不怀好意的江青阴阳怪气地向周恩来道。周恩来越听越感到这些充满火药味的发言，都是江青背后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布置的，矛头都是指向自己和负责军委工作的叶剑英。他打定了主意，拿过麦克风，不慌不忙他说：“对于这个会，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顿时会场哗然，怎么，一个中央常委、国务院总理都不知道，这岂不是江青个人搞的么？！他接着说：“但是，我对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不够敏感，有点思想落后于形势。幸好，江青同志敏感，我应该检讨自己的思想。……”

江青得意地望望周恩来，她用闪电战术，突然袭击，逼着周恩来当众检讨。她感到高兴。

大会一结束，她立刻在钓鱼台把姚文元、王洪文、张春桥、谢静宜、迟群都叫了来，他们坐在丰盛的庆祝宴会上。“哈哈，”江青狂笑了一阵，得意忘形他说，“今天是我们的庆功宴，把周恩来搞得狼狈不堪，他这个庞然大物，也得在大庭广众面前检讨自己的思想跟不上形势。他有什么了不起的，照样是咱们手下的败将！”说到这里，她站了起来，举起酒杯，同谢静宜、迟群碰碰杯：“为我们这两位冲锋陷阵的有功之臣，干杯！”她一仰脖，一杯茅台酒全部倒了下去！

“周恩来将是我们长期较量的对手，”王洪文端起酒杯，和江青碰碰杯，奉承他说，“江青同志就是指挥我们的统帅，你就统率我们和他周旋到底吧！”

“他不会就此罢休的，”老谋深算的张春桥插了一句，“我们还要防备他从背后捅刀子。王、关、戚是怎么垮台的？”

“不要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三杯茅台下肚，江青得意忘形了，“眼下，鹿死谁手，就看我们两家了。但是，从年龄、身体，他都不占优势，他今年已经是七十六七岁的人了，好景不长了。他手下的得力干将叶剑英，也是七十六七岁了，秋后的蚂蚱，还能有几天扑腾头！他有点像诸葛

亮死前的处境，后继无人。”说到这，她自信他说：“我们是兵强马壮，我的年龄算是大一点，但比起周恩来、叶剑英，还小十六七岁，至于洪文，文元，你们是属于少壮派，他们更没法和你们比！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战胜他们！”

她忽地站了起来：“为我们的胜利干杯！”她带头一仰脖，一杯酒又灌了下去。

正在江青开足马力，通宵达旦地来审查“一·二五”大会上的录音带时，一件使她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二五”大会的当天晚上，周恩来便把参加大会的秘书叫来，吩咐道：“你们要开夜车，把大会上的发言整理出来，用不着全文整理，把主要意思整理出来就行了，我有急用！”

秘书们知道周恩来的用意，连夜突击，到第二天，即1月26日上午，记录便整理好了。周恩来把记录从头到尾地看了一遍，重要的地方还用红笔划个横杠，又给毛泽东写了封信，都装在了一个大信封里，立刻派机要通信员送给毛泽东。

当天下午，毛泽东认真地看了“一·二五”大会上的发言，他越看越生气，他大口地吸着烟，这不仅是背着政治局，也是背着我干的，已经狂妄到目空一切了。在她的眼里，还有谁，谁也不在话下了。这么大的一件事，连个招呼也不打，就擅自行动起来。这也是夺我的权。她自以为翅膀硬了，可以一手遮天了，这完全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

“恩来吗？”毛泽东立即拿起电话，“你通知一下政治局各委员，开一个会，讨论一下江青私自召集的‘一·二五’大会的问题。”

政治局会议开始了，毛泽东道：“这么大的一件事，你们和政治局商量过了么？和我商量了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互相面面相觑，哑口无言。

“1967年，你江青带头就搞乱过军队。”叶剑英也义正词严地批评了江青，“你这次是想夺权，是对政治局、中央军委和周总理搞的一次突然袭击。这么大的一件事，谁也不商量，自己就干上了，你江青的胆子也够大的了。”

“现在北京的中央直属机关、国务院各部和军委的各单位，听了你的报告，又闹腾起来了！”周恩来严肃地指出，“他们哪里知道，你用的是中央的名义，其实完全是你个人的意见。怎么收场啊？”

骄横一时的江青，顷刻像霜打的茄子——蔫了，她无法反驳，但心里又憋一肚子气。她几次都想豁出去了，大吵大闹，吵它个天翻地覆；但她毕竟是在政治漩涡里滚了10年，她知道其中的利害。如果真的吵得不可开交，给毛泽东下不来台，他一动怒，这不是飞蛾投火，自取灭亡吗？这也正是对方所希望的。她忍了又忍，终于克制住了自己，没有发火。“这次的事件，”她无可奈何他说，“我是有责任。”

“录音带一律不准向下发了。”毛泽东的批示，算是作了结论，并责令江青等“要作检查！”

会议结束了，江青满脸铁青，驱车回到住所，一进屋，便像发了疯的野兽，发泄着不满：“你毛泽东已经不分里外了，你反复无常，一会儿支持我们，一会儿又支持周恩来，好人都让你作。”她又疯狂地攻击周恩来，“一定是他告了刁状。”她望望坐在身旁的王洪文、姚文元，“不然主席知道得怎么那样快？我们的录音带还没修改完，主席就掌握了大会的情况，这除了

周恩来，谁还能干得出来！”说到这，她咬牙切齿地发着恨：“这是从背后射我一暗箭。好吧，既然你对我仁，也就别怪我对你不义，让我们长期进行较量吧！”

“这次我们算是败在周恩来手下了，”王洪文垂头丧气地说，“我们还得写检讨……”

“败，我才不承认失败呢！”江青气呼呼他说，“咱们谁也不许泄气，胜败乃兵家之常事，振作精神，重整旗鼓，下次再见高低！”

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顿时吓得胆颤心惊，自己虽然是中央常委、副主席，但这不是“永久”牌的，而是“飞鸽”牌的，说不定什么时候，毛泽东一勃然大怒，一句话，就把自己从副主席的“宝座”上拉了下来。他一想起刘少奇、陶铸、林彪的下场，便不寒而栗。光棍不吃眼前亏，保住自己的地位要紧，说点违心话，取得主席信任再说。

他万般无奈地拿起笔来，这支笔足有千斤重，他的手颤抖地写着……

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江青恨之入骨。她忽地一下跳了起来，急速地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只要我还有口气在，叶剑英也好，周恩来也好，你们就休想安宁了，我不好受，也不能让你们舒服了。

江青心里早有打算，眼下军队成为叶剑英的地盘了，虽然任命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从表面上看，军队是自己和周恩来平分天下，但张春桥在军队里只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一召开军委常委会议，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占着绝对的优势。张春桥在里面是孤掌难鸣。江青一直忧虑这件事。

军队是举足轻重的一股强大的力量，它站在哪一边，哪一边就是绝对的优势。她对未来的决战，心里充满着矛盾。她看周恩来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身体渐渐瘦削，连说话的底气都不足了。根据医生的情报，他的病相当严重。“好！”她高兴得一拍大腿：“这太好了。用三路向周恩来进攻：一、在精神上，千方百计地折磨他；二、加重他的工作，每天都让他累得筋疲力尽；三、加上病。这几路夹攻，就足以使周恩来早日去阴曹地府。到了那时，国务院这个最高的行政权力机关，自然落在自己的手里。大功告成，夺取天下，她做着今后的女皇梦。

她要千方百计抓军权。为了建立自己的武装，几乎费尽了心血。这天，她把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找来，把自己的心思向几位心腹透露了一下。

“我虽然名义上是政治部主任，执掌着全军的人事大权，”张春桥紧锁着眉头，道，“但在任命重要领导干部上，我一点权也没有。军委常委一开会，他们是多数，人又熟悉，背后还有周恩来的控制，我是光杆司令一个，怎么也抗衡不了他们。”他忧心忡忡他说：“军权不在我们手里，这是我们致命的弱点。我们虽然手里有成千上万的造反派，但那是分散的，造反起哄，那可以，真正到了真刀真枪决战的时候，他们哪是军队的对手？！”

“现在我们怎样把军队抓过来呢？”江青反剪着双手，慢慢地踱着步，道，“这应该是决定胜负的关键的一步棋，现在抓都有点晚了。”

她激动地一挥拳头：“人总不能让尿憋死，我们搞第二武装吧，造反派还是听我们话的。把民兵组织起来，发枪支弹药，进行军事训练，节骨眼时，把这批队伍拉出去，是可以跟他们较量个高低。”说到这，她望望王洪文，道：“第二武装，你在上海先搞起。那是你的根据地，人熟地也熟，又有群众基础。”

“是！”王洪文会意地点点头，“给民兵的武器，要现代化的，机枪、

大炮，甚至火箭都应该准备齐，到真正决战时，一声令下，就能拉出来，和叶剑英的正规军决一死战！”王洪文俨然仿佛已经是指挥千军万马的总司令了。

“我们要两路进攻，”江青接着说，“我也不能让叶剑英安静了，要放火烧荒，鼓动军队的造反派闹腾一下，给叶剑英找点麻烦，也是好的。”她望望张春桥道：“你利用总政治部主任这个地位，也要物色一些我们的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就不相信没人投靠我们！不用多，在北京附近的地区，有一两个师的兵力站在我们一边，就足以夺取整个天下……”

王洪文回到上海，花天酒地，尽情地享乐，他的铁哥们紧随鞍前马后。

“洪文同志！”这天坐在他身旁的王秀珍迫不及待地问道，“先透露点消息吧！”

“消息么！”王洪文端着架，眉头皱了皱，道，“根据主席和总理身体的情况，我们在战略部署上，应该早着手准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主席和总理的趁康情况都不算佳。从8年来的较量看，在主席生前很难把周恩来打倒，主席也不是不想搞周，但他有一次流露说：‘反周必乱’。他怕搞掉周恩来，引起天下大乱，这是迟迟不敢对周恩来下手的真谛，但他们都已年过古稀，主席已经81岁高龄了。周恩来也七十六七岁了。根据医生的确切报告，他们管理朝政的时间不会太长了。”

“根据这种形势，”王洪文故意顿了顿，装腔作势地道，“如果是主席先去世，我们同周恩来要有一场短兵相接的较量，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有他们无我们，有我们就无他们，这是势不两立的矛盾；肯定讲，和平接班的可能性极小，而极大可能是武力接班。除非是在主席还没去世前，就先让我们接班，罢去周恩来的一切职务。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很小。权，肯定不是靠别人恩赐，而是靠我们自己去夺取。不靠神仙和皇帝，”他望望铁哥们，意味深长地说，“就靠我们的本事了。”

说到这里，他若有所思，又继续道：“如果周恩来先走一步，主席是在周恩来之后去世的，接班有两种可能，直接把党、政、军大权交给我们，这就可能和平接管。另一种可能，把大权委任别人，人为地给我们树立一个对立面，这又是一场生死搏斗。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需要有自己的武装。我这次就为这件事来的。”

“这个战略部署，想得周到、及时、正确。”徐景贤沉思了一会儿，道，“要有备无患，不然的话，到了真正决战时，我们赤手空拳，只能是以卵击石，坐等待毙！”

“上海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王秀珍喝得脸有点红了，激动他说，“我们都是拎着脑袋干文化大革命的，也都是洞庭湖的麻雀，见过大风大浪的。”说到这，她一拍胸脯，打下保票，夸下了海口：“你放心，先由上海着手准备第二武装，我们有上百万工人，把忠实于我们的工人组织起来，进行军事训练，发给现代化武器，这是一支扭转乾坤的力量。”她一挥拳头，发誓道：“我们誓死捍卫以江青同志为首的中央文革，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我们要找个名正言顺的理由，组建第二武装。”颇有心计的徐景贤有分寸他说，“必须绝对保密，不要走漏消息，不能打草惊蛇。我们要拉屎攥拳头，暗中使劲。”

王洪文坐镇上海，在极端诡秘的情况下，打着加强沿海国防的名义，开始组织民兵、加强军事训练，并分期分批地发了武器。

毛泽东不满江青

对江青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并不是一点不管。从 1973 年底以来，他对江青的不满日甚，曾多次批评江青。

1973 年 11 月 25 日，毛泽东对一封批评江青的来信作了如下批语：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允许批评。

毛泽东

1973.11.25 那封信署名“一个共产党员”，批评江青“民主作风差”，批评江青坚持“一切为样板戏让路”，并指出“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的口号和提法是不恰当的。

此后，1973 年 12 月 9 日，毛泽东说江青“迫不及待”。

1974 年 3 月，政治局开会讨论派谁去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让邓小平去。江青坚决反对。

江青对邓小平的仇恨如同对周恩来的仇恨一样，是泯灭不了的。因为她知道，周、邓等人是绝不会同她同行在一条轨道上的。邓的复出和重新崛起对她意味着什么，她很清楚。

毛泽东得知这次开会的情况后，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江青：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毛泽东
三月二十七日这

期间，毛泽东还给江青写了这样一封信：

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81 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
74.3.20

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无论从个人还是从党的利益来说，都是不幸的婚姻。偏狭、妒忌、狂妄、狠毒，这些江青都具备，而且她还有极强的权力欲。她最缺少的是善良和对人的感情。毛泽东已经与江青分居多年。毛泽东在世的最后几年，两人见面不多。江青知道，不能失去毛泽东这杆大旗。凡有事或江青认为应该见见毛泽东的时候，她都要事先向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提出申请，得到毛泽东许可方能见面。

这次求见未被获准。毛泽东不愿多见她。

有些事是让毛泽东很伤心的。比如一年前毛泽东允许江青来见他，谁知她来是为了要钱，毛泽东给了她3万元。“她看我身体不行了，为自己准备后路，要夺我的遗产稿费了。”江青走后，毛泽东流了泪。

江青知道，毛泽东不会与她彻底决裂。且不说毛泽东对她总不能没有一点感情，那同住一间窑洞、马背上前后相随、从延河边一块来到中南海的经历，哪能一笔勾销？而更主要的是她有政治资本。江青的名字与“文化大革命”息息相关。毛泽东认为江青批刘、林有功，只要毛泽东不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不会轻易否定江青。

江青自恃有特殊的身分和特殊的“贡献”，常常肆无忌惮。“文化大革命”初期自不必说，1974年“批林批孔”，就很是施展了一番。她以个人名义给军委和全军写信、送材料、派联络员，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放火烧荒”，煽动打倒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李德生，随后便是以批判林彪、孔丘为名把矛头集中指向周恩来。

江青兴奋了。归来兮，“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八面威风！“9·13”以后稍稍稳定的政治局势又开始混乱，国民经济重新下降。

毛泽东生气了，他并没有给江青为所欲为的权力。

1974年7月17日，骄阳似火。这天下午3时，中南海紫光阁会议室正在开会。这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的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委员都出席了。

“批林批孔，没有深入下去，我们不是没有可批的，而是有儒，各个单位都有，还有大儒。”江青慷慨激昂，滔滔不绝地指桑骂槐，“大大小小的儒不批倒批臭，文化大革命就无法深入下去。我们应该再掀起一个高潮。”

“我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王洪文打了接应，道，“这次批林批孔，为什么深入不下去？”他自问自答他说，“就是因为层层都有阻力，而更大的阻力，并不是在下层，而是在上层，在领导机关，碰到了某些高级领导人。”

“我们的某些高级领导人，”姚文元用冷似冰霜的目光瞥了不动声色的周恩来总理一眼，道，“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就是绊脚石，8年多了，一路上总是跟不上，妨碍着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而他自己还不自觉，从来也不认真地检讨。”

“也不能说这种人对文化大革命不积极，”张春桥敲着边鼓，冷嘲热讽地挖苦说，“他也很积极，而且还很顽强，他的积极性和顽强性，不是如何支持文化大革命，而是千方百计地破坏文化大革命，阻碍文化大革命！”

江青打了冲锋，其余三位，打接应的，打配合的，都从不同的方面发起了进攻。

“江青同志，”一位政治局委员早已听不下去了，这又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围攻，主攻方向是周恩来总理。这位政治局委员早已料到，迟早会发生这场短兵相接的交锋，近一段时间，报刊又充满了火药味，杀气腾腾地要揪出“大儒”。他再也控制不住了，义正词严地问道：“江青同志，请你把话挑明吧，我们在座的究竟谁是大儒？当然不会是你们几位了，自然是你们几位以外的人了。何必旁敲侧击，含沙射影呢？究竟谁是大儒，摆在桌面上不是更好吗？如果真的犯了像你们几位批评的那样的错误，该检讨就检讨，该受批判就受批判。”

“谁是大儒谁心里明白，应该有自知之明，这还要别人说吗！难道连这么点自觉性都没有吗？”江青气得脸色铁青，说话声也大了，摆出一副要吵个天翻地覆的架式。

“我认为江青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是好样的，自己有错误，就应该开诚布公地承认，而不是装糊涂！”少壮派王洪文已经不是打接应了，而是从下面冲了上去。

“批林批孔，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的。”姚文元用献媚的目光望望坐在对面的毛泽东，道，“有人对毛主席的指示，也迟迟地按兵不动。这不是一般错误，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态度问题。”

毛泽东紧锁着眉头，大口大口地吸着烟，这是浅碟子装水，稍微头脑清醒的人，都一眼就看到底了，这不仅使被围攻的周恩来难堪，同样也使毛泽东下不来台。江青这样胡搅蛮缠，放刁撒野，这岂不是给他脸上抹黑么？好端端地研究一些国家大事的会议，硬让江青几个人给搅得开不下去了！他脸色变了，动怒了。

“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

受到毛泽东的当面批评江青显得很不自在，尽管表现出一副矜持的样子，但她那种高傲和主角的气派不见了。毛泽东又说。

“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江青说。看得出，江青说这话是极不情愿的，而且还包含着一种不满，不仅对毛，而且对邓。邓小平这个人，表面上话不多，但硬得很，在她面前很少退让。难怪毛泽东说他“内部是钢铁公司”。既然毛泽东这样称赞他，那就把它送给邓小平吧。

“当众说的！”毛泽东紧跟一句问道。

“说了算！”江青也紧跟着回答。

“孔老二讲的，言必信，行必果。”毛泽东说到这里，对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说：“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

“不大好的就改。”

“你也是难改呢，”

“我现在钢铁工厂不开了。”

“不开就好。”

夫妇二人展开了对话。

钢铁工厂不开了，至于帽子店，江青说：

“就是有一个电影叫《中国》，太坏了，但是汉奸帽子还没有戴，因为还弄不清楚是谁搞的。”

其实，江青完全知道拍这部电影的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是周恩来批准来华的。江青的真正用意不是批这个外国人，而是要打击周恩来。现在她向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很明显一是向毛泽东告状，二是说给在座的周恩来听。

“我一定特别注意，请主席放心。”江青又接着说了一句。

其他人都不说话。“他们都不吭声呢。”毛泽东面对江青，说。

周恩来把话接过来，说有些事他也是负有责任的。他讲了“1·25”大会的情况。

“此人一触即跳。”毛泽东指的是江青。

“我没有跳。我本来不想去，后来总理说大家都要去，我没有办法，才去的。”“1·25”大会明明是江青的得意之作，是对周恩来的一次突然袭击。

江青在这里完全是颠倒黑白。

“我讲你的脾气。”毛泽东对江青说，然后面向大家：“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大家仍不吭声。

最后，毛泽东对大家说：

“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来自上海，毛泽东说的“上海帮”即由此而来。

“现在登奎也搬进来了。”江青说。她是在说他们的人不仅都是上海来的，而且人并不少，不是一个小宗派。

“你那里要当心，不要变成5人了。”毛泽东说。

会议结束后，政治局委员们从毛泽东的住处走出来。有几个人的气色很不好，他们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上海帮”——毛泽东今天第一次给这几个人使用了这样一个概念。

“邓小平不是周恩来，他的作风不同。周恩来注意策略，使自己能够停留在水面上，但不能改变激流的主要方向。邓小平却不顺从这股激流，而是马上筑坝堵住洪水。”

这是巴拉奇·代内什的观点。

确实如此，邓小平开始筑坝，试图堵住祸水。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显然，这是为周恩来之后的国务院总理的人选作了安排。

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近期内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知还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大乱大治，只有大乱，才能大治。这是毛泽东的观点。“文化大革命”已经乱了8年，并未达到大治的目的。8年前，满面红光，神采奕奕；畅游长江，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健步登上天安门，向百万红卫兵挥臂致意，天摇地动。而今，步履蹒跚，垂垂老矣。不能再乱了，要安定、团结。治国安邦，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几个人不行，江青更不行。还是要靠周、邓。人大会议已中止了7年，不能再拖了。要开人大，要重新“组阁”。国家要走上正轨。

毛泽东的思路向着有利于周、邓的方向发展。双方力量的对比，当然随之向着不利于江青等人的方向发生变化。

四届人大是很关键的一局。如果人大之后国务院形成一个周、邓体制，情况将大为不妙。这一点，江青等人很清楚。这一局不能输。要进攻，只有进攻，才能掌握主动。决不能让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

周恩来告别西花厅

西花厅位于中南海西北角，论条件是中南海里比较差的。它也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式的建筑，两面临街，隔一道墙就是大马路。1949年，工作人员随周恩来看房子时，耳边忽然传来一阵隆隆的汽车马达声，脚下便鲜明地感觉出了地颤。刚想说什么，又是一阵车轮辗过的沙沙声，接着便是一道刺耳的喇叭声。声未止，玻璃又响起来，那是共振的原因。

“周副主席，这里不行，太吵了。”工作人员纷纷发表见解。

“我住下吵，别人住下就不吵？”周恩来看过房间，做个手式：“就搬这里了。”

用周恩来的话讲，随时可以听到市声，感觉上离人民群众近些，这是西花厅最大的优点。

西花厅分前后院，后院的北屋，有周恩来一间卧室，邓颖超一间卧室，两人合用一个客厅。到吃饭时，这个客厅便是餐厅。接待内宾在这里，看电视、文化娱乐也在这里。

靠会客厅的东北角有个木质楼梯，上面也有点房间，是周恩来侄女们假期时居住的地方，孙维世来时也住在这里。孙维世是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她受到周恩来夫妇的关怀和照顾，亲切地称邓颖超为“妈妈”。这里也算是女孩们的“绣楼”了。

这座清代皇家建筑，看上去似乎富丽堂皇，郁积着贵族的气息。定睛细看，就会发现，门窗檐柱上已油漆斑驳，露出陈旧的木质，那骄横盛世的皇家气息已被岁月风化，变成漫长历史演变的物证。那青砖地面，由于年头久，到了夏天便泛潮泛碱，使墙角一圈也能看见白碱的印痕。

那年代没有壁纸，墙壁虽然喷了浆，由于泛潮，很快就都变成灰黑。房间里光线比较暗，那种阴湿昏暗的感觉，比现在普通人住的公寓要严重得多。天花板也很陈旧，像上了年纪的老人的皮肤一样缺少光泽。

最不方便的是厕所，距卧室有一段路。现在一般公寓从床上爬起来就可以进卫生间，那时的部长们一般也有这种条件。

室内的陈设更是简朴。办公室里有一张两面抽屉的办公桌，那是40年代诞生的老式桌子，已经很旧。桌前一把转椅，周恩来坐不惯，后来换成了四条腿的靠背椅。这种靠背椅现在已经不常见，在解放初还是最普通的一种样式，就是在座椅上垫一层棉花，再包上灯芯绒布的那种直棱的靠背椅。

办公桌一侧，还有个长条桌，不带抽屉，铺一层绿呢子布，上面摆了烟缸和茶杯。长条桌两边各摆四个凳子，两头还各有一个凳子，周恩来随时召集副总理或各部部长来办公室，都是围了这张长条桌开小会或是谈话。

靠墙壁，正中间有一个简易木架子，木架上铺了周恩来在解放前用的毯子，上面端端正正摆放着毛泽东的半身石膏像。石膏像两边各摆一个书柜，办公室两头还有书架子。书架子上的书主要是马恩列斯著作，毛泽东选集，干部必读以及辞源、辞海等各种工具书。

周恩来每天除开会、谈话、接见内外宾、视察工厂农村学校商店等大量工作外，总要坐在那张老式办公桌前，伏案工作几小时甚至十几小时。他缝制了一副工作套袖，蓝布做的，两边有松紧带，和工人们使用的套袖没什么两样。每次办公前，他必要仔细戴好套袖，以免磨坏衣服肘部或被墨汁污染袖口。

周恩来有夜间办公的习惯。秋天，地面泛潮更为厉害。一天夜里，秋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周恩来坐久了，全神贯注地批阅文件，两腿却下意识地抖动着，时而右腿压在左腿膝部，时而左腿压住右腿膝部，停笔思考时，左手便会不经意地揉揉膝头。卫士悄悄观察着，完全明白这些下意识的动作说明了什么。他找来一块小毛毯，轻手轻脚走到周恩来身边，无声地蹲下来，将毛毯小心翼翼盖在周恩来的腿和膝部。周恩来的腿忽然停止了那种颤颤运动，接着，脚在地上搓响一下。

卫士从桌下仰起头，立刻看到俯下来的那张英俊而熟悉的面孔，那双使所有中国人为之骄傲的浓黑的眉毛下，两只眼闪出温柔而深挚的光波。卫士心里一阵热，又一阵酸，嘴唇动了动没有出声。

“小张，谢谢你了。”周恩来扶了他一把。当卫士起身站到一边时，周恩来又说：“谢谢。太晚了，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休息去吧。”

以后，每当周恩来夜间办公，卫士便替他盖一块毛毯在腿上。终于，他们忍不住提了建议：“总理，铺块地毯吧，其他首长都铺了地毯……”

“不要，我不需要。”周恩来摆手。

“可是，屋子太潮，你又不让翻修，首长们到你这里来开会，坐久了都容易腿脚受寒受潮，特别是一些老人，会闹腰腿疼。”

周恩来望着卫士，想了想说：“那好吧，办公室可以铺地毯，来客人共同得益。卧室不许铺，卧室只我一个人，铺了浪费。”

就这样，周恩来的办公室里有了地毯。但是卧室始终没有铺。

周恩来的卧室陈设更为简单。他睡一张双人木板床，上面垫一层棉花套，然后是一条普通棉布褥子。被子也是普通棉布被。他不喜欢花布，喜欢素淡。被面是豆绿色的平纹布，被里是普通白布。开始他使用的是荞麦皮枕头，后来出国，工作人员悄悄帮他买了个长方形海绵枕头，替他换了。对于这一“新事物”，所费无几，他接受了。

木板床的两边很“热闹”。床头两把椅子，脚下两把椅子，四把椅子围拱一张床。因为周恩来连个衣服架也没有，脚下的椅子是放衣服用。周恩来同毛泽东一样，有上床办公的习惯。每次离开办公室时，他自己抱一堆批阅的文件，工作人员帮他抱一叠文件，就放在床头的椅子上。周恩来上床后，必须继续办公三四个小时，批阅过的文件由卫士交机要秘书，然后他才会睡觉。

大跃进开始之前，周恩来特别忙，有时上了床，继续办公五六个小时仍然处理不完工作，无法入睡。他本是白天睡觉，但上床时往往天还没亮，躺在床上办公，吊灯显然不适合，为了借光，周恩来不得不保持某种躺卧的姿势和角度，这样是很疲劳的。工作人员建议说：“总理，买个台灯或是落地灯吧，这样有利于办公。”

“嗯，是得搞一个，这是工作需要。”

见周恩来同意了，工作人员马上提议：“打电话叫宾馆送一套就行，我们有储备。”

“自己用，搞那么高级干什么？”周恩来把手一摆，“不要麻烦宾馆，我不要。”

“这是为工作又不是为享受。”

“正因为这样，所以不要宾馆里的。我是为了用，不是为了看。这件事按传统办。”

“什么传统？”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周恩来笑着说：“一个落地灯，很简单，稍微动动手就行。”

结果，他请中南海的工人用铁管子自己做了两个落地台灯，卧室床头摆一个，办公室摆一个。是30瓦的日光灯，用洋铁皮打的灯罩。用了几天，那洋铁皮反光，晃眼晃得厉害，他让工作人员在灯罩上刷了层绿漆，从此，这两个落地台灯便再没有动过地方，一直陪伴到他住进305医院，卧床不起。

由于地面潮湿，周恩来常闹腿疼，办公室的地毯由于潮湿而生了虫。老卫士长何谦心疼周恩来，跟邓颖超商量后，找到周恩来建议道：“总理，这些房子太旧了，按照正常情况也该维修了，否则会损坏的。”

周恩来觉得有理，想了想说：“正常维修还是必须的，这些房屋都是国家财产，不能损坏。”

何谦马上又建议：“那么我们就安排一下，利用你外出的时候搞。”

周恩来同意道：“这件事你来办吧。”他看一眼何谦，特意强调说：“就是正常维修，一定不能铺张浪费，哪里坏了修哪里，要尽量节约。”

周恩来到南方视察、读书时，何谦留下来，负责房屋的维修。

何谦是位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对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他讲原则，组织纪律性强，特别是对自己要求严格，办事从未出过什么大的差错。周恩来办什么事交到他手里都是很放心的。

这一次，何谦是带着一种感情接受这项任务的。周恩来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连走路都要算计好时间。案头上的文件总是几大沓。有些事本来不该推到他这里，可到时候还是推来了。何谦曾不满地跟周恩来说：“总理，这些事应该是他们处理，他们又是休假又是娱乐的，凭什么都推到你这里来？”周恩来严肃他说：“你不要乱说。我就是做具体事的么。这些具体事我多干一些，其他首长就好多考虑一些大事。”

周恩来在中央领导中，无疑是工作量最大的一个。然而他却是在这样一个陈旧、潮湿、昏暗的环境里工作，对此，何谦又心疼，又有些不平。有这样的心情，周恩来走后，他在征得邓颖超和童小鹏等同志的同意之后，便照自己的想法干了起来。

周恩来腿不行，一到下半夜就腿疼。何谦首先指挥工人将潮湿的铺砖地改成了地板，并且换了新地毯。窗帘太薄，夜里不隔凉，就换成了呢子的。卫生间也做了改建，盖钓鱼台国宾馆时剩下的澡盆搬来一个装好，这种澡盆底子平，有扶手，对老人来说比较安全。屋子里的家俱太简陋，办公累了连个舒服一下身体的沙发也没有，就从宾馆储备的沙发中挑两个搬来了。邓颖超的房间也太简陋，连一般女同志都有的梳妆台都没有。他便为邓颖超置了一个梳妆台。房梁年久已经腐朽，便换了梁，并且重新油漆粉刷一遍。这些事办完了，他各个房间走一圈，心里算算账，觉得实在算不得铺张浪费，每一项工作都是有理由的。何况，全国不就是一个总理吗？只搞这样一点“基本建设”，叫任何人听了都会觉得够“低标准，瓜菜代”的了。

万没料到何谦的这些想法与周恩来的想法全扭劲了。

周恩来从南方回到北京，一进家门就怔住了。他皱起眉毛眯细了眼，目光像机枪手寻找目标一样飞快地扫过地板、地毯、窗帘、沙发以及油漆粉刷过的房屋，接着便退出了门。

“何谦，何秘书！”

“总理，我在这儿。”何谦隐隐生出不祥的预感。

“你花了多少钱？”周恩来声音低沉，因而更显出分量沉重。

“不知道……”

“何秘书，你也是老同志了。我是怎么交待你的？为什么搞这么铺张？国家正在困难时期，谁叫你添置这些东西？是你的主意还是小超的？”周恩来始终用“小超”来称呼邓颖超。

“是我的主意。”何谦主动承担责任。

“你要作检查！”周恩来突然提高声音，声色俱厉。

“房子潮，夜里你办公……”何谦深深叹口气，接着解释说：“你在外，我想，有些事情和想法打长途一下子也说不清，我就做主了。”

“你不用解释了，这个错误是明摆着的！”

何谦长期跟随周恩来，他了解周恩来的习性：你错了，不解释，痛快认错，他一般不生气，你越解释他反而会越生气。

“总理，我考虑不当，是我错了……你先回去休息吧，我愿意作出检查。”

“我回去，接受既成事实？”周恩来把手一摆，表示不能接受，严厉地说：“你算算花了多少钱，我自己赔！”

何谦小声说：“你赔不起。你才收入多少？你和大姐的工资合起来也不够……”

周恩来指着房间那些新添置的东西，大声说：“把那些东西统统搬走，否则我不进！”

周恩来发脾气的时候从来不骂人，但是说话语气激烈，声色俱厉。他发过脾气后，接着必要放缓声音说几句柔和的话，决不会让同志下不来台。这次不然，他气得厉害，没说柔和的话，拒绝进家，住到钓鱼台5号楼去了。那是他办公和接待外宾的一个地方。

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觉得何谦在这件事的处理上虽然不合周恩来的想法，但也算不得过分，已经是很注意节俭。看到周恩来发这么大脾气，家也不肯进了，他们都很焦急，便去找陈毅。他们觉得陈毅与周恩来关系密切，友谊深厚，又会讲话，反应机敏还会来点幽默，他一定能劝说周恩来消消气，接受现实，回家。

“啥子了不起的事嘛，我看也只是修了该修的地方嘛。”陈毅看过房子，信心十足去说服周恩来。周恩来刚去天津视察回来，仍是住在钓鱼台不肯回家。工作人员都以为陈毅会马到成功，谁料想，陈毅不曾把周恩来劝回家，倒是周恩来把陈毅带到国务院会议上。

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以后，在大会小会上连续作了几次检查和自我批评。开始大家是认为有点小题大作了，但很快便理解了周恩来。

那时，每星期有一次国务会议。周恩来在一次国务会议上再次检查这件事：“这次我在南方读书，到各地看了看……家里花了那么多钱替我修房子。我作检查是应该的。我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个很坏的头。那么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房子修不修？我心中不安。”

由于周恩来反复检查，副总理和部长副部长们都以为工作人员把周恩来家修成什么不得了的宫殿样子了，纷纷来参观。参观之后无不感到震惊。房子都是修了该修之处，并无奢侈之感，甚至还不如某些部长和省委书记的住房好，而周恩来却如此看重这件事。那么，谁还敢乱花钱修造住房？

何谦也多次作出口头和书面检查。他检查之后，难过地说：“只要总理肯回家，在现在修好的房子里住几年，我挨什么批评都行，给我什么处分我也没意见。”

周恩来听后，很受感动。他把何谦叫到办公室去，说：“你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对我应该是最熟悉的吧？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房子搞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你不要只听人说

没什么，说只修了应该修的，不同的意见肯定也是有的。而且，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我还怎么说别人？这个头就是我带的。都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些你为什么想不到。现在呢，我搬进去住吧，我心不安。我不搬去住吧，你们心不安。你们这么搞对谁也不好啊……”

周恩来花费这么大精力处理这件事，止住了别人可能发生的效仿。

工作人员别无选择，将地毯、沙发、窗帘、梳妆台和灯具等等凡是能搬走的全搬走，恢复原来的旧东西。只剩地板没法拆，澡盆用水泥抹死在卫生间里了，这些东西要想搬走就得“搞破坏”了。

他们向周恩来汇报：“总理，能搬的我们都搬走了。地板和澡盆总不能硬拆吧？油漆总不能再刮掉吧？那样还得造成更大的浪费……”接着，陈毅也来劝说，至此，周恩来才勉强搬回家住。

这一次给工作人员的教训太深了，都懂得了在周恩来面前是来不得“既成事实”、“下不为例”这一套的。此后，直到周恩来逝世，他的房间再没有大修过。

后来，国家经济形势逐步好转。到了1964年1965年，工作人员心思又曾活跃过一次。

西花厅的前院有个水池子，有条小长廊。周恩来说：“我们号召人民节约一滴水，一度电，怎么能为我一个人浪费一池水？”所以那水池子从未放过水，成了工作人员种试验田的地方。那条长廊更是旧烂得不成样子，木料上的漆都脱剥了。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工作人员商量了一下，找周恩来汇报说：“总理，西花厅的木建筑必须保护，现在需要修理一下。水池子应该放水，改变环境，对木建筑也能起保护作用。这些木建筑也该刷漆维修，这样才能起到保护效果。”

周恩来点头说：“可以搞一下，但一定要自费，不准花公家的钱。”

工作人员见周恩来同意了，都很高兴，忙与有关部门联系。有关部门来看过后，一算账，需要2万元。

“什么？两万元！”工作人员愣住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全部存款只有两千元，差了一位数。

“总理，人家说维修一下要两万元呢……你看怎么办？”

“咱们还有多少钱？”

“差一位数，只有两千。”

“嗯，差太多了……”周恩来沉吟一下，说：“暂时放下吧，以后再说。”

就这样，周恩来居住的西花厅，直到他逝世，院里屋里都再没修过。

自1949年周恩来走进西花厅，这所古老的房子纵然无言地陪伴了他25年，感情自在极深处。如今，就要向这里告别，主人的依恋之情更是难以言喻。

位于北京城内北海西岸旁边文津街的解放军305医院，病房大楼底层有两套宽敞的病房。一套是为毛泽东准备的，他没有住。在另一套房子里，1974年6月1日迎来了它的新主人——周恩来。

这天中午，身患癌症的周恩来走出中南海西花厅。刚到门口，他停下，转身。两道柔柔的目光，久久地抚摸着这世纪小屋。

他的秘书悄声对身边的医务人员说：“昨天总理一再说，他舍不得离开这儿。这办公室他用了25年。”

305医院，躺在手术床上包扎伤口的周恩来缓缓睁开了眼。他黯淡的目

光透出若有所求的神色，嘴角微微抽动着。

是麻醉效果不好而疼痛？是关心手术结果？还是要感谢为他竭尽心智做手术的专家？……

医务人员把头俯下去，于是，听到了一阵微弱的讷讷声：“叫，叫李冰同志来。”

刚出手术室的医学科学院日坛医院李冰，听到召唤，忙回到手术床旁。

“李冰。”周恩来的嘴唇翁动着。

“嗯。”李冰轻轻应着，侧耳俯身，贴近周恩来的唇际。于是，周恩来呼出的热气和艰难吐字的声波，便直触她的肌肤耳膜，从她心房唤来了春雷一般的隆隆回响。

“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去。”周恩来断断续续，讲完这句话，鼻凹处已经沁出汗。李冰用力抿紧嘴唇、点头，并且飞快地眨动眼睛、防止泪水盈眶。她翁动着鼻翼，哑声说：“我就去，请总理别说话了，千万要好好休息。”她不敢久留，把头一扭，匆匆退出手术室。

一走走廊，李冰猛地张开嘴，让室塞的喉咙能顺畅一些透气。于是，压抑已久的泪水如决堤的小河流泄下来。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的身体更虚弱了。正像人们已知道的，他一天也没有停止工作。每次手术后，回到病房便又开始工作，让工作人员为他念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大参考和参考资料。有时邓颖超来了，就由邓颖超为他念。周恩来的组织纪律性非常强，文件发到哪一级就是哪一级，不该让别人看的就绝不扩散一点，对邓颖超也不例外。邓颖超带来的如果是密封件，就当着他面帮他拆开，交给他自己看。

刚能下地，周恩来就又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工作。在1975年5月的一天，周恩来在散步时，曾问身边的医护人员：“你们说实话，我还能坚持多久？”

医护人员一怔，马上竭力绽出笑，想用几句轻松的安慰话搪塞过去。

周恩来抬眼望天空，仿佛在正视那冥冥之中的死神，又像是在寻找马克思在天之灵，忽然但然地笑了。

“组阁”风波

周恩来住院期间，江青一伙加紧了夺权活动。他们用的还是老办法：先制造舆论。《红旗》杂志1974年第10期发表了姚文元策划和修改定稿的《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从6月5日姚文元布置写这篇文章，到10月1日刊出，历时近4个月。《红旗》编辑部贯彻姚文元的意图，说文章的主题应放在“研究儒法斗争对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意义”上，文章的目的是“为了现实的阶级斗争”，所以要“针对当前的主要问题来写”，要着重写“复辟反复辟”的“经验教训”。姚文元8月5日说：“索性改为儒法斗争对今天的意义”。文章借研究秦汉儒法斗争历史经验之名，借古喻今。文章说：“新兴地主阶级能不能保持政权，关键在于能不能保证继续执行法家路线。”又说：秦始皇陶醉于“黔首安宁，不用兵革”这种太平景象的时候，奴隶主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赵高已经披着法家的外衣钻进了秦王朝的心脏，对地主

阶级政权进行“挖心战”。秦始皇一死，赵高立即发动沙丘反革命政变，用一条“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的儒家路线代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对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实行血腥的阶级报复。文章说：“西汉王朝的前期和中期所以能在反复辟斗争中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汉高祖死后“法家路线却历经吕后、文、景、武、昭、宣六代基本上得到了坚持”。“由于在中央有了这样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而“清君侧”的策略就是要通过“搞垮中央的法家领导集团”改变法家路线。文章进而点明本意：“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那些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往往采取这种‘清君侧’的反革命策略”，“打击坚持毛主席正确路线的革命力量。”他们的用意，跃然纸上：一为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是钻进党内的赵高、刘凵；一为标榜他们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法家领导集团”，要让法家人物“在中央主持工作”。在这以后，上海市和两校等写作班子发表的多篇文章，为所谓“中央法家领导集团”鼓吹。这些文章，既是给老百姓看的，更是给毛泽东看的。他们向毛泽东进言：只有让“中央法家领导集团”主政，才能够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泽东心中有数，知道江青“积怨甚多”，对此并不理睬。

1974年10月12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借国产万吨轮“风庆”号远航归来为题，影射攻击周恩来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

“风庆”轮事件梗概如下：

1974年，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组织处副处长李国堂和宣传干事顾广文，奉派遣到“风庆”轮协助首次远航欧洲的工作，李任政委，顾为政治干事。“风庆”轮开船后，某些人要李、顾批判所谓造船买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李、顾给以拒绝，并指出：国务院和交通部一向支持国内造船工业，但目前在国内造船工业尚不能满足远洋运输的情况下，利用一些有利条件，从国外适当买进一批船只，是完全必要的。这既有利于加速发展我国独立的远洋船队，也可以尽快地改变由于船只不够每年要用大量外汇租用外轮的局面。一些在这个问题上的谬论，矛头是直接指向周恩来和国务院其他领导的。他们还在船员中议论了“样板戏”。“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据此写了一封10000多字的信，诬蔑李、顾是“假洋鬼子”，“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江青在信的批语中攻击交通部“崇洋媚外”，是“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专政”。张春桥、姚文元也诬蔑李国堂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王洪文批示：“先将李国堂留在上海，发动‘风庆’轮船工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交通部必须对李国堂进行严肃的处理，并将处理情况报中央。”国庆节前夕“风庆”轮返回上海后，李、顾两人被扣在上海批判，“李、顾事件”定为“反动的政治事件”。《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评论员文章，说什么：“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充满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斗争的历史。”“翻一翻中国造船工作发展史，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近代尊孔派的头子都直接插手造船工业。”文章还说什么：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刘少奇等都奉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推行了一条卖国主义路线。又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不仅如此，江青一伙还在中央政治局挑起事端。6月1日周恩来因病住

院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有预谋地对邓小平进行了多次挑衅。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实际上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四人帮”更加紧了对邓小平的攻击。10月17日晚，“四人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预谋地提出所谓“风庆”轮事件“崇洋媚外”问题，要邓小平立即表态，对邓小平突然袭击。江青挑衅性地问邓小平：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邓小平严正地回击江青，我要调查。江青等人大吵大闹。邓小平说，政治局讨论问题要平等么，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待人。江青等四人一拥而上说：早就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你果然跳出来了。邓小平蔑视他们，离开了会场。

10月17日晚，在政治局会议上，又一次进攻开始了。江青提出所谓“风庆轮”问题，说进口船只是崇洋媚外，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并逼迫邓小平表态。

邓小平毫不退让。

江青等人胡搅蛮缠，会议无法继续进行。

邓小平气极，拂袖而去。

这天晚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一种似乎是决战前夕的紧张严峻的气氛中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地点在钓鱼台17号楼。

四人一致认为，必须争取毛泽东的支持，由王洪文尽快赶赴长沙，向毛泽东报告情况。第2天，即10月18日王洪文乘坐的专机在长沙机场降落。当晚，毛泽东接见了她。

在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时，王洪文向毛泽东报告：

“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至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

王洪文继续说：

“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毛泽东仍然默不作声。

“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

王洪文的这句话是点睛之笔。如果毛泽东对他的报告重视并给予支持，把事件与庐山会议即九届二中全会联系起来，那么问题的性质就很明显了。

王洪文期待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

同一天，即10月18日。北京，钓鱼台10号楼。

江青与王海容、唐闻生谈话。是江青把她俩叫来的。

王、唐二人看起来像姐妹俩，衣着打扮、个头长相都差不多。总是穿一身朴素的服装，方口布鞋，留齐耳短发，戴眼镜，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她俩一个是毛泽东的表侄孙女，一个是外交部官员唐明照的女儿。她们的职务是外交部的翻译，但在党内高级领导层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她们不仅为毛泽东接见外宾担任翻译，而且是党中央主席家中的常客。在毛泽东晚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家里的客人是不多的。其他领导人有时半年几个月都难得见上毛一面，只是在他召集政治局会议或接见外宾时，才能和政治局委员们或陪同接见的其他人一起见一见。毛泽东非常信任王、唐二人，要这两位年轻人参加政治局会议，然后直接听取她俩关于政治局内部各种情况的汇报及国内各方面情况的反映。报送政治局委员传阅的有些文件要列上她

二位名字。毛泽东知道政治局内部是分为两个阵线的，对两个方面报告的情况他都不轻易相信。他需要他认为是真实的情况。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王、唐二人便充当了毛泽东与政治局其他人之间的一座特殊的桥梁。毛泽东不仅从这两个年轻人那里获得他想了解的情况，而且他的指示有时也要经过这两人向政治局或中央、国务院其他领导部门传达。

江青今天把这二位请来，是想请她们在毛泽东面前再奏周、邓一本。

江青向王、唐二人讲了如下意思——

毛主席很快就要在外地会见外宾，有个重要情况请你们在陪同外宾去的时候，向主席报告。在 10 月 17 日晚上，政治局讨论“风庆轮”问题的会上，小平和我发生争吵，然后扬长而去，使得政治局的会议开不下去了。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连，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全是在养病。小平和总理、叶帅都是在一起的。总理是后台。

“这件事我讲不很清楚，等晚上我找洪文、春桥、文元一起来，再进一步向你们介绍情况。”江青说。

她还透露，王洪文要向毛泽东报告这件事。

当天晚上，当王海容、唐闻生按照江青的安排来到钓鱼台 17 号楼的时候，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已经在这里等她们了。江青首先让张春桥“介绍当前国内形势”。

张春桥首先讲了国内财政收支和对外贸易出现逆差的问题，说这是国务院“崇洋媚外”造成的。

“小平在‘风庆轮’问题上跳出来不是偶然的，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就主张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张春桥说。

对问题性质的看法，张春桥把 10 月 17 日晚的政治局会议比作“二月逆流”。

第二天，王海容、唐闻生去医院，向周恩来汇报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找她们两人谈话的情况。

周恩来听完汇报，沉思片刻，说：

“我已经知道政治局会议的问题。我所了解的情况并不像江青说的那样，而是他们四个人事先计划好要整小平，他们已多次这样搞过小平，小平忍了他们很久。”

周恩来清楚地知道，10 月 17 日的政治局会议事端已经使斗争进一步明朗化，争论的焦点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问题已经到了毛泽东那里，如何解决要看毛泽东的态度了。

最后，周恩来对王、唐二人说：

“我正在做工作，打算进一步了解情况，慢慢解决问题。”

10 月 20 日，王海容、唐闻生在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了北京这几天发生的情况，并表示了对江青等几人的不满。王、唐二人是陪同来华访问的丹麦首相哈特林到达长沙的。

毛泽东对王海容、唐闻生作了如下指示：

因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毛泽东的表态使江青等人发起的这次攻势遭到严重挫折。

一架涂有中国军用飞机标志的喷气客机在北京西郊机场呼啸着腾空而

起，不一会儿便消失在蓝天白云之中。

邓小平飞赴长沙，面见毛泽东。

1974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邓小平。谈话在极为亲切的气氛中进行。在座的有王海容、唐闻生。

“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毛泽东以一种满意和赞赏的口气对邓小平说。

“主席也知道了。”邓小平说。他知道，毛泽东指的是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双方的对阵。

“好！”毛泽东显得很高兴。

“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我赞成你！”

“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毛泽东用手指着王、唐二人，说：“她们都不高兴。”

“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邓小平说。

“这个好。”毛泽东很高兴。

邓小平又谈到自己的工作问题，向毛泽东表示：

“最近关于我的工作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责任确实重大。

“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罗。”毛泽东说。

同一天，毛泽东在江青给他的一封来信上作了如下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
十一月十二日

江青不满足自己的仅政治局委员这个职务。她想插手国务院。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她要过问。她在给毛泽东的这封信中提出：让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金祖敏是纺织工人。中共九大期间，突然用飞机把他接到北京，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8天以后，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短信：

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采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毛泽东
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李固、黄琼，东汉人。李固素来仰慕黄琼，曾勉励其出仕。顺帝永建二年，黄琼被招聘入朝，途中称病不肯前往，经朝廷敦促，才继续向京城进发。

在黄琼到达洛阳近郊的时候，李固写了一封信给他，即毛泽东说的《李固给黄琼书》。这封信从两个方面启发开导黄琼，一方面批判了当时名士的孤傲，另一方面针对当时名士专靠声名而其实不符以致容易被人攻击的缺点，对黄琼进行了规劝告诫。毛泽东对李固此文颇为欣赏，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说她“九大以后基本是个闲人”，希望毛泽东给她工作，即给她可以发号施令的实权。毛泽东的信实际上否定了她的这种要求。

“组阁”阴谋的破产

1974年12月下旬，进入数九寒天，凛冽刺骨的寒风在华北平原上空呼啸着。叶剑英得知周恩来要去长沙的消息后既喜又忧。喜的是，有周恩来亲自出马向毛泽东建议，击败江青“倒阁”的阴谋胜利在望。忧的是，周恩来的身体能承受得了吗？据医生告诉他：“总理身体状况很不好，要乘飞机去长沙，怕……”医生话没有说完，叶剑英便果断道：“你们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周总理的安全，这是政治任务。”

周恩来同机的还有王洪文，毛泽东让他和周恩来负责四届人大筹备工作。

长沙，毛泽东对它的感情极深，这是他家乡湖南的省城。青年时期，他在这里读书，度过了难忘的时光——“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毛泽东这次来长沙，住的时间不短。

周恩来、王洪文到长沙略事休息，便去见毛泽东。

“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毛泽东一边摇着手，一边对王洪文说。

“以后不搞了。”王洪文脸红了，红得很明显。

毛泽东接见周恩来、王洪文时，王海容、唐闻生在座。

“明年1月起，外宾我不见了。要求见，我也不见了。我吃饭、睡觉还好，游了5次泳。就是讲话、肺、腿。”毛泽东向周、王说自己的身体情况。话题转到邓小平身上。

“他政治思想强。”毛泽东用手指了指脑袋。

“politics比他强。”毛泽东指着王洪文。

Politics是英语“政治”。周恩来当然听得懂。

“他没有邓小平强。”毛泽东一边说，一边在纸上写了个“强”字。

王洪文十分尴尬，也很紧张。

接着，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四届人大人事安排，说到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以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打断了周恩来的话，一字一句地说：

“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又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了“人才难”3个字。

周恩来说：“人才难得。”

毛泽东把笔放下了。

周恩来报告副总理名单，念道：“邓、张、李……”即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

毛泽东又打断周恩来的话，说了一个“陈”字，即陈锡联。

……

12月28日，周恩来、王洪文离开长沙返回北京。飞机在平稳地飞行。上面，是无边无垠的晴空；下面，是茫茫无际的平原。世界、宇宙多么博大多么深邃。

两人的心情此时却各不相同。王洪文心绪欠佳。周恩来则有一种喜悦宽慰之感。

毛泽东与他们说话的主题很明确：批评江青和他们的那个“四人帮”，赞扬小平并赋予小平更重要的责任。

此次来长沙，毛泽东于12月23日、24日、25日、27日，与周、王两人共进行了4次谈话。

23日，毛泽东要周恩来、王洪文在长沙逗留3天谈谈。24日又说，让他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25日让他们再留两天。27日说，现在没什么要谈的了。

这四次谈话，毛泽东主要谈了这样几个问题：

“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说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能爬起来就好。并举党内斗争历史为例。

对邓小平的评价和担任新的职务问题以及副总理人选。即23日谈话的主要内容。

对江青的批评。毛泽东说他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江青说没有工作做，毛泽东说看资料，研究国际国内问题，然后提意见。说自己多年来就是这样做的。毛泽东说，对江青当然可以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11次路线斗争就不对了。当时，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这一条只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谈，在政治局就不提了。

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3个主题，就搞乱了。毛泽东说，搞乱了，也不告诉他。周恩来说，在一、二月份，江青下达那些指示，开了那样大会，他们也有责任，政治局也没有认真讨论。所以主席离京前约政治局同志谈话时，我说过，有些事是我们“怂”起来的。毛泽东说，说批林容易批孔难。现在五经四书也批了，孔夫子是文圣打倒了，关云长是武圣也打倒了。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谈国际形势。毛泽东认为越讲缓和越各战，现在可以不提当前世界主要倾向是革命，而要强调备战紧张，各国人民对此事要有所准备。毛泽东认为要弄清苏联对我试探的真正意图。毛泽东问，如果勃列日涅夫要来谈，应该怎样？周恩来说，如他真想来谈，可考虑，但我们不能去请他。毛泽东点头。

周恩来把这几次谈话的内容归纳整理了一个提纲，准备回京以后立即向政治局常委传达。

周恩来微微地笑了。四届人大之前围绕人事安排的这番较量，已经有了令人鼓舞的结局：邓小平在党内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有人插手“组阁”但没有成功。如果形势照这样发展下去，就可以比较放心了。

飞机开始降低高度，北京到了。

周恩来一动身去长沙，江青便慌了手脚。她十分敏感：“这是去游说主席，是去‘组阁’了。他临死前还同我们较量……十有八九主席会采纳他的意见。”张春桥更意识到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果真不出所料，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中央决定，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月8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

这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批准李德生辞去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从三届人大到四届人大，经历了整整10年的时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国家政权的象征，法律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已有8年半的时间被实际上废除了。

四届人大的召开表明党内的正确势力力图使国家走上正轨的努力有了初步结果。

当周恩来站起身，准备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全场掌声经久不息。

四届人大产生的国务院领导层是这样一个人选：总理还是周恩来，副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从这个格局看，为四届人大的组阁而进行的较量，以“四人帮”阴谋夺权却败了下来而告结束。

四届人大以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代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并在实际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全面整顿”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邓榕）在《在江西的日子里》说：“在江西的这段时间里，父亲有一个习惯，每天黄昏落日之前，总是十分规律地围着我们那个小小的院子散步。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就在一步一步之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随着前进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确，更加坚定起来。这些思想的蕴育成熟，是否已为日后更加激烈的斗争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呢？”毛毛也知道，答案是肯定的。

从1975年1月起，邓小平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以一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坚定地、有步骤地狠抓全面整顿工作。这一年，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全年工农业总产值4504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工业总产值3219亿元，增长15.1%；农业总产值1285亿元，增长4.6%，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2.8845亿吨，增长3.4%；棉花238.1万吨，下降3.4%；钢2309万吨，增长13.2%；原煤4.82亿吨，增长16.7%；原油7706万吨，增长18.8%；发电量1958亿度，增长16%。基

建投资总额 409.32 亿元，增长 17.7%。铁路货运量 8.67 亿吨，增长 12.9%。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1271.1 亿元，增长 9.2%。国家财政总收入 815.6 亿元，总支出 820.9 亿元，赤字 5.3 亿元。

更重要的是，全面整顿是党和人民反对“左”倾错误和“四人帮”的一场重大斗争，唤起了全国人民的空前觉醒，加速了“四人帮”走向灭亡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 1975 年的全面整顿，就没有 1976 年的伟大的“四五运动”。全面整顿又是后来党所进行的拨乱反正伟大斗争的前导，从思想和组织等方面做了重要的准备。

国务院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从 2 月到 10 月先后召开了解决全国铁路问题的工业书记会议、钢铁工业座谈会、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南方十二省省委书记会议和部分地委书记会议等一系列会议。邓小平在这些会议的讲话中，提出了全面整顿的思想。要点是：

（一）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从现在算起还有 25 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国内也有许多事情要做，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二）全国各方面存在着整顿问题。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都要整顿，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现在的问题是有些班子“软”、“懒”、“散”。经过整顿，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

（三）要安定团结，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闹派性的人有大小野心。争权夺利，耍阴谋诡计，弄得不得安宁，对派性要寸土必争，寸步不让，对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

（四）在整顿中要落实政策。快些解放和使用老干部，发挥老干部的作用。中年干部有比较多的经验，要发挥他们的作用。青年干部的提拔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来，否则不是爱护他。对劳模、老工人，要注意落实政策。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不能把他们叫臭老九。

（五）要抓规章制度。这是保证产品质量所必要的，不能叫管、卡、压。工业整顿后，利润还是要抓。既要抓政治，又要抓利润。

（六）要重视教育。学校教育总的要求以学为主，中心是教育，不能把整个现代化教育水平拉低。要提高教师地位。

（七）要搞好科学技术。科研是生产力，科学落后要拖整个国民经济的后腿。

（八）加强党的领导，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把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坚持下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党的领导怎么行？党讲话不大灵怎么行？”

（九）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学精神实质。要反对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割裂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做法。

“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

以上这些，是全面整顿的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

全面整顿以铁路运输的整顿为起点。邓小平当时指出：“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定决心解决这个问题。”

2月15日至3月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业书记会议。根据会议反映的情况和讨论的意见，3月5日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中央9号文件）。决定指出：“全国所有的铁路单位，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方针”；要改进铁路管理体制，“全国铁路必须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铁路运输必须由铁道部集中指挥，铁路职工必须由铁道部统一调配，铁路的政治工作和运输指挥工作必须统一起来”；“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首先把岗位责任制、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等建立和健全起来”；加强组织纪律性，确保运输安全正点，“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妨碍正在进行指挥、调度和各种勤务的工作人员的正常工作”，“阻拦火车、中断运输、损坏列车和铁路设施，都是违法的，必须坚决制止。情节严重的，要严肃处理。对少数职工利用职权，内外勾结，搞资本主义的行为，必须坚决反对，严肃批评。”“对制造事故、杀人抢劫、煽动停工停产、煽动哄抢物资、盗窃铁路器材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要坚决打击，依法惩办。”

邓小平3月5日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讲话，着重强调了要坚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和增强组织纪律性、坚决反对派性这三条方针。他还明确指出：“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对其他工业部门会有帮助。”会后，铁道部部长万里率领工作组，先后去了徐州、太原、郑州、长沙等地，对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了重点整顿。召开几千人、几万人、十万人大会，反复宣传中央9号文件的精神，发动群众批判派性，落实党的政策，号召广大职工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集中解决领导班子问题，对派性特别严重的领导干部进行严肃的批判，限期改正，到期不改，采取撤职、调离原单位等果断的组织措施，重新配备领导班子。对于极个别煽动闹派性、武斗、停工停产的坏人坚决给予打击，逮捕法办。注意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防止打击面过宽。这些措施深得人心。

经过一、两个月的整顿，铁路运输的形势明显改观。到4月份，严重堵塞地段全部疏通，全国20个路局除南昌外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全国铁路平均日装车数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列车正点率也大力提高。问题最为严重的徐州铁路分局，21个月没有完成国家计划，4月份提前3天完成了国家计划。铁路的整顿立竿见影，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对全国工交战线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与此同时，中央在落实政策、解放干部方面采取了重大步骤。根据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央4月底作出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受审查者予以释放。其中属于敌我问题的，有劳动能力的分配工作或劳动，丧失劳动能力的养起来，有病的安排医院治疗。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妥善安置，补发工资，分配适当工作，党员恢复组织生活。搞错了的进行平反。对于尚不能作结论的，问题在内部挂起来，分别由中组部和

总政会同有关机关再作结论。待工作结束后，中央专案组自行撤销。

根据上述决定，长期被关押的高级干部 300 多人被释放出来，其中一些人陆续分配了工作。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落实干部政策、“解放干部”的一次重大行动。这次落实干部政策是很不彻底的，但是毕竟放了人，对于促进形势继续朝着较为有利的方向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邓小平又将贺诚之女写给他要求给他父亲分配工作的信件转给毛泽东，并对贺诚的任职作了安排。5月17日，毛泽东在军委关于贺诚的任职报告上作了批示：“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傅连璋被迫害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毛泽东也是很痛心的。这一批示又推动了干部政策工作的落实。

毛泽东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文艺萧条的景况，提出要调整文艺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

5月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他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把知识分子说成“臭老九”指出：“老九不能走。”7月2日，毛泽东在林默涵的来信的批语中指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7月初，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时指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7月14日，毛泽东作了关于文艺问题的书面谈话，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他还说：“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

2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对反映大庆工人艰苦创业的电影《创业》大加指责，指使文化部于3月10日提出报告，给《创业》加上了“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等10条罪名，并且停止在全国放映，组织批判。7月18日，电影《创业》作者张天民给毛泽东和邓小平写信，对江青和文化部核心小组对《创业》的批判提出不同意见，并建议重新上演。7月24日，毛泽东在来信上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10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这些讲话、批示，并不是每一条都完全正确（如周扬一案是错案，不存在“从宽处理”的问题）；但是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若干具体问题上能够纠正错误。

5月8日至29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先后有17个省、市、自治区和11个大钢厂及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钢铁工业座谈会。万里在会上介绍了铁路整顿的经验。5月21日邓小平在国务院会议上就钢铁工业整顿发表了重要意见。5月29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在座谈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邓小平的两次讲话，根据铁路整顿的经验和钢铁生产存在的严重问题，提出了整顿钢铁工业的4条办法。

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落实政策；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强有力的独立的生产指挥机构。

在5月29日讲话中，邓小平首次提出与“左”倾错误和“四人帮”作斗争的著名口号“三项指示为纲”。他说：“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

是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的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

历史地看，当时不提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是绝对不可能的。实际上，邓小平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纲。6月4日，中央作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指示》，并批转了中共冶金工业部核心小组《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中央批示说：中央今年9号文件发出以后，整个工业战线的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石油工业一直领先，近两个月煤炭生产、铁路运输也上去了。钢铁生产虽然也有所进步，但上升缓慢。至今还没有改变月月欠产的状况，欠产多的，主要是包钢、武钢、鞍钢、太钢等几个大钢厂，这些企业的有关领导要认真检查：思想政治路线是不是端正？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不是建立起来？派性是不是克服了？党的政策是不是认真落实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是否已予以有力的打击？批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加强对钢铁工业的领导，冶金工业部要帮助各地党委抓好重点企业，国务院应即充实和加强冶金工业部的领导班子。

经过近一个月的整顿，钢铁生产的形势开始好转。6月份欠产严重的几个大钢厂的生产状况逐步向好的方面转变，全国钢的平均日产量超过了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

5月至8月，教育部部长在周恩来、邓小平支持下，积极着手整顿教育工作。他多次召开部内外干部、教师座谈会、汇报会，听取意见，了解情况，针对林彪、江青一伙对教育的破坏，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他指出：“到底在上层建筑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怎么专法，专对了没有？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教育与经济基础，哪些相适应，哪些不相适应？现在一讲教育，好像一文不值了，成不成？”“一讲就讲两个，一个是17年，一个是1972年回潮，就是不讲林彪路线的干扰”；“不能一提知识分子就骂一通，这样符合不符合主席的方针？”“毛主席当时讲的500万，是指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现在我国有2500万知识分子……是否大多数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就不能当技术员，不能当干部，只能回去当工人农民，这样成不成？”“我们现在学校有没有培养干部的任务？不培养干部办大学干什么？”“根本不要文化，就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行吗？”“老说过去是‘智育第一’，根本不是，不对。”“贫下中农为革命种田，工人为革命做工，学校为什么就不能提为革命读书呢？”“有知识的是私有，没有知识的就公有？那不要学校好了！”“大学生上学还要不要改造？上管改捧那么高，还要不要讲世界观改造？”“我们教育革命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的倾向很严重，非出问题不行。”“总理的讲话（指加强基础理论）他们为什么不贯彻？”“去年《教育革命通讯》上刊登的《破‘因循守旧’》那篇文章中，要搬掉一座什么‘其重无比的大山’，究竟要搬掉哪座大山？”6月至10月，《教育革命通讯》连续发表《全国关怀青少年的成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正确道路》、《研究基础理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搞好基础理论研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剖析》等文章和评论。这些文章和评论提出要使青少年“努力学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需要的科学文化知识”，批评了那种“认为坚持以学力为主的原则，努力学习社会主义文化科学知识，重视基础理论课教学，保证教学时间和质量，便是搞智育第一，便是走回头路”的错误认识；批判了“以

干代学”的实用主义货色。并指出：不引导青少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就势必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7月20日至8月4日又召开了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研究军工企业的整顿问题。军工企业自3月起已按中央9号文件精神开始整顿，国防工办也采取“调虎离山”的办法，把各主要企业的造反派头头召到北京开会，办学习班，使生产形势发生了变化。8月3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到会讲了话。邓小平在讲话中，除了再次强调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外，又提出了发挥技术人员作用、坚持质量第一、关心群众生活等重要意见。叶剑英在讲话中指出现在有大小小的野心家，要大家提高警惕。李先念在讲话中指出，要建立健全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的责任制，保证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这次会议后，经过努力，军工企业的生产情况全面好转。

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以毛泽东提出的“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为主题，讨论解决军队的整顿问题，即改正不正之风和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安排超编干部的问题。

早在1975年1月，邓小平在总参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就提出了军队要整顿的问题。7月14日，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要争取时间，抓紧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要抓编制、抓装备，还要抓战略；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讲话分析了军队的状况，切中时弊地指出军队要解决“肿”、“散”、“骄”、“奢”、“情”的问题，军队的领导班子要解决“懒”、“散”、“软”的问题。邓小平语重心长地指出：“现在确实有些值得注意的现象，我们都担忧啊！”“现在军队一些不好的现象能不能克服，几十年的优良传统能不能继承和发扬，主要靠我们这些老同志的传帮带。”

7月15日，叶剑英就国际形势问题、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等问题，作了总结讲话。

7月1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转发了中央军委《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和《叶剑英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邓小平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会议受到全军上下的热烈拥护。会议最主要的成果有二：一是对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迅速作了调整，把一批追随“四人帮”、坚持派性的人调了下去；二是要军队一些负责同志警惕“四人帮”。会议的召开，对于消除林彪集团在部队的影响，抵制“四人帮”插手军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杨成武在一篇文章中回顾了这次会议，从他的叙述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次会议的重大作用，杨成武说：

会上，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军队要整顿》的重要讲话，对“四人帮”作了坚决有力的回击。叶剑英同志针对“四人帮”煽动派性，把全国搞得乌烟瘴气的问题，作了重要的发言，叶帅尖锐地指出：“现在搞资产阶级派性，就是搞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又说：

“军队要高度的集中统一，决不允许有资产阶级派性存在。要使广大干部战士认识资产阶级派性的反动性和危害性，警惕阶级敌人混水摸鱼，乘机进行反革命破坏。”叶帅在发言中，还非常气愤地脱稿讲话，揭露了反革命分子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把军队搞乱的阴谋诡计。他对大家说：你们要注意，现在有的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你们要抵制。以

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会上，徐帅、聂帅也都作了重要的讲话，一致赞同小平同志、剑英同志的意见。

接着，叶帅亲自给各大军区、军种的领导同志打招呼，他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军种一个军种地分别找司令员、政委谈话，传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他跟同志们说：“毛主席说现在有个‘上海帮’，你们要注意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

紧接着，叶剑英同志就全力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头一项重要工作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和军委的部署，调整配备全军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这是为粉碎“四人帮”采取的强有力的组织措施。叶剑英同志亲自拟定了调整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的“六人小组”人员，亲任组长。他还亲笔写了这个名单向毛泽东同志报告。毛泽东同志批准后，叶帅就带领“六人小组”紧张地进行工作，很快地对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

毛泽东强调“三要三不要”

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8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12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对周恩来、王洪文作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毛泽东说：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将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8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读马列主义的书。”

这个“理论”确实很难懂，比如：8级工资制与林彪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有什么联系？

1975年3月1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集团的社会基础》。一个月后，4月1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两位主管意识形态的权威为毛泽东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作了注释。

当然，张春桥、姚文元懂得“理论”，他们对毛泽东的重要指示作了力所能及的全面阐述。不过，理论毕竟是理论，张、姚这些人其实对观念形态的东西并不真正感兴趣，他们更注重现实，他们的理论从来都是为现实斗争服务的。林彪如果上台，搞资本主义容易还是不容易，张春桥、姚文元已经不关心了。林彪早已死了。他们的真正用意，是利用这个“理论问题”，组织一次对周恩来的新的进攻。虽然周恩来已病重住院，但他们并不想给他哪怕是一点点的安宁。于是，他们借机提出“反经验主义”，煞有介事地告诫人们：“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了解党的历史的人都知道，“经验主义”曾经所指哪些人。

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经姚文元审

阅修改后，报送毛泽东。这份报告提出把反经验主义作为学习专政理论的一项内容。

毛泽东阅后，提笔在这份报告上批道：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为盼。

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一种表现，”批评得好厉害！

批经验主义这场刚刚拉开战幕的进攻只好收场了。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很长时间毛泽东没有召集政治局会议了。毛泽东在外地休养了10个月，刚刚回到北京。

毛泽东与周恩来握手。

“快一年没见到主席了，大家想念主席。”周恩来说。

“怎么样？还好吗？”毛泽东关切地问。

“开了三刀，消化还可以，前天向主席报告了。”周恩来回答。

然后，毛泽东依次与各位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握手。

“老师呀。”毛泽东与叶剑英握手。

“小平呀。”与邓小平握手。

“你要挂帅呀。”这是对陈锡联说的。

“最近刚见过主席一次了。”纪登奎对毛泽东说。

“吴德有德呀。”毛泽东握着吴德的手说。

“你的信好啊。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不要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可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不要住在钓鱼台。”毛泽东与陈永贵握手时说。

接着是吴桂贤：“主席好，我是吴桂贤。”

“我不认识你啊。”毛泽东握着吴桂贤的手说。

“我64年见过主席，国庆节参加观礼的时候。”

“我不知道。”毛泽东没有印象。

“延安儿女问候你。”吴桂贤说。

“你是延安人哪？”毛泽东问。“她是河南人，陕西西安的纺织女工，最近到延安去看了。”周恩来在一旁解释。

毛泽东与苏振华握手，说：“管海军靠你呀，海军要搞好，使敌人害怕。我们海军只有这样大。”毛泽东伸出了小手指。

“现在大了点，现在这么大。”苏振华伸出无名指说。

“你当了大官了，不谨慎呀。”毛泽东与谢静宜握手时说。

“我不想当大官，但是现在官做得越来越大。”谢静宜对毛泽东说。

“试试看吧，搞不好就卷铺盖。”毛泽东做了一个卷铺盖的手势。

大家坐下来，会议开始，主要是毛泽东谈话。

“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不能看，我也不能写书，讲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写了。对不起春桥。”

毛泽东开门见山，把今天谈话的主题端出来。毛泽东这里讲的张春桥的文章就是4月1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提出反经验主义问题。这篇文章发表前曾送毛泽东审定，所以毛泽东现在批评张春桥又说对不起张春桥。新华社的文件就是指那份《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求报告》。

“还有上海机床厂的10条经验，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毛泽东又说。

上海机床厂的经验也是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作品。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毛泽东把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都归到修正主义里头。

接着，毛泽东又批评批林批孔“三箭齐发”。

“走后门这样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毛泽东指着王海容。唐闻生。又说：“我也是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他们当了5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毛泽东讲党的历史。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28个半统治了4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毛泽东用手指着周恩来：“你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文章，反对邓、毛、谢、古。”又指邓小平：“邓是你，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教育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因为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毛泽东讲话幽默风趣，这是他的风格。他说教条主义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就举一例，“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

毛泽东重申“三要三不要”，接着说：

“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要照样搞下去呀？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错误，还是自我批评。”

毛泽东又重复两遍“三要三不要”。他说，这三条重复一遍，“其它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这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讲过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毛泽东停顿了一会儿，又慢慢地说：

“教育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在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你们外交部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面向王海容、唐闻生）“讲错了没有？你们两个是臭知识分子，你们自己承认，臭老九，老九不能走。”

毛泽东再次说他犯了错误，对张春桥的文章没有事先纠正。他说：

“春桥的文章是有理由的，因为1958年就写了文章，那时我还不认识他，好像不认识。”

“见过面。”张春桥说。

“没有印象，那篇文章我写了一个按语，人民日报登了，人民日报那时是邓拓管的吧？”

“是吴冷西。”张春桥回答。

“只有两篇文章是拥护的，其它的都是反对的，所以他有气。”毛泽东说。

1958年“大跃进”时，张春桥就主张消除资产阶级法权。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内许多同志都不同意他的观点。毛泽东说的“所以他有气”即指此事。

毛泽东接着说：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知识分子，全是巴克莱学说。巴克莱是美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找来看一看。”

“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江青在一旁问道。

“嗯。”毛泽东回答。

江青进来后，没有同毛泽东握手问候。毛泽东没有注意到江青也来了。江青的一句问话把毛泽东的话题引到她这里来了。

毛泽东说：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工作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她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

毛泽东知道江青也是一个到处鼓吹反经验主义的人。毛泽东批评她既没有斗争经历，也不会写文章，谈不上教条主义，只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毛泽东对江青到处以个人名义送材料、乱发号施令非常不满。他已多次批评过江青，这次又旧话重提。

毛泽东又说：

“这一回跑了10个月，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我在外面养病，我一面养病，一面听文件，每天都有飞机送。现在上帝还没要我去，我还能想，还能听，还能讲，讲不行还能写。我能吃饭，能睡觉。”

毛泽东是1974年7月离京去外地的。临走前，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谈

了一次。10 个月后，他回到北京。这是回京后第一次与政治局委员们见面，所以讲得很多，谈兴很浓。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泽东十分强调“三要三不要”。他从林彪事件中总结出这三句话，定为党内的三项基本原则。

“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

毛泽东接着讲到 1920 年至 1922 年在湖南搞工人运动，讲到当时工人运动比较高涨的几个铁路、矿山。他说：

“水口山锡矿，名曰锡矿，其实没有锡。”

毛泽东顺口念了一首民谣：

无锡锡山山无锡，
平湖湖水水平湖，
常德德山山有德，
长沙沙水水无沙。

毛泽东又对自己所作“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的两句做了解释。

“我说才饮长沙水，就是白沙井的水。武昌鱼不是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在现在的武昌到大冶之间，叫什么县我忘了，那个地方出鳊鱼。所以我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孙权后来搬到南京，把武昌的木料下运南京，孙权是个能干的人。”毛泽东念了辛弃疾的一首“南乡子”中的两句：“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他指着叶剑英说：“他看不起吴法宪。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说吴法宪不行。”

毛泽东让叶剑英念这首“南乡子”。

叶剑英随口念道：

何处望神州？
满眼风光北固楼，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
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
坐断东南战未休，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生子当如孙仲谋。

毛泽东很高兴，对大家说：“此人有文化。”他指的是叶剑英，并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念过的这首词中的那两句，以及吴法宪不行、曹刘为谁的话。

周恩来见时间已晚，便对大家说：“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吧，主席休息一下。”

1975 年 5 月 3 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

对“四人帮”的反击

毛泽东4月23日对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所作批示和5月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谈话，对反经验主义问题作了结论。周恩来考虑，应就如何传达4月23日批示向毛泽东做一报告；在报告毛泽东之前，先在政治局内部通通气。

周恩来提起笔给政治局成员以及参加政治局活动的几个人写信。时间是5月21日。

这封信说，5月3日政治局同志面听毛泽东指示后，周恩来提议政治局常委五人先谈一谈。5月4日、7日谈了两晚。王洪文传达毛泽东指示，说《红旗》第5期发了文章，毛泽东4月23日就不再下达了（这篇文章传达了 this 批示的精神）。于是，周恩来等人考虑中央再发个文件，正面阐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问题，以利于学习和实践。

当时，张春桥说，如搞文件需要一段时间。“此事，请中央政治局同志讨论后报主席。”

周信的这段内容主题很明显：要把毛泽东4月23日对“反经验主义”的批评传达下去。因毛泽东说既然《红旗》已写了文章，批示就不传达了。周恩来就考虑发个中央文件，否则张春桥批经验主义的影响就很难消除。要搞文件，自然是张春桥管的事。但张又说需要时间，这实质是想拖，想不了了之。周恩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让政治局委员们拿出意见。

周信的第二段，先是说明了一下，《红旗》第5期文章提到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时，提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是在姚文元的文章中，而不是在张春桥的文章中，3月份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反经验主义的两篇社论也是根据姚文元的文章引用的。在对此作了说明之后，周恩来指出：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的，是指张春桥在总政3月1日召开的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在信的此处加了一句注：当时还提到江青同志在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在这个会上，张春桥说在批林整风时，他就认为从1959年以后批经验主义不够，所以与周恩来商量将毛泽东批印的《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小辞典》选辑重印一批发行。对张春桥的这些情况，当时认为已弄清楚，就不忙于向毛泽东报告了，现在政治局正式开会讨论毛泽东的批示和指示，周恩来已请王洪文向政治局会议将这些情况说明。

周信的最后提出：“如大家同意，亦请将此报告转呈主席一阅。”

这段内容，是为了把张春桥反经验主义的一些言行提出来，在政治局内部讲明，同时报告毛泽东。

周恩来这封信的台头是：

洪文同志阅后请转政治局同志和参加会议同志审阅。

信先到了王洪文那里。5月22日王批道：

请剑英、小平、春桥、江青、文元、先念、锡联、登奎、国锋、吴德、振华、志福、桂贤、海容、静宜、闻生同志阅。张春桥5月22日在这封信上

批：

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

江青 5 月 24 日批：

许多情况不我了解。同意报主席。

姚文元 5 月 24 日批：

常委会讨论情况不了解。如还讨论个别的问题，建议也说明一下。

王洪文 5 月 24 日批：

继续传阅，传完后送总理阅，是否呈主席请总理定。

这封信几经传阅，又回到了周恩来这里。是否报毛泽东的问题，张表示不反对，但说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姚没有表示态度；王也没拿出意见，让周定；倒是江青表态同意，不过前面也加了一句“许多情况不了解”。实际上她很了解。

“反经验主义”问题，张春桥是主要人物，而且他是政治局常委。

5 月 27 日，周恩来给张春桥写了一封信：

春桥同志：我在五月二十五日收到洪文同志退回我的报告，要我决定是否呈主席。在你的注语中，说我信中有些话不确切。我国头上皮下神经疱疹未好，脚上皮下毛细血管病痛未止，故晚了两天才将当时认为较为确切的语言写出，请你审阅。

当时，你说，由于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时，主席建议印两本书，都在半年读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些组织和同志读得多些和较好些，而哲学小辞典三版选辑却很少有人读，几乎没有什么反映，所以主席在批印的指示时就说：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而后，刘、林反党集团实施阴谋诡计，经验主义者就常常上当，所以你在批林整风时就提出将主席批印《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再印一批发出，这次，主席指示要把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搞清楚，才会防止变修正主义，如果不把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因此，你联系到十多年的思想，经验主义者由于不多读书，难于总结经验，易于上反党集团的当，甚至陷进去，故你在三月一日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片面地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这在三月中各政治部向总政来电反映讨论情况，也可看出。

我这段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写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

如你的低温已退，我很想在今天下午或晚上到你处一谈。盼复！

周恩来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五点半

27日当天，张春桥在这封信上批道：

总理：已在电话商定，不再改了。现退上。祝你健康。

这封信于当天又回到了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即在此信上批了5个字：

呈主席批阅。

5月27日，初夏的季节，北京街道两旁的树木已经绿了。这天，邓小平根据毛泽东5月3日的指示，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

到会的政治局委员，各就各位。人们已经形成了习惯，在座位上也是阵线分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等坐在一排，互相紧挨着。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则坐在另一边。仅在座位上，便摆出两军对垒的阵势。

与会者，不论是哪一方，都面无表情。所有的脑子几乎都在进行着紧张的思考。

邓小平此刻的心情是复杂的。毛泽东让他主持会议批评江青，这句话听起来容易，执行起来可就难了。他意识到，这样做无疑是去捅蚂蜂窝，但他一想到祸国殃民的江青等人，干了那么多的坏事，几乎使国家毁于一旦，他便下了决心，要压一下对方的邪气。

江青心里明白，光和邓小平较量，她可以胡搅蛮缠，蛮不讲理，大吵大闹。但这次是毛泽东授意，不能李逵式地蛮干了，要讲究点策略。

张春桥这些日子心情沉甸甸的。可以说，这是他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最被动、最感压抑的一段时间。身体也不太好，常有低烧。进入1975年，形势愈加令他忧心忡忡，前途莫测啊！毛泽东、周恩来都重病在身，他们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日子不会很长了。问题在邓小平，这个昔日被打翻在地的中国二号走资派居然又重新崛起，而且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处于接班人的有利地位。如果这种态势继续下去，毛泽东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可想而知了。“文化大革命”已经9年。对张春桥来说，也是惊涛骇浪、奋力拼搏、孤注一掷、义无反顾的9年。1966年8月，他从上海来到北京，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央文革那时是毛泽东领导下的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他们这些“革命的笔杆子”和林彪这些人的“革命的枪杆子”紧密配合，实行了一场文斗加武斗的改朝换代的大“革命”。顺王者昌，逆王者亡，八面威风不可一势。九大以后，“笔杆子”和“枪杆子”在权力分配的过程中发生尖锐冲突。毛泽东在关键时刻支持了“笔杆子”，导致了林彪的垮台，为此，他与江青、姚文元受到毛泽东的赞赏，“反刘、林有功”——毛泽东常常这样说他们。但历史常常很难捉摸，十大以后，他们这几个人似乎是沿着一个向下倾斜的路线滑坡。毛泽东对他们的批评多于表扬：批“11次路线斗争”，批“三箭齐发”，批“四人帮”，批“反经验主义”，尤其是这个“四人帮”把他们压得有些抬不起头来。邓小平这个钢铁公司更是立马横刀，步步紧逼，今天又是吉凶难卜。

会议开始后，邓小平说：要安定团结，要“三要三不要”，首先要政治局同志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毛主席告诫、帮助我们，再三讲“三要

三不要”，联系实际讲宗派主义，讲“四人帮”的问题。主席问政治局讨论的结果。讨论，无非是对主席5月23日批示，到会同志都讲了话。有同志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有的同志说是搞突然袭击，搞围攻。其实，百分之四十也没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和过头。无非是讲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有的来自经验主义，有的来自教条主义，这没有什么过。倒是要提一个问题、三件事：批周、叶，……当时钻出一个“11次路线斗争”，这不是主席的，后来主席纠正了；批林批孔，又钻出个批走后门，提到对马列背叛，当面点很多人的名；学理论，是防修、反修，又钻出个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几件事雷厉风行。主席提三个问题，钻出三件事。倒是问一问，为什么？

邓小平还针对“四人帮”强调不要搞小圈子，不要搞宗派，搞宗派、“四人帮”值得警惕。他还强调纪律，说不要以个人名义送材料。

邓小平的讲话没有转弯抹角，虽然远没有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这一些已经很有分量了。

叶剑英、李先念也在发言中向江青等人提出质问和批评。

6月3日政治局又一次开会批评江青等人。会议一开始是无言僵局。张春桥在记录本上写着：“沉默、沉默，又沉默。”

打破僵局的叶剑英，他讲了3个问题。先讲反经验主义问题。他说，3月1日出现反经验主义（指姚文元发表的文章），全国报纸跟着来了，用反经验主义代替反修正主义。不要只提一个，放过另一个。一定要学习，这非常必要。不学好就没有武器。今后中央要带头。有些同志读得多，不必拿来作私有财产。（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剑英的话是够让那几个人难受的）叶剑英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团结。他说，不要分裂，现在不同于庐山（指九届二中全会），那时有些同志商量如何对付林彪，是对的。现在情况变了，过去可以交头接耳，现在如果不变，就不利。过去一个时期不正常，如果继续下去，就有害团结。历来有小组织存在，就会分裂。第三是讲请示报告，严守纪律。叶剑英说，一个时期以来几乎重大问题都不请示报告，“11次路线斗争”，批走后门，批经验主义，都是如此。以后重大问题要提交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要引起严重注意。不要事先不请示，事后来纠正。不要干扰主席，这是最大的干扰。

6月3日的会，王洪文多少作了点自我批评。讲到江青、邓小平的争论，他说他只听一方意见，没听小平意见，觉得应向主席报告。征求过江、张意见，向主席报告是对的，对争论的看法有片面性。到长沙报告主席，受到毛主席批评，错误主要是他。关于反经验主义，虽然没发表文章、讲话，但对社论、新华社报告都看了，没有认识到问题在哪里，也没有引起重视。以后要好好学习。要按主席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的指示办事。对27日的政治局会议的看法，他认为多数同志的发言是好的，对他的批评是难得的。王洪文有两个保留，一是认为确实有干扰（即“四人帮”的错误），但形势总是好的（换句话说，王的意思是对“四人帮”不能全面否定）；二是说11月会议批周恩来，决不能因批评江青而否定这次会议。会议的大方向没有错。

江青也发了言，她说27日的会，自我批评不够，又有新的不恰当的地方，还要加深认识。上次会，她有体温。有些问题还得消化一下。还得看一点东西，再做进一步检讨。

最后，邓小平提议会议结束，讲多少算多少，向主席报告。

5月27日、6月3日两次政治局会议开得是成功的。尽管没有把话全部讲完，“四人帮”也不承认有“四人帮”，但毕竟是在政治局内部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四个人的一次反击。这样的面对面地把问题摆开，使“四人帮”处于一种受批评而不是教训、攻击别人的地位，这还是从未有过的。

不久，毛泽东找邓小平谈了一次。对这两次会议，毛泽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邓小平对毛泽东说：

“会议的情况，主席都知道了。”

毛泽东点头，说：

“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

“最后他们否认有‘四人帮’。”邓小平说。

毛泽东说：

“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就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反陈锡联。要告诉庄则栋，有事要找陈锡联，不要跑王洪文、江青，不然陈锡联不好办事。”

对“四人帮”的成员，毛泽东始终对他们反刘、林给予很高评价，这一点从未含糊过，毛泽东对陈锡联很器重，总是称他为“司令官”。陈锡联，解放战争时期任二野三兵团司令员，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毛泽东在四届人大前亲自提议陈力国务院副总理。体委主任庄则栋有事不找分管体委的副总理陈锡联，而是往王洪文、江青那里跑。5月27日政治局会上，邓小平曾批评过。毛泽东在这里也表了态。

“风向快要转了，在政治局。”毛泽东说。这话说得很形象，而且充分表露出这位中央主席对政治局出现的风向变化所持的喜悦、支持的态度。

“政治局的同志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散了。”邓小平说。

“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听你的话。他威望不高。”

“他最后的发言，政治局许多同志感到不真实。”邓小平这里指是王洪文6月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江青也不喜欢他，专门在我这里告他的状。他应该好好工作。”毛泽东说。

1974年下半年，江青与王洪文曾发生过争论。不过这种争论是同一条战线内部的争论。王洪文与江青的配合不像张、姚二人那么熟练自如。

“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毛泽东向邓小平明确表示。

“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邓小平说。

“那好！”毛泽东很高兴。

“反对的人总是有的，一定会有。”邓小平说。

毛泽东笑着说：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迫于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江青无可奈何地作了一个书面检查：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我在四月二十六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

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得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

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江青的狂妄、狭隘、极强的仇恨心理，使她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这样的压抑。不久，她离开了北京。她想换个环境，找地方宣泄心中的郁积。9月，她到了山西大寨。

评《水浒》含沙射影

除了社会实践，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尤爱读中国历史。光是一部《资治通鉴》，他足足读了17遍。如果不是历史把他造就成为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他可以成为一位一流历史学家。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肌体出现了许多严重故障，心脏、肺、腿都不行，走路需要别人搀扶，说话也已经吐字不清，游泳——他最喜爱的体育活动是绝对不能进行了，即使散步也已经很困难，只有书成了他最好的依伴，卧室、床头、客厅到处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当他已经卧床不起的时候，躺在床上还是要看书。他让人准备了两副眼镜，一副没有左腿，一副没有右腿，以便在两边侧卧时分别使用。书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芦荻谈了对《水浒》的一些看法。芦是有关部门挑选来为毛泽东陪读的，芦荻向毛泽东请教了关于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先讲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然后谈到了《水浒》。芦荻把毛泽东的谈话做了记录并整理出来：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千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会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四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写在前面。

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

毛泽东的上述谈话当天便传到了姚文元那里。

姚文元坐在办公桌前，眼睛注视着毛泽东这几段不足 300 字的谈话，脑子飞快地转动着，考虑如何把这些本来是针对一部古典小说的个人的评论与现实斗争结合起来。

姚文元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已经开始秃顶，身体也已经发胖。其实，1975 年他才不过 44 岁，比王洪文仅大 4 岁。姚文元思路敏捷，文笔熟练，颇有制造文字狱的功夫。1966 年，他只有 35 岁，便写了闻名天下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揭开了史无前例、震惊世界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一年，他一跃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九大以后，他是政治局委员，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的主要工作在北京，主管宣传。

姚文元考虑成熟，立即动手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说：“关于《水浒》的评论‘这个问题很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姚提出把毛泽东的这篇谈话和他给毛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学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

姚文元的这封信也于当天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批示“同意”。

8 月 31 日，当人们打开当天的《人民日报》时，看到在一版头条位置和二版的整版上刊登了《红旗》杂志短评《重视对 水浒 的评论》和署名“竺方明”的长篇文章《评 水浒 》。短评引用了毛泽东关于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指示。两篇文章明显地暗示：评论《水浒》有其现实政治斗争的背景和意义。

9 月 4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于是，毛泽东对一部古典小说的即兴评论在姚文元等人手里起了化学反应，变成了另外一种性质的东西，成了向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发动新的进攻的重型武器。

毛泽东本人当时的的确确没有赋予他的这几段话以特别的政治含义。

9 月 1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大寨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到会的有邓小平、华国锋等，江青也来到大寨。

邓小平强调整顿。

江青则大讲评《水浒》，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

“评《水浒》要联系实际，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有人弄了一些上豪劣绅进了政府！”

江青要求在会上放她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

华国锋请求毛泽东。

毛泽东答复：

“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当江青在山西昔阳大寨污蔑周恩来的时候，周恩来再次病危。

1975 年 9 月 20 日，周恩来进行第四次手术。手术一切准备就绪，周恩来就要上手术台。

这时，一份手写稿件送到周恩来面前。周恩来用颤抖的手在稿子上签上

了自己的名字，并写了这样一行字：

“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

病危中的周恩来漏写了一个“前”字。

在场的人意识到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

是的，它很重要。这是周恩来于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周恩来签署的这份手写稿件，就是这个报告的记录稿，是周恩来委托邓颖超亲手根据录音记录整理的。

周恩来知道，有人要打倒他，即使他活着的时候没有被打倒，死后那些人也不会放过他。而“伍豪启事”问题就是一颗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以用来把“周恩来”三个字炸得粉碎的定时炸弹。这次手术，能不能下来手术台，很难说。他要把事实真相可靠地存放起来，一旦在他离开人世之后，在有人再次借“伍豪启事”陷害他的时候，这些材料就可以为他作证。

“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1931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在上海的党中央机构面临严重威胁。顾顺章家人对中共在上海的领导人的情况十分熟悉。为保卫中央领导人的安全，特科采取了非常措施。顾顺章认为周恩来是这件事的祸首，便把仇恨集中在周恩来身上。顾顺章与国民党特务机构合谋，伪造了《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企图用这种反间计陷害周恩来。这个“启事”首先刊登在1932年2月18日的《新闻报》上。而在这之前，周恩来早已于1931年底离开上海抵达中央根据地。在当时的情况下，各类报纸都不可能再刊出“否认声明”。临时中央决定：请《申报》先转登伪造的“伍豪启事”，然后再刊登一个拒绝伍豪要求否认这个启事的声明。这种巧妙的做法造成了伍豪已在要求否认“伍豪声明”的效果。

这就是所谓“伍豪启事”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这件事又被翻了出来。

1967年12月23日，北京大学6406信箱有人写信给毛泽东，反映1932年2月上海的报纸刊登过《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

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对此信批示：

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毛泽东
一月十六日

1968年5月，国内全面内战，打倒一切进入高潮，又有人向中央反映“伍豪启事”问题。5月13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到今天才抽出一天功夫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二月十八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结果，《申报》二十日、二十一日登出伪造的启事，二十二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拒绝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

事的办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十六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周恩来、赵容（即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我记错了，查遍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向仲发相继叛变后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之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申报》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合订本一册，《申报》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敬礼！

周恩来
五月十九日夜

毛泽东阅后批示：

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康生、江青同志已阅。

这件本来十分显而易见的问题并未就此了结。1972年6月23日，周恩来在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了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到会的有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当时，周恩来曾考虑将他的报告录音复制后分别存放在中央和各省。这一考虑出于什么原因，是不言而喻的。但后来没能这么做。1975年9月，周恩来病危，他委托邓颖超将这个报告录音亲手整理成书面材料，在进入手术室前签署了这份文件。周恩来要把历史的真相可靠地保存下来。

这份由邓颖超亲笔整理的文稿很可能是周恩来一生中签署的最后一份文件。可以把它视为周恩来的“遗嘱”——一份为自己忠诚、清白的历史作证的遗嘱。

死神没有在1975年把周恩来夺走，他是在3个半月之后，在1976年的第八天离开人世的。

